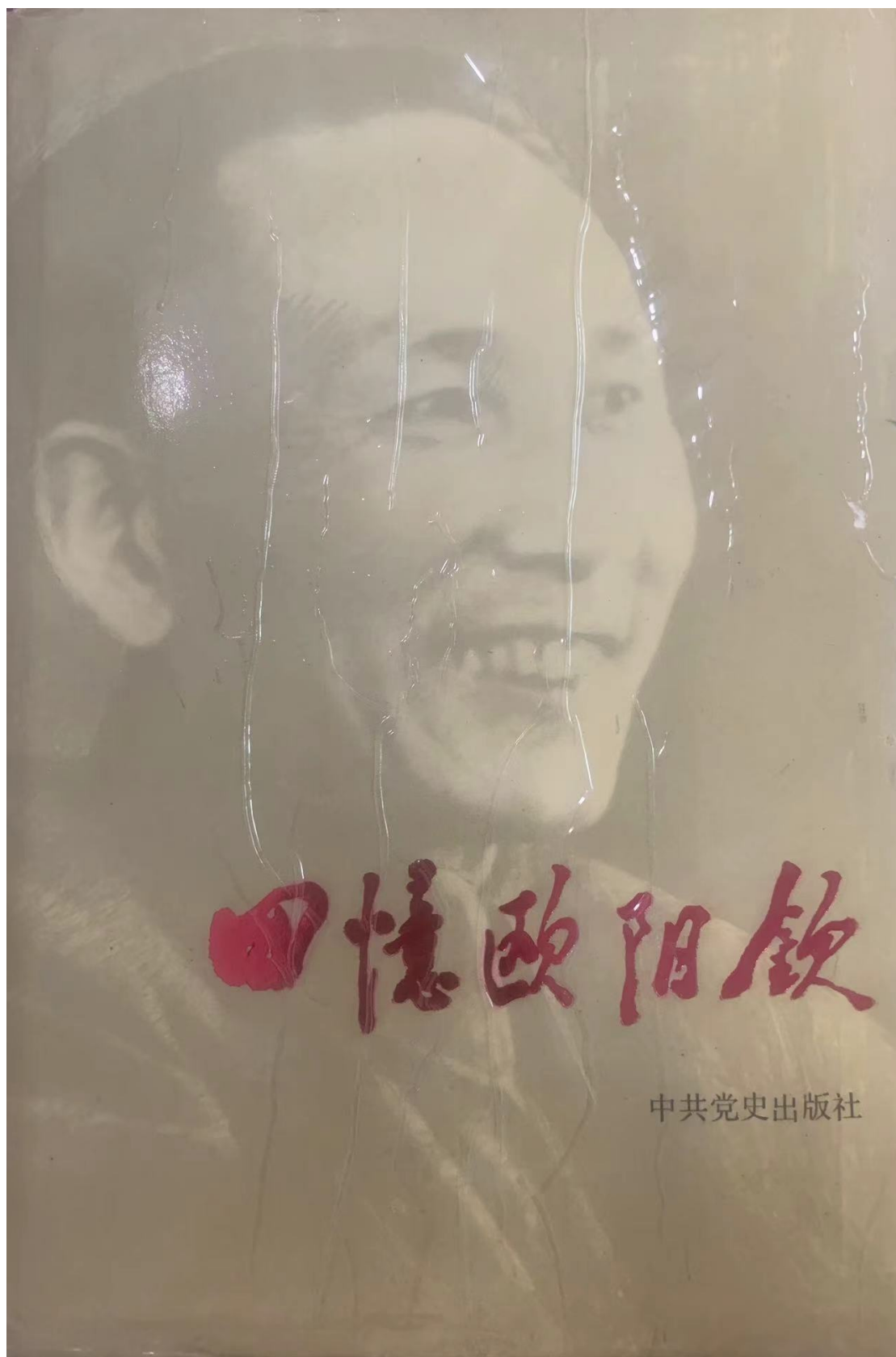




纪念欧阳钦同志

杨尚昆

欧阳钦同志是 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 年入党的老同志，曾先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三军团担任过政治部组织部长和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我们有过一段共事的历史。以后他在西北和东北工作，我们也时有接触。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身体遭到摧残，在 1978 年就逝世了，未能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巨大变化，使我深感痛惜，并时常引起对他的怀念。

欧阳钦同志从法国到苏联学习军事后回国，就在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中央军事部工作，经受了地下工作和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1931 年初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曾直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在这期间奉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苏区的工作。周恩来同志亲自听了汇报，了解到苏区的详实情况后，发出了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中央苏区的成绩和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时指出了反 AB 团斗争中存在着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问题。后来欧阳钦转到军队工作，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对“短促突击”、“拼消耗”的错误战略战术不满，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转到地方，在陕甘省委、陕甘工委、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省委和西北局担任负责工作。抗战胜利后，到冀察热辽分局任秘书长，建国后任旅大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东北局第二书记。

欧阳钦同志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善于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去全面地、历史地观察和分析问题，因而能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就我

所知：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任陕西省委书记时，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严格贯彻党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隐蔽精干”和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保存和巩固了党组织，发展了统战关系；他重视情报工作，在一些重要部门发展了情报关系，有的后来起了很大作用。在冀察热辽工作时，鉴于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他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稳妥地掌握政策，强调蒙汉团结，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1948年任旅大地委书记时，他明确指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要根据这一特点制定工作方针和各项政策，很快统一了干部思想，使旅大工作有很大发展。他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时，提出黑龙江省是个新兴工业地区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并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针，把刚组合起来的两省一市的干部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做好全省工作。这些都反映了欧阳钦同志在领导一个地区工作时，具有掌握全局战略的领导水平。

欧阳钦同志党性强，原则性强，光明磊落，一心为公，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深受同志们的敬爱。在西北和东北，他和高岗两度共事，对高岗的错误都进行过斗争。在“大跃进”期间，他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制止了一些过火行动，减少了损失。对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斗争，他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铮铮铁骨、威武不屈，与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不仅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而且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欧阳钦同志主持一个地区工作总是顾全大局，把地区放在国家的全局中考虑。他反复强调：“全国支援了东北、发展了东北，东北有责任支援全国各地的发展。”对国家建设大庆油田和开发北大荒，他都主动地积极地全力给以支持。在国家粮食供应有困难的那些年里，他提出“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从黑

龙江调出大量粮食支援了全国，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

欧阳钦同志长期做党的工作，一贯重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是专讲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对黑龙江省的工作，他提出“思、农、工、林及其它”的安排次序，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他十分重视学习。在不同地区、不同政治形势和条件下，他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提倡和组织干部、群众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提倡工农学哲学，这些在西北，在大连，在黑龙江都发生了很大影响。我们今天在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下，学习欧阳钦同志一贯重视党的领导、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有重要现实意义。

象欧阳钦同志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们党是不可多得的。他们遗留下丰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他们就在于继承和发扬他们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更好地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我赞成编纂出版《回忆欧阳钦》的文集，并写这篇短文作为追念这位老战友的一瓣馨香。

回忆录

顾全大局 为国为民

王 震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3 年了。在将近 60 年的革命生涯中，欧阳钦同志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和力量。他的不朽业绩、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和深深的思念。

我和欧阳钦同志 1931 年在瑞金相识。以后，在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工作和学习中、大生产运动中，直至 1984 年在大连旅顺、兴安岭修铁路和开垦北大荒的战斗中，我们有过许多工作联系和交往。共同的革命事业，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相知甚深。欧阳钦同志早年投身革命，1919 年与李富春等同志留法勤工俭学，1924 年 5 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巨繁重的建设事业中，他久经磨练和考验，始终保持着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从建国初期到 60 年代，欧阳钦同志长期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东北局第二书记。他立足本职，胸怀大局，自觉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以地方利益服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1954 年 6 月和 9 月，我两次去黑龙江密山、虎林地区，看到那沉睡千年的大荒原还未得到开发，而当时大批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又需要安置就业，我与一些同志认真商量，有了“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想法。1955 年 8 月，我向中央报告了这一建议。当月，党中央正式决定以军队屯垦的方式开发北大荒。从 1955 年到 1958 年，铁道兵先后有 9 个师的复员转业官兵开赴那里。欧阳钦同志对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始终积极支持。他向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和各个部门提出，

要从各个方面支援垦区建设。在充满艰辛的开创时期，黑龙江省及时将大批粮食、副食、日用品和建筑材料等物资送到垦区，还派来了许多专业干部和大专毕业生，直接参加北大荒的勘查和开发。当时有的同志对开发北大荒的意义一时看不清楚，在一些问题上有些议论，欧阳钦同志就积极向干部们宣传开发北大荒对于发展我国农业、巩固和建设边疆的重要战略作用。他充满深情地说：北大荒要变成北大仓了，应当给开发者立碑。欧阳钦同志当年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黑龙江垦区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垦区，拥有耕地 3000 万亩，占全国国营农场耕地总面积的 40%多，是一个以生产粮食和大豆为主的重要商品粮基地，同时也是包括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大型综合性农工商企业，每年向国家提供数十亿斤商品粮，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抚今追昔，当年开发北大荒的数十万官兵和职工，都不会忘记欧阳钦同志的宝贵支持。在北大荒的史册上，将永远镌刻着欧阳钦的名字。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遇到困难的关头，欧阳钦同志总是以大局为重，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替国分忧。1954 年，一些省区遭受了严重水灾，粮食紧缺，中央要求黑龙江省多征购一些支援全国。欧阳钦同志毫不含糊地承担了任务。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本省的情况后，他提出了“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带领干部群众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1960 年，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了保证全局利益，欧阳钦同志提出，从大局出发，积极调拨粮食支援国家，他说：我们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也要节省下粮食支援受灾更重的地区。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黑龙江省出色地完成了粮食调拨任务。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所以能够战胜罕见的灾害，除了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对头外，全党同志心系大局，团结奋斗，

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同样需要全党同志顾全大局，同心协力。

欧阳钦同志常说，顾全大局，贵在“自觉、主动、积极、热情”。为支援大局，他从来不提条件，不讲价钱，不遗余力。1959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了油田，党中央决定迅速组织力量开发。欧阳钦同志随即主持召开了省委专门会议，落实支援油田建设问题，提出了“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方针，当时正值困难时期，黑龙江省各种物资都十分紧张，还是千方百计为油田送去大批粮食、蔬菜、农副产品和其他生活、生产物资。他对余秋里同志说：油田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帮上忙的，就一定全力以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也得到了欧阳钦同志的全力支援。我当年曾对陈赓同志说，如果没有欧阳钦同志的支持，你的哈军工是搞不成的。他说，确实是这样。

自觉坚持全局观念，不仅要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还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在各种具体复杂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欧阳钦同志处处顾全大局，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在谈到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局观念的论述时说：“为了取得胜利，必须懂得全局。因为局部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的，懂得了全局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他经常教育黑龙江省的干部：“全国和全省经济是一盘棋，各级都要服从国家的一盘棋。”“只有大局好了，小局才能好，大局不好，小局即使好也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因而要以大局为重。”他还以黑龙江省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黑龙江是国家工业发展的重点省份，国家“一五”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有20多项安排在黑龙江，国家投资达二三十亿元。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但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而且对壮大地方经济，促进和带动地方各业的发展，发

挥了巨大作用。欧阳钦同志由此指出：黑龙江省能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是国家支持的结果，我们发展了，也有责任支援全国。

欧阳钦同志说的是一个省的情况。实际上，全国各地 4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何尝不是这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而哪一个地区又没有为全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事实告诉我们：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是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整体，全局兴旺了，局部才有生气；局部搞好了，又可以为全局增添活力。因此，顾全大局，不但不会影响地方的发展，相反，只会促进和有利于地方的发展。黑龙江省并没有因为支援北大荒、支援大庆油田、支援哈军工、支援受灾的兄弟省区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尽管他们确实为此付出过许多，但从长远看，这样做既维护了全局利益，又促进了地方的发展。各地的实际情况都能说明这一点。

在欧阳钦和许许多多共产党人身上充分体现出来的全局观念，归根到底，来源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来源于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我们党必须也能够维护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全局观念还是我们现实经济基础和社会本质关系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一致的，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国家必须也能够维护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全局观念是我们党的一个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任何非无产阶级政党，任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局利益和全局观念。保持和发扬这个优势，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今天，我们纪念欧阳钦同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倡和发扬这种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和人民利

益的崇高精神，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奋发努力，战胜困难，做好工作，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真诚永存

张爱萍

1930年，我在红十四军的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地下党江苏省委秘密送我到上海治伤。伤愈后，我请求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省委把我的关系转到中央军委。

这时，省委安排我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邮政总局北侧广东酒家隔壁的新雅宿舍，等候军委来人接头。

初冬的一天，北风乍起，阴云飘浮天空。街头的小贩减少，有那么几个看摊的也戴上了棉帽，穿上了棉衣。大约晚9时左右，忽然有一陌生人来找我。此人，中等身个儿，面庞清瘦，明亮的双眸里透出亲切与和善，年纪约有二十三、四岁，衣着单薄，人很精干。他看了看我说：“你就是爱萍同志喽？”他待我回答后，自我介绍说，“我是军委联络员，恩来同志派我来看看你。身体恢复得怎样？”“谢谢！谢谢！”听说是军委来人，我倍感亲切，由衷感激。请他坐下后，我们便聊了起来。

他比较详尽地了解了我受伤的经过、伤情及手术情况。捧着我的手臂仔细看了看伤口，说：“伤得是不轻。”我说：“离心脏还远呢！”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又一次提出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的请求。他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重返战场当然很好。不过，我作不了主，待我回去向恩来同志报告，尽早给你个消息吧。”

当时，周恩来同志任中央军委书记。军委机构设在上海，秘密统领全国军事运动和全国的红军。

几天后，这位联络员来了。我们此时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他开门见山：“恩来同志讲，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为好！”

啊，“不宜再当红军！”我心里倏然一惊，顿时涌出一股难以按捺的着急。在战争年代，军人的生命光辉闪烁在战场上。离开了战场，何谈军人的价值。我急切地把左手臂伸到他的面前，说：“我的伤已经好了。再说，受伤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断了，还有右手，不妨碍打枪作战。再请你给恩来同志说说，我还是恳求到苏区去，不离开红军。”

“好好，我再去回报。”他拍了拍我的左臂，说：“不要着急。恩来同志说，你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上海很需要人。”他说话沉稳，语气谦和。

我忙说：“前线更需要人。我的愿望是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他赞许地笑了，格外温和。

他走了，我的心里却七上八下。我知道这位联络员同志会给我争取的，但是军委领导人的意见怎么能随意改变呢？二天，三天过去了，那位联络员同志还没有来，我想这回去苏区的希望没有了。我不得不作留在上海的准备。

不料，一个星期后，那位联络员来了。未曾开口就显得十分兴奋：“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

不啻于雾海夜航突然看到一盏明灯，心里涌出股喜悦的浪潮。我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是连声说“谢谢”。

是的，我十分感谢周恩来同志对一个青年人要求到苏区红军去的迫切心情的理解，居然能使这个与他意见相悖的青年实现了意愿，也感谢面前这位联络员同志，他为了让我实现夙愿，不厌其烦地转达我的意见，不遗余力地为我争取。这一次的如愿，成为我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能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

联络员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祝贺后，又告诉了我中央苏区的路线，并嘱咐我耐心等待，秘密交通到来，即可随他上路……。临别，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后会有期！”我还真感到恋恋不舍。我把他送到街口，目送他走进人群里，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

当时的秘密工作规定，对上级派来的同志，对接头的交通员，对方不报姓名时，不要问其姓名。因此，对与我接触了三次的联络员同志，我不知其姓名，只知道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有这么一位待人真诚、态度热忱、工作负责的联络员同志。

1932年秋，我在江西瑞金红军学校参观时，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正是那位联络员同志。意外的相逢，格外高兴。我们两双手紧紧相握，相互交谈了别后的情况，我还急切地打听恩来同志的消息。这时，我才知道这位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欧阳钦就是当年的军委联络员，才知道他当时任军委组织科长。

在红军长征中他任一、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特别是建国之后，我与欧阳钦同志又有多次接触。每次接触，我的脑际都重现当年他当军委联络员时的印象，或者说，几十年来，欧阳钦同志待人真诚、为人谦和、做人正直的性格没有变，对同志极端热情、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没有变。同志间相处应该真诚，难能可贵的是真诚；为人处事应该有负责的态度，难能可贵的是负责的态度。写这篇短文怀念欧阳钦同志，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真诚和他对同志的负责态度。

真诚永存！负责精神不朽！

知交和战友

黄火青

欧阳钦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同志，是我党创建初期的党员。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称得上是我党的一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曾与他三度共事，彼此相知较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同遭劫难。相濡以沫，使我终生难忘。他虽然逝世已经 10 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上我的心头。

一、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

我和欧阳钦最初共事，是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那是 1932 年到 1933 年，当时刘伯承任校长，欧阳钦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党总支书记。我们天天同桌吃饭，一起说笑，特别是刘伯承好讲笑话，常常使人乐不可支，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红军学校在我和欧阳钦初去时只有几百人，到他离任去红一方面军时，已扩大到 4000 多人，欧阳钦在学校扩建及从部队选拔新学员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刘伯承和继任校长叶剑英都亲自给学员上课。学校还常请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来给讲国际、国内形势，学员定期组织政治讨论会，讨论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争等问题，还有危拱之，李伯钊等同志担任文艺委员，常有学员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学校生活搞得很活跃。我们后来在一起时还回忆过那段生活。同时也谈到那时我们执行了“左”的路线。错整了某些好同志，并共同引为沉痛的教训。“左”倾路线的教训使我们都变得慎重和清醒了一些。欧阳钦在旅大和黑龙江主持工作期间，都曾顶风保护了一些同志。1959 年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我们两个人都曾在会上明确表示不赞成在农村搞大食堂，实行供给制以及“吃饭不要钱”，

刮“共产风”等“左”的作法。

二、在冀察热辽

长征到达陕北后，欧阳钦从陕西省委调到西北局工作时，我在中央党校。虽然同在延安，但交谈的机会很少。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先后到了冀察热辽，我任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欧阳钦任分局秘书长兼城工部长，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可以看出，经过白区、苏区、军队、地方等各方面工作的长期锻炼，欧阳钦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导人，他的政治眼光和政策水平给我和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正处于时局急剧变化的时期。抗日战争结束了，许多干部、包括有的领导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政策上，在国际、国内一片“和平民主”声中，滋长了和平麻痹情绪。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调遣和部署打内战的兵力，于1946年1月13日发布所谓“停战令”，更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在此形势下，冀察热辽分局多次讨论和、战问题。欧阳钦同志一再提出，要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不能受他的假和平花招的欺骗，并指出国民党反动军队不断违反停战协定，抢占平泉等要地，我们决不能以退让求和平。果然，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对冀察热辽地区发起了进攻。

冀察热辽地区连接华北东北、俯瞰平津，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是刚解放的新区，汉奸、恶霸、土匪还盘踞农村和一些城镇。为把这个新区变成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清算汉奸，进行清匪反霸。为此，分局和热河省委作出了关于发动群众的指示。欧阳钦参加研究了这一决定，并提出积极发动群众反奸反霸使广大人民翻身，减租减息使群众得到生活上的利益，然后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意见。分局和省委的这一正确决定，当时曾遭到过批评，被认为“左”倾，我们把决定报告中央后，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并转发各地。

在清算斗争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步骤。欧阳钦在土改中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也是很突出的。当时有的地区发生了“左”的倾向，但他在热东领导土改时，在叶柏寿、羊山一带，提出“宁少扣、不扣（地主富农）、勿错扣，牢记不伤中农”和“一切要经群众路线”的口号，因而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土改开展得较好，参军人数最多。冀察热辽是蒙汉共居地区，时有民族纠纷。欧阳钦很注意民族政策，在土改之先揭露蒙奸和反动的王公贵族煽动民族纠纷掩盖阶级斗争的实质，并积极倡议创建蒙汉联军，同时要求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保护牧场畜群，因而在这些地区民族政策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欧阳钦在冀察热辽分局工作时，还很注意整顿党风和干部队伍。他曾在党刊《团结与奋斗》上发表《消除腐化思想》一文，批判了“以为胜利了应该是享福的时机了”的错误思想，批判了“机关变衙门，陈设华丽，铺张浪费，官僚架子，不深入不接近群众，讲个人地位讲待遇，这些人对敌斗争意志逐渐丧失，遇到环境紧张就惧怕困难，甚至临阵逃跑”等危险倾向。分局的同志也都认为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好的队伍，决定利用时打时停的间隙在全地区开展整风学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冀察热辽地区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组建了八、九、十一三个纵队和五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一个炮兵旅，涌现了董存瑞、郅顺义、郭俊卿等许多英雄人物，这中间，也有欧阳钦同志的一份功绩。

三、在东北协作区

在冀察热辽和欧阳钦再度共事之后，他去了旅大，以后又到黑龙江，我则到了天津，只是在中央开会时偶尔见面。党的“八大”以后，我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又和欧阳钦同志共同在东北工作了。我知

道他在旅大和黑龙江都工作得很好，深受同志们的拥护。1958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六个大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以便建立大区的经济体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由欧阳钦任主任，我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任副主任，这时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了。在协作区的工作中，欧阳钦充分表现了顾全大局的精神。协作区一成立，他就提出，在全国的大力支援下建成了东北这个工业基地，现在东北应该大力支援全国。早在1954年他去黑龙江省委担任第一书记后不久，就提出“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积极说服大家完成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协作区成立没有多久，全国就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欧阳钦仍然一如既往，急国家之所急，同黑龙江省的其他同志一起，努力以粮食支援全国，其中也包括支援辽宁，仅1959年就调出粮食30多亿斤。此外，在支援中央调往黑龙江的农垦大军开发北大荒、支援开发大庆油田等工作中，欧阳钦也都是积极主动，全力以赴，全力支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很多心力。协作区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到1960年10月第二次成立中央局时，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的干部就并入了东北局。在欧阳钦主持下，协作区委员会在规划、协调及组织东北三省和内蒙东三盟的相互支援上，都做了不少工作，起了推动的作用，并为新的东北局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东北三省在支援全国的大三线建设上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出了很多人力、物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合作共事也是融洽的、愉快的。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我们这些早年参加革命的人也在经受着考验。在这个考验中，欧阳钦充分地显示出他的铮铮铁骨，显示出他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坚定的原则性。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对把省委的其他书记打成走资派，他也公开表示

反对。他说“我是第一书记，有问题我负责。”“黑龙江省的工作是全省干部和群众干的，我如果说黑龙江资本主义复辟了，就对不起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他自己受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他唯一的儿子欧阳湘也被迫害致死。所有这一切残酷的打击，他都顶住了，挺过来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欧阳钦对老同志、老战友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文革”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们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有十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被召来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和欧阳钦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他谈到林彪时直呼其名。我提醒他在别人面前可不能这样说话。他在病中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批示他可去广东疗养，这本是他解脱出来的极好机会，我要他带孩子去，他却问我去不去，我说我没有条件去，他说“你不去我也不去。到那里没有人说话。”就这样把去广东的机会放弃了。1969年底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我们分手了，我去了辽宁，他去了黑龙江，又遭了一次罪。再见到他时，他已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连行动都困难了。但即使如此，他仍惦念着我。他比我先回到北京，辽宁海城、营口地区地震时，他和他的夫人黄葳同志不仅挂念着在盘锦农场劳动的两个女儿，还挂念着在附近农村的我，四处打电话探问情况，并安慰我的女儿叫她不要着急，直到打听到我已转到沈阳住院，他们才放心。这种几十年共同斗争和几度融洽共事形成的深厚的革命友情，每一念及常常使我激动不已。

令人尊敬的欧阳钦同志

柯麟 陈瑛

大革命及广州起义失败后，组织安排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一家达生医院，由我（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负责。达生医院既是医院，又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党中央经常利用它进行联络工作，中央政治局也常在这里开会。

1928年，我们居住在上海静安寺路锦屏里，当时欧阳钦同志在上海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经常和周恩来同志等在一起，他经常到达生医院与我和贺诚同志联系工作外，还有时到家中向我交代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及布置工作。欧阳钦同志出门时常拿着一把雨伞、一个小袋放点零钱，到码头、车站、小旅馆等，不惧艰险，联络同志。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同志和党中央失去了组织联系。在上海中央做秘密工作时身上不允许带有任何人的姓名和地址，所以欧阳钦同志常向我说“我脑子里装了许多同志的姓名和地址，而这些姓名和地址又经常变动，不能记错。”他以非凡的智慧和记忆力、高度革命责任感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使许多失去与组织联系的同志，能和党中央接上关系，回到党的怀抱里，不仅使这些同志感到党的无限温暖，而且受党组织的派遣奔赴各地继续投入革命斗争。

欧阳钦同志不论和我接触或与其他同志联系，都能为人诚恳、团结同志、关心同志的生活，我们感到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同志，他为革命工作做出很大成绩，我们永远纪念他。

回忆欧阳钦同志

袁血卒

在一个人生的经历中，总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情。我同欧阳钦同志有过两次接触。第一次是1932年，距今59年，第二次是1978年，算来也13个年头了。岁月不居，时日常流，欧阳钦同志生前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如画，历历在目。做为良师益友，他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仍牢记心头。

1931年12月14日，举世震惊的“宁都暴动”取得胜利之后，我在红五军团先后担任第四十四师的三十一团、一二八团团长的职务。1932年春，组织上选派我到瑞金红军学校政治班学习，当时欧阳钦同志任该校政治部主任。

对于习惯了战斗生活的我来说，学校里的学习生活显得有些平淡和单调。但是我深知，反动派的屠刀正挥向苏区的工农兵群众，激战的枪炮还在继续，我们的人民和战士还在流血。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之中。

一天，我进入教室刚摆好学习用具，政治主任教员张如心同志径直走到我的跟前说：“袁血卒同志，欧阳钦主任找你有事，要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迅速整理了一下着装，怀着初次谒见领导同志的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急步朝欧阳钦同志的办公室走去。到了门口，我轻轻敲门喊了声“报告”，随着“请进”的回答，门很快打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个头不高但很匀称，白净的脸庞因长期辛劳而显得有些消瘦，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透出几分英俊和潇洒，身穿一套非常合体的褪了颜色的灰色布装制服，十分整洁、朴素和庄重。脚穿一双八成新的圆口布鞋，使人一见面就感到他是一个精明强干、温文尔雅的政治工作者。

我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敬礼，他一面点头微笑一面亲热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你就是袁血卒同志吧？”我马上回答“是的。”他客气地让我在他的办公桌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这时我抬头环视一下室内，陈设很简单，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地图，桌面上一侧堆放着许多摆得整整齐齐的书报，桌子中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书面上放着一支红蓝铅笔，显然在我来之前，欧阳钦同志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房间不大但很简朴，明亮清爽。

欧阳钦问我：“血卒同志，到这里学习你习惯吗？有什么困难没有？”又问了我的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还特别详细地询问了“宁都暴动”的有关情况以及“宁暴”胜利后我担任团长期间所经历的几次大的战斗情况。

他那笑容可掬的言谈，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使我完全忘掉了与首长初次见面的畏惧，逐一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当我谈到对学校的学习生活基本习惯，但不如打仗痛快时。欧阳钦同志爽朗地笑了。记得他温和地说：“是的，教室里看不到战场上弥漫的硝烟，听不到枪弹的呼啸，也无需你当团长的带头冲锋陷阵。但是，今天学习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还可以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能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记得他还说：“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肩负更重要的责任。以至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当我谈了“宁都暴动”是如何取得胜利的经过后，他感慨地说：“宁都暴动的胜利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我本人也从中受到很大激励。听了你介绍的情况，我更加清楚了‘宁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党的领导是起义胜利的决定因素。若不是党派你们打入二十六军

秘密活动，成立组织，发展党员，进行策反，在关键时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决策，制定计划，周密部署，‘宁都暴动’就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

接着，欧阳钦同志又问了很多问题，涉及十分广泛。记得他问了部队中党的建设及作用、政治思想工作、军民关系和士兵生活以及装备情况等。问得很细，听得也很认真，每当我讲完一个问题，他都插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时而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述着什么。遇到需要研究分析的问题，他又以兄长、以同志和战友的口吻同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记得那天我们谈得很久，要不是公务员提醒，我们几乎连吃午饭也忘记了。

这次和欧阳钦同志交谈，使我受益非浅。他渊博的知识，机敏的思维，雄健的谈锋和深邃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仍记忆犹新。

我第二次接触欧阳钦同志是1978年2月初。那时他刚刚平反不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暂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因等待中央解决长期压在我头上的政治历史问题，也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大概因为早年相识的缘故，我们一见面就象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从瑞金到延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几乎无话不谈。

当欧阳钦同志了解到我背了40年的政治历史包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被施以酷刑，造成致残的悲惨遭遇后，深表同情和不安。他深情关切地安慰我说：“血卒同志，几十年来你九死一生，是幸存者，要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我们的党和人民是公正的，党中央会解决你的问题的，你要乐观，要有信心。”

我虽然知道欧阳钦同志和许许多多的老干部一样，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但当时我并

不知道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他的爱子欧阳湘被迫害致死的冤案也没有得到解决。他把自己的痛苦深深埋在心底。在和我交谈中只字不提，既没有怨天忧人，也没有耿耿于怀。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表现出老革命家的冷静和坚毅。用他自己的话说：“个人的不幸比起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来，算是小事一桩。”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3月里的一天，我突然患病高烧不退，需要马上住院治疗。找组织上派车要等时间，求人又不好开口，因为那时“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有的人心有余悸，怕因为我的问题没有解放，帮助我而受到株连。就在我需要帮助的当儿，欧阳钦同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毫不犹豫，立即叫司机用刚刚分配给他，自己一次还没有坐过的红旗牌轿车将我紧急送到了医院，使我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每当我回忆起这件往事，心里总是热呼呼的，感激之情，难以表述。

我非常怀念欧阳钦同志。他虽死犹生，风范永存！

在欧阳钦指挥下战斗

吴 西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六师是 1933 年 6 月由兴国模范师改编而成的。它是一支英雄部队，在兴国、广昌保卫战以及红军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战斗中，都立了战功。

红六师政治部主任原为曹其灿同志，不幸在保卫广昌战斗中壮烈牺牲。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同志于 1934 年 4 月调任六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在政治部当敌工科长。

欧阳钦来六师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广昌保卫战失利，兴国失守，苏区缩小，几十万敌军重重包围，只有突围是唯一出路。于是，长征开始。当时红军失去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临时中央、中央军委完全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由于他们军事上犯战略战术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保守主义，最后逃跑主义。”红军损失严重，形势十分严峻。指战员对错误领导造成的后果议论纷纷，甚为不满，政治思想工作十分繁重。欧阳钦善于团结干部、爱护干部、使用干部，在他的领导和政治部同志的努力下，使六师全体指战员思想情绪稳定，战斗意志旺盛，政治思想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

当时，我深得欧阳钦同志的信任和重用。他常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除了我本职的敌工工作外，每次行军出发，他还派我做宣传鼓动工作。我和民运科长带着宣传队随前卫部队走在前边，搭起鼓动棚，向战士们宣传不为一时的失利而气馁，不因离开根据地而丧失信心，宣传要取得革命胜利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只有勇敢战斗才有光明前途。活跃了行军气氛，鼓舞了部队士气。

红六师过了赣江，徐策政委、欧阳钦主任要我带领一个特务连作尖兵连。一次夜行军，碰上粤军一个连也在夜行军，我立即指挥尖刀

连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敌人退缩到一个土地庙里，我们包围了他们，并挖墙角向庙里打。结果敌人害怕，投降了，全连交械当了俘虏。我将俘虏带到营地后，向徐策、欧阳钦汇报了战斗经过。他们肯定了尖兵连为部队开辟道路、通过封锁线所做的贡献，但告诉我和粤军这一仗不该打，应该放他们走。对此，我很久没有想通，不理解为什么遇到敌人还“不该打”，还要“放他们走”？直到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学习总结长征历史经验时我才知道，当时红军与广东陈济棠有默契：红军不深入广东，不打粤军，粤军也不打红军。回忆当时我们经过广东北部边区时，广东商人还卖给我们日常用品，粤军确实没有追打我们。当时，这是很高的机密，只有师以上领导掌握，所以徐政委、欧阳钦主任只指示我们“怎样做”，而没告诉我“为什么这样作”。可见，他们有很强的党性和极高的组织纪律性。

1934年11月下旬，我军已突破敌军的三道封锁线抵近湘江。三军团首长急令红六师十六团跑步折回灌阳阻击敌人。欧阳钦主任对我说：“吴西同志，掩护‘红星’（中央纵队代号）渡湘江，至关重要。为了加强领导，师党委决定，派你带青年干事刘西元随十六团行动。”十六团连夜跑步到了灌阳，扼守在城外一个小山头上策应掩护最后通过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我和十六团党总支书记黄振棠在阵地上做战前动员工作。灌阳城里敌人是桂系第七军夏威的两个师。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矛盾重重。蒋介石命令他们阻击红军，他们知道红军士气高昂，英勇善战，既怕全力堵截损兵折将，消耗实力；又怕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为名，进入广西。所以，他们希望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都快点离开广西。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桂系军队没有来进攻我们，而是悄悄地从灌阳向南撤走了。

当天下午，八军团六十二团来接我们的防地，继续监视敌军并掩护八军团队伍通过。我们则快步向湘江方向疾进。部队已四天四夜没

有睡觉，拖着疲劳困倦的身体从灌阳、界首之间穿过，一路小跑，要抢在敌人之前到达湘江东岸。我两腿像灌铅似的走着，突然，听到“扑通”一声，原来是刘西元同志掉进沟里了。我使尽全力把他拉了上来。记起欧阳钦主任派我来十六团时的嘱咐：掩护“红星”渡江的任务至关重要，到十六团去加强领导，一切行动起模范作用。我立即提起精神来，大踏步地向前走，同时鼓励、搀扶掉队的同志。到了湘江东岸，听到“红星”已安全渡江西去，我们才放下心来。团长命令战士们解下绑带，接起来，一个挨一个牵着涉水泅渡，无一伤亡的渡过了湘江。我们找到师部，见到了欧阳钦主任，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我们十六团虽然安全顺利地归还了建制，但是十七团和十八团在掩护“红星”渡江后，作为后卫部队，又掩护红八军团渡江，在几昼夜敌众我寡的浴血战斗中，许多同志壮烈地牺牲了。欧阳钦主任交织着喜悦和悲痛的心情总结说：“十六团艰苦卓绝阻拦敌人追击，十七、十八团不惜牺牲一切奋勇杀敌，‘红星’能安全渡过湘江，和我党、我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作为我的直接领导，欧阳钦同志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坚持原则，有很强的党性。既严格要求别人，更严格要求自己。他政治水平高，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客观、全面、深刻。他作风民主，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总是以普通红军战士的身份战斗在群众中。他年纪比我们大，身体比我们弱，但在行军中，经常见到他艰难的跋涉，却把马让给生病或掉队的同志骑。

部队到达扎西后，进行了整编。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欧阳钦回到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我被分配到红十三团当敌工干事。从此，我很少见到欧阳钦同志了。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几次想去看望他，都因学习紧张而未如愿。建国后，他在黑龙江工作，

又因相距太远，未曾谋面。

打倒“四人帮”之后，他来北京，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曾两次去他家看望。没有想到，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残酷折磨，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今天，为他出版回忆文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写此文，寄托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回忆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同志

黄振棠

欧阳钦同志和我是 1934 年 4 月江西广昌保卫战后，先后调到红六师的。广昌战役，我军打得坚决、顽强，在敌我众寡悬殊下，苦战 18 天后撤出广昌县城。在给敌人重大杀伤的同时，我军也伤亡很大。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同志壮烈牺牲，由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继任。我也派至六师十六团任总支书记。

5 月 3 日我到六师政治部报到。先见到组织科曾科长，湖南人。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十六团干部和党团组织情况，当讲到广昌战斗我师虽伤亡很大，但部队战斗情绪很高昂时，他十分振奋。我们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一直谈到吃午饭后，他才领我去见欧阳钦主任。一见面欧阳钦主任劈头就问：“你在军团政治部当过宣传队长？”我当时一愣，这位主任真厉害，没见面就将我的情况摸去了！于是我立即回答：“是的，但时间很短。”欧阳钦接着说：“当前敌军集中 50 多万兵力，新式武器装备，还有外国军事顾问，正对我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次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战略，步步为营，企图逐步压缩苏区，最后占领苏区。敌分兵四路，又有空军配合，形势十分严峻。我军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和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我师到西线去，就是去兴国那边执行新任务，归江西军区陈毅司令员指挥。部队去兴国有许多有利条件。我师战士、干部绝大多数是兴国人，了解那里风土人情，熟悉地形道路，子弟兵回去会受到热情欢迎。群众越欢迎我们，我们更要注意纪律，多帮助群众做事。军民鱼水情么！有机会在干部群众中安排时间多讲讲，引导大家努力去做群众工作。政治方面，首先要注意上下团结，特别是各级干部的团结，领导班子团结了，才能打胜仗。中国有句老话‘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现在团结更为重要。其次，要有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特别是要发挥连队中党支部的领导作用。第三，每到一地先要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是遵守纪律和奖罚严明。我师前身是兴国模范师，对自己家乡更要做得好一些，给群众一个好的感觉。第四，团结友邻部队，尊重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谈的时间不短了，你还要赶路。最后谈一点对敌军工作。现在是堡垒对堡垒，要有计划地向敌人喊话，宣传我军对敌政策，欢迎敌军过来当红军和我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欧阳钦主任的话，使我了解了当时形势的严峻性和任务的艰巨性，明确了政治工作重点。谈完后，我问：“是否去见一下师首长？”他说：“他们都在开会，我转告他们。以后有机会见面的。”我说：“请主任和师首长放心，我会尽力去做好工作，请首长们多帮助指导。”我离开师部时，欧阳钦主任还派一个通信员送我到团部。路上我一直在思虑如何贯彻落实欧阳钦主任的重要指示。

到团部见到李寿轩团长和刘随春政委，我当即将欧阳钦主任的指示向他们作了汇报。当晚，在政治处开了一个会。刘政委把我向政治处的同志介绍说：“黄振棠同志来我团任总支书记。”大家热烈鼓掌。刘政委继续说：“振棠同志到师部时欧阳钦主任有重要指示，现在请振棠同志传达。”我详细地传达了欧阳钦主任指示后，强调了当前要抓的三件事：一、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二、我师暂时离开军团去西线作战，在陈毅司令员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英勇杀敌。三、兴国是模范县，我们是兴国的子弟兵，军民合作，保家卫国，借助兴国力量，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并说：“欧阳钦主任为我们分析敌我形势和双方实力强弱，虽则敌众我寡，然而我军有高昂的士气和鱼水般的军民情义，还有在兴国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战略战术正确，是可以以弱制强的。”欧阳钦主任的指示大大鼓舞了战员的士气和必胜的信心。

部队开抵兴国地区后，先后与敌人多次交锋，我师指战员个个顽强拼搏，重创敌人。但当时由于已失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命令红军硬打硬拼，致使我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苏区，踏上长征道路。

长征路上，三军团负责掩护中央纵队突破重重封锁线，安全渡过了湘江。红十六团在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和在灌阳拦住敌军追击，确保中央纵队渡江的安全立下了战功。

长征到达遵义后，红六师驻遵义尚稽镇担负警卫遵义会议的任务。会后，刘少奇同志向我们简要地谈了军事领导问题和战略问题。大家听到毛主席回来重新领导我们，都踊跃欢呼。

扎西整编，红三军团撤销师的番号，编足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团，直属军团领导。我调至十三团，欧阳钦主任回军团政治部组织部任部长。我离开了欧阳钦主任的直接领导。

岁月如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成为历史，回忆起往事，欧阳钦主任的音容笑貌，依然那么亲切似在眼前。初见面时他那番热情、坦直的谈话，至今犹在我耳边萦绕，永远激励着我为人民、为党贡献我毕生的精力。

良师益友

汪 锋

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之间，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 12 个年头了。但回想起我和欧阳钦一起生活、战斗的年代，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却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我和欧阳钦早在 30 年代就已相识。记得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由红军转为地方工作。1935 年 12 月 5 日，我奉毛主席之命，到西安同杨虎城联系，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出边区时，同欧阳钦见过面，从西安回来，又和他见面并送给他一支钢笔，当时，边区物质条件艰苦，钢笔是工作必需之物，所以他高兴地收下了。但我们真正在一起共事，则是稍后的事。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后，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成员包括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李一氓、赵伯平等同志，贾拓夫任书记，欧阳钦曾担任统战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39 年 5 月，拓夫调往延安中央西北局工作，欧阳钦接任省委书记，即省委工作由欧阳钦主持。此前，我已于，1937 年的 7、8 月间经省委派往山西前线，在杨虎城部做党的工作。这时，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等许多领导同志均在山西，我曾向他们请示汇报过工作。1937 年 11 月太原失守，我又和北方局的其他同志撤到晋西，过冬后到晋南，春节后经洪洞县回到西安。在前方的一些情况，当时就是向欧阳钦同志汇报的。1938 年 1 月，我接替了他的省委军委书记兼统战部长职务。

迫于国民党在西安反动势力的压力，省委机关于 1937 年下半年从西安搬往云阳。此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嚣张，湖南、河南的两个八路军办事处相继被国民党捣毁，很多同志惨遭不测，中央指示陕西

省委撤往边区，欧阳钦即于 1939 年 12 月带领机关进入边区的淳耀县安社村。我迟走了一二个月，一是因为我带着队伍，马上走不开；二是因为当时被称作“友军”的赵寿山部队驻在云阳附近，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估计不会发生问题。在云阳期间，欧阳钦曾几次主持会议，讨论省委参加党的“七大”的人选问题。到了 1940 年，随着敌人步步进逼，国民党搞摩擦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企图一点一点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省委调出自己的警卫部队（共计两个连，战斗力较强）反攻爷台山，吃掉敌人一个民团，又配合当地军民，收复了照金，欧阳钦率省委迁至照金。在这里住了一年之久，我们又收复了马栏和耀县柳林镇、庙湾等老区，保卫了根据地。此后，战争打打停停，持续了数年。至 1944 年，敌人派出一个师反扑，抢占了一些地方，中央派张宗逊同志率主力部队支援，将来犯之敌击退。

这些地区，是摩擦与反摩擦、蚕食与反蚕食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关于这一地区的战争，根据地和国统区的报纸都有不少报道，影响很大。美军军调处的顾问小组曾来这里调查，为他们做翻译工作的是黄华同志。

在这一段长期、艰难而复杂的斗争中，欧阳钦作为省委的主要领导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他既坚决、果断地开展对敌斗争，又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了敌人，又教育了群众；既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又能与当时、当地的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在反摩擦、反蚕食、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可以说是有功于党，有功于人民的。在和欧阳钦同志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欧阳钦早年留学法国，1924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当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他还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里）

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意志极其坚定。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使他得以胜任党的重要工作，也使他个人赢得了同志们的尊重和信赖。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他经常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讲述长征中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用理论和实践教育帮助干部群众提高认识，特别是提高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对大家帮助很大，我个人也受益匪浅。

欧阳钦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忠诚，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既没有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又没有首长架子。他为人正直，对同志襟怀坦白，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体贴照顾。和他共事的同志都感到愉快、舒畅。

欧阳钦又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铁面无私。记得中央决定改编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时候，杨虎城的部队也奉命进发山西。但杨部的一名军官（中共地下党员）却害怕与日寇决战，临阵退缩。欧阳钦对此十分生气，力排众议，坚决将其清除出党。

1941年7月，欧阳钦离开陕西省委，调中央西北局工作，先后任四局副局长、副秘书长，仍分管陕西党的工作，我们工作上的联系不曾中断。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调他到东北工作，虽极少见面，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一直保持着，直至“文革”开始，天各一方，身陷囹圄，音讯中断。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新疆工作时，才惊闻欧阳钦同志突然逝世的噩耗。当时由于工作紧张，未能脱身，只是献了花圈，发了唁电，寄托哀思，终以未能参加遗体告别和追悼会而感到惋惜。

斯人已去，音容宛在，业绩永存。谨以此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欧阳钦同志。

学习欧阳钦同志忠诚正直的品德

马文瑞

时间过得真快，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文革”后我出来工作不久，听说他病了，就到医院看望他。他虽然身体不好，但见面时仍象过去一样嘻嘻地笑着，那乐观和善的面容，至今还那么真切，好象就在昨天。

我和欧阳钦是老熟人。长征结束后不久，我们就相识了。那时他任陕甘省委组织部长，我任陕西省委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长。1936 年 5 月，党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任书记。按中央指示，地方也成立了工委，陕甘工委由欧阳钦任书记，安塞工委由我任书记。虽难得见面，但都是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我真正同他在一起工作，是在 1944 年夏至 1945 年 10 月之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他先后任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副局长、副秘书长、秘书长，我则在西北局组织部任职。欧阳钦为人忠厚正直，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原则性强；工作勤奋认真，一丝不苟；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自我批评；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素，关心群众。共事当中，有几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至今难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上述品质和特点。

记得有一年夏天，延安地区下了大暴雨。欧阳钦得知一些地方山洪暴发。来势凶猛的洪水冲垮房屋，淹没道路，毁坏桥梁，他十分着急，担心分散在各山坡、沟沿窑洞土屋里的干部、群众的安全，立即给各单位打紧急电话，询问情况，下达指示，督促有关领导进行防汛安全检查，对危险，易出事故的地方，要求马上采取应急措施，防止伤亡事故的发生。屋外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哗哗一片。为使对方听清，他对着电话大声喊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查问布置。待他把电

话打完，自己已满身汗水，嗓子嘶哑，精疲力尽了。

那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由于国民党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土地又贫瘠，只有 150 万人口，要保证驻延安的中央机关、学校（当时在延安的大学就有 10 多所，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保卫边区的部队的吃穿供应，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多方筹措经费，保障供给。但也有人为了急于筹措经费，干了违纪的事情。中央下令纠正。西北局办公厅有个生产科长，叫赵新民，没有立即停下来。在一次会议上，西北局书记高岗提出：“把赵新民抓起来！”在场的人都没有说话，只见欧阳钦站起来说：“我不同意！他的事我们都知道，要说承担责任，首先应由我们来承担！”欧阳钦个子不高，脾气又随和，高岗有时跟他开玩笑，搞个恶作剧，如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扔到院子里。他过去把帽子拾起来戴上，一笑置之，也不与他计较。这次事关下级同志的政治前途，他毫不犹豫地顶了高岗，担起责任，保护了同志。

欧阳钦 1943 年曾在边区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党的工作作风问题》。时间过去了近 50 年，现在翻看，其中的不少见解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报告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党的工作作风也是个思想问题”，认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思想方法是马列主义的，那么，表现在他的作风上，一定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作风问题是个思想问题”。他的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又如，报告在谈到党的决议、政策贯彻不好的原因时，他归纳了四点，现在不妨将要点摘录如下：

- 1、我们对党的决议、指示执行还不太忠实，党的决议是党的行动方针。如果党的命令不执行，党就没有什么了，党就是靠着决议、指示来领导的。如果不尊重党的决议，就是不尊重党。

2、研究党的决议案很不够。党的决议案是从实际中来的，是从实际经验中抽出来指导实际的，而我们对决议案没有研究，没有经常去研究，没有逐字逐句去研究，没有根据自己具体的环境去研究，订出执行计划，而是一般的传达传达。有时看了放在柜子里，置之高阁。

3、我们的组织机构、领导机构还有毛病。首先领导上没有一元化，没有贯彻好一元化，因此有时互相推诿。其次，领导机关有头重脚轻的毛病，上面很重，下面太弱，决议没有办法执行，也不知道怎样执行。

4、最后，干部还缺乏贯彻的决心，实质是自由主义作怪。明明开了会，大家举手赞成了决议，也知道了这个决议很好，但就是不去作，这不是自由主义态度吗？

欧阳钦的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在报告的最后，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上面很多批评是连我也包括在内，绝不是只批评别人。我对各方面的情形也不大了解，粗枝大叶的毛病特别厉害。比方，我到陕西工作已经六年了，到西北局工作已经一年多了，我对边区的情形还不大了解，了解一些都是一般的，很浮浅。”他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是襟怀坦白的，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1942年到1944年的延安整风，的确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统一了思想，为以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在1943年后的审干当中，康生却别有用心地污蔑中共陕西省委地下党是“红旗党”（意即“举着红旗反红旗，名为共产党，实是国民党”），打击了地下党的许多好干部，有的同志甚至因此受到关押。欧阳钦、贾拓夫等同志曾多年在陕西省委工作，也在被怀疑之列。欧阳钦受到很大的

精神压力，心情很不舒畅，但他没有消沉，也没见他发过牢骚、讲过怪话。他仍象往常一样勤奋地工作，把他负责的西北局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后来说过：“一个人被人误会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是有了深切体验以后说的话，也反映了他那时的心态，那时他就是这样做的。直到1944年冬，中央负责人之一任弼时同志找他和贾拓夫去谈话，他才对贾拓夫说：“要谈就好，我们担着风险，艰苦工作，革命了多少年，竟革成了‘反革命’，我们要说说去！”当他从任弼时那里回来，情绪大变，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原来弼时同志代表中央给他们平了反，背了多年的“黑锅”一下子卸掉，浑身轻松，他怎能不高兴呢！

在当时战争和边区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在生活上照顾少部分领导同志和生病的同志，许多单位有个小灶，比一般干部吃得略好些，西北局也不例外。在小灶吃饭的10多位同志，由于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有的同志常提这样那样的意见，而欧阳钦作为西北局秘书长，身体不算好，总是做什么吃什么，很少作声。

建国以后他长期在黑龙江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我也受“四人帮”迫害多年，“文革”后才见到他。他正直的品质，坦荡的胸怀，以及对革命的耿耿忠心，象他和善的笑声一样，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知音

罗青长

欧阳钦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仅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襟和高风亮节在党内赢得“忠厚长者”的盛誉，而且也因其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堪称为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知音。

抗战初期，欧阳钦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期间，曾在国民党军队和其它一些重要部门发展过许多重要的情报关系，其中包括深受胡宗南信任的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

戴中溶，上海嘉定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毕业后由学校推荐，至甘肃天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工作两年，负责电讯技术。以后又在复兴社头子之一康泽主持的庐山海会寺特训班任教官。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和围困陕甘宁边区，将胡宗南从前线调回西安，从此，胡开始坐镇大西北，拥兵数十万，设置千里封锁线，与延安直接对峙。不久胡部即扩充为三十四集团军。随着胡宗南统治地盘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解决电讯联络问题。胡宗南用人重“黄陆一浙”（黄埔生、陆大生、第一师故旧、浙江同乡），戴中溶是第一师时期的老人，技术精湛，人缘好，是难得的人才。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胡宗南又重新召回戴中溶，并委以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科长之职，同时还兼任无线电训练班副主任。

重视对敌隐蔽斗争和信任、重用知识分子，是欧阳钦同志的一贯工作作风。1938年8月，戴中溶的妹妹、我地下党员黄葳同志（原名戴中宸）从武汉去延安经西安时，因革命形势变化，民先组织由公开转向秘密，组织决定黄葳（改名陈源）留下，以中学教员身份作掩护，任民先西北队部妇女部长。是年11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决定

转变民先队组织（即以各种形式分散进行工作），黄葳去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看望同学后，又看了戴中溶。戴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后黄葳调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见到欧阳钦同志时就提出戴中溶拟改名“黄甦”要求去延安的问题，并介绍了他的情况。

欧阳钦全面了解了他们家庭、经历、思想情况和革命意志。黄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1936年入党，经过长江局秘密党员训练班培训，政治上很坚定。戴中溶还有个弟弟戴中孚，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1930年入党。戴中溶的经历和背景都很复杂，但不失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刚到胡宗南部时，他就向胡口头表示：一不加入国民党，二可不参加“总理纪念周”，三可不穿军装。以示不问政治，专攻技术。胡点头同意。事实上，由于他在胡部机要部门工作，更了解国民党反革命内幕和黑暗腐败的丑闻，又受到弟妹的影响，他对我党的事业怀有深切同情和了解，不愿再留在国民党部队工作。欧阳钦经过周密思考，认为如能将戴发展为我情报关系，对于对敌隐蔽斗争将十分有利。因此，出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欧阳钦派黄葳多次去胡宗南部与戴中溶联系（胡部机要室主任王微抗战前驻北平时，黄葳和戴中孚曾以清华教员和戴中溶弟妹身份看望过王微夫妇，所以黄葳到胡部不受嫌疑），并及时向中央做了详实汇报，建议让戴中溶继续留在胡部发挥作用。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知道，国共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后，一方面加强了抗日力量，另一方面，在党内王明极力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引起一些同志忽视隐蔽斗争，并造成了不少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进行了反对党内新投降主义的斗争，最终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欧阳钦亲身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分裂，有在白区、

苏区和国外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他深深体会到对敌隐蔽斗争在党的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对戴中溶的使用这件事上，足以体现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的远见卓识。

1939年到1941年，我在西安曾代表组织与戴中溶发生工作关系，深感他抗日态度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同情我党。后来我又把从延安派来的王金平（即田光）同志介绍给戴做副官。二人密切配合，战斗在“西北王”胡宗南的心脏里，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曾多次为组织上购买国民党特务控制很严的电讯器材，同时还将胡部的电讯联络情况、战斗序列、进攻延安前夕的军事动向等情报及时报告延安，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

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戴王二人继续在胡部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曾于1984年8月刊登当年胡宗南占领延安时的延安市市长陈绥民（即陈大勋）的文章《延安的克复与失落》，文中写道：“……我军后来之节节失利，主要在收复延安之后之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原文如此）二人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功亏一篑，且有后来瓦子街一役，我九十军尽入共军口袋战术中而全军覆灭之惨痛教训。”又言“……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复为共谍戴仲容等所渗透，以及西安电讯局科长方某亦为共谍，致使后方军政措施与兵员调动，均为共方所洞悉。……”

陈文将延安失落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戴中溶等人的“渗透”，固然失之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党情报工作在西北解放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47年10月初，因地下组织遭破坏，戴中溶等被捕。戴在狱中表现很好，甚得难友们的好评。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才出狱。在“文革”中的1967年6月，戴中溶同志被中科院“造反派”诬为

国民党的最大军统特务，欧阳钦同志和黄葳同志也因此案受到牵连，遭到迫害。聂荣臻元帅把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周总理，周总理非常关心此事，向我查询后，当即批示“戴中溶早与我党有联系，过去对党有贡献”。林彪、“四人帮”一伙虽一再阻挠总理批示的执行，但这一冤案最终还是得以平反。

回忆这段往事，谨表达对欧阳钦的敬佩和怀念之忱。

向欧阳钦同志学习

常黎夫

欧阳钦同志在青年时代出国，留法勤工俭学达6年之久。1924年他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将近60年的革命历程中，艰苦奋斗，功绩卓著。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但他那待人慈祥恺切，处事冷静沉着的声音风范，宛然在目。今回忆记述我同他交往中的二三事，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

我初识欧阳钦是在1937年3月间。那时我刚从延安回到西安。张德生同志告诉我，贾拓夫、还有一位同志一起想同我见面谈谈。我们商量好用聚餐形式相会。届时我们在义香楼借吃牛肉煮馍聚会。他们三人中除贾拓夫、张德生外，另一位就是欧阳钦同志。我简要向他们汇报了去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宜君、中部（今黄陵）等10县的情况，讲述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给这些县派的新县长到任后同驻地我党、我军相处关系情况（杨虎城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任秘书长时，和我党商量后委派的进步人士。我以省政府视察员名义去视察各县，沟通他们同我党地方组织的统战关系），我还谈了在延安会见我党中央领导人的感受。大部分时间是他们向我讲述红军在长征中的许多动人的事迹。1937年春至1938年春，陕西政局形势尚好。在此期间，我和他们三人继续采取聚餐形式相会交谈过几次。每次总是交谈一些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陕西省党、政、军方面的一些情况信息，不谈具体工作问题。这个期间，我同中共陕西省委的关系，是直接和张德生保持联系（每周至少去他的住处一次），我同欧阳钦单独见面交谈工作问题只有两次，都是到谢华住处（北大街通济坊），

商量帮助谢华、徐彬如解决经费等问题，保证省委刊物《西北》如期出版发行。

1938年，在张德生离开西安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同欧阳钦保持直接的联系，10天左右碰头一次。地址先在莲湖公园湖边亭子里（距欧阳钦的住处很近），后来欧阳钦搬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地下室，我去那里同他接头。秋后，我去办事处已很困难，不久他也离开西安。我同省委只能靠专门指定的交通联系（如宋志远、聂景德等），或通过办事处周子健同志传递。在多次同欧阳钦的交谈中，他对形势问题的分析和具体工作的指示总是言简意赅，精辟透彻，使我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例如：1938年夏，西安形势逐步恶化，国民党陕西当局限制抗日救亡活动以至下令解散十三个救亡团体，并先后逮捕了何志诚、于志元、蔺克义等青年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欧阳钦在省委机关刊物《西北》第十七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意见》专文，向国民党陕西当局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和要求，指出：“真正的青年统一运动，以及一般的救亡统一运动，必须包括一切有群众基础的真正救亡团体在内（不论合法的非法的，非法的应给以合法），采用民主的方式，以产生共同行动的纲领与共同的领导机关，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之下，更进一步地精诚团结起来。”在这期间，欧阳钦还指示我，通过杜斌丞、韩兆鹗发动爱国人士支持各进步青年团体继续坚持抗日活动，并同情由各青年团体与国民党当局展开要求释放被捕爱国青年的斗争，迫使其不得不释放青年救亡团体的负责人。

秋后，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全面实施镇压青年运动、迫害进步青年的反动政策。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时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从工作到组织进行转变，走向青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道路，在与工农结合的实践中锻炼出一大批革命青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

二

1939年6、7月间，我由西安去泾阳县云阳镇，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这时贾拓夫已回延安，欧阳钦接任省委书记，欧阳钦和张德生一起听取我的汇报。我主要汇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由杜斌丞、杨明轩二老提出，拟在原十七路军（此时编为三十一军团）发展进步人士，成立秘密组织的意见。欧阳钦看了我带去的秘密组织的章程草案后，讲了很重要的看法和意见（组织名称我记不很清，大概是“抗日民主同志会”，1941年修改为“新中国大同盟”。章程宗旨内容10多条，基本主张与《大同盟纲领》相同。《新中国大同盟纲领》全文见1941年3月11日伍云甫致中央书记处电）。他讲到十七路军的光荣历史，指出一定要站在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及西北人民的立场上，继承西北革命优良传统，加强内部团结，保持实力，严防和抵制蒋介石的挑拨离间、瓦解异己的阴谋诡计。他还指出，我党对西北军工作的政策一贯是要保持、巩固、扩大，使之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并争取将来成为八路军的外围军。他说至于在西北军成立秘密组织，时机不太适宜，必须报告请示党中央。欧阳钦在谈到西北军历史时，从靖国军到西安事变，讲得详细、确实，使我和张德生都感到他比我们这些陕西人都了解得多。此后党中央也指示认为，此事以暂缓为宜。我回西安后转告杜、杨二老，他们完全接受我党的意见。我汇报的第二个问题，是杜斌丞提出的利用赈款开垦马栏荒区，安置河南黄泛区难民问题。欧阳钦、张德生表示完全同意并报告了党中央，中央也表示同意。8、9月间，杜斌丞就去洛阳与卫立煌接洽接收难民问题，我亦随行。还有一些工作上的具体问题，是我和张德生单独汇报解决的。省委领导同志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怀，我对他们十分尊重和感激。如在领我参观安吴青训班后，他们给我指出了应该有计划地阅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开给我书单，并且建议我不要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学习

俄语上面。欧阳钦说，学外语如不实际使用很快就会忘掉，因为外语只是一种工具，在现在情况下只能当“点心”用，不能当“饭”用。我回西安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停止了已经学习半年多的俄语课程。

三

1941年秋，欧阳钦同志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央西北局第四局副局长、西北局秘书长，直至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去东北。这个期间，我先后任边区粮食局副局长、边区政府秘书处长、副秘书长，虽然和欧阳钦没有直接经常的工作关系，但彼此往来，接触较多。在西北局讨论统战、财经、粮食等问题会议我列席时，常能见到他。每逢节日假期，有机会我总要去西北局看看欧阳钦、贾拓夫、张德生三位良师益友（张在关中工作，但每次来延安总是住西北局机关，和欧阳、贾在一起），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永生难忘。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春节后欧阳钦、贾拓夫等特意约会要到粮食局来吃荞面“麻食”。吃饭前，我向他们详细地汇报了边区粮食征收、调运分配以及供应的情况，还着重谈了粮食工作各种制度建立中的问题。欧阳钦以他广阔的阅历、知识和经验，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特别是对建立各种工作制度的问题谈得更为深刻、具体。他以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亲身体会，极力主张实行严格的粮票、饭票制度。以后，因机关部队自产粮食的比例逐渐增加，我们在建立预决算、审批、支付手续、审计监督等方面都有了较完善的制度，因此饭票制度没有实行。但他的深情厚意，却深深记在我的心中。1944年春，我调边区政府秘书处工作后，在调查研究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团结边区政府机关和边区议会上层党外人士的工作中，和欧阳钦接触较多。每次在西北局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前，欧阳钦或贾拓夫总要找我去了解一些具体情况，耳濡目染，使我受益不浅。

我最后一次和欧阳钦同志会面是1977年冬。当时，我还没有完

全“解放”，奉命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借机我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了欧阳钦同志。见到他经受“文革”折磨，身体十分衰弱，“同病相怜”，不胜感慨。1978年2月，欧阳钦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衷心希望他的身体会有好转，不料竟于5月与世长辞，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是党和人民多大的损失啊！光阴荏苒，回首以往，眼前总是浮现出欧阳钦笑意盈盈的脸庞。和他在一起，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人声严厉色，倒是常常听到他言谈中的咯咯笑声，几乎是非笑不说话的样貌，亲切诚恳，如沐春风。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寸步不让。“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凝聚在欧阳钦同志身上的高贵品质，正是许许多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对人民的事业赤胆忠心的表现，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后人学习的榜样。

欧阳钦同志在陕西二三事

孙作宾

1936年11月上旬，我作为中央交通员完成了传递十七路军和红军建立联系，互不侵犯，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信息之后，途经中共陕甘工委驻地富县下寺湾，通过我的老友、时任工委军事部长曹力如的介绍，认识了欧阳钦同志。他当时任工委书记。我向他陈述了自己受毛主席指派，专程赴三原、西安给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面交毛主席的复信和有关情况后，欧阳钦向我详细谈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情况，以及我党提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听了欧阳钦的谈话，使我很受启发，深感他对党中央在历史转折关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理解得全面透彻，水平很高，对革命必胜的前途充满着坚定的信心，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当我在陕甘工委停留期间，11月10日，我游击支队与三十八军驻防富县的王劲哉旅某营，在油坊原发生了流血冲突。鉴于我过去曾在十七路军中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又与王劲哉旅长熟识，所以欧阳钦当天就派我和工委军事部的申力生同志一起去王劲哉旅，指示我们按照联合友党友军，一致抗日的精神，与王劲哉谈判，妥善解决争端，务求建立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相互友好来往，相互通商的协议。

根据欧阳钦以上的要求，我和申力生于第二天下午，通过王旅迫击炮连连长张玉琳进了县城，见到了王劲哉。经过谈判、磋商，一致认为：今天我们双方互相打，不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自己打自己，朋友打朋友。在油坊原发生的争端，双方都有伤亡，是很不幸的。既使双方的实力受到损失，也使抗日国防力量受到影响。于是双方议定：一是驻防延安、甘泉、富县地区的王劲哉旅与红军和游击队

接壤地段，各自后撤 15 至 20 里，留出缓冲地区，双方严加约束自己的部队，不准进入缓冲地区活动，杜绝再次发生摩擦冲突；二是有事互相通报，友谊往来，协商解决；三是相互通商。

谈判任务完成后，我和申力生立即向欧阳钦作了汇报，他表示满意。我即向欧阳钦告别，返回保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他派了一位同志专门送我。经过这次短暂接触，我和欧阳钦建立了革命的友谊。据后来得知，他还给中央联络（社会）部李克农部长和周恩来副主席各写了一封信，对我的工作安排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中央若再派我到白区工作时，希望能途经富县下寺湾，与陕甘工委建立工作关系；二是中央若不派我到白区工作时，希望能把我调到陕甘工委工作。我返回保安后，立即向李克农汇报了西安之行的情况。不几天，中央又派我执行交通员任务，并带领张文彬、老于、王林等四五位同志到西安，他们再转赴天津、广州等地工作。我到西安之后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欧阳钦也随后到达。12 月 25 日，中央决定恢复陕西省委，在周恩来领导下，配合代表团工作。贾拓夫任书记、欧阳钦任西北军工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二府园李焕卿家。这时，欧阳钦为尽快地与西安学生中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派我到西安师范找到了西安地区学生运动负责人董学源，并要我向董转交了省委关于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的一些文件材料。

当时，我对立即释放蒋介石有些不放心。就向欧阳钦提出说：“我到下边给党员传达，宣传放蒋介石，一致抗日，实际上我自己还没想通呢！”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一致抗日的这一重大决策，是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情况，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政治形势提出来

的，是非常正确的。……具体地说，就是要把我们党过去提出来的‘反蒋抗日’口号，转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拥蒋抗日’，这对于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和发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表现了欧阳钦在任何情况下，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原则性、坚定性与灵活性。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使我十分钦佩。

在欧阳钦担任省委西北军工委书记、军委书记兼统战部长期间，我和吕剑人、申敬之等同志都在他的领导下，在十七路军中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的工作。

我与十七路军孔从洲旅长是同乡，交往较深。这个时候，孔从洲经过参加西安事变的洗礼，爱国热情很高，抗日情绪尤为强烈。他还让我替他买了不少革命书刊阅读，思想进步，溢于言表。1937年5月，在三原西渠岸附近，我和孔从洲遇到了欧阳钦，我为他俩作了介绍。孔从洲离开后，我向欧阳钦汇报了孔的表现，并建议说：我们应把孔从洲列为十七路军中培养发展党员的对象。全国解放后，欧阳钦和孔从洲见面交谈时，他还向孔提及我在三原向他建议之事。这件事情说明，欧阳钦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的建议是十分重视的，就是在10多年之后，他仍然牢记在心。

抗战开始后，我先后在甘肃工委、中央统战部工作。1941年春，欧阳钦找我谈话，拟调我到关中分区委任统战部长。嘱我到那里后，在习仲勋书记领导下，努力搞好工作。我很快到设在旬邑马栏的关中分区委机关赴任了。

1年多以后，1942年夏，欧阳钦和贾拓夫代表西北局组织和我谈话说：“依照党中央和西北局的决定，调你担任甘宁工委书记，尽速在陇东分区庆阳组建甘宁工委机关，以积极开展甘肃、宁夏两省党

的地下工作。”由于西北局书记高岗曾诬蔑西安地下党都是“右派”，特别爱打击报复，曾整过蔡子伟、黄子文、王柏栋等一批老同志，许多正直的同志不愿和他共事。我也不愿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于是，我向欧阳钦和贾拓夫汇报了我的顾虑，想请组织另行分配别的任务。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欧阳钦对我的话未作任何表示，只是郑重地对我说：“新成立的甘宁工委是党中央首先提出并作出决定的。它在组织上受党中央和西北局双重领导，中央由刘少奇同志直接分管，重大问题都必须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后，才能决定。这些，我和拓夫已向少奇同志作了具体汇报，他是同意这样办的。你应该按照组织决定，搞好甘宁工委的工作。”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分配，赴庆阳去了。

日本投降后，欧阳钦于1945年10月离开陕西到东北，先后任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旅大区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长期、残酷的迫害。但他对党忠心耿耿，嫉恶如仇，刚正不阿。1975年，正当“四人帮”横行之际，我和欧阳钦都住在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几乎每天都见面。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几个人说：“……近二三年来，我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提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研究，我认为这个提法没有理论根据，是错误的！这个提法，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实终归是事实，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裁判！”在那个黑云压城的严峻时刻，欧阳钦直言讲出了这么尖锐、深刻的心里话，使我极为敬佩和感动！什么叫无私无畏？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我从他的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

十年“文革”，他唯一的儿子欧阳湘被迫害死了。内心的沉痛他

深藏不露，平静地说：“革命嘛，革命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的女儿下乡时间久了，见到不少人回了城，也想回到二老身边，照顾他们。欧阳钦对老伴黄葳说：“咱们还可以动嘛，让孩子多锻炼几年，对她们有好处。”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月，党中央为欧阳钦同志彻底平反。2月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正当他发挥聪明才智，为党的事业继续作出贡献的时候，由于身心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遭受折磨摧残，于5月15日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使党和国家痛失英才，也使我和所有的陕西老同志，失去了一位人所共仰的良师益友。

欧阳钦同志和三十八军地下党

范 明

我和欧阳钦同志发生组织关系，是1939年2月间。我当时在抗日前线山西平陆茅津渡的三十八军教导队任政治指导员，党内担任军部、直属部队和教导大队的总支书记。中共陕西省委派联络员小李（现名王写剑）来部队传达省委决定，成立了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由蒙定军、胡振家和我组成，蒙定军同志任书记。并传达了省委书记欧阳钦关于陕西省委对做好三十八军地下党工作的几点重要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必须以抗战利益为最高标准，反对个人利益、地方主义与封建集团的利益，提高抗日情绪。听指挥，守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团结内部，巩固部队，增强抗日战斗力量。反对一切破坏、分裂与逃亡行为。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发扬英勇作战、慷慨牺牲精神，争取战斗胜利，反对任何动摇与畏缩、临阵脱逃的行为。对临阵脱逃的党员要开除党籍。要进一步加强巩固三十八军的作风——三大禁令（即禁吸大烟、禁嫖、禁赌）和四大口号（经济公开、人事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要以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模式改造部队，争取把三十八军改造成为我党、我军的外围军。并指示要利用关系，特别要做好赵寿山的上层统战工作。省委和欧阳钦的这些指示，为我们做好三十八军党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虽然我还没有和欧阳钦直接见面，但他的这些正确、具体、切实可行的指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0年3月前后，陕西省委又派联络员小刘（杨信）来部队向我传达了省委和欧阳钦关于西北军工作（主要是三十八军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党的支部和小组改为单线联系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的方针。在具体方法上是要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广泛交朋友，要尽量“灰色”，但要“外灰

内红”，“同流不合污”。千方百计争取掌握兵权。同时也要实施“镀金政策”，就是设法把忠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党员，送到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学习，取得学历后回部队任带兵的下级军官，用此抽梁换柱的方法把国民党派到部队进行特务活动或吞并瓦解部队的反动腐败军官挤出去。还要成立“打狗队”（党的保卫队）和党卫军，把武装工作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等。这些重要指示，对保卫三十八军党组织不遭破坏和对敌斗争不断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充分显示了欧阳钦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在这样一位老同志领导下工作，我和同志们都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在敌人营垒里为党抓武装和斗争必胜的信心。

1942年，毛主席给三十八军赵寿山军长发来“虞辰”电报，指名要我（郝克勇）到延安向他汇报工作。工委和赵寿山商议后，同意我以赵寿山的代表和工委的代表的双重身份，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为此，工委立即进行全面准备，写出了向中央汇报的总提纲。我于1942年11月初到达延安西北局，第一个见到的负责同志，就是原陕西省委书记、时任西北局副秘书长的欧阳钦同志。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在未见到他之前，心情是崇敬而又拘谨的。当受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见如故的热情接待后，我的拘谨心情一扫而光。他同工作人员一起，把我送到青化砭西北局的“三层楼”——三层窑洞最高的西北角的秘密窑洞里，并详尽地嘱咐我应注意的事项，让我好好休息。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回到党的怀抱里的温暖和革命同志的亲切友爱之情。几天后，他又帮我拟定了写自传和向毛主席汇报的提纲。我用了大约10天的时间，写成了约20多万字的自传和汇报提纲，交给他转呈毛主席。他还给我发了一些有关整风的文件。我很惊奇他对我从1932年入团，1938年转党，在西安和上海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许多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足见他工作作风的深入、细致和扎实。在等待

汇报期间，我有时到西北局的阅报栏和壁报栏去看当时认为是毒草的《轻骑队》的小报文章。一次，忽然见到我当年在西安的老同学张光天，他对我点了点头，我高兴地急欲上前同他握手，可是他却摇摇头躲开了，使我莫名其妙，大惑不解。第二天，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让秘书叫我到他的窑洞里去“谈话”。进去一看，高岗气哄哄地坐在上面，欧阳钦坐在旁边，在座的还有李卓然、贾拓夫等同志。高岗没头没脑地问我和张光天是什么关系？我说张光天与我是同学关系，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并说明1933年前后，我和阎自强在上海建国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时，曾与张光天到龙华监狱里探望过邓君同志，并将我的一部邓演达所著的《中国文学大纲》精装本、摩尔根的《进化论》送给了他。尔后邓君因病死在狱中等等。高岗听罢后，劈头盖脑地问欧阳钦：“他说的对吗？”欧阳钦毫不迟疑地回答：“对！和张光天说的一致。”并侃侃而言，证实张光天当时确实是由陕西调往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党员，以及邓君和他的两个弟弟邓鉴、邓钊的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在欧阳钦这样有力的证实面前，高岗竟拂袖而起，用手砍着脖子说：“张光天要不是特务，杀我的头！”欧阳钦和我都不再说话。结果不欢而散。事后我才知道，贾拓夫和欧阳钦当时都是高岗怀疑的对象。通过这件事，使我对欧阳钦身处逆境，仍勇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坚强党性和高尚情操敬佩殊深。

在高岗从中作梗，迟迟不送我去见毛主席，前方又不断来电催问的情况下，贾拓夫和欧阳钦给我出主意，建议我给赵寿山写一份请求给我带回临潼的护送部队继续发经费、给养和臂章的电报，送给毛主席批发（因西北局不能批发此电）。果然，毛主席批发此电报后，当即通知欧阳钦陪我到枣园去见他。我们高兴地由西北局骑马到枣园毛主席住处，已是下午2时许。由于主席习惯于夜间办公，这时尚未起

床，我们在窑洞外间等了一会儿，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首先由我根据三十八军工委所拟的汇报提纲，向毛主席作了详细的请示汇报（以后又作过多次汇报和讨论研究，先后在座的有高岗、贾拓夫等，欧阳钦则每次都参加了）。

毛主席在几次听取汇报过程中，非常细致地询问了每个细节，特别是对赵寿山等上层统战对象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动态，对三十八军工委成员蒙定军、胡振家及党员骨干的情况，以及对工委所提出的统战工作、对敌斗争的策略以至应变方案，都和欧阳钦同志一起作了细致的了解、研究和讨论。最后，毛主席于1942年12月中旬，对三十八军工委的工作作出了全面指示。主要精神有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了三十八军地下党在陕西省委领导下，善于把地方武装力量和统战工作结合起来，不但保存了党的组织，并且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是一个好的典型。

第二，党在三十八军的方针政策是：进一步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的方针。要广泛“交朋友”，外灰内红，掌握兵权，保存实力。

第三，斗争的策略是：北抗日寇，南斗重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利用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主席对这一策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极为生动、详尽的剖析和解释，使我深受教益。

第四，党中央对赵寿山采取完全信任的态度，要向他公开三十八军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和他进行诚心诚意的、无保留的合作。凡是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

第五，关于赵寿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党中央原则上同意。为了防止暴露，决定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履行入党手续，在党内不公开，做为一个特别党员。待时机成熟时，再追认党籍。

第六，为了统一领导，步调一致，严守机密，不误时机，决定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归中央直接领导。

第七，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对此，毛主席就起义的时机、打出的旗号等作了相当具体的指示。

第八，干部是部队的生命，要大量培养党的干部。三十八军办教导队是打国民党的旗号，穿国民党的衣服，吃国民党的饭，办共产党的学校，这还是第一家。不要怕小，任何事都是由小到大。只要有干部，就有一切。希望赵寿山军长不仅作好三十八军的工作，还要特别作好西北军将领的工作，作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人的工作。要拥戴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作工作、作斗争。对国民党要同流而不合污，既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过早暴露。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依靠群众，这是三十八军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做出的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指示，是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汇报提纲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吸收了欧阳钦的汇报和真知灼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指示，对三十八军的革命前途，犹如一盏指路明灯，产生了巨大、深远的作用。

在谈话中，毛主席还对陕西省委和欧阳钦积极、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法“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毛主席说，三十八军地下党在陕西省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善于开展统战工作，并把统战工作同地方武装实力结合起来，不但保存了党的组织免遭破坏，并且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掌握了部队实力，这个经验是好的，成绩也是特别显著的，是陕西地下党中一个好的典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欧阳钦去东北担任领导职务。并指示他动员中央党校的学员和机关干部组成干部团去东北开辟工作。因此，他动员我和我爱人梁枫同志去东北。我们欣然同意，还

买了一头毛驴，随着干部团出发了。不料刚走出延安不远，在西北局接任欧阳钦工作的张德生派组织部的马振邦飞马赶来，向欧阳钦说明我的作用在西北，请欧阳钦把我留下。欧阳钦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不想留下，中央党校二部的同学们也都嚷嚷着让我一起走。欧阳钦犹豫了一下，召开了党组会。说明从他个人来讲，很想叫我同去东北，但从组织原则和工作需要出发，我还是留在西北为好。在这种大义大理相劝下，我就留在西北局统战部工作了。后来从西北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欧阳钦让我留在西北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虽然 40 多年过去了，但岁月的流水冲不淡对欧阳钦同志深深的记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立场，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凛然气节，在坎坷、挫折面前的坚强意志，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在我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坐牢 13 年、劳改 7 年的漫长岁月里，之所以能够经得住生与死、血与火的严酷考验，除了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之外，不能不说，我从欧阳钦同志的身上，也吸取了很大的力量。

欧阳钦同志在西北局

张邦英

欧阳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时，调欧阳钦任四局副局长，我任组织部副部长，在一起工作，相处甚好。他赤诚忠贞的道德品质，耿直爽朗的性格，热情洋溢的革命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和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极其困难。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办公没有纸张等用具。为了度过边区这一经济困难，党中央曾在1939年2月2日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他生动、形象地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的回答。”因此，边区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作为四局的领导，欧阳钦在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按照西北局、边区政府发展生产的指示精神，积极发动、组织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并协助边区一部分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进行生产自救，着重是开荒种地、纺线、养羊、养猪等，以解决吃饭穿衣的困难。从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到战士，人人动手。欧阳钦虽然身体瘦弱，但积极参加耕种、锄草、收割以及纺线等劳动，不甘落在人后。记得刚开始参加开荒时，他的身体很不适应，不大一

会儿就满头大汗，手上打起了几个血泡，但他仍然又说又笑，情绪很高。他一方面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注意检查了解生产情况，研究总结经验。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及时地把机关生产工作推向前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虽然陕甘宁边区仍在国民党的大军包围和日寇的威胁下，但基本上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群众产生了忽视人民军队的倾向，也有一部分干部在边区经济困难、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困难过多，考虑部队的困难较少，加之某些部队同志对地方体谅不够，在一些地方曾发生过一些误会，影响了军民团结。这些倾向引起了欧阳钦的重视。他在中央和西北局“军民一家人”的精神指导下，经常主动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后随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及时采取措施，尽快妥善处理。在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开展边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上，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了拥军决定。此后不久，由边区政府、西北局会同中央办公厅、延属地委、专署等组织劳军团，慰问在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劳军团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西北局副秘书长欧阳钦为团长，成员有我（当时调任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以及边区政府有关厅、局的柳湜，群众团体的负责同志高长久，延属专区专员曹力如等20余人。劳军团出发前，欧阳钦紧张地部署制作锦旗，筹集资金、书籍、慰问品，安排活动日程，还特意抽调民众剧团和秧歌队等文艺团体随劳军团慰问演出。同志们对他所作的组织准备工作十分满意。

2月17日，劳军团从延安乘卡车抵南泥湾。19日上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林伯渠、王震、欧阳钦和我们劳军团成员一起检阅了南泥湾生产部队。广场上，红旗飘扬，军号嘹亮，一队队威武雄壮的

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主席台。林伯渠主席向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次日，三五九旅召开了拥政爱民大会，从几十里外赶来参加大会的群众络绎不绝，五六千军民汇集在广场，锣鼓喧天，歌舞动地，热闹非凡，把拥军爱民活动推向了高潮。有力地促进了全边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军民的团结。

在此期间，劳军团还同南泥湾生产部队一起举行了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等各种座谈会，并察看了田地、工厂、农具等。欧阳钦在讲话中对三五九旅将士既是抗日的英雄，又是生产的模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使指战员们深受感动和鼓舞。劳军期间，他不顾疲劳，与连队的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劳军结束后，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题为《南泥湾劳军观感》的文章，发表在3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中，他对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在南泥湾生产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以后部队的生产、军民关系等提出了真知灼见。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在我调往新疆之前，到东北参观学习。当时，欧阳钦任旅大区党委书记。我们久别重逢，感到特别的高兴，他那热烈之情，溢于言表，真可谓“他乡遇故知”。正巧安子文也来参观。欧阳钦不仅热情地招待我们，而且陪同我们参观工厂、市容，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旅大在日、俄占领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以及现在的发展面貌。继之，又参观了东北其他一些地方，使我这个过去长期在山区进行革命工作的人大开了眼界，增加了不少工业方面的知识，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信心。

1961年，我在华北局工作。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党中央决定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垦部分荒地，以解决天津市20亿斤口粮的困难。华北局指定我负责这一工作。在去呼伦贝尔盟调查土地状况，途经哈尔滨时，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欧阳钦在百忙中亲自到火车站接我，

并安排食宿。还邀我去他家吃了顿便饭。我看到他在生活上、衣着上仍然和解放前一样，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谈到黑龙江省的工作时，他侧重向我谈了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问题，说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他的谦虚、谨慎的品德使我很受感动。

欧阳钦同志虽然已经逝世 10 多年了，但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十分怀念他。他虽死犹生。

不思量 自难忘

吕剑人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 10 多年了，但是他呕心沥血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淳朴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 1936 年 11 月间和欧阳钦认识的。当时，他担任中共陕甘工委书记，住在甘泉县下寺湾。我是由临时陕西省委送到驻保安的党中央，不久分配到白区工作训练班学习后，被派往延安一带做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我持介绍信见到欧阳钦，他热情地接待了我，留我在工委住了几天。其间，欧阳钦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延安及其以南沿线敌军的情况，阐述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向敌军宣传的内容，又和我商量了工作的策略和方针等问题。他说，当前日寇已占领华北并妄图吞并全中国，我们的方针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枪口要对外，不应自相残杀，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要西北军打红军是想一箭双雕，消灭异己势力。西北军应和红军订立协议，互不侵犯。并嘱咐我到那里以后，先从同学、朋友、亲戚、同乡那里了解情况，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有了这个基础，就好进一步开展工作了。最好先从驻扎在延安城里的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工作。他在写给肤施（今延安）县委的介绍信中明确指示，县委要协助我对敌军开展工作，生活上给以照顾并保证安全等。欧阳钦对党的方针政策交待的非常明确，对工作安排的相当具体，对国际国内形势和敌我双方态势了如指掌，可以看出他具有很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强有力的领导能力。能在这样一位同志领导下工作，我心里非常踏实。

那时，苏区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吃的是包谷豆和野菜。欧阳钦见

我初到苏区，怕我不习惯，特意嘱咐有关同志尽力给我照顾，他多次向我问寒问暖，同时，还向我解释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才能夺取胜利的道理。第一次与欧阳钦同志接触，就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36年12月13日，14日两天，肤施县委先后得到情报，说延安城内和以南的劳山、道草铺等沿线一带的十七路军全部撤走了。我和中共肤施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主席刘秉温等几位负责同志一起进城察看，果然部队撤光了，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发生了什么大事变。延安城内和沿线十七路军一撤，我没有工作对象了，就返回下寺湾陕甘工委，再次见到欧阳钦同志。果然，一见面他就向我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简况，并说中央要迁往延安。这时，先头人员李克农等同志已到了下寺湾。李克农对我说：“你不要回保安了，和我们一起去延安。”于是我又随他返回了延安。不几天，中央从延安大批向西安和全国其他各地派干部，我又被派回陕西省委，省委仍派我去十七路军搞政治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十七路军中撤销了政治机构，我回到省委，被分配在军委工作（欧阳钦时任军委书记兼统战部长，我任军委联络员）。我在军委工作一年多时间，直至1938年6月，这期间和欧阳钦接触的较多，我们之间更加熟悉了。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深入细致做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使我深为敬佩。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对友军情况，对党组织活动，对党员思想状况以至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思想情绪等都问得非常详细，并经常提醒我说，不认真了解情况，不重视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搞好工作。他不光这样要求下级，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作出了良好的表率。

1937年8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险，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战发展

为全民抗战。中共陕西省委积极贯彻中央方针，发表了“拥护国共合作，立刻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宣言。全省各地党组织加紧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作为省委军委书记，欧阳钦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军地下党工作的领导。

1937年冬至1938年夏，在我主要负责联系驻黄河西岸各线的西北军一七七师地下党工作期间，正值太原沦陷，日寇已进逼黄河东岸，并妄图西渡黄河进犯西安和兰州。这时，欧阳钦指示我要加紧做好部队和驻地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工作，积极做好日寇渡河后的新的严峻形势下的思想准备工作。当时在友军中提出的口号是：“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抗战积极性，增强对敌斗争的认识和决心，发动团结地方广大群众一起抗战”。省委又发表了《保卫西安、保卫大西北告各界同胞书》。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在合阳、韩城、大荔、朝邑等县大力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军队中的统战工作，从友军中抽派党员和进步分子到地方上组织人民自卫队，利用暑假在学生中开办训练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组织妇女联合会，揭露日寇的暴行，并于1938年春成立中共沿河工委，准备一旦黄河失守，就统一领导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开始把政策中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G。陕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反G中心，他们一面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蚕食和摩擦，一面破坏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和抗日救亡组织，并用造谣、讹诈、恐吓、搜查、放毒、绑架、暗杀等卑鄙手段，迫害进步人士，打击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党的活动十分困难、艰险。这年5月，欧阳钦继贾拓夫之后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他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反复分析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在陕西的反共活动将日益加剧。在抗战初期阶段，我地下党组织暴露或半暴露

的同志较多，当前紧迫的任务是如何保存党组织，保存干部，力争避免损失，以等待时机，发挥作用。省委认为，必须吸取我党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的教训，必要时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把已经暴露身份和不宜在国统区继续工作的干部、党员和进步分子调回边区；未暴露和隐蔽较好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应设法打入国民党基层的各种组织中去，如政权、文教卫生、社会组织、地方武装以至国民党、三青团中去。并允许在必要时，可以加入国民党、三青团。隐蔽下来的党员，主要是广交朋友，不要发展新党员，以免暴露政治面目。省委讨论通过后，把意见报告中央。不久，中央就明确制定了国统区的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陕西省委根据这一方针，作了具体安排，有的调入陕甘宁边区学习、工作，较多的人是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地方组织，利用“合法身份”，保存自己，并进行可能的抗日活动。

由于以欧阳钦为核心的陕西省委最早向中央提出并坚决执行了“十六字方针”，陕西的地下党组织遭受的损失较轻，保存了大批骨干力量。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有利条件下，陕西省委及时“叫醒”隐蔽的同志，较快地恢复了地下党组织与活动，在广大的沿山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向中央输送了一批派往国统区的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一切，都是和欧阳钦同志的高度政治水平和善于策略运筹分不开的。

在工作上，欧阳钦是位好领导；在生活上，他是干部和群众的贴心人。记得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当时我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我爱人在行政学院学习。不巧，我的儿子患了严重的百日咳，我们无法送到医院去看病。当时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反映给他，他立即给我批假、开介绍信，并把他的马借给我，催我赶快送孩子到桥儿沟医院住院，这样，孩子的病才没有继续耽误。又有一次，我寄养在农村的

一个孩子病了，欧阳钦知道后，又主动把马借给我，让我去几十里外的农村看望孩子。不料，天下了大雪，当天夜里我没能赶回延安，第二天才把马还给他，他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反而关心地询问孩子的情况。据我所知，他不仅是对我，对其他干部也都是这么温暖和关心。因此，大家有心里话都愿意给他说，有问题爱向他反映。

欧阳钦一生光明磊落，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贞不渝。“文革”中，他和他的家人遭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不屈不挠。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愧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

好的领导者和良师

董学源 陈煦 罗文治 杨克

欧阳钦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幸逝世已有 10 多年了，我们很怀念他。

我们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接触过许多领导同志，从中体会到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作一个好的领导者，工作作风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必须创造性地、扎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要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身体力行，为人表率，起一个良师的作用。一句话，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又是一个良师。有幸的是，我们在地下党陕西省委机关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当时省委的领导同志们，基本上都具备这样的特征。欧阳钦在这面对我们的教诲和熏陶，至今铭记不忘，革命的友爱是深厚的。我们着重从这些方面，写一些回忆和体会，以表示我们对欧阳钦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敬。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后，12 月 25 日，在西安成立了新的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欧阳钦任常委兼西北军工委书记。欧阳钦到达西安后，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西北军和进步群众团体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复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利于促成团结抗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道理。并通过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扩大宣传党中央的方针。他还派人同原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些同志接上关系，为发展党组织作了积极的工作。在省委领导下，董学源等同志在西安各学校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成立了西安学委。董学源、刘日修（刘南生）、毕于仁（陈煦）先后任学委书记，在欧阳钦和张德生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

1938 年 1 月，欧阳钦接任省委宣传部长。他积极筹办党的机关

刊物——《西北》周刊。他直接领导该刊的工作，带领同志们搞印刷、搞发行，亲自撰写评论等文章。他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和组织能力。他写的文章针对性强，文笔鲜明生动，对宣传组织民众，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国民党顽固派对《西北》周刊极为仇视，竭力破坏，但是，广大群众喜爱这个刊物，它的订户普及省内外。毛泽东同志曾为《西北》周刊题词：“要把西北的事办好，人民必须有言论自由”。在欧阳钦的精心指导下，《西北》周刊办得颇具特色，富有战斗精神，成为宣传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号角，群众救亡运动的喉舌和向导，向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教育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好教材。

1939年春，贾拓夫赴延安，欧阳钦即主持省委工作。是年5月，中央正式任命欧阳钦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不久，欧洲战争爆发，国际风云突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G的政策，在其统治区进行各种特务活动，破坏我党的秘密组织和进步团体。欧阳钦和省委领导成员张德生、赵伯平、汪锋等同志团结战斗，及时抓巩固党的工作。鉴于陕西省国民党统治区已经有近万名共产党员，是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党的组织，1939年1月以后，根据形势发展，省委先后提出党的组织“在发展中巩固”“发展与巩固并重”“以巩固为主，一般停止发展”等口号，并要求在群众工作中采取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利用合法的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

1940年1月，省委在边区淳耀县安社村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欧阳钦在报告和结论中，特别强调巩固自己的阵地，保存力量，一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指出，我们需要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而不是庞大无力的、脱离群众的党组织，因为一切决定于党的骨干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巩固党的工作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必须努力做好。

1940年5月，党中央在指示中提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是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稍后，中央又听取陕西省委汇报，吸取新的经验，作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9月，省委在照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德生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欧阳钦主持会议，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欧阳钦告诫大家，不能只讲成绩，满足现状，而要正视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他指出，在当时环境下，做抗日的事、进步的事，宁可“有实无名”，以免个人突出，引起暴露。为了巩固党的组织，要做“劳而有益”的事，绝不能做“劳而有害”的事。要懂得“无为而后有为”，有时候不做工作，正是做了保护党的组织的工作。他还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懂得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善于遵从规律前进，避免发生大的错误。当时局好转时，要准备时局恶化；和平时期，要准备战争。古谚语说得好，“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在当时和今天都有启发教育意义。

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政策，1941年7月，中央调欧阳钦到西北局工作。不久要张德生去延安汇报工作。9月间又通知省委让杨克和一位县委书记去延安汇报组织工作及基层支部活动情况。当时陈云同志主持座谈会，专门研究陕西党的工作问题。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同志参加。据张德生向杨克说，陈云详细了解陕西党组织活动情况及社会情况，讲了我们自建党以来、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历次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教训，提出在国统区反共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怎样使党的骨干能够保存下来，使国民党特务破坏秘密党组织和“一网打尽”的阴谋不能得逞；怎样实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任务。1941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欧阳钦等同志列席了会议。会后由贾拓夫负责，将会议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一个文件，报送中央、毛主席修改审定。经毛主席提议，将这个文

件改用西北局名义下达，即《西北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中央的决定。当时，高岗是西北局书记，虽然参加过这个《决定》稿的讨论，但《决定》稿的基本内容和文字定稿，是由陈云提出并经党中央、毛主席审定的。“文革”中，有人把这个《决定》诬蔑为“高岗西北局的黑指示”，这是极大的荒谬。1976年10月，欧阳钦曾向看望他的杨克、刘南生、张思明、朱平、李浩等同志说：“杨克你一定要向中央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不久杨克给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有关情况，还建议将这个《决定》编入《毛选》中。欧阳钦当时还严肃地说，我们陕西省委的同志过去受高岗的歧视、压制和打击，我到东北还有这种情况。我们过去同高岗有分歧，对他的一些错误有过抵制，“文革”中说我们是“高岗的黑帮”，“执行高岗黑指示”的“黑干将”，完全是胡说八道、诬蔑不实之词。欧阳钦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摧残，行动不便，听力很弱，有些话必须由黄葳同志大声转述。但他的思维很清楚，记忆力很好，把看望他的几位同志原先在西安地下党时叫的名字都能一一叫出，见到同志们非常高兴和亲切。他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的精神，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

1942年以后，陕西省委继续贯彻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工作越做越细，经验积累也更加丰富。由于欧阳钦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正确地执行中央政策，陕西地下党保存了大批骨干（仅调进边区的较“暴露”的重要骨干就有几百人），党的组织基本上得到了保存并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历次决定、指示中，对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成绩都是充分肯定的。解放战争开始前后，省委派出大批干部，在陕南和关中一些地区组织武装力量，开展了游击战争，大力动员组织群众支援野战军，配合野战军解放了全陕西。战争中曾侦察获得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为我军打胜

仗做出了贡献。如 1948 年瓦子街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司令员曾表彰陕西省工委及时提供了重要情报。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多次表扬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1984 年 9 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在西安听取陕西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汇报后说：“解放前我两次来陕西，对陕西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康生诬蔑陕西地下党是个假党，我就讲陕西地下党怎么会是假党呢？陕西的党是个真党，是个好党！我在陕西走的那条路，说是白区，实际上是红区，很安全。少奇同志也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好多人都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他还说：“解放前我两次来陕西，一次是长征，一次是五师中原突围。两次都不顺利，都得到了陕西党组织和陕西人民的大力支持。”“没有陕西党就没有我李先念。”先念同志对陕西地下党的这些评价，董学源、罗文治等同志都曾亲耳聆听过，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欣慰，迄今记忆犹新。这也是我们应当告慰已逝世的欧阳钦和拓夫、德生等同志以及大批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

欧阳钦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提出要真正成为“陕西通”“国民党通”。提出我们不仅是中央政策指示的传达者，而主要是中央指示的执行人、灵活的运用者。他对陕西的社会、历史、自然、经济诸种情况都调查研究，曾安排有关同志专门整理了一份陕西经济资料。对陕西的各政治派别以及社会矛盾也注意调查分析，以便熟悉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情况，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为了总结 1937 年至 1941 年 4 年多的工作，他曾组织机关干部，对党的组织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统战军事工作、青年运动等各方面，分别总结经验教训，整理出近百万字的材料。我们四个人都分别负责调查研究，整理了有关材料。这些材料有一部分由欧阳钦亲自审阅修改定稿。这些材料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后，曾受到好评。

欧阳钦关心爱护同志，一贯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

1939年春，省委机关专门集中一段时间学习《论持久战》，澄清了一些糊涂思想，帮助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1940年2月，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省委及时印刷发行了这部著作，并组织指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欧阳钦不但带头宣讲，撰写文章介绍，而且还组织同志们写学习心得。他特别重视组织干部学习哲学，持续学习的时间最长。省委几位领导参加各部门学习讨论会，也自编一个组认真学习，经常讨论得很热烈，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欧阳钦自身廉洁奉公，生活简朴，工作刻苦认真，并且努力在机关培育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经常用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事例教育大家，和大家同学习、同工作、同战斗、同娱乐，从不搞特殊化。由于欧阳钦等领导同志的表率作用，省委机关在泾阳县云阳镇和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安社、照金、马栏等地，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机关初进驻边区时缺油少菜，只好挖野菜吃，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种菜，饲养猪、鸡，上山砍柴烧炭。虽然生活艰苦，物质条件很差，但同志们精神振奋，朝气蓬勃，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每遇节假日，省委都组织文娱活动，唱歌曲、唱秦腔、演话剧、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丰富多彩。记得有一次中秋晚上，大家欢聚窑洞外边赏月，贾拓夫出了一个谜语：“外国人在中国，打一人名。”我们大家正在猜想时，欧阳钦很快地说：“杨克、杨克！”大家哈哈大笑，都佩服他思维敏捷。

欧阳钦工作态度认真，作风扎实。他在1940年9月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曾提出：要提倡认真、切实、具体、精细的作风，克服纠正粗枝大叶、敷衍塞责的毛病。这种思想，无疑是和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有密切联系的。他还有个突出的特点，是善于从实际工作表现中了解干部，与同志相互交心、相互信任。在西北局机关搞“抢救运动”

时，对待地下党的干部，他坚持客观慎重的态度，顶住压力，决不随波逐流。他的无私无畏的可贵品质，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欧阳钦是一个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老同志，是一个经得起执政党地位的考验和战胜“和平演变”的革命家，是一个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色的领导干部，他永远是我们的良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欧阳钦南泥湾劳军记事

陈 煦

1941年3月，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部队开进距延安东南近百里的南泥湾屯垦。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奋斗，把昔日荆棘遍地、荒无人烟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各界人士的称赞，成为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为了表彰三五九旅的功绩，学习他们的精神，1943年春节刚过，延安各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组织了劳军团，准备到南泥湾慰劳部队。在筹备会上，大家公推西北局副秘书长欧阳钦同志为劳军团团长，劳军团成员还有张邦英、柳湜、霍子乐、曹力如、高长久、白茜、李瑞山等同志，连同工作人员，共25人。

2月17日，劳军团全体成员乘一辆大卡车向南泥湾进发。前往视察屯田和防务情况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肖劲光也同车前往。

抗日战争时期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林老、肖劲光、欧阳钦、张邦英、曹力如这些领导同志都很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果断，雷厉风行。能和他们同行，大家都很兴奋。汽车离延安南行到三十里铺，向东拐进山沟，再向南翻过一道大梁。山那边满是森林，部队开出了一条路，不大好走，于是多数人下车步行。当天到达南泥湾。以后，又到旅部驻地金盆湾。几位领导同志分头进行慰问活动，欧阳钦着重找一些营、连干部，开座谈会，也访问一些战士，由我作记录和收集资料。部队方面，也各自召开欢迎会，用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猎获的野味款待我们。安排的活动很紧张，气氛非常热烈。慰劳活动共进行了五六天。回到延安后，欧阳钦仍然十分兴奋、感动。他参阅我收集整理材料，写了一篇题为《南泥湾劳军观感》的长篇通讯，

刊登于3月13日《解放日报》上。

在慰问和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从欧阳钦的身上看到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作风。

深入了解实际情况

那时和营、连干部开座谈会，极少有人拿上整理好的材料作汇报。文化水平高的，口袋里有个小本本，记些人名、地名、数字，大事要点等，主要靠嘴讲，偶而翻一翻小本子；文化低的，就全凭记忆说话了。但都讲得生动具体，新鲜活泼，听起来有兴味，记录也好做。欧阳钦在听的中间，抓住要点，反复询问，寻根究底，弄个明白。我就注意把这些要点记清楚。从南泥湾到金盆湾，是一片相当广阔的深山区，由三道湾形成了三条川，纵横各80多里。传说百十年前这里曾经经济富庶，人烟稠密，后经战乱破坏，已多年人迹罕见。附近老百姓不愿到这里来，是怕吃柳根水，婆姨不生娃，怕霜冻早，庄稼不能成熟，还怕土匪和野兽。后来，朱德总司令亲自到这里调查，搞清楚有可耕地上百万亩，是部队屯田的好地方。从1941年3月开始，三五九旅的部分部队先后到这里屯田，延安各机关学校也来这里办农场，已开出了15000余亩地，还安置了200多户移民和河南来的难民。环境气候已开始有变化，土匪绝迹，野猪、黑熊减少，无霜期从100天延长为130天左右。这里已初步展示出一个新面貌，劳军团看了都很高兴。欧阳钦兴奋地用调查研究得来的数字对比，盛赞三五九旅建树的功勋。

全面总结经验教训

欧阳钦在做调查研究时，注意听成绩，也注意听缺点和不足。部队的干部、战士，也是既讲好的，又讲不好的。那时，这已成为习惯，没有谁说这种调查方法有什么坏处，相反，都认为是改进工作的需要。欧阳钦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绩，例如：部队自给了一部分粮食、马料

和干草，蔬菜全部自给；增加了肉食，每个连都养了几口至几十口猪，种了小麻子自己榨油吃，帮助群众种地、收庄稼，密切了军民关系；还办了一些手工业、运输业。这些，既解决了部队的困难，又适应了群众的需要，也完全符合党的建设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屯田中发生的问题和缺点，他也调查得很认真，并和大家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例如：当时有些战士对屯田思想不通，认为参军就为打鬼子，要种庄稼不如回家，有的要求退伍，甚至个别人“开小差”，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教育。有的单位把谷子种在川地，包谷种到山坡，成熟不好，甚至失收。于是干部请老百姓吃饭，虚心请教，按当地传统经验办，就解决了。有些单位劳动组织不合理，开荒时每人一天可开5分，十来亩的地块，有20人就行了，可全连百十人开上去，铺展不开，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于是学会了按地块大小分派劳动力。还有些单位劳动纪律不好，个别战士借群众的工具不按时归还，一经检查出来，都坚决纠正了。这些经验教训，欧阳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都写进了《劳军观感》中。

坚决贯彻中央方针

欧阳钦在劳军活动中，做了大量慰问看望、调查研究以及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和林老、肖劲光、王震等同志研究工作直到深夜，但他在《劳军观感》中，没有一处提到自己，而是热情洋溢地宣传群众创造的成绩，介绍各级干部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纠正缺点等好的经验。他虽然是劳军团团长，但对慰问等活动，突出宣传林老，特别是写了林老和劳军团留别书上的一段话：“你们不仅英勇善战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会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界的障碍。今天在前方打日本是大事，在后方发展生产也是大事。生产可以度过难关，支持抗战，生产可以保障供给，达到丰衣足食，生产可以改善军民关系，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抗战，生产可以锻炼思想意识，从实际行动中去体会劳动创

造世界的真理。你们在前方抗战曾打了许多胜仗，是光荣的。现在在后方生产成为发展经济的模范，也是光荣的。”这正是当时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另外，欧阳钦还突出宣传王震旅长治军和领导生产有方，表扬先进，批评落后，鼓舞斗志，再接再厉。对屯田前景充满了乐观和信心。充分体现出当时团结奋斗，万众一心，坚决贯彻中央方针的精神。

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田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到 1944 年，实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预期目的，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那时党的各级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工作生动活泼，坚强有力。中央决定的事，勇往直前，千方百计，务求干得成功。大生产运动是这样，其他工作，大致也是如此。那种情景，回忆起来，令人非常怀念。

深切怀念欧阳钦同志

李连璧

我第一次见到欧阳钦同志是在 1937 年初夏。

那年 5 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随后，陕西省委在省委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向党员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我就是在这次传达会后见到欧阳钦同志的。

虽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半年，国共两党开始变对立为接触，但是共产党员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还必须是隐蔽的。我当时是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长，仍然不能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收到赴云阳参加会议的秘密通知后，我就单身化装从西安启程，到达云阳后，在当地一户群众家里一直等到天黑，才被引入会场。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全省各地的地下党员代表，除传达报告的同志桌上点有蜡烛外，听报告的同志互相看不清面孔，也不说话。听完传达后，又各自被引到老百姓家里住宿。回到西安后，我才知道，那天从西安赶去听传达的，还有我很熟悉的西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谢华同志。

在我返回西安前，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和欧阳钦同志找我了解西安群众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欧阳钦同志，他当时是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1938 年 1 月，欧阳钦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上任伊始，他就创办了省委的机关刊物《西北》周刊。在这个刊物上，几乎每期都能看到署名“杨清”（欧阳钦的笔名）的文章，有时一期中甚至有二三篇。欧阳钦是一位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实践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他的文章以政论见长，有深厚的功底，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强烈

的感染力，深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我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之一。

初次和欧阳钦见面，往往会感到眼前的他和文章上的他对不上号。他那时已步入中年，与他那思想敏锐、文笔犀利、充满朝气的文章相比，面前的欧阳钦似乎显得老成持重、少言寡语，但一经接触，你就会发现，他说话中肯，言简意赅，有极强的概括力和针对性。在宣传部长这个岗位上，他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才能。西安事变后，抗日救国群众组织有很大的发展，自编的各种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象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救亡阵线》，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沙河》，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学生呼声》等，都得到过他的具体指导。省委宣传部还给党员发过一部分延安印的毛边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我都是在这些毛边书中读到的。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还经常由宣传部编写油印小册子，在党员中秘密传阅。通过这些小册子，我及时受到了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的理论原则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教育，得知一些重要时事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如对“国焘路线”进行批判的情况等）。当时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很少，小册子里的文章，大都是欧阳钦亲自撰稿或指导身边几位年青同志写的。

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后，在泾阳县云阳镇设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实际是省委机关的驻地。省委利用云阳镇东北角的玉皇庙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玉皇庙年久失修，在大殿前边的一座破旧戏楼上，住进了八路军两个班（对外声称驻扎了一个连）；在昔日香烟缭绕的大殿内铺上厚厚的麦草，就是训练班的课堂兼宿舍。我在这里上过一期训练班，由省委负责人轮流给我们授课。欧阳钦除了讲课外，还指导同志们联系实际进行讨论，特别强调如何在工作中具体贯彻执行。

1941年7月，欧阳钦调往延安，任西北局四局副局长。那时，我也在他的领导下在四局工作。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在指导我们认真阅读、领会中央文件，仔细翻阅材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只要边区政府派工作组下乡，他总要四局派同志一块下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分析研究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写出报告，提供给领导机关参考。

欧阳钦一丝不苟、刻苦认真、缜密严谨的工作作风给当时在四局工作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一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不在家，窑洞里只有他的爱人黄葳一人在缝被子。她用无可奈何的口气告诉我，欧阳钦感冒好几天了，发烧、吃不下饭，又强撑着到办公窑洞改稿子去了。我一边帮黄葳缝被子，一边等着他回来，直到夜深了还不见他的身影，就只好告辞了。这样不辞劳苦地忘我工作，在欧阳钦是经常的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了飞快的发展。我从地方调到部队工作，离开了延安。建国后，我回陕西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往国外工作了10多年。我听说欧阳钦同志在东北工作，也十分想念他，但一直没有机会看望他一次。这成为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难忘的 8 年

李岷阳

欧阳钦是一位忠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地下党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驻延安时期，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 8 年。虽然建国后他一直在东北工作，相隔千里，难以见面，但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总在我们的怀念之中。

1978 年 5 月初，我和老伴陈煦来到北京，特意到欧阳钦同志家看望。见到他的夫人黄葳同志，才得知他在住医院。从黄葳口中，我们惊闻他们唯一的儿子欧阳湘（湘湘）在“文革”期间由于坚持真理被迫害致死的噩耗。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当年延安的一幕情景：那时湘湘只有 3 岁，刚从寄养在枣园的老乡家领回。穿一身粗布棉袄，黑黝黝的小脸，浓眉下一双毛茸茸的眼睛，睫毛上挂着泪花，靠在窑洞门口的土崖上，用陕北口音哭叫着：“我要甲娃哥哥，我要回家（老乡家）”，牛犟地不肯回到亲妈妈的身边。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劝回了窑洞。湘湘是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建国后上了大学，并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不幸惨死，使欧阳钦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

怀着悲愤的心情，我们到医院去看望欧阳钦同志。14 年未见，特别是经过“文革”的劫难后见到他，悲欢交集，满腹话不知从何谈起。看到他病重衰老，走动困难，只能吃流质食物，我们的心情很沉重。他见到我们，满面笑容，慈祥和蔼，深情地忆起往事，全然忘记了病痛，使我们感到欣慰。离京前，我们又到医院和他依依惜别。没想到，几天以后，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他 5 月 15 日病逝的噩耗，他和我们的这次见面，竟成了最后的诀别！回首峥嵘岁月，令人感慨不已。

欧阳钦，我们至今还习惯地称他杨清同志，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是：他十分相信群众、热爱群众，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武装建设，重视党的宣传工作，爱护干部，重视对干部党性的培养教育。

—

1938年，我在中共三原县委武字区工作。从省委机关刊物《西北》上，经常看到署名杨清的文章。他通过党刊，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陕西形势，教育地下党员如何认清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和陕西地下党担负的任务。比如，武汉失守后，他在《西北》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意义，并指出，国共合作必须坚持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独立自主方针。他教育党员，既要防止从右的方面，错误地理解统一战线就是“服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批判了王明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同时，又教育党员不要冒险行动，克服“左”的倾向，要在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中注意隐蔽自己，防止突然袭击，要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中间力量，否则就会既丢掉了中间力量，又暴露孤立了自己，作为一名年青党员，我反复学习、领会杨清文章的深刻含义，对我认清形势，积极、隐蔽地作好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9年春，我从进步人士、三原女中校长王芸竹那里看到她刚刚收到的国民党中央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我拿走抄了一份送给县委书记周芝轩同志。这个“文件”预示着国民党开始反G，也证明了杨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政治水平。但在当时抗日热情的冲击下，我对白色恐怖即将到来的危险性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西安经常处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中。为了迎击日寇的进攻，三原县委决定从武字区抽调80多个农民党员组成农民连，由黄子文任连长，慕天祥任指导员，到胡乔木、冯文彬领导的安吴青训班学习游击战术。这一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暴露了我们地

下党的力量。反动派派了一个民团准备解散县委经常活动的一个据点——武字区的西岳庙小学。以杨清为领导的省委闻讯后，指示我们立即全部由公开转入秘密，把已经暴露的同志调回延安，能够留下的同志转移阵地，减少联系，寻找各种关系，取得合法身份，坚决改变已经不适应时局的活动方式。这时，我已转到县上工作。我要原先剪成短发的农村女党员立即梳起发髻或接上长辫子，要求知识分子党员尽力和社会人士拉上关系，我和基督教在学校的外籍教师也拉上了关系，以“灰色”的面目出现，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这时，省委派交通员送来了党中央刊物《共产党人》。其中刘少奇写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文，给我们启发极大。省委还指示：严禁地下党员到青训班去（青训班离三原仅十几公里），要我们把地下活动和公开活动严格区别开来，这要成为一条铁的纪律。杨清还通过多种方法教育我们严守党纪，减少党员之间的互相联系，党支部一律改为单线联系，但仍允许慎重地、个别发展地下党员，特别是在学校中发展党员，以免断线。还规定一个学校可建立两个平行的支部，互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减少被破坏的危险。还指示党员是民先队员被迫参加三青团的，应从党支部划出去，到三青团内去进行青年活动。在农村保甲组织中，也采用灵活的方针，如武字区6个乡的保长中，5个都是地下党员，搞两面政权。这些措施，对保存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省委和杨清这些具体部署和组织措施，都是和国民党搞“防G、限G、溶G”针锋相对的，也是把党中央指示和陕西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运用和推广。

1939年9月，三原、临潼部分地区和泾阳、高陵合并为三原中心县委。红二十六军活动过的武字区和临潼栌阳地区便连成一片。这一带农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群众对反动派警惕性相当高，特务到这里来心惊胆战，我们的同志到这里却安然无恙，不少同志进边区、

去延安，都在这里歇脚暂住。

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G高潮，白色恐怖也笼罩着关中大地。由于特务的跟踪监视，我无法立足，交通员送我过封锁线来到陕甘宁边区南端的照金——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这儿山高林密，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几个村庄住满了我们的同志，处处充满了活力。

我住的干训队有一百来人，学员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先后进入边区的，党员全部改名换姓，准备随时再派到外面去工作。大家一块儿学习《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党中央文件，还经常背起背包到省委礼堂听大报告。杨清作报告的次数较多，他讲述马列理论的学习方法，讲述如何增强党性，讲述党和群众的关系。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讲述党是从群众中来，又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党是群众的领导者，不是群众的家长，既要教育群众，又要向群众学习。1941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他在大会上讲话，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他在讲话中强调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改造社会应达到的目的。他说：

“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世界，要把改造世界作为己任。现在的社会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以至贫困死亡和战争……第二国际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搞阶级调和，为统治阶级服务……我们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目前我们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爬（往上爬）、拉（拉拢）、压（高压）社会，要改造这个社会就要了解、熟悉这个社会，和那里的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杨清铿锵有力、针对性极强的讲话，对我后来的进步

有着重要作用。

照金是国民党搞“摩擦”的边缘地区，我们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生活虽然艰苦、紧张，但心情是舒畅愉快的。杨清等省委领导和我们在一起很随便，生活上也没有上下级之分。那时，住在石洞里，睡的是树枝架的“床”，一人一条草褥子，连被子也没有。除了学习之外，男同志上山打柴，女同志负责挖野菜，每顿饭七八个人围着一盘辣椒、一盆野菜。由于心情愉快，生活规律，我反而比在白区胖了。民运部长赵伯平说：“看你刚来时黄皮拉瘦，现在红光满面！”

省委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有时还演话剧、秦腔。杨清等领导同志都是热心的观众。赵伯平对秦腔最热心，《看女》《三滴血》都是他改编的。那时，可以说人人能登台，个个能演戏。省委医务所的李静，是远近闻名的好大夫，老乡常找她接生，接一个，活一个，不得“四六风”。杨清对她密切联系群众很高兴，见了她，总要问：“今天接了几个娃？男孩？女孩？”还开玩笑说：“你这个大近视眼，可不要把娃的‘牛牛’当脐带剪掉了。”李静也能演戏，她在演《闲话江南》（写皖南事变）里装扮王二嫂，此后，大家都叫她“王二嫂”，时间一长，真名真姓反而被人忘掉了。杨清离开照金调往延安前，又遇上她，认真地问：“你的名字到底叫什么？”黄葳笑着说：“不用问了，她叫李静。”

三

1941年10月，我调到延安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工作，贾拓夫和杨清同志兼任正副局长。四局分边区、国统区、民族等研究室和一个调查处。拓夫、杨清根据中央指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对干部坚定地树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起着重要作用。

1942年春，开始了整风运动。四局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都从国统区来，在学习整风文件中，民主空气很浓，思想非常活跃，

但都自觉地联系思想实际，对我们增强党性、改造世界观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审干开始，开展了“抢救运动”。这事康生负有重大责任，他把陕、甘、川、豫等地下党统统打成“假党”“红旗党”。这年春夏之交，一夜之间，四局的同志有的关进保安处，有的锁在窑洞里，剩下的寥寥无几。拓夫、杨清、赵伯平以及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等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高岗还亲自“审讯”了董学源、陈元方、刘蓊等同志。

这时，我住在审查干部的一个窑洞旁边。一天，我走出窑洞准备打饭时，周围空无一人，忽见杨清同志从我门前经过，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有问题就说，没问题就不要乱说，要坚持真理！”当时“坦白运动”已经开始，有人在大礼堂已“坦白”了，真假难辨，人心惶惶，杨清同志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忐忑不安的心里注射了一针镇静剂，鼓励我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党性，真是一语重千斤啊！

不久，西北局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高岗气势汹汹地宣布要枪毙黄流（时任延安县委宣传部长），并且贴出了处决布告。这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G高潮，外患内乱，使人忧心如焚！幸好几天后，听到毛泽东同志“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大家心中的千钧石，一下子落了地！以后听说，毛泽东同志来到行政学院，在近千人大会上讲话。意思说，把大家冤枉了，他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赔礼道歉，还深深向大家鞠了个躬。不少同志感动地啜泣流泪，有的禁不住痛哭失声。大家衷心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在紧急关头，拨正了航向。共产党敢于承认错误，坚决纠正错误，这正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来，从贾拓夫召集我们开的座谈会上得知，当时省委领导都是被审查对象，被剥夺了发言权。甘肃省工委书记孙作宾同志在受审期间更是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他坚持真理，保护同志，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1945 年日本投降前后，甄别工作结束了。同志们怀着“真党员，假党员，革命斗争中看行动”的壮志豪情走上新的斗争岗位。不少同志，如康行、林坚等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埋人坑前凛然不惧，壮烈牺牲了。

值得缅怀的还有韩夏存同志。他被派往西安工作，历经艰险，成绩卓著，直到西安解放。他和留在延安的爱人刘蓓长期分离，有一次仅在半个指头长的小纸条上写了二三十个字给刘蓓，以此表达革命者坚贞不渝的爱情和思念。艰苦的地下斗争环境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建国后不久，他仅 33 岁就病逝了。

“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这是“文革”后党中央有关陕西问题的文件中作出的结论，也是几十年斗争实践证明了的。“文革”后和 1984 年，李先念同志先后两次到西安，在座谈会上和小范围谈话中，都讲到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还提到“康生诬蔑陕西地下党是个假党，我讲陕西党是个好党。我在陕西走的那条路是白区，实际是红区，很安全。少奇同志也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好多人都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陕西地下党作出的正确评价，和欧阳钦同志坚持中央的正确路线，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党政干部的光辉榜样

王维之

—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 10 多年了。但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坚持真理的博大胸怀和关心干部的深厚情谊，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从 1939 年起，先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 10 多年，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9 年冬，我由中共陕西省临潼县委调到省委所在地云阳镇学习。当时欧阳钦任陕西省委书记。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杨清同志”。由于云阳镇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所以省委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的名义驻在那里。杨清身着一套退色的八路军灰军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副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前辈的形象，听同志们私下讲，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因为当时地下工作纪律很严，不允许随便打听其他同志的情况；工作也未直接和他接触，因此了解不深。不久，省委派我到陕西澄城县委工作，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但每年利用寒暑假回省委汇报工作，在省委机关常常见到他，开始对他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1940 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环境日益险恶。省委机关先迁到关中分区边沿的安社村，后又迁到比较安全的照金镇。我每次回省委全靠自己摸索探路，冒险穿越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每当历尽艰险到达省委，回到组织和同志们的怀抱时，倍感亲切，完全消除了白色恐怖环境中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险感觉。更令人兴奋的是，在省委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区无法看到的文件和革命书刊，能听到欧阳钦等省委领导的报告和当面指示。

欧阳钦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原则性很强，平时言语不

多，有时批评严厉，但对人十分真诚，心地宽厚。记得当时流传着他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严厉地批评一位年轻同志，那位同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面顶撞他，气得他拍了桌子。这位同志就抓住他拍桌子一事，进行反驳，而他在这种情况下却能够很快冷静下来，承认自己拍桌子不对，立即道歉，并把批评变成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使这位党员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改正了错误。这就是我后来常听他讲的“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的生动事例。

欧阳钦特别注意对国民党统治地区敌友我力量的调查分析。有一次，当我汇报工作时，他插话问我澄城县教育界和政府系统敌友我三方力量的比重，我回答的不具体，他很不满意，当即批评我粗枝大叶的作风。他说：“必须分清敌友我，并且要有调查分析的数据，这样才有搞好工作的基础。”这次批评，给我的教育很大，从此我在工作中很注意调查研究，摸清底子，从而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二

欧阳钦一贯重视用文化艺术形式推动宣传工作。在 1939 年的困难条件下，在他和赵伯平等同志的倡导下，办起了七月剧团（后改名为西北剧团）。这个剧团既演陕西人民喜闻乐见的秦腔，又演话剧、舞蹈、歌咏，还搞黑板报、漫画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欧阳钦经常过问剧团工作，听剧团领导汇报，从演出内容、形式、题材、效果到演员生活问题都关怀备至。1941 年夏天，我在省委办的学习班学习期间，曾上台演过话剧。他在台下看得兴致勃勃，发现我能演剧，又听别人说我过去在学校时搞过宣传队，就决定我去西北剧团当指导员。

剧团努力宣传党中央、八路军的抗日革命思想，活跃省委机关和关中分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并专程到延安向党中央作过汇报演出。在革命斗争中，西北剧团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文化人才。1985 年我回

陕西时，见到不少剧团成员，当年十几、二十岁的年青演员，如今已成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一个个鬓发染霜了。大家回忆起欧阳钦同志，都充满着敬仰之情。

三

1954 年到 1965 年的 11 年中，欧阳钦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有一些刚接触他的同志开大会时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我就毛遂自荐给他们当“翻译”。

1954 年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并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开始。国家的 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中，有 20 多项在黑龙江省。欧阳钦特别重视关系国家全局的重点工程建设。我当时在省委基本建设部工作，分工抓哈尔滨平房的一〇一厂和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及特殊钢厂等重点工程。欧阳钦曾多次主持省委会议或与主管工业、基建的领导同志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给予及时指导，并组织各方面力量给我们以有力支援。在省委和他的支持下，这些重点工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胜利完成了。欧阳钦是个走到哪里热爱哪里的好领导。他时常强调黑龙江省是国家粮食、煤炭、木材生产的重要基地，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在他的主持倡导下，省委提出年产“三个一千万”的奋斗目标，即年产一千万吨粮食、一千万立方米木材、一千万吨煤炭。这个口号提得既响亮又切合实际，对全省人民鼓舞很大，也为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四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欧阳钦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第一位。合省之初，相当一部分工交企业受“一长制”的影响，削弱了党对企业的领导。1955 年 8 月，省委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工业政治会议，欧阳钦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领导与工矿企业一长制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党的领导是绝对的、整体的、全面的、不可分

割的、不可动摇的、没有例外的。”从而澄清了许多同志的糊涂思想，统一了全省党内外同志的认识，加强了党对企业的领导。他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欧阳钦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1958年4月，省委召开了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欧阳钦提出了“思、农、工、林及其他”的工作安排次序，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各行各业的首位。他经常主动抓宣传教育和文化工作，他不仅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地的实际相结合。他对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贯彻执行，总是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的。因此稳妥、可靠、收效显著。例如1957年春，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省委要求各条战线的领导下去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欧阳钦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仅我们工业战线就座谈了两个半天。我在座谈发言中认为工业方面的主要矛盾，一是党的勤俭建国方针和当前企业铺张浪费的矛盾；二是企业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受到他的重视。他在各条战线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5月19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联系本省实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1958年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六十条》时，他又带领有关同志深入牡丹江地区，召集地、市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讨论贯彻执行措施。可以说，每次省委代表大会的报告。他都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定稿的。记得1960年3月的省党代会开幕前，我参加了他主持的省委常委扩大会，充分讨论修改了他的报告稿。会上，当他作完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中奋勇前进》的报告时，会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次省代表大会水平空前之高，对合省六年来的工作作了深刻的总结，对今后任务提出了

明确的方向，整个报告充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很好学习。”

五

欧阳钦作风正派，对同志从不远近亲疏，从不拉拉扯扯。我虽然和他相识较早，但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1957年秋，省委决定调我去鸡西工作，行前我到他家告别并请示工作。那时他家住阿什河街39号院。我和他爱人黄葳同志1941年在照金根据地时就比较熟悉。欧阳钦征询我对调动的意见，我表示服从省委决定，就是担心对煤矿工作不熟悉，怕做不好。此外，我还检查了自己在省委基建部工作时的缺点，希望他指示批评。他谈了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后说，鸡西是国家重点煤炭基地之一，为了保证提高煤炭生产和全面发展鸡西经济，省委决定将鸡西县和鸡西矿区合并，成立鸡西市，调我任市委第一书记。他简要地交代了工作重点之后，嘱咐我到新岗位之后，要虚心向内行学习，向煤矿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他的话融汇了领导、老师和同志的亲切感情，增强了我对搞好市委工作的责任感和信心。

1961年4月，他到鸡西市视察工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煤炭产量骤降，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他刚到矿务局招待所，不顾旅途疲劳，马上就要我和其他负责同志汇报煤炭生产情况，接着视察了自力更生勤俭办企业的“三八妇女工业社”和文明办旅社的典型第六旅社。晚上又和市委、矿务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如何鼓起勇气，战胜困难，高产稳产，提高煤炭生产水平问题。会上他高度赞扬恒山一井，小恒山四井上游采煤队和大同沟煤矿，三八妇女工业社等勤俭夺高产的先进事迹，要求我们认真组织推广。他强调，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任何困难都可以战胜。他和我们一直谈到深夜11时，接着又上火车赶往密山县去了。欧阳钦的指示使我们受到很

大启发和鼓舞，我们市委和矿务局领导班子统一认识，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使鸡西煤炭生产一直保持着高水平，实现了“生产稳步上升，掘进大幅度增长”的预定目标。

欧阳钦同志这些可贵的思想作风，对我们今天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应把他的好思想、好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发扬光大。

深切怀念我的“表哥”

白 茜

在 5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欧阳钦是我最崇敬的领导人之一。他那清癯的面容，炯炯的目光，不苟言笑的神情，尤其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认识欧阳钦较早。那是他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约在 1935 年底到 1936 年夏，他担任陕甘省委组织部长、陕甘工委书记期间。我在陕甘省委做妇女工作。真正接触和了解，则是在 1936 年西安事变后重建陕西省委时，我们一起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

西安事变发生时，贾拓夫在三边特委书记，我任妇女部长。我们俩刚结婚不久。事变后不几天，中央急电拓夫回延安，随周恩来、秦邦宪、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乘张学良将军派来的飞机去了西安，欧阳钦等也随后前往西安。12 月 25 日，也就是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那天，秦邦宪代表中央，宣布重建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欧阳钦为西北军工委书记，李一氓为宣传部长，张德生为组织部长，彭加伦为秘书长。西安方面大致安排停当，组织上通知我去西安住省委机关，协助做秘密工作。记得我是同欧阳钦、张德生同乘杨虎城将军派来的汽车，从延安出发的。一路上，杨清（以后我们都习惯这样称呼他）和德生对我这个刚从农村出来 2 年的贫农姑娘处处照顾，使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汽车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杨清和德生穿上中山服，我也脱掉老区穿来的灰军装，换上早已准备好的旗袍，由杨清带我到设在二府园的省委秘密机关。在那里我见到了拓夫，这时，我才知道我要和拓夫、杨清一起住在这里，作为掩护身份，杨清是我们的“表哥”。熟悉的同志开玩笑说：“两个

陕北人，怎么有个南方表哥啊？”

省委机关离八路军办事处不很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在“八办”工作过。凡从敌后参加革命，从西安去延安，或由延安派往敌后工作的同志，都在“八办”转程。那时，我刚满20岁，生平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不仅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而且秘密工作又有许多限制，行动也不方便。拓夫、杨清整天在外面工作，我一个人守在机关，常常觉得手足无措，心神不安，怕应付不了复杂的情况，于是常向“表哥”要求想回延安工作。欧阳“表哥”耐心开导我说：“这里工作非常重要，少不了你这种角色，这也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和锻炼。不要着急，慢慢就会适应的。”一个多月后，来了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俊气的大姐，一看就知道是大城市出来的。原来她就是欧阳钦的爱人蔡纫湘，是组织上从上海调来和我一起住机关的，这样，我很快就安心了。

蔡大姐是杨清在湖北搞革命工作时认识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中央。1931年1月，欧阳钦到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蔡大姐留在上海。同年10月蔡大姐也到了中央苏区。他们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为了革命工作，男孩子送到外祖父家，女孩子托给一位同志抚养。以后杨清调到红军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开到前线，后来又随军长征，蔡大姐未能随军，两人就分开了，直到这次在西安才又重逢。但是两个孩子一直未找到，听说男孩长大后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知道表哥、表嫂这样的经历，我真为他们难过，也从中深受教育，决心很好地向他们学习，象他们那样为党忘我工作。

蔡大姐见多识广，很有白区工作经验，为人又热情、坦诚。杨清让她多给我讲讲敌后工作的意义、方法和经验。名义上，她是我的“表嫂”，实际上，我俩比亲姐妹还亲近。我们一起接待秘密来访的同志，一同上街买菜，有时一起转送材料。她常对我说：“买菜、做饭、住机关、送材料，同在延安一样，也是革命工作。”还常讲：“在

敌后工作随时都有危险，平时要少说话，多观察，尽量少接触人。要提高警惕，万一落到敌人手里，什么都别说，什么都说‘不知道’，更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干革命的。要坚强，做到宁死不屈！”她还给我讲过许多上海等地秘密工作的故事，使我学到很多城市生活的经验，懂得了更多的白区工作的方法和策略。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国民党、蒋介石加紧反共，我们的工作环境日趋紧张。那时，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奶水很多。蔡大姐就对我说：“现在特务活动很猖獗，敌人到处抓拓夫他们，咱们工作要特别当心。万一他们被捕，咱们必须立即转移。若一时和组织失去联系，我去给人家当娘姨（保姆），你就去给人家当奶妈。我们的事情不能对任何人讲！”后来，党内出了叛徒，因叛徒认识拓夫，不认识杨清，组织决定把我们转往泾阳县云阳镇，对外以八路军留守处教育部名义继续开展省委的工作，留下杨清和蔡大姐在西安住机关，我们两家才依依不舍地分开了。虽然分开了，但工作仍然密切联系。这一段时间欧阳“表哥”和“表嫂”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我始终铭记在心。

虽然杨清留在西安，但因工作关系经常到云阳来。有一次，我牙痛得半个脸都肿了，耳朵也化了脓，脑袋整天嗡嗡响，什么也听不清，躺在床上，几天都不能动弹，一动就撕心扯肺地痛不堪忍。拓夫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天天外出，也根本没有在意。我一个人，还要带孩子，实在难受极了。一天，忽然听到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哟！白茜是个要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躺倒的。你应该找大夫给她看看，实在不行，到西安去找大夫麻！你呀，拓夫，也太不关心人了，我这个表哥可要批评你了！”这不是杨清的声音吗？我这几天牙痛得辗转反侧，没有人过问，杨清一来，就听到他这么亲切的话语，我顿时喉咙哽咽，眼泪夺眶而出，心里感到无限安慰。杨清平时不多言语，尤其很少当面讲人好话，但内心深处很关心人，

那种细致入微，那种温暖，的确令人感动！

杨清对同志十分关心，对自己却要求很严。1938年，蔡大姐由于过去在敌人监狱的折磨加之长期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环境，突患脑溢血病逝于西安。我听到消息，极为难过，党失去了一位好干部，我失去了一位好大姐，不知该怎么安慰杨清。但我见到他时，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影响工作，影响情绪。做为一个坚强成熟的革命者，他是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的。

1939年5月，党中央调拓夫回延安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杨清担任了陕西省委书记。以后，我一直做妇女工作。杨清1941年7月调西北局后，仍然直接管我们妇联，仍是我们的老领导。由于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深入实际，原则性很强，工作水平高，所以我们都愿意向他反映情况，听取他的指导。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妇联的人总是说：“找欧阳钦同志去！”绝没有因为他不苟言笑对他敬而远之的顾虑。

杨清在边区妇女工作中的威信，还来自他以身作则。就拿大生产运动来说，开荒、纺线，他样样带头，从来没有纺过棉线的他，抽空就学，不久就纺出线来了。他看到陕北的女同志纺的线又细又匀，对自己纺的总不满意。有一天，他问我怎样才能掌握纺车的窍门，我说“要纺好，可不是一二天的事。咱们变工吧，我替你纺线，你去干别的事，不是一样吗？”他认真地说：“那不行，各人的生产任务应当自己去完成，朱老总、周副主席不都带头努力生产吗？”这时期，妇女参加边区经济建设，投入大生产运动，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而这些成绩都和欧阳钦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分不开的。

蔡纫湘大姐不幸病逝后，杨清和黄葳同志结了婚。因为我对他很敬重，对黄葳也十分亲切，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儿子，记得有一次我去

西北局开会，会后欧阳钦说：“走，到我家看看我的儿子湘湘去！”他们住的窑洞十分简陋，但收拾得十分整洁。他们留我吃午饭，小桌上除了从食堂打来的饭菜外，还多了一小盘瘦肉。“吃吧，”欧阳钦夹给我一块，“好吃吗？”“很香！”我说。当时，边区生活很苦，平时很少能吃到肉。“好吃就多吃些。”吃完饭后，他笑着问我：“你吃的是什么肉？”“猪肉？牛肉？羊肉？”“全不对，是狗肉！”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若事先告诉我，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吃的。黄葳笑着不让他告诉我，其实狗肉很好吃！

1942年整风时，我遇到了许多苦恼的事，首先是揭发本单位特务的指标完不成。我和周围的同志朝夕相处，工作多年，觉得大家都是好同志，哪有那么多特务啊！二是有件事搞得我日夜不安。当时，我是边区妇联主任，上面转来个材料，却不让我看，说一个妇女干部参加过特务组织，是整风重点。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位同志是从敌后自愿来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我们在一起工作，她非常积极主动，很能吃苦，热情高，是个好同志，怎么会是特务呢？组织上让我找她谈话，想来想去，这个任务我没法完成。怎么办？就去找杨清。杨清严肃地对我讲：“整风中，一定要实事求是，讲话要有真凭实据，不能为完成‘任务’瞎来，更不能乱整人。团结干部，团结群众，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啊！”在当时整人、逼供信很严重的情况下，杨清能说出这番话，相当不容易，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和鼓舞，沉重的负担立时减轻了！以后，杨清多次对我说：“整风很重要，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话，办实事。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同志，对得起历史！”那时，他和拓夫都受到怀疑，压力很大，他表现得很冷静，相信任何问题都会搞清楚。我真佩服他有这样坦荡的胸怀，有这样冷静的头脑！

1945年上半年，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胜利发展，需要有一个各

解放区联合的总机构。3月8日，在延安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各界代表会，成立了中国解放区妇联筹委会。筹委会选举出常委13人。选举结果使我大为惊讶，惶惶不安。象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论年龄、资历、水平、工作经验都比我高得多的妇女领袖，都是委员，而我却要当主任，我怎能领导人家呀！我怎么能干得来？心里象压了块大石头。我去找杨清同志，把焦虑、不安的心情和他说了。他认真听完我的意见后，缓缓地说：“你有你的道理，我会把你的意见向上反映。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比如培养年轻工农干部啊，地方也应有个代表啊，等等。如果最后组织定下来，你应该打消一切顾虑，全身心地工作。又不是你一个人，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左右有帮手，有什么干不来的？再说，你能和蔡大姐、邓大姐一起工作，难得啊！你多向她们学习，一定会提高更快。”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虽然我还是信心不足，但不敢干、不愿干的念头打消了。

1954年初，我在劳动部工作。杨清当时任旅大区党委书记。有次我去大连出差，因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有去打扰他。后来他见到我，很不满意地说：“你这个人去大连怎么也不来找我呀！看看我的两个小女儿嘛！我还可以安排你去看看工厂。有些先进的大型工厂是西北过去没有的。去看看重型机械厂，黄葳就在那里当副厂长嘛，看看我们国家的建设速度和发展前途，很令人鼓舞啊！”我说，知道你工作忙，怕打扰你。他说：“再忙，西北来的人我都要见。他们工作需要的，我能办的，都满足。在西北工作多年，对西北产生了感情啊！”1959年，庐山会议后，拓夫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人因此都疏远了我们。可杨清每次来北京开会，见到我们，仍和过去一样亲切、信任、关心。这种正直、坦荡的胸怀和情谊，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湘湘是杨清唯一的儿子。可是杨清对他严格要求，从不娇惯。在

这位严父身边，湘湘成长为一个很好的青年。他生活艰苦朴素，学习努力上进，大家都很喜欢他。湘湘考上清华大学，后来又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科技大学，仍对自己严格要求，没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文革”中的1968年11月，湘湘因反对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行为，反对打砸抢，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向当时的领导写了揭发信，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批斗、迫害致死。湘湘继承了父亲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死。这对受“四人帮”迫害的欧阳钦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致使他的精神很长时间都未能缓过来。可他仍和以前一样，把痛苦深埋在心里，从不和别人谈起此事。我去探望他时，也注意从不带孩子，不谈及孩子的事情。他见我也从不谈及“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拓夫。我们彼此之间是完全能够互相理解的。他只说过一句话“把痛苦留给自己。”他就是这样做的。

欧阳钦同志是我最崇敬的老领导之一，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为人和品德有口皆碑，他象一座丰碑矗立在我的心中。

抹不掉的记忆

聂景德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陕西广大人民特别是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都经常怀念着他。他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足以为人表率。

1937 年春到 1940 年 5 月，我先是在省委直属的西安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作，以后在省委机关作巡视员及省委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和欧阳钦同志接触较多，受到过深刻的教育。

1937 年冬，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临汾之后，很快打到黄河边，占领了风陵渡。每天隔着黄河向潼关打炮，陕西已经成为抗日前线，日寇随时有打过黄河进犯西安的可能。面对这严峻的形势，以贾拓夫、欧阳钦（时任省委军委书记兼统战部长）等同志为核心的陕西省委及时决策，动员全省党员积极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准备一旦黄河失守，立即在关中普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此，1938 年 3 月 2 日，已改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欧阳钦在他主办的《西北》周刊第六期上发表了省委对保卫陕西、保卫西北的意见。省委对一旦日本侵略军入侵陕西，立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及时在党员干部训练班中开设了游击战术和军事训练课。欧阳钦负责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传统。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和战士们一块担米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在此期间，省委还抽调了王世俊、白宗信、范祥瑞、郝俊峰、孙明理、马怀公、许康济等一大批党员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学习游击战争，其中范祥瑞、郝俊峰等同志毕业后到三十八军工作，在中条山抗日战场为国捐躯了。1938 年上半年，省委还派刘永端、伍仲秋、张天喜等党员到合阳，以杨虎城部一七七师名义到各联保处担任政治指导员，协助保卫河防，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省委领导下，西安等地中等以

上学校师生分期分批组织农村工作团到关中、陕南等地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武装农民，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9月5日出版的第二十四期《西北》周刊刊载的成仿吾词、吕骥曲的《保卫陕西》歌，可以说生动形象地表明当时的形势和群众的心声：“日本强盗打到了陕西的门前，黄河两岸都成了抗日的前线……。咱们是黄帝子孙，咱们是三秦好汉，起来，男女老少，一千万同胞，大家联合加入抗战，……八百里秦川到处燃起抗战的烽烟，让日寇的鲜血染红泾渭河水，让日寇的尸骨飞不出华岳终南。保卫陕西、保卫长安，拼着头颅热血，保卫我们的河山！”

1938年3月30日，欧阳钦又在他主办的《西北》第七期上发表了省委书记贾拓夫（关锋）写的《学生战时工作团怎样工作》的专题文章。号召全省人民“动员组织武装千百万民众起来，进行保卫陕西的斗争。”文中，贾拓夫把战时工作团比作“教育与锻炼青年的学校”，要求战时工作团的水平要“提高一步，不仅宣传而且组织武装民众，必要时把工作团变为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仅西安大中学校派往农村的工作团便有160余人，足迹遍布关中和陕南各县，既宣传、教育、动员了广大民众，又培养、锻炼了党员、干部，并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作为省委宣传部长，欧阳钦非常注重对党员的教育。他曾主持编印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党员须知》等小册子，发给党员学习。1939年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西北》不能在西安印刷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欧阳钦设法把机器搬进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境内，坚持编好印好《西北》，由交通员带进西安，再由当时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任联络员的我转《新华日报》西安分馆帮助发行。《西北》周刊在陕西起过很大作用，它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

指导抗日救亡运动，抨击破坏抗日的行为和谰言，声援为抗日而遭受迫害的进步青年。欧阳钦为办好《西北》可以说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全国解放后，张德生曾对我说：欧阳钦非常怀念《西北》周刊，德生同志希望我把《西北》周刊搜集齐全。1965年德生病危弥留之际，在医院又向我提起欧阳钦关心《西北》周刊的事。1978年春，我去北京开会时，特地将省图书馆现存的一套《西北》周刊带去，想让欧阳钦再看看，遗憾的是他已病危，无法过目了。

欧阳钦同志在陕西省委工作时所建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他永远活在陕西人民心中，活在陕西老干部的心中，活在党的光辉历史中。

一身正气 松柏节操

刘南生

人生一世，终有一死。有的人死了，人们想不起他的多少事；有的人死了，让人回忆不绝、怀念不已！欧阳钦就是这后一种好领导、好同志。

从1936年底到建国以后，我陆续在欧阳钦领导下工作了多年，和他建立了深厚的上下级同志之谊。他对我的帮助、教诲，是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

1936年西安事变后，欧阳钦在陕西省委先后担任西北军工委书记、军委书记、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我当时在西安任中共西安学委委员、学委书记兼学联党团书记。那时，西安有好几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其中水平最高、影响最大、最受青年欢迎的是1938年初由欧阳钦主办的《西北》周刊。我从《西北》和欧阳钦撰写的许多文章中，不但及时了解到国际、国内形势，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还学到了不少斗争方法和策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由于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错误报告，使一大批青年干部被扣上所谓“红旗党”（即在国民党红旗政策下建立的假共产党）的罪名，被隔离、审查、批斗，有的还被关进保安处，蒙受了很大冤屈。1944年9月，我从中共中央北方局调回延安，进中央党校二部学习。这时我发现被隔离审查的绝大多数都是我熟识了解的好同志。他们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一贯对党忠诚、勇敢、坚定，怎么一下子都成“敌人”了呢？！10月份的一天，我怀着悲愤的心情找到在西北局工作的贾拓夫、欧阳钦同志，要求他们想办法，尽快把受到“抢救”的同志解放出来。我把我熟悉的

同志的情况，逐个向他们作了汇报，证明他们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绝不会和敌人有任何关系。他俩都同意我的看法。欧阳钦心情沉重地说：“希望你不要性急，我和你的看法一样，相信这些被‘抢救’审查的都是好同志。凡是各机关、学校来找我们调查的，我们都写了证明材料，今后我们还要努力找有关单位做工作，尽早把这些同志解脱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他在窑洞里踱了几步，接着说：“你可以把西安建党的历史情况和这些同志当时的表现，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有助于尽快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也要劝慰受委屈的同志，不要背包袱，不要有怨气，要以革命的前途为重，经过这次运动，进一步得到考验，不是更坚强了吗？今后更艰巨的任务，正等待他们去完成呢！”欧阳钦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其中不仅满含关怀而且充满鼓励，这种鼓励，正是被错整的同志最需要的。我按照他的建议，详细写了一个西安建党情况的汇报，交给了党组织。其后不久，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力挽狂澜，使“抢救”运动中被审查、关押的同志，相继得到解脱。

1947年秋，时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的欧阳钦率领王改工作团到中共十八地委（即原热河省东部和辽西地区）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我当时在地委任宣传部长，负责留守机关。欧阳钦也住在地委机关，因此我有时跟着他一起到农村检查土改工作。他下基层一贯注重实效，工作深入，雷厉风行，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偏向，通报推广。使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对土改政策掌握得非常稳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他爱护关怀干部，坚决反对对有缺点的干部实行所谓“搬石头”的作法。他指示把各县、旗一些群众意见大的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习土改政策，改进工作作风，学习期满后再参加土改，行之有效地培养、团结、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第二，他很注意团结中农，坚决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凡是发现有违反政策的地方，他都要求在复查时，政治上赔礼道歉，经济上实行退赔。他还特别注意从政治思想上启发教育贫雇农，使之充分认识团结中农的必要性。

第三，对于地主、富农，欧阳钦也要求严格执行政策，指示按《土地法大纲》规定的条文分给土地、房屋。除了极少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地主，必须经法庭宣判执行外，他强调不许打人，更不许打死人。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们这个地区土改中死人是较少的。

第四，欧阳钦注意强调保护城镇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从而使各县、旗的市场不但未受影响，而且日趋繁荣。

由于欧阳钦坚决、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使十八地委地区的土地改革搞得扎实、顺利，翻身农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47、1948 两年农业均获丰收，参军青年多达 2 万余名，有力地支援了辽西战役。

1949 年 2 月，我调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秘书长，又在担任区党委书记的欧阳钦同志领导下工作。他在旅大期间，针对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狠抓干部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国际主义教育，批评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在同年四月份区党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他在代表区党委所作的题为《在目前形势下旅大党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口号，促进了旅大地区的各项工作，使之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欧阳钦工作勤奋，作风朴实，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除了自己经常性地到一些大的工厂企业检查工作外，还多次指示我带领工作组，先后到大连铁路工厂、大连造船厂等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学习总结苏联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并定期向他汇报。他还经常在星期天

让我和秘书一起和他下乡搞农村调查，为指导农村工作取得第一手资料。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我已调任旅大市公用局局长。此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派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到旅大市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他们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主观想象，说什么旅大市“山高林密，虎多而肥”，把全市大多数局级干部和企业经理、厂长划在“老虎”的圈子之内，号召群众起来揭发批斗，打击面极为广泛。在情况十分严重的时刻，欧阳钦代表旅大市委召开全市县、局企业领导干部大会，并作了讲话。他说：“我们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要痛改前非，但不是一切皆非，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研究解决问题。”他号召全体干部不要垂头丧气，要振奋精神，再接再厉，把本部门的工作做好。欧阳钦同志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不少同志感动得流了泪。会后，欧阳钦顶着压力，加紧落实被审查干部的问题，及时解脱了一大批干部，使全市的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在“三反”、“五反”中，我也是被审查、批斗的干部之一。主要“罪名”是我主持在大连市中山广场兴建了一座人民文化俱乐部，被工作组定性为严重的“铺张浪费”工程。这项工程是经旅大区党委批准，也是在欧阳钦的支持下修建的。工期只用了一年时间，施工中千方百计地利用废旧材料，如用台风刮倒的行道树作地板，到工厂调拨废旧小钢轨当钢筋，甚至拆一些坟墓废弃的石料加以利用等等，总共才用了当时关东银行发行的纸币 70 万元左右。俱乐部建成后，全市干部有了学习，听报告的地方，大家很高兴。周恩来同志到旅大时，也赞扬说：“这样的工程，工期短，质量好，花钱少，作用大，你们这件事办得好！”并且要去了全部设计图纸。事实这样清楚，工作组却以功当罪，要把我当“老虎”打，我当然不服气，也不害怕。批斗了我几个月，我就是不作检讨。后来还是欧阳钦说了话，肯定“这是

区党委讨论决定的，是为旅大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我才被解脱出来。

欧阳钦同志虽然已经逝世 10 多年了，但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和他建树的不朽业绩，将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赤忱忠贞 风范永存

彭毓泰

1978年5月中旬，我突然听到欧阳钦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痛涌上心头，泪水禁不住滚滚而下。他慈祥的面容和一件件往事又蓦然回到眼前……

革命青年的良师益友

1935年8月，我在上海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沦陷时，我于混乱中失去了党的关系，回到西安后，我进西安高中读书。1937年10月重新入党。次年初，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的干事。妇女部部长张秀岩同志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住在我家，领导我从事秘密革命活动。那时，欧阳钦同志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他住在二府园，离我家不远，他常常机智地摆脱特务的跟踪，来到我家和张大姐研究工作。欧阳钦个子不高，身材清瘦，说一口清晰易懂的湖南话，话虽不多，但每一句都很简明、中肯。除了谈工作之外，他还多次嘱咐我要绝对保证张大姐的安全，不允许发生任何差错，并强调说这是省委交给我的光荣任务。从他口中，我知道了张大姐是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的妻子，当时李铁夫在延安病逝不久，她是强忍悲痛，顽强工作的。我由此更加敬佩张大姐，也更坚定了为革命不惜献出一切的决心。

1938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利用暑假期间到泾阳县的云阳镇参加党员训练班学习。欧阳钦给我们讲授时事政治课。他大革命前曾在法国和苏联留学七年，博学广闻，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他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透彻分析，深入浅出的生动表述，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使我们这批刚刚参加党的队伍的青年，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进一步明确了党的任务和自己的责任，坚定了抗战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

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受到党的知识的系统教育，因此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训练班结束前，欧阳钦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从对我父母的高度评价，谈到党组织对我和姐姐的信任，勉励我在斗争中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充分利用社会关系和家庭的有利条件，为党多做工作。在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中，既有谆谆告诫，又满怀希望，使我深受教益和鼓舞。

从云阳回到西安不久，张秀岩大姐就找我和曹冠群谈话，传达省委对我们工作的安排。决定我们俩不上大学，专职搞好党的工作。张大姐说：“你们俩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从年龄和社会阅历来说，以革命为职业是早了些，肩上的担子也重了些。但形势逼人，党要求你们早些成熟，尽快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尽管我们对学校生活很留恋，家庭也具备供我们上大学的条件，但是，作为共产党员，面对苦难深重的祖国，面对党的殷切期望，我们愉快、坚决地服从了。我想起欧阳钦不久前的那次谈话，实际上是一次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我先后在西安作秀小学和咸阳当小学教员，以合法身份掩护地下活动，后来被分到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任妇女部长。

1939年夏天，地下交通通知我立即到省委驻地云阳参加会议。到达后，得知是推选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欧阳钦和张德生同志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提名我为候选人。经过候选人自我介绍、民主评议，我被选为候补代表。面对这么高的荣誉，我既激动又惭愧、不安。欧阳钦亲切地勉励我戒骄戒躁，克服缺点，发扬成绩，努力工作，无愧于“党员代表”的称号。接着，他又郑重地告诉我，广州、武汉沦陷后，蒋介石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准备对外投降日寇，对内掀起反共高潮。要我回去后密切团结党内同志，提高警惕，在情况危急时，及时把暴露的同志撤回边区，以保存

革命力量。1940年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按照省委的指示，分批撤回到淳耀县。这时，恰逢欧阳钦从延安开会回来路过淳耀，见我们全部安全回到边区，十分高兴，亲切地问这问那，还给我们作了一次时事报告。

这年5月，党组织派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会议。我们一行十余人，由吕剑人同志带队去延安。到延安后，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的“七大”延期召开，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妇联任秘书长。1942年10月，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开了两个多月，实际上是一次整风学习班。会议中间，欧阳钦嘱咐我：“你参加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你一定要认真学习领导的讲话和老同志的发言，从中吸取政治营养。同时也要深刻地检查、反省自己的缺点，为今后担负更重要的任务打好基础。”

1943年7月，康生乘整风运动之机，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把一大批好同志，特别是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分子。我也被隔离审查了两个多月，逼我承认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我这个自小参加革命，党的“七大”候补代表，一夜之间成了“敌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我打懵了，怎么也想不通。当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拨正了方向，由罗瑞卿宣布给我们平了反。但我仍没有从委屈、痛苦中解脱出来。这年元旦前，欧阳钦特意让他的爱人、西北局调查部干事黄葳同志来叫我和曹冠群过年到他家去玩（冠群在“抢救”中也挨了整），我们当时心情不好，都没有去。黄葳一连叫了好几次，推托不过，我们才去了杜甫川他们的住处。几个月未见，欧阳钦明显地消瘦了，他热情地端出红枣、花生招待我们。见到老上级，我们象见到亲人一样，一肚子委屈化成了泪水。欧阳钦也很难过，他为他自己也被审查，无法保护我们这些年青同志感到内疚。待我们心情平静下来后，他坚定地说：“把陕西省

委诬蔑为‘红旗党’是完全错误的，省委的工作成绩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你们都是对党忠诚的好同志、好党员，省委是相信你们、了解你们的！真理必将战胜谬误，搞‘抢救’运动的人终究会受到历史谴责的！”沉思片刻，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者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不少坎坷，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困难大多数来自外部，有时也可能来自内部。在敌人的监牢、屠刀面前是考验，在革命队伍内部一时被误解、受委屈也是考验。你们都年轻，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和摔打，更不能对党、对党的事业失去信心，否则就不配作一个共产党员了！”

欧阳钦这一番既亲切关怀、又批评勉励的话，使我和冠群心悦诚服，心里的疙瘩一下子化开了。不久，毛泽东同志就亲自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我和石锋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随欧阳钦、高自立带领的工作队奔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欧阳钦留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我分到绥中县委任宣传部长。在一度和上级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我们县委一班人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不分日夜地为解放军筹措粮食、被服、物资，组织担架队、破路队，支援锦州战役和辽沈战役。这期间我们接到欧阳钦一封短信，这封信是在战火中辗转了好几个月，才交到我们手中的，已经揉搓得不成样子了。但字里行间，充满对我们的鼓励、关怀和期望，使我和石锋激动不已。

忘我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0年“文革”使千千万万革命老干部遭受了一场磨难，欧阳钦的一家和我的一家自然难于幸免。1974年，我恢复工作后，到北京治病。此时，欧阳钦在周总理的保护下，也在北京住院治疗。黄薇同志热情地邀我到他们在中组部招待所临时安的“家”中去住。我这时才惊愕地得知，他们唯一的儿子欧阳湘早在“文革”期间就在黑龙江

被迫害死了！湘湘是 1940 年在西安出生的，黄葳分娩前，是我母亲送她去的医院，是我们看着生、看着长大的好孩子。他大学毕业不久，是一个有才华的年青党员，死时还没有结婚。白发丧子，对他们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我到医院探望他时，有意回避“子女”这个话题，怕引起他伤心。他却毫不避讳地向我谈起了儿子的死。他躺在病床上，深情而平静地回忆了湘湘的许多往事，谈到儿子大学刚刚毕业，还没有为党作什么工作时，语调中充满惋惜。他告诉我，在湘湘死了两年多之后，他才知道信息的。“听说造反派批斗时，湘湘很坚强，宁死不低头，不说一句违心的话，是条硬汉子！”说到这里，他沉思似地闭上了眼睛。停了片刻，他又说：“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光是我们家的湘湘一个，还有不少老同志的儿女为捍卫真理牺牲了……革命的进程避免不了曲折，要坚定信心，要看到光明。”我知道，他这番话既是勉励我，也是自勉。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的气焰正盛，形势还相当严峻，是应当继续作好斗争准备的。

1978 年 2 月，我从报纸上看到欧阳钦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说明他身体已经康复，并能够出来重新工作了。万万没有想到，仅仅三个月后，就接到他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逝世的噩耗。我深为党失去了一位好干部、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老师而悲痛。

欧阳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 10 多年了，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坚定，对于同志的温暖、热忱，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欧阳钦与《西北》杂志

史 悦

欧阳钦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创办了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历时两年，出刊 50 期，发行数量曾达到 6000 份，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它宣传抗日救亡，并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作斗争，对于动员、团结抗日力量，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回顾它的历史，从创刊到结束，都与欧阳钦紧密联系着。有关《西北》和“西北社”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他主持、参与、筹划并领导进行的。

1937 年底前后，当省委决定创办《西北》时，欧阳钦一面选调人员筹备，一面组稿和写稿。1938 年 1 月 21 日，由毛泽东书写刊名的《西北》，就在西安问世了。首期社论是欧阳钦写的《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保卫陕西》，该文署名杨清，这是他在《西北》上发表文章的笔名，也是他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使用的名字。之后，16 开版本的《西北》相继在西安出版。

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战，但中共陕西省委仍然处于地下。而公开出版《西北》，就需要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对此，欧阳钦作了巧妙安排：由已经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并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李初梨和曾在高校任教的徐彬如分别挂名为《西北》的“编辑人”、“发行人”，并由他俩在住地门前挂上“西北社”牌子（许士庙街十五号），以便对外联系。为了使《西北》取得在西安公开出版的合法权益，得到登记证，由他俩以以上职务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登记，由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我负责联系印刷、校对和发行工作。这样，就使欧阳钦和从事编辑工作的林放（郭有义）能够秘密进行地下活动并与党内各方面联系。

欧阳钦除了亲自为《西北》写稿、编稿外，还经常向省委和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西北》编委组稿，以保证《西北》稿件的高质量，发挥其省委喉舌作用。1938年8月，《西北》发表了署名关锋（贾拓夫）、杨清、德生的《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关于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意见》一文，这实际上是省委的意见。欧阳钦为《西北》写稿最多，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甚至二至三篇。为了使他有充分时间写作，省委在民先队西北队部结束时，将该队妇女部长黄葳（笔名陈源）调到“西北社”作搜集、积累、提供资料等工作。有了这个方便条件，欧阳钦写文章更多了。黄葳也为《西北》写了多篇文章。欧阳钦编辑业务极为熟练，每期付印前，他迅速地画出版面大样，并在文稿上注明标题字号与字体。他为了节约用纸，每页安排的字数比一般刊物多数百字，工人们只能在大块文章的行间加对开铅条，一般文章行间加四开或不加铅条。他工作极端负责，在创刊初期，每期上机器印刷前，他还要看大样，甚至再校阅一遍才放心。

欧阳钦为了扩大《西北》的发行数量和邮寄中的安全，由地下党员张道吾（介人）在西安当时最繁华的南院门开设了胜利书店，为《西北》的总经售；由有关同志在西安生活书店建立了党组织，经过联系，把邮寄陕西和全国各地的《西北》包裹，让我直接送到西安邮局负责加邮戳和打包的地下党员手中，绕过了国民党在邮局的检查人员的检查和破坏。欧阳钦采取多种措施，使《西北》的发行数量由初期的2000份，增加了3倍，这在当时一般书刊只发行一二千份的情况下，是很高的数字。

《西北》出版到第十期前后，由于发行到各地党组织的《西北》（占印数的1/4）基本上收不到刊费，《西北》的经费发生了困难。怎么办？省委根据欧阳钦的意见，决定由“西北社”在社会上募集资金，一些统战对象，其中包括陕西开明绅士韩望尘、杜斌丞等踊跃捐

助，解决了困难。在西安形势恶化，省委决定在边区设厂印刷《西北》、购买印刷设备时，所募集的资金剩余部分，解决了燃眉之急。

1938年冬，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出版物在出版前，要送清样给他们审查。《西北》在送审中，每期都有被删除的段落和句子。对此，我根据欧阳钦的指示，不改动版面，把被删除的字换成“x”或“口”，表示抗议和不满。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由“溶G”改为“限G”与“反G”。承印《西北》的西京评报社有了顾虑，不愿承印《西北》。对此，欧阳钦指示我要和该报社有关职工交朋友，联络感情并启发其政治觉悟，使《西北》能够继续在这里印刷。他还准许我报销招待费。我遵示照办后，果然起到作用，从而使《西北》又在该报社印刷了多期，直到同年12月24日《西北》出版到第三十期后休刊。当《西北》在西安印完最后一期的晚上，我从报社回西安“八办”途中，在一条暗道上发现国民党特务埋伏逮捕我时，飞车逃离。当晚不能回“八办”了，辗转数处，最后又回到西京评报社，得到那里工人朋友的帮助，在他们的夜班宿舍暂栖了一夜。亲身经历，使我深感欧阳钦预见的英明正确。

1939年春，“西北社”和安吴青训班用2000元合买了一套印刷设备，在边区的淳（化）耀县境内筹建印刷厂。同年初夏建厂成功，起名青年印刷厂。《西北》遂于同年7月1日在这里印刷。此时，省委驻在泾阳县云阳镇，距离青年印刷厂100多里，沿途几乎全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几十里狭谷险道，还必须通过驻有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口子头镇。我一人来往于两地，危险颇多。当时“西北社”只有林放和我两人，而林是从事编辑工作的，怎么办？欧阳钦决定调安群来。安群和我都曾是西安师范学生，但安群专门学习过半年军事，军事知识多。我们两人化装成八路军军官，佩带武器，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

两个人行走险道时，一前一后，拉开距离，荷枪实弹，均安全通过，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欧阳钦非常关心青年印刷厂的建设。这个厂设备简陋，虽然有一台浇字炉，但只有一套老五号字铜模，没有标题字铜模，标题字用久了受磨损，需要更新，但没有那么多铅字，怎么办？欧阳钦知道后，派我到西安购买，从而使青年印刷厂较好地完成了印刷《西北》和毛泽东著作任务。其中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除在《西北》上登载外，还作为《西北丛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了 6000 册。

1940 年初，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进攻。4 月，《西北》出版了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向国统区发行已非常困难，印刷厂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欧阳钦将上述情况向中央报告，经中央批准，《西北》停刊，印刷设备移交延安解放印刷厂。至此，《西北》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严于律己 宽厚待人

安群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给我的脑海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其中许多令人激动的往事，是和欧阳钦同志连在一起的。

1939年夏，我在陕西省委的机关刊物《西北》周刊社工作。当时欧阳钦任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北》周刊社负责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一直工作到1942年5月，他那周密严谨的工作态度，宽广豁达的革命胸怀，关心、培养干部的优良作风，使我毕生难忘。

欧阳钦培养干部的方法是严格要求，启发引导，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并在实际工作中识别干部、使用干部。

记得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高潮。为了使全体干部认清当时的形势，欧阳钦给干部出题，组织干部讨论，题目是《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特点及我党的方针、任务和对策》。他先让干部独立思考，深入学习，然后组织讨论。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争论十分热烈。最后，欧阳钦对大家的意见进行综合、归纳，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作了总结性的报告。他一方面表扬肯定了一些干部的正确观点，一方面从爱护和教育干部的角度出发，讲革命道理，摆事实，澄清了干部中存在的模糊认识。通过这样扎实、深入的辅导，使大家明确了党的任务和对策，统一了思想，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欧阳钦常说：“对理论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句话至今使我铭记在心。

欧阳钦对工作极端的负责，布置工作既讲原则性又不乏灵活性。1938年秋，国民党加紧限G、反G，承印《西北》的西京评报社迫于压力，常常拖延印期，使刊物不能按时出版。欧阳钦指示史悦和报社职工交朋友，提高其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还可以报销一点招待费。

史悦照此办理，常和管印刷的职员谈抗日形势，并请他们吃了几次羊肉泡馍，此法果然有效，使每期的印刷时间大大缩短，保证了《西北》及时出刊。

记得 1940 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 G 高潮。3 月份的一天，敌人有 2 个师的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石门关骚扰，距我《西北》社印刷厂所在地潘家峪很近。欧阳钦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人飞马至潘家峪给我送信。信中说：“国民党反动派两个师将从石门关通过，距印刷厂很近，要保护好印刷设备，情况危急时可拆卸隐蔽，如与省委失去联系，可组织工人打游击”。当时大雪纷飞，山峦沟壑一片银妆，马匹、人员行动非常困难。为了保护《西北》周刊社和印刷厂的安全，我遵照欧阳钦的指示，马上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安排，把几十个工人组成了班排建制的游击队，并进行了几次军事演习。因群众的掩护，加之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从这儿通过没有发生意外，我们工厂安然无恙。由于欧阳钦对问题指导的这样具体、明确，才使我执行起来觉得胸有成竹，井井有序。

欧阳钦是位宽厚待人，严于律己，善于虚心接受下级的意见，从不给人“穿小鞋”的好领导。记得 1940 年后，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西北》周刊发行十分困难。这年 4 月，中央决定《西北》停刊，印刷设备和工人全部移交延安解放日报社。

我从延安返回时，正值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在延安开会，他交给我一个班的武装，要我把两匹骡子驮的《共产党人》刊物护送回省委。一天，在爬高山时，烈日当空，满头大汗，到山顶时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我身上棉衣也被雨水湿透，浑身冰凉。回到省委后，发高烧 41℃ 不省人事。省委秘书长张中以为我得了伤寒病，把我送到深沟畔上新打的一排窑洞中的一个窑洞里进行隔离。那时无药物治疗，我又吃不下饭，每天昏睡起来，就喝水，喝完水，又昏睡。这样反复

了几天，烧才逐渐退了，身体也慢慢恢复。这时，省委总务科长杨坚因动员公粮的人少，向张中提出让我去参加动员工作。张中即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出发。我见条后，心中有气，心想病成这个样子，身体没完全好，又叫我去搞公粮，一气之下，把条子撕得粉碎，向送条子的同志说：“我不去！”欧阳钦知道后，即派警卫员杨三娃叫我。三娃对我说：“杨清生气了，你可要注意啊！”我到 he 那里时，正值他和张中吃早饭，组织部的罗文治同志正在汇报工作。欧阳钦问我：“让你去动员公粮，为什么不去？还撕了秘书长的条子？”我说：“我的工作岗位撤销了，应给我重新分配工作。动员公粮我干不了！”欧阳钦说：“这是敌人逼得我们没办法，谁也不愿意这样做。”我还是坚持不去。他生气地说：“你应该有党性啊！”我说：“我党性不强，你送我到党校学习，锻炼锻炼党性。大概做组织工作的人党性强，让组织部的人去吧！”欧阳钦生气地拍了桌子，大声说：“你就应该去！就让你去！”我也拍桌子质问：“你发什么脾气？拍桌子干什么！”欧阳钦立即冷静下来，说：“我发脾气不对，向你道歉！你不服从组织对不对？”我也觉得自己太走火了，回答说：“不对！”行了个军礼，说声再见，二话没说，立即骑马出发动员公粮去了。当天半夜，动员群众把公粮运入仓库后，第二天 10 点多钟，我还在睡觉，杨三娃来了。他说：“杨清书记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我说粮食全入库了，我累了我要睡觉。据我所知，这是最伤他面子的一次，但欧阳钦和张中丝毫没有计较，照样对我关心、爱护、培养、使用。在照金时，让我担任省委招待所所长，他指示我组织住招待所的全体干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鼓励我说：“重点你知道，大胆地组织学习吧。”欧阳钦的胸怀，的确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1982 年到 1986 年，我曾 3 次回到陕西，曾去省人民医院看望几

位住院的老同志。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纪检委书记的罗文治同志对大家风趣地说：“我一看见安群，就想起杨清书记。那一次杨清拍桌子，安群也给他拍桌子，老安脾气大，胆子也大，拍桌子时我在当场。但杨清从来不打击，不报复。老安你想想，三四十年代，我们党的作风是何等的好啊！”

谆谆严师 蔼蔼长者

赵呈琳

1938年3月，我12岁时，参加了革命，到中共陕西省委当勤务员。当时省委机关驻在泾阳县云阳镇，为了保密起见，对外叫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我先后跟随过几位首长，也在欧阳钦同志身边工作了一年多，直到1940年6月份离开。他的坚强，他的乐观，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切为了革命的胜利

欧阳钦的身体比较瘦弱。但为了革命事业，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毫不顾惜自己。

1938年严冬，渭北高原上，刺骨的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削减了八路军的给养，并且接连不断地制造军事摩擦，省委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在冰雪封山的数九寒冬，连烤火的木炭也没有。每当深更半夜，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我在睡梦中常常被欧阳钦的咳嗽声惊醒。我知道，他还在小厢房里彻夜工作。谁能记得清那盏小油灯伴着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由于房间里没有生火，冷得象个冰窖。为了御寒，欧阳钦几乎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看文件，写文章，一方面领导组织抗日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谋虑和国民党顽固派违抗抗战建国纲领、破坏抗日团结、分裂抗战力量的行为作斗争，灯的油烟常常把他的鼻孔熏得黑黑的。

凡是和欧阳钦接触过的同志，无不佩服他的水平和才干。但是和他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都深深体会到，他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正确的指示和意见，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靠他刻苦的学习、深入的调查研究、长期的实践磨炼得来的。

生活俭朴 平易近人

1939年12月间，省委机关从云阳迁到陕甘宁边区内的安社村后，欧阳钦住进了一孔土窑洞。在这孔卧室兼办公室的窑洞里，只有两条长凳和一张小破桌子。每顿饭都是小米饭、土豆、野菜。有时候，管理员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想给他做点好的饭菜，他坚决不同意。记得一次管理员给他做了一碗面条，轻轻放在桌子上。他立刻皱起眉头，神色严肃地说：“这怎么行呢？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同甘共苦，怎么能搞特殊化呢？”管理员只好又把面条端回了灶房。

那时，每人两年发一套棉衣，一年发一套单衣，衬衣、衬裤等是没有的。身为省委书记的欧阳钦也和大家一样。他的棉衣上打满了补丁，他的毛巾，由于用的时间太长了，毛掉光了，还破了许多洞，他用剪刀从破的地方剪开，把好些的毛片对在一起，用针线将其仔细缝上，继续使用。我当时年纪小，每逢看到他穿针引线的认真劲儿，总忍不住想笑。他不但不笑，还要把我“敲打”几句：“笑什么？闹革命么，还能不吃苦？先苦后甜嘛！将来，等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都富起来了，我们当然也不会用这破毛巾了，但现在不行，还得过苦日子，你说是吗？”他见我笑着点头，又接着说：“小孩子，要不怕吃苦，要在苦中锻炼，将来才能有出息。怕吃苦，什么也干不成，只能去当二流子！”

欧阳钦的话，留给我永生难忘的印象。作为省委书记，他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对下级又那么平易近人、温暖关怀，既是严于教诲的老师，又是慈祥可亲的长者，令人可亲可敬。刻在我脑海里的事，还有一件。那是1940年2、3月间，有一次，我们总务科大胡子何科长，处罚了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小勤务员，他让我们在总务科门前的院子里罚站，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这件事让欧阳钦知道了，于是便把何科长叫去：

“听说你罚那帮小鬼们的站，有这事吗？”

“是的”何科长笑着说，“您不知道，这帮小鬼太调皮了，不批评一下，恐怕以后要出乱子的……”他一个劲儿在为自己辩护。

“什么？出乱子？”欧阳钦马上严肃起来，“老何呀，他们还是孩子嘛，心灵都很单纯，将来都是革命的接班人，批评是可以的，这么冷的天，怎么能罚站呢？冻坏了怎么办？！你想过没有？”见何科长低下了头，欧阳钦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对这帮小鬼，今后要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多爱护，不允许再罚站了！”

何科长面带愧色地出去了，见了我们还挺不好意思呢。

手把手教我学文化

为了教我学文化，欧阳钦同志也是费了不少心思的。

刚开始，他总是开导我：“你才12岁，不识字怎么得了！不但工作干不了，生活也不方便。你想想，一天不多，只认两个字，一年就有700多了，不小的数字啊！坚持下去，保准四、五年就可看报，七、八年便可写文章，成秀才了，多好的一件事啊！”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手把手地教我认字、写字。后来又教我造句、写作文，使我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也提高了学文化的兴趣和对知识的渴望。建国后，我虽然上了大学，但我的起步，是欧阳钦手把手扶过来的。

“两点希望”

1940年6月，组织上调我到剧团工作。一种和亲人、和所尊敬的师长惜别的痛苦感情，一下子揪紧了我的心。

欧阳钦看出了我的神情。临走的前几天，他把我叫进窑洞内，亲切地问：“怎么，知道要走的消息了？”

我含着泪水点了点头。

“这有什么难过的呢？”他笑出了声，“干革命嘛，本应四海为家，你年纪还小，不能老在我身边打杂，要出去锻炼，才有前途。不

过，我对你有两点希望。”

“什么希望？”我止住了泪水，倾听他的嘱咐：“不论走到哪里，一要坚持学文化，二要干好工作，团结同志，记住了吗？”他打着手势说。

我用劲地点了点头。

临别之际，欧阳钦象对待老同志那样，庄重地和我握了握手，接着又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虽然没有说话，但不尽的话语都在他那慈祥的眸子中。

一别 30 余年，没有想到，1973 年，我又在北京见到了敬爱的欧阳钦同志。当时他身体很不好，也没有恢复工作，但还象当年那样乐观、热情，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问了我很多情况，还问到许多陕西老同志的情况。言谈之中，深深怀念着陕西，对“文化大革命”的前景也满怀忧虑。

这是我和欧阳钦见的最后一面。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精神和功绩永存党和人民心中，也永远铭刻在我这个当年的小勤务员的记忆中。

欧阳钦和七月剧团

王群定 王小民

1938年7月，全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周年纪念日在隆隆的炮声中来到了。当时，日军正向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连续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也对边区根据地实行封锁、破坏和蚕食。面对这种形势，陕西省委机关决定借抗战一周年纪念之机加强抗日宣传，扩大政治影响，鼓舞广大人民抗日的勇气，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当时，陕西省委机关驻在泾阳县云阳镇上，对外号称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欧阳钦同志当时任宣传部长，因他的化名叫“杨清”，我们习惯地叫他杨清同志，那时，机关每逢重大的纪念活动，我们都去安吴青训班求援。那里有青救三团、战地服务团，聚集了一批能歌善舞的文艺人才。这次机关派的是白衣（现名何纯勃）和斯曼尼（现名杨公愚）去请人。谁知人家也接到中央通知，要进行扩大宣传，抽不出人来。他们两人回来后向杨清作了汇报。他沉思了大会儿，指示道：“既然请不到外援，我们就自己搞，能搞成的话，以后就不用再求人。”

这样，白衣和斯曼尼就召集人研究，最后确定由白衣和程波涛合作写一个《英勇奋斗十八年》的短剧，由苏一平、李冰（曹冠群）两口子合写一个话剧，斯曼尼自己按《三娘教子》的格式，写一出《新教子》，把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融汇进去，旧瓶装新酒，有着很强的时代感和高涨的抗日热情。

那时，国民党表面上还和我们讲统战。所以，演出地点就放在国民党联保处的戏楼上。演出那天，正逢“国民月会”，听说八路军演戏，群众来得很多。新颖通俗的自编自演节目，吸引了人山人海的观

众，很是红火。待到《新教子》出场，群众一听是本地秦腔，热情更加高涨，顾不得前边坐的是干部、首长，潮水般地往前面挤。看到这种情况，杨清同志立即指示干部们往后退，把前边的好地盘让给群众。戏演到热闹处，后边的群众又往前挤了，杨清命令干部继续后退，让群众看好戏。云阳镇地处关中腹地，人实在多呀！联保处从来也没有来过这么多人，一下子把联保处给挤“炸”了。群众觉得很稀奇，没想到共产党八路军还能演秦腔！谁不争着、抢着来看共产党的秦腔戏？！

戏演完后，杨清很兴奋，半夜把斯曼尼叫去问：“你们搞的那是什么戏？为什么群众那么喜爱？”斯曼尼回答说：“我胡凑合哩，这叫秦腔，是陕西地方戏曲。”杨清说：“难怪群众这么爱看，秦腔好啊！群众爱看就是好戏，以后多搞些这类戏，让群众好好看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民族形式。搞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工作就上去了。”

杨清这么一鼓动，干部们编秦腔、演秦腔的热情一下子起来了。不光斯曼尼写，民运部赵伯平部长也写。我们的舞台上，大部分演的是秦腔，群众非常爱看，从中也受到了很大教育。我们除了宣传打日本救中国，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揭露他们派夫抓丁，逼粮逼款，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等等罪恶。通过观看我们的演出，群众认为共产党替他们说了话，出了肚子里的气。所以当地群众把看戏说成是“出气”：“走，今晚‘出气’走！”

1939年，省委筹备成立业余剧团。为给剧团起名字，大家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叫七七剧团，以显示我们抗战的决心，有的说，我们是党的机关，剧团是党的剧团，还是叫七一剧团好。大家争论不休，定不下来，就去请示省委书记杨清同志。他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说：“‘七七’是抗日纪念日，‘七一’是党的生日，都是很有意义的名

字。”他踱了几步，思索片刻，以商量的口气说：“叫‘七月剧团’怎么样？把两个意思都包含进去了。”大家听了都拍手称好。从此，我们业余剧团正式定名为七月剧团。后来剧团专业化了，还是沿用这个名称。

1940年秋，我们剧团接到指示，要调我们到延安去学习、演出。大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到延安去就是到中央去，到毛主席身边去，大家都希望见到毛主席。这天一大早，我们整队从老君庵出发，吃早饭时分，到达省委驻地坟滩村。杨清和张中秘书长来欢送我们。9月天气，不热不凉，灿烂的阳光洒在身上，令人心旷神怡。杨清微笑着给我们讲话，他说：“目前，革命还处在困难时期，不过，再困难，也要送你们到延安去学习、提高。大家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要保持以往的优良作风，要讲“三化”，这就是军事化、政治化和艺术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求我们始终保持警惕性，因为我们处在边区的前沿阵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打仗，没有军事化的作风，就会被敌人吃掉；政治化，就是要求保持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一致，行动统一，深入群众；艺术化，就是我们已经成了专业剧团，不能再有游击作风，要讲艺术质量，在普及中提高。他还亲切鼓励我们，目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怕牺牲、奋勇斗争，就会很快迎来新中国的黎明的。

杨清的热情勉励，使我们这伙青年文艺工作者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通向延安的路上，我们的脚步迈得更加有力了！

杨清同志在冀察热辽

赵毅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把东北建成为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重大任务。以热河为中心的冀察热辽地区，是东北和华北两大战略地区的咽喉。我们能不能在热河站住脚，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至关重要。中央在决定派 10 万大军 2 万干部去东北的同时，即决定要留下部分干部和部队在热河，并电令以程子华同志为书记在承德成立中共中央冀热辽（以后改称冀察热辽）分局，林枫同志所带领的第一批领导干部，本来是快马驰赴东北的，但到了承德之后，中央电令我留在承德，参加冀察热辽分局工作。不久黄火青和杨清等同志也先后到了承德，参加冀察热辽分局工作。在延安时期，杨清在西北局，我在中央宣传部，接触不多，到了承德以后，我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斗了。他处理分局繁忙复杂的任务，真可谓日理万机，但他明确必须以发动群众作为中心任务，在发动群众中掌握政策稳准严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键是发动群众

我们怎样才能站在热河站住脚？关键的问题是发动群众。这里的同胞，在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蹂躏下度过 13 年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他们对敌伪有着深仇大恨。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绝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重新骑在热河人民头上。面对国民党的进攻，我们发动了自卫战争。“为了迅速把热河建设成为长期坚持的革命根据地，并能及时动员与组织广大人民积极参加自卫战争……就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在杨清秘书长的积极参与下冀察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于 1945 年 11 月 25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

当时的热河，日本侵略者虽然垮台了，但凭借日本势力的敌伪残余，还象梦魇一样压在人民头上，使人民不敢真正直起腰来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针对这种情况，分局和热河省委的《指示》中提出“有冤伸冤、有仇复仇”的口号，开展“控诉复仇、回头自新”的清算运动，要求清算斗争取得胜利后，必须紧接着以减租减息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冀察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的这个《指示》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认为这个指示可以适用于东北。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

杨清领导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领导机关指示发出后，随时注意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指示》中说“在清算运动告一段落后即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环节”，有的同志在执行中没有在清算运动后随即转入减租减息，使运动陷于冷冷清清的停顿状态。杨清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使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续开展。《指示》中还明确指出“这一斗争，以民族形式出现，实质上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有些干部执行中忽略了阶级内容，导致“复一切仇”的倾向，以致一些人出于个人恩怨，发生一些木匠斗铁匠、瓦匠斗皮匠等偏差。这些缺点，都在杨清和分局领导下得到及时纠正。

严格执行政策

热河的群众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即上述清算反霸，减租减息斗争时期；第二时期是“五四指示”以后，即土改革时期。杨清在分局会议上指出，第一时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了群众运动的热潮，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群众感到仅仅限于减租不能满足生活和生产的要求。分局派出调查组到农村了解情况，发现热河土地高度集中，剥削特别残酷。1946年4月热河省委扩干会上就提出“土地应从高度集中走向适当分散”的方针。虽然没有明确提

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实质上没有区别。

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展开了冀察热辽地区发动群众的新阶段。分局和热河省委在热西、热辽和热东派出了大规模的领导同志亲自带队的土改工作团，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

在这急风骤雨的群众运动中，作为分局秘书长的杨清同志，一方面要掌握全局的情况，一方面又亲自参加热东叶柏寿土改工作团（南团）了解第一手资料，掌握政策。土地改革是在农村中发动贫雇农群众消灭地主阶级，不是对地主作肉体的消灭。在运动中，有些地方的领导对政策没有掌握好，以致发生“有斗必打，有打必死”的现象。杨清和分局领导同志认为，这是违反政策，也是违背广大贫雇农意愿的，坚决地制止和纠正。《土地法大纲》上明文规定，对地主是接收其土地，对富农则是征收其多余的土地，但我们有的同志地富不分，以致于什么打烂平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老牛赶山、倒宝塔形”等种种错误都出现了。杨清在一次会议上说：“老牛赶山”尽给地主坏地，地荒了，有人说叫他要饭吃去。向谁要？还不是向贫雇农要？如果我们不给地主富农生产和生活上的出路，则社会上将有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口无职业，流浪，行乞，甚至为匪为盗为娼，没有生活出路时便要为非作恶，破坏社会秩序，贫雇农也不能过好生活，所以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和生产上的出路，实际上还是为了贫雇农的利益，只要向贫雇农讲清楚了，他们是能够理解的。

“中农的向背决定革命的成败”

冀察热辽土地改革初期，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打烂平分，“老牛赶山”，加重中农负担，不让中农参加农会等等。有的同志甚至说“抽肥补瘦”是对中农而言的。这些同志不懂得，划分阶级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生产手段的占有和剥削关系，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用比光景、比富裕来划分阶级，这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

这样一比就把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中农推到敌人方面去了。杨清在土改会上讲：“我们经过土地改革的地方，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比如，中农受到侵犯，感到动摇、恐慌、敢怒不敢言，对贫雇农离心离德；地主威风未打倒，仍在暗中活动；贫雇农孤立。我们口口声声‘贫雇农领导’，如果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中农离心离德，你领导谁？我们口口声声‘贫雇农优势’，如果中农中立，甚至暗中还是跟地主走，你有什么‘优势’？那时宁城一个区发生地主武装暴乱，就有许多中农参加，杀了我们的干部。所以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是农村土地改革中的大问题。刘少奇同志说：‘伤害中农利益是我们的致命伤’。毛主席也明确地说：‘中农的向背决定革命的成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分局决定对提高了成份的中农改订成份，没收他们的东西要进行赔偿道歉。这个决定，遇到各种各样的思想抵制，有的人认为这样做会给群众泼冷水。杨清根据事实对分局的决定作了有力的阐述。他说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贫雇农接受团结中农的政策，比有些干部要快，他们说人多心眼多力量大，江山坐得稳，要是中、贫雇农团结一体了，地主就不可能反攻倒算。有些贫雇农说，对中农让步，不是怕他，是买他的心。许多事实证明，有些干部单纯强调贫雇农利益，实际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冒险主义倾向。

为什么有些干部在落实中农政策的问题上反而落后于贫雇农呢？杨清说：我们有些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出了问题就往下推，而不敢向群众承认错误，怕丧失自己的威信，不好工作。所以有些贫雇农说：讲斗争的时候你们叫我们斗，斗错了又怪我们。结果是干部不讲民主，贫雇农对中农也没有民主。

杨清说：既然我们在政策上伤害了中农，就应该以负责的精神，切实检讨，及时认真的予以纠正，不要采用任何动摇的不坚决的中间

立场和态度，才不致把坚决赔偿与巩固团结全体中农的方针化为空谈。其次，还必须打开大门，把全体中农吸收到农会里来，并吸收中农参加农会领导，共同商议贫雇中农内部团结问题。当然农会的领导权，是应该牢固掌握在贫农的手里。巩固团结中农就是巩固贫雇农的领导权。如果中农不跟贫雇农走，哪里还有什么贫雇农的领导权呢？杨清做为分局秘书长，在多次干部会议上都反复给同志们阐述这个问题。

土改支持壮大了武装斗争

冀察热辽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的。后来除热北外全部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特别是热中地区，四面都在敌占城市与铁路公路线包围之中。分局和军区决定，把主力分散到各地区去，执行歼灭小股蒋军，清剿土匪大团，保卫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壮大民兵和地方武装，把根据地逐步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扩展。当时摆在分局面前的任务很多。杨清说：我们是武装保卫土改，土改支持和壮大武装斗争。他把土地改革作为争取自卫战争胜利，压倒一切的最突出的中心任务。只要土地改革完成了，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样，土地改革完成了，各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春耕生产运动。为了巩固土改成果，扩大解放区，土改后的农民掀起了参军热潮。“父亲叫儿上战场，哥哥带弟打遭殃”（老百姓把“中央军”叫作“遭殃军”）。1947年4月，分局的《全力准备大反攻》决议发布后，民兵、县支队不断向主力部队升级，整连整连的民兵由乡支部书记带领着参加主力部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迅速壮大起来。

我们是1946年8月28日撤离承德的。由于我们抓紧了土地改革这一中心环节，壮大了人民力量，配合着东北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从国民党手中解放了承德。这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东北及全国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结果，其中杨清同

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蒙汉联军的倡导者杨清同志

李运昌

1945 年秋，日本投降后，冀察热辽中共中央分局成立。我是分局委员兼热河省政府主席和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杨清同志是分局委员兼秘书长。我们在异常艰苦的岁月中共同战斗了 3 年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此之前，我就久仰曾任苏区中央分局秘书长杨清的大名，知道他有很高的水平和能力。在冀察热辽分局的战斗中，尤其是在创建蒙汉联军的工作中，我更深刻体会到杨清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融汇贯通，运用灵活，能正确运用党的政策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并有独创灼见。

冀察热辽地处华北东北两大区连接地带，居重要战略地位。又属于蒙汉民族共居地区，曾被日本侵略者占据 13 年之久。日军为了达到将内蒙作为反苏、反 G 的军事基地，利用蒙族军事力量为其侵略服务的目的，千方百计挑起民族矛盾，制造“蒙族人压迫汉人”的假象，致使蒙汉两族纠纷不断，隔阂日深。我军解放冀察热辽后，敌人又制造“汉族人要压迫蒙族人”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蒙汉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到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事业，而且是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根据地的一个关键问题。

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负责民族工作的杨清同志，按照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论述，提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蒙族上层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的军队，成立内蒙古自治学院培养民族干部。”

当时冀察热辽所属的热北、热东、热辽、热西，有昭盟五旗、锦

热八旗。这些地区蒙民较多，人口达 50 万以上。这里原有的蒙族武装多属于王公贵族与旧军阀所有，还有一些土匪。为建立蒙族人民自己的军队，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召开了蒙民问题会议。会上讨论决定了发动蒙民群众，建立蒙汉联军问题，审慎地提出土改政策以及建立政权等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杨清首先讲了当时正处于全面大反攻前夕的形势。他说：“目前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武装的蒋介石反动军队的进攻，这是最大的、可能是最后一次战争。我们一定要把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军队打垮，就需要加强民族团结一致的军事力量。”杨清结合几十年他的深切体会，反复讲：“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是从无数次战斗和流血牺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一整套军事上，战略上的路线方针，是政治思想和纪律作风的传统。这不是从日本士官学校中学来的，也不是从外国搬来的。而是运用历史建军传统，战斗中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我们现在面临全面大反攻，要打垮蒋介石这强大的敌人还是不容易的，因而要加强军事力量。”

针对冀察热辽地区是蒙汉共居地带，杨清提出需要建立蒙汉联军。这样可以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蒙族士兵中缺少红军传统。在蒙族骑兵中可以有一部分步兵，加在一起可编为独立团。干部可以有蒙有汉，这样便于统一领导指挥，便于统一作战，也可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补充，统一建立各种制度。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击反动军队，才能保证取得大反攻的胜利。杨清关于建立蒙汉联军问题提出后，我坚决支持他的意见。但有些蒙族干部有疑虑。有人提出这是否和伪满时期蒙古建军，日本派人的参事军官一样？又有人提出是否有大汉族主义，慢慢地把蒙族军队吃掉了？杨清耐心地反复解释，说蒙汉联军与日军派的参事官有本质区别，日本侵略者是为达到其侵略目的而派驻蒙军，我们蒙汉联军目的是为解放人民，为蒙族人民服务的，这是根本不同

的。如果军队干部不老老实实为蒙民服务，我们就要反对他，赶走他。杨清又耐心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是民族团结，绝不允许欺压蒙民，如果发现这类行为，大家起来批评，群众起来反对。经过杨清反复阐明建军的目的和党的民族政策之后，蒙汉干部深刻理解到建立蒙汉联军对蒙民有利，对打败敌人有利。一切从人民利益着眼，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积极行动起来。开始时，蒙汉联军仅限于小范围内，建立了区、县的武装，人少分散，力量较弱。

杨清经过深入调查后，指出：“过去组织力量不够，有些地区仅组织了一些支队，只能在局部小范围内活动，不能参加到野战部队去，不能参加大战役。无力量，敌人还容易钻空子。如果组织起蒙汉联军师，就大不相同了。今天我们处在大反攻时期，要打出去，打到全中国去，打到敌人后方去。要外线作战，就需要编正规军，要建立蒙汉联军的野战部队，既是蒙民又是人民解放军的野战部队，这样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蒙汉联军在冀察热辽地区大规模建立起来，如原内蒙昭乌达盟自卫军 6 个团与二十军分区人民子弟兵联合编为蒙汉联军师，司令员为喻楚杰，蒙族清卓里克图为副司令，杜星垣任政委，乌力纳吉任副政委，阿尼布和任参谋长。联军的建立，既加强了军事力量，又稳定了内部。如原昭盟自卫军四团和五团，原来是由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和子章组织起来的，但由于这支队伍成份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向冀察热辽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时，千方百计拉拢这支队伍，派遣特务诱降和子章，遭到和的严词拒绝，并将 3 名诱降特务押送人民解放军军法部门惩处。但四团司令额尔登格被特务收买，叛变作乱。五团政委布钦巴拉珠等去制止乌尔塔、韩桑杰叛乱时被绑架，布钦巴拉珠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了。联军建立后叛乱已消除。蒙族广大官兵都深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争取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另一

支新建的蒙汉联军是卓索图盟纵队，由白云航、孔飞任正副司令员，开始只有3个支队，以后发展到14个支队、4000余人。这支部队在冀察热辽与敌多次战斗，歼灭大批敌人和土匪武装。由于蒙汉联军的建立，把原来不稳定的，涣散复杂的武装很快改造成有纪律、有战斗力的人民武装。

蒙汉联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北部5个旗一次就扩军9000多人，昭乌达盟扩大了2个骑兵师和1个步兵师。他们为冀察热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以及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时隔数十年，每当回忆起蒙汉联军的功绩，就不禁深切怀念最早提出建立蒙汉联军主张的杨清同志。他的业绩在冀察热辽根据地的创建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回忆杨清同志在热东

王国权

我认识杨清同志是在 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是年秋，我受命同胡锡奎、段苏权、李子光等同志一起赴热河承德组建中共热河省委和省军区。不久，程子华、黄火青、赵毅敏、杨清等同志也来到这里，创建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从那时起，我和分局秘书长杨清的接触逐渐增多了。

杨清同志忠诚于党的事业，生活艰苦朴素；对待同志真诚正直、平易近人；对工作严谨，认真负责，满腔热忱而又实事求是；知识渊博，品德高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同志。

1946 年春，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大举进攻冀热辽根据地，先后占领了承德、赤峰。冀察热辽分局被迫撤退到林西，但建立巩固的冀察热辽革命根据地，是分局始终未变的战略思想。在敌人优势兵力进攻下，杨清积极执行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参与分局制定“发动群众，继续进行清算反霸，减租减息”，“组织广大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1946 年 5 月间，我从热河省委调到热东十八地委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央《土地法大纲》颁布前后，分局机关组织了千人土改工作团，杨清秘书长来到热东指导土改工作。

热河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但由于受日伪统治 13 年之久，人民长期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群众缺少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开展工作困难是很大的。

为了尽快打开局面，杨清亲自带领我们地委的同志和工作团，深入到农民中间和贫雇农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的愿望，倾听他们的呼声，深入交朋友，给他们算地主的剥削帐，分析农民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

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向他们揭露国民党是“刮民党”的真面目和反动本质，启发、提高穷苦百姓的阶级觉悟，增强群众和国民党斗争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土地改革运动激起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上千万的农民卷入这个运动，许多优秀农民加入共产党，农民掌握了自己的政权，土地改革与自卫战争使农民体验到‘坏人好不了，穷人苦不了，好人死不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是杨清对土改的论述，热东的事实更说明了这一卓识远见。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 800 多万亩土地，74 万石粮食，20 万头牛马牲口和相当数量的农具、衣物、钱财分到贫苦农民手中，占全区总人口的 56.7% 的农民分到了胜利果实。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热东地区建立起各级人民武装队伍和政权组织，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的穷苦百姓扬眉吐气，第一次抬起头做人，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情绪十分高昂，整个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杨清抵达热东时，这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进度不快而且问题不少。相当一部分干部认为“工作快了就不能好，工作好了就不能快”。实践中有的光图快而产生了偏差，有的追求“好”而慢慢腾腾。杨清经过深入调查后，重点解决又快又好的问题。在会议上他多次阐述土改既然是解决贫雇农饥寒、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在政策已经明确，环境已经允许的条件下，不能拖延。他亲耳听到有的农民说“先分给我土地，三五亩也行啊”要求土改进度“快一点，贫雇农就少挨饿挨冻”。如果只强调主观规定的“好”，而不讲速度，也有个“阶级感情”问题。他在 1946 年 12 月叶柏寿工作团干部会上打了个比方说：“我们的同志只要把棉衣脱下，两天不吃饭，就能体会到贫雇农这种饥寒的痛苦，就可能打破主观公式的一套，理解贫雇农的情绪和要求了。”

那时《土地法大纲》已经公布，深入群众的杨清听到群众对土改

“快”的要求和对地主转移土地契约，转移藏匿、毁坏财物的顾虑，加之热东接近敌占区，为了打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犯，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也迫切需要翻了身的农民给以人力的支持。杨清帮助我们多方面认识土地改革加快进度的意义。

杨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后，尖锐地指出，土改进度迟缓的原因，是“不敢大胆地组织以贫雇农为骨干的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参加工作，而把工作局限于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圈内。”认识上把工作“好”的意义抽象化了，缺乏阶级分析。有的地方，干部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天天开会或斗争又不解决实际问题，拖延分配果实的时间，群众对于误工太多不满意。杨清举例说有个地方“群众开会 50 天，来回走了 800 里路，分得果实大洋 22 元，很不高兴。”另一个地方斗争数月，尚未分配土地，群众对我们干部说“你们这么做，我们实在翻不起身”，群众情绪怎么能高呢？作到又快又好的途径，杨清认为“只要我们大胆放手地把政策交给群众而又不放弃领导，群众就会有本领有力量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解决得很好。”他说：“因为有广大群众参加工作，也就易于避免快中的急性病与粗枝大叶的毛病。”

杨清以他深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给了我们热东地委的同志以切实的指导和帮助。热东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之后，又出现了当时称之为“干部不熟悉群众路线”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形成“群众说什么就是什么，群众说怎么干就怎么干”。贫村、富村的本位主义，土地少报亩数、地主把财物藏到外村的现象等等都突出起来。杨清及时指出：“这是忘记了领导，忘记了群众路线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坚持“不能把无产阶级降低到农民的水平”，提醒我们说：“现在已有些同志不自觉地降低到农民水平，值得领导上注意”。在杨清具体及时的指导下，热东地区的土改大体上作到了又快又好，许多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例如团结中农，照顾少数民族上层，

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并给他们以生活出路等问题，都较为稳妥地解决了。

在土地改革中我们还要进行扩兵、征粮、战勤、锄奸等工作。有些同志不能把这些工作跟土改结合进行，认为只能做好一件再做另一件，有一种机械的阶段论；还有些同志认为这些工作应当由有关部门派专家来完成。杨清主张这些工作都应当结合土改来进行，因为土改是群众关注的焦点，是牵一动百的大事，离开土改而孤立地去做很难见效。他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但这些工作又带有专门性质，必须有专门机关操持这些工作。要做好，必须是群众运动与专门机关相结合，而不是相脱节。”他的这个指导思想很快为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获得很大成绩。在土改进行中有两万多人参军，有 20 多万人次参加支前和破路斗争，征粮任务也提前完成了。

注重生产是杨清的一贯思想。他在土改中多次强调：“我们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的目的，是要把生产力向前推进一步。应以此教育农民，土地改革完成后要好好组织生产，我们不只要今天翻身，还要永远翻身。”他了解到一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怀疑我们将无止境地分配土地，分了一次再分一次，这种思想顾虑妨碍生产的发展。他说：“我们要明白地表示，只要这次分好了，以后即归个人所有不再分了。使他们安心生产，兴家立业。”他发现有的农民不珍惜分得的果实，就要求土改工作团的干部要教育农民“不要浪费，以备明年大生产”。热东是土地肥沃的地区，我们地委也感到有更大的责任支援前线。次年，辽沈战役在热东边缘上展开，我们的一些县便是战场。由于土改后生产大发展又值丰收，在辽沈战役中，我们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热东地区有 10 万民工参战，建昌一个县就有 140 个担架待命随时出动。临近战场的凌源等 5 个县一次预交公粮 2600 万斤。

叶柏寿县七区用 800 头毛驴、16 辆大车一次送上粮食 10 万多斤。每当想起当时那激动人心的情景，便不由得记起杨清同志。

因为这一切与他的正确领导、走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与他严谨的作风，满腔热忱的工作以及实事求是、埋头苦干也是分不开的。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他忠于党的事业，为中华民族解放呕心沥血，无畏献身的革命精神无不交口称赞和由衷地敬佩。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对党对人民的利益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党性原则和成熟的领导才能。在今天回忆起来，犹似昨天一般清晰。杨清同志在热东土改中为革命根据地建设做出的贡献，热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冀察热辽地区、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贡献，将永垂青史。

忆冀热辽时期的欧阳钦同志

段苏权

我和欧阳钦同志是在冀热辽地区工作的岁月认识的。当时他在中共冀热辽分局任常委，我在热河省军区任司令员。那时日本侵略军刚投降不久，虽然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仍坚持独裁统治，在美国的帮助下向华北、东北运兵，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争夺东北的斗争尤为突出。热河是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为了争夺东北，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加紧调兵遣将。我党早在抗日时期便在东北战斗。日本投降前后又有主力部队先于国民党进入东北，因此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在东北无一兵一卒，华北国民党军队也为数不多，若大的东北、华北地盘，蒋介石想要一下子独吞，则力不从心。他感到新的进攻部署尚需要时间，于是他不得不与中共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1月5日签定了《停战协定》。这样就出现了全国表面的和平局面。对此，当时有不少人迷惑不解，看不清蒋介石和美国耍弄的假和平虚伪面目。但欧阳钦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热河的斗争形势，对局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深刻有益的见解。我们仅从1945年12月19日至1946年3月19日，他在冀热辽分局会议上的10次发言中，便可看出他的远见卓识。

一、争取和平民主是更加复杂的斗争。他说：“停战协定的签订，是新的阶段。由抗战、内战到和平建设时期，是新的更复杂的斗争的开始。”他提出，“要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要宣传抗战时期我们在热河的游击战争、抗战功劳，现在我们占领热河是付出过代价的。不能

为了‘和平’，节节退让，忍让求和，让国民党乘机占去我们的地方。”热河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停止国民党的进攻。应经过北平、重庆向外宣传，进行政治上的反攻。现在国民党急于进攻，企图抢占战略要点。我们应该急转直下，及时部署。但在此以前，我们转得慢，部署不及，未能及时认清。直到义县失守，才引起我们的警惕。他提出“要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不要为蒋介石的假和平所迷惑。

他说：“现在和平与民主应分开讲。争取和平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保卫和平。民主是和平的保障。今后是争取民主，国民党是强调统一，不讲民主。我们要强调民主，有民主才能有和平团结统一，民主是决定一切的东西。他强调指出：“和平斗争更加复杂，不容易，各方面要准备，大家要研究，检讨过去是为着将来。现在有一批人去参加非武装斗争，不能忽视这些。”他着重指出：“全部工作要适应这一新形势，是争天下的问题，要争新民主主义，是谁领导的问题。”

欧阳钦透彻地分析了形势。特别是在当时一片和平声中，他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提出了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争领导权的问题。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对我们启迪很大。

二、热河在战略上应主动配合东北的斗争。欧阳钦高瞻远瞩，认为热河的斗争与东北斗争息息相关，应当把热河与东北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就把热河的斗争提到了战略地位上。他指出：“国民党是把热河与东北看成一个战略单位的。东北问题未解决，热河难以得到和平。国民党在锦州一带的部队可以东进，也可以进攻热河。过去对形势估计不明确，不战不和的方针吃亏很大，应该是有战有和的方针。要主动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打。东北作战对我们是配合，我们亦应配合东北作战。配合了东北作战，就是保卫了热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主张：“对铁道两侧应增兵。现在的有战有和，不会引

起全国破裂。”他指出：东北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苦斗。我们东线失利，虽然损失很大，但给东北以帮助，使我们能争取时间，发动群众，集训部队，布置了2月份的战役，使国民党进攻东北遭受了困难，是值得的。这些思想是从全局战略考虑的，是难能可贵的。

三、要动员一切力量保卫热河。热河是通向东北的要津，国民党势在必夺，因此热河的和平只能用战斗来争取。他指出：“分局要动员力量保卫热河，是打的方针。否则不能保持现在的地位。”他强调：第一，要发动群众起来保卫热河。发动群众，不只是一个口号，要切实执行。如清算、减租、生产、剿匪等要用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进行。要和群众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得到利益。发动的办法，要党政军民大家动手。减租是中心普遍的问题，进行救济，要救群众的急需。部队亦应做群众工作，搞好军民关系，从群众工作中整训部队，使部队体会到自己是人民的军队。要帮助群众生产，把军队锻炼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第二，要精简机构。他指出：“整编与精简要适合于目前环境，精简机关、合并部队可立即进行。”他同意加强省委的工作，分局与省委合并办公。指出，现在还有非省级所能解决的问题，省政府要存在，热河军区名义要保留，将来争取改为省保安司令部。精简机构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作效率，迎接新的斗争。第三，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他指出：干部要在热河生根站住脚，要与群众结合，要培养当地干部。从具体斗争中训练群众，要做为中心任务，从事业上生根。如煤炭、货物的供给，使群众生活好了，是从具体事业生根的办法。部队整训，应着重训练干部，在运动中了解审查干部。第四，财政问题的根本要靠生产。如使市场有货物，开设粮店、煤店，可以稳定物价，提高边币信用。

四、要利用执行小组进行和平斗争。他指出：谈判应先无条件停战。热河问题要全部解决，防止这里停战，国民党又转移兵力进攻赤

峰。如果把国民党军队牵制得好，对东北有直接帮助。他说：“军事上不能依靠执行小组。小组随时有撤走的可能，要利用它。”这次三人小组来，应多准备我们抗日游击战争的材料，及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们的时、日、地区、部队番号等材料。党政军民工农都要进行准备。要开干部会动员，要照实际做到的讲。这是为了和平斗争的需要，新闻记者来时要有材料证明我们能管理城市，进行建设。从几个月的工作中，证明民主民生的设施及未来的生产建设计划是可行的。

当时冀热辽分局决定由欧阳钦负责热河执行小组的工作。由于热河是国共斗争的敏感地区，因而成立了承德、赤峰两个执行小组。我曾先后担任过赤峰、承德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在欧阳钦的指导下，与国民党军事代表和美国代表打交道，围绕着军事停战地点、赤峰驻军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斗争。我们用大量的事实，以及我军驻赤峰的现状，迫使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与我达成了协议，使赤峰战略要地掌握在我军手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后因斗争的需要，我又奉命担任承德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此时正是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的前夕，国民党军队违犯停战协定的事件有增无减。当时我们提出应召开长官会议，会同执行小组解决军事冲突。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毫无诚意，在开会地点、时间、参加人员等一系列问题上，出尔反尔，大耍花招，致使长官会议流产，冲突加剧。不久，全面内战爆发，执行小组在从承德向围场转移时竟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致使调处成为泡影。从以上事实证明欧阳钦所说的“不能依靠执行小组，但可以利用它”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欧阳钦早在1945年12月19日的分局会议上就提出，大家“要认清蒋介石的本质”。果然，蒋介石的反动本性不改。他于1946年7月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8月23日，国民党第十三军占领承德。随后又占我滦平、隆化、丰宁、围场，并从东北地区迁

回张家口。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进攻，我军采取相应的自卫。热辽军区第十六旅四十六团在建平南的华石里沟歼灭敌九十三军的一个营；热河军区第十三旅在热辽军区十七旅配合下，又歼灭敌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第三团，攻克宁城；热东分区和第十三旅歼灭建昌敌军 1500 余人，攻克建昌。正如欧阳钦所说：由于“热河的战争环境，使我们在领导思想上有了较早的转变。”

欧阳钦同志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建树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我们仅从他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和平时期的言行，便可知他的雄才大略。他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善于把握群众的脉搏

杜星垣

欧阳钦同志是早年入党的老革命家。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现在，我谨就 1947 年至 1948 年春，他在指导冀察热辽南团土地改革斗争中，有关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摸索群众脉搏的事迹，写此片断回忆。为写此文，我还邀请当年参加南团工作的同志共同回忆，并阅读了欧阳钦写的有关南团及热东土地改革的遗稿，联系目前贯彻我党六中全会决议的一些问题，思往事，为来者。

曾参加南团工作的同志座谈时，大家都感到那次土改斗争的实践，对于自己人生观的建立以及 40 多年风雨磨炼，都有着很大的推动力。他们参加土改时才 20 岁左右，现在已步入花甲之年，政治上已很成熟了。这些同志的不断进步固然由于有理想，有党和群众的教育、斗争的实践，但与当年欧阳钦在土改工作中的教育和指导也是分不开的。

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南团未进入京承线以南时，这地区的许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反霸斗争，但有些地方“煮了夹生饭”。欧阳钦指出，形成“夹生饭”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贫雇农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他经常给我们传达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精辟论述。他的神态和湖南音韵，使我们感到那么真切。一次，他还把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修改党章报告中的一段话背出来：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无论是怎样的正确，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可见他学习是非常扎实深入的。

欧阳钦认为：打开局面，动员参军，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发展生产，这些工作都需要放手地发动群众，不要束手束脚。但是放手大胆，并不是马马虎虎，犯急性病，而是需要更负责、认真、精细的工作。他的这些话，对于南团统一放手发动群众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当时团部办了团刊，上面经常登载有关群众发动情况的具体报道。

对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所说的：“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启发群众的觉悟。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多么长久的时间，这是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的指示，当时南团有些同志认识不足。在凌源县二、三区开始第一个地区的工作时，有些同志没有把“扎根子”、“交朋友”作为整个土改工作的起点。艰苦地搞了两个多月，群众没有全面发动起来，土地还有大部分没有分下去。致使我们转移到叶柏寿去时，不得不留下几十个同志在这两个区继续工作。欧阳钦总结说：“目前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个特点是工作比较细致，这是好的；另一个偏向是提出‘ unlimited time, thoroughness’, 这与目前的战争形势与群众运动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欧阳钦很注意群众发动之后如何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提高群众觉悟的问题。1947年12月份他在南团分团委会议上说，当群众已经有某种必要的自觉之后，要不断使他们的觉悟提高，实现党提出的全部任务，从实际斗争工作中提高农民的觉悟。

南团从叶柏寿转移到朝阳的羊山，经过前两个阶段斗争的考验，分团委吸收了一些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严格执行土改政策

南团转移到朝阳锦义地区后，欧阳钦经常轻装简从，深入基层。

从工作一开始，他就非常注意阶级调查和分析工作组调查的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数字和百分比，以及他们的思想动向，欧阳钦都特别注意，发现疑问，立即要求重新调查。

农村的阶级划分，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在富裕中农和富农之间的剥削量的计量和划分的界限上。当时为剥削量计算，下了很大工夫，反复了多次。有些是欧阳钦要求复查的。每复查一次，富农就少了一些，中农的队伍就大了一些。对于地主和富农界限的划分，前者的概念，用他的话说：“占有土地和剥削”。对于富裕中农，开始的剥削量定为15%，后来欧阳钦传达刘少奇的指示，给中农筑了一些“防线”，剥削与被剥削可以抵消，即使剥削多一点，也算在中农内，目的是为了不侵犯中农利益。

欧阳钦很注意扩大贫雇农队伍的问题。例如，热河这地方打吗啡的人较多。一些团员见有些农民家里很穷，但又打吗啡，不知该往哪个成份划。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贫苦农民被抓去做劳工，劳累过度时，为了不被日伪毒打，就打吗啡，振精神，久之成瘾。对这些人，经过工作，不仅诉地主的苦，还诉日本鬼子的苦。经过工作组和当地干部的努力，贫雇农戒了毒。欧阳钦对这些工作非常关注，他赞赏地说：农村情况，客观现实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他在《热东自土地会议决议传达后至现在》一文中说：“某些工作团对定成份划阶级多偏重于生活状况，而忽视剥削关系这个基本因素。”对于南团，他有这样一段话：南团的划阶级定成份，一般是根据土地的占有与剥削关系而定。但是其中有些把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分不清，把富农划成富裕中农，或把富裕中农划成富农。还有的把下中农划成上贫农，或把上贫农划成下中农。有的村划分成多少等。五等以下为贫农，或六等以下为贫农，差别不一，标准各异。他强调划阶级定成份，只要把政策交给贫雇农，充分走群众路线，就可避免划错。反之，工作组包办代替，三榜定不了案，或是贫雇农沉默不睬，就会出现偏差。

他主张划分阶级成份时，要经过群众“七嘴八舌”的讨论，才能

达到“又快又准”。

他认为每一个阶层，有大、中、小之分，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对他们的政策和具体策略要有差别，以调动其可能调动的积极性。教育要考虑其承受力，一步一步的提高。拔苗助长不行，填鸭也不行，要和风细雨，点点入地。

“对于地主，除了分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或是汉奸豪绅外，还要缩小打击面。对其弟兄和儿女，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情况，争取改造。有的同志认为，知识分子都是地富成份，不能要。试问农村中，不是地富成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呢！知识分子能团结的一个也不要抛弃。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招他们入学、受训。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表现好的还可以吸收入党。改造他们，现在有用，将来也有用。

逃亡的地主，经营工商业有本事的，愿意回来，我们要争取。现有工商业我们采取保护政策，他们要回来搞工商业，我们为什么不欢迎呢？

对于中农，是使他们与贫雇农结成巩固的同盟，我们不仅不能侵犯中农，我们做了一些过火的事，也会使中农疏远我们。例如杀了地主，中农就害怕。对富农打击过火，也会影响中农的情绪。中农在农村是多数，经过土改，中农会更多。贫雇农会上升为中农。对地富的政策掌握得好也可能降为中农。自然两者性质不一样。”

“土改最终目的为了发展生产。不团结大多数，不打击极少数，大家畏缩动摇，如何发展生产？”“群众发动得好、土地平分公正，那么扩军、征粮、发展组织就好办了。”

勇于承担责任

南团是冀察热辽分局党校、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热河蒙古民族学院三部分组成的。这些学员和干部，从政治水平、工作经验到出身成

份都不相同。我们采取了混合编制，挑选较好的任骨干，欧阳钦支持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样，可互相补充，共同提高。

土改期间，出现工作团和当地干部不很融洽的现象。欧阳钦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协调，很快得到扭转。一条山沟里的土改工作，花了较多时间群众积极性没有起来，工作组就把外面的群众组织到沟里来分土地。他听到汇报后，没直接批评，而是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说明这种移花接木、包办代替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使负责这条山沟的土改小组和全团团员受到教育，自觉改进了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欧阳钦对任何工作的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既不贪功，也不诿过。他常说，成绩就是成绩，缺点就是缺点，要实事求是嘛。他还曾对我和范儒生说：“人生被人误会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革命者的态度是不要放在心上！”

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在南团联络，有什么缺点，我负责。他在冀察热辽分局的会议上说：热东、南团土改中有什么偏差我负责，不能怪下面的干部，应怪我没有把政策交待清楚，深入不够。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欧阳钦总是勇于承担责任。他对出现的问题，从不向上推，不向下卸。他不仅勇于承担责任，激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想办法弥补损失，改进工作，使干部从中得到提高。

欧阳钦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马洪 陈伯村

时光如箭，转眼 45 年过去了。在记忆的长河中，有许多东西日渐淡漠。但是，1946 年 10 月到 1948 年 6 月，我们在欧阳钦同志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却使我们终生难忘。特别是当环境严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起欧阳钦，想起同他一起工作的岁月，不禁从内心深处肃然起敬，怀念不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都从延安调到冀察热辽解放区工作。1946 年春，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当时形势十分严峻，8 月底我们主动撤出了承德，转战一个多月到达内蒙古北部的林西县。继续发动群众，坚持解放战争。

当时的林西县是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的临时驻地，热河省委的一部分干部到达那里以后，马洪由热河省委秘书长调任分局秘书长，伯村则从 1947 年夏被派往分局城工部任秘书并编辑《城工通讯》。当时，欧阳钦同志任中央分局秘书长兼城工部长。这样，我们二人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很快，我们就被欧阳钦身上体现出的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精神风貌吸引了。

欧阳钦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不尚空谈。每当党中央、毛主席有什么重要指示，每当分局准备做出什么重要决定，欧阳钦总是很快地行动起来，或者认真传达贯彻，宣讲部署，或者广泛征求意见，博采众长，使上级的精神尽快深入人心，化为整体的行动；使分局的决策能符合中央的精神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切实可行。欧阳钦每到一地，总是马上召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情况，把党的温暖送到干部和群众之中。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一年多中，记不清他开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座谈会，记不清他与多少干部、老乡、蒙古族群众谈过心。他这种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在我的脑

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欧阳钦非常注重掌握政策，有很强的原则性。我们当时身居蒙古族同胞聚居的地区，他尤其注意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他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蒙民工作的几个问题》，把自己从实践中、从群众中总结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这篇文章为基础，经过集体讨论，形成了冀察热辽分局的文件。这一文件的贯彻执行，对于我们做好蒙民工作，增强蒙汉团结，把绝大多数蒙族同胞吸引团结在党的周围，孤立与打击个别长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继续与人民为敌的蒙族头人、王公贵族与图谋制造叛乱的分子，使这一解放区迅速巩固起来。

欧阳钦敢于同错误的思想做坚决斗争，又勇于自我批评。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当时，他是冀察热辽分局的常委，马洪是分局秘书处处长，负责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多次亲耳听到他无论对谁的批评意见，都摆到桌上开诚布公地谈出来。不管是职位比他高的同志，还是同级、下级，只要作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他都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批评，决不姑息迁就。记得当时有一种错误的论点，说“只有前方根据地回来的干部才有对敌斗争经验，而延安出来的干部则没有对敌斗争经验。”这种论调，造成了从前方根据地和从延安来的干部感情与工作上的某种隔阂。欧阳钦激动地说：“延安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说没有经验？说什么只有前方抗日根据地才出经验，难道延安不是抗日根据地吗？！”为了清除这种隔阂，他不仅在会上慷慨陈词，并且在会后向广大干部和风细雨地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于维护分局干部的稳定和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欧阳钦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遮遮掩掩、文过饰非，而是严于律己、解剖自己，勇于自我批评，自觉地把自已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正因为如此，他在大家心目中享有可敬可

佩的知心人的美誉。

欧阳钦非常关心干部群众，体恤民情，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马洪到分局工作时，正值一场大病之后，他在从承德撤退时得了伤寒和痢疾，先后有一个月之久。当时白天坚持行军，晚上躺在炕上昏睡，汗流不止，被褥全部湿透，腹泻难抑，一夜要跑十几次厕所，身体十分虚弱。欧阳钦极为关心，不仅问寒问暖，问烧不烧，疼不疼，还一次又一次叮嘱警卫员给找药服，弄水喝，送饭吃，有时还亲自照顾。

欧阳钦生活艰苦朴素，作风平易近人。他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和我们拉家常，讲起他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往事，特别是他们学法文、学马列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得到很大启发和教益。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分局的重要文电、报告的起草，他都亲自动手。我们草拟的所有文稿，他总是反复修改，分局城工部出版的《城工通讯》，他也是认真审改，字斟句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含糊。欧阳钦有一篇长达 72 页的《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的报告文稿、《在热东城工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分局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都是在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几易其稿完成的。许多同志都为他的精力过人感到惊讶与敬佩。

欧阳钦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欧阳钦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我所崇敬的革命前辈和良师

林肖侠

我认识欧阳钦同志，是在 1927 年大革命时的中心——武汉。当时，我还是 10 岁的孩子，是一个小学的儿童团团长。我的父母和欧阳钦住在一座楼房里，朝夕相处，很是和睦。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又常见到他。他是看着我长大并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因此，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长辈看待，我十分尊敬这个革命的长辈。

直接接受欧阳钦同志的领导和教诲，是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和 1954 年黑龙江、松江、哈尔滨市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总共有 15 年之久。他对我的思想、工作影响甚大，堪称是我的良师益友。

城工工作的好领导

1946 年 1 月，我调任热东地委宣传部长。次年 2 月，改任城工部长，当时欧阳钦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秘书长兼城工部长，我在他的领导下作敌占城市工作。这一时期中心工作是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此，他带领土改工作团到热东地区领导和帮助进行土地改革。我也被分在朝（阳）锦（县）义（县）地区负责土改。欧阳钦高度的政治原则和水平，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但促使热东地区土改工作的顺利进展，同时给广大干部也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1947 年 7 月，冀察热辽分局指示热东地委要加强对敌占区锦州市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锦州市工委，以配合东北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配合解放锦州。欧阳钦在对热东地委城工部的指示中，提出了我们对城市工作重视不够的批评，要求地委和城工部加强对锦州工委的领导。我愉快地接受了批评，使工作很快赶了上去。

1948 年 3 月 7 日至 12 日，冀察热辽分局在欧阳钦主持下，在热东地区朝阳县的羊山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为了贯彻东北

局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而召开的。会上，欧阳钦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是东北城市工作新的转折点，我们的革命开始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武装斗争，过去工作着重农村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新的转变，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叫城市领导农村。目前形势已发展到可以夺取城市的时候，这就要不失时机地及时转变。他指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要熟视无睹，落后于新的形势，要跟上新的形势，在新的革命高潮中推波助澜，淹没蒋家王朝，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他还指出，冀察热辽地区城工工作起步晚，全区从去年4月会议开始搞，成绩很大，但还是落后于形势。锦州市委建立半年，做了不少工作，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但还不巩固，不要满足，不要麻痹，要在工作中深入下去，发现问题，找出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在新形势下把工作做得更好。他说，群众工作是东北局城工会议提出的三大任务的中心，是贯穿一切的最突出的任务，要特别重视和学会做群众工作。要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扫除群众中的各种思想顾虑，这是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他还指出，要发动群众搞土改，在群众中找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去找城郊区的关系打入城市或直接打入城市，在敌占区工作。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要把群众自发的运动加以组织领导，开展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在羊山会议上，他对锦州市委的工作十分关心，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指出建立锦州工委是对的。过去是力量小，分头搞，现在要加强统一领导。并指出，武工队是个好形式，好方法。要使武工队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做调查研究工作，很好地掩护工委机关和工作组，打击小股地主武装。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分局的决定和欧阳钦的指示，作出了加强锦州市工委的决定，由我任锦州工委书记，魏奇同志为副书记，舒铭、

高诚、王愚、田志周、马海富、李皦等同志为工委委员。

可以说，羊山会议对加强锦州工委的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城市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一直到10月15日解放锦州止，都是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

城市领导郊县的倡导者

1954年8月，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决定，将原黑龙江省、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由欧阳钦任第一书记，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敬爱的欧阳钦同志又要和我一起工作了。

欧阳钦在黑龙江担任第一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2年间，对哈尔滨市的工作十分重视和关怀。他强调哈尔滨在东北特别是在北满的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的156项重点项目，哈尔滨市就占了12项。这12项工程包括三大动力（锅炉厂、电机厂、汽轮机厂）以及飞机厂、铝合金厂、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等重要工厂。这一批重点工程投入生产后对全国将起到重大的作用。所以，欧阳钦一到哈尔滨市，就听取市委、市政府关于重点工程项目的汇报，十分重视这些工厂的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对从华东各地来哈尔滨市参加建设的同志表示极大的关怀和欢迎，使这些同志感到温暖，更加激发他们支援东北建设的积极性。

欧阳钦对哈尔滨市的工作十分重视，十分关心市委领导班子的团结。市委书记任仲夷同志曾多次讲“我们有一个好的团结的领导班子”。因此，哈尔滨市工作发展十分迅速，真正成为黑龙江省的首府和东北的中心城市之一。这一段工作，之所以成为哈尔滨市的“黄金时代”，是和欧阳钦的领导分不开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欧阳钦对城市领导农村的思想是非常明确而坚决的。1958年，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把阿城、呼兰、肇东、双城4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不久，又把五常、巴彦、木兰、通河划给哈尔

滨市领导。这样，哈尔滨市开始了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领导了 460 万城市和农村人口。当向 8 个县的同志宣布省委的这一决定时，普遍受到欢迎。哈尔滨市的党、政、群众团体也非常高兴，都愿意为农村和农民服务。当时，哈尔滨市和 8 个县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经济上有客观联系的基础上，加之党和行政上的领导关系，加重了哈尔滨市领导农村工作的责任。当时，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都非常重视欧阳钦作出的这一决定，认为是充分发挥哈尔滨市这个中心城市作用，按照经济区划的要求，城乡结合、城乡互助，把哈尔滨市周围的农村带动起来，对发展城乡经济有很大好处。这是在当时东北三省中第一个实行以城市领导县的新事物，以后辽宁和吉林都参照黑龙江的经验，先后实行了以城市领导农村的领导体制。欧阳钦这一远见卓识不是偶然的。早在 1948 年他领导敌占区城市工作时，就指出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就要到来，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变为城市领导农村。决定哈尔滨市领导 8 个县，就是这个思想的具体化。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欧阳钦的城市领导农村的体制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全国各省、市几乎都是实行城市领导郊县的体制，而且效果很好，这就是证明。

由于我在哈尔滨市委分工领导 8 个县的工作，和欧阳钦接触较多，经常向他汇报县和郊区的工作，陪同他到县和郊区视察，可以常常得到他的教诲，受益甚多。我原在锦州任市委书记，还只是领导郊区，到哈尔滨领导 8 个县，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新问题。但在欧阳钦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变化，逐渐得心应手了。

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从冀察热辽到黑龙江的 20 年间，欧阳钦是坚持和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光辉榜样，给了我深刻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在欧阳钦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欧阳钦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同志们的头脑。在冀察热辽分局期间，他指出，过去我们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后我们解放了全东北，又要求一个转变，即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变为城市领导农村。他说，农村实行土改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城市，使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使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人民的贫困才能消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证明了欧阳钦的观点是正确的，有着高瞻远瞩的气魄。

欧阳钦在指导哈尔滨市的工作中，特别强调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搞好城市工作，在冀察热辽时他就指出我们在城市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阶层人民，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贯穿一切的东西。

欧阳钦非常关心爱护干部，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他总是从爱护出发，贯彻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使同志感到心情舒畅，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帮助的态度，不要把人整死嘛！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要整垮一个干部容易得很，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不但使犯错误的同志感到温暖，而且对广大干部也是一个教育，对个别想整人的同志也是个警惕。

欧阳钦不但注意团结干部，还十分关心、爱护群众。60年代，张权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到黑龙江工作，受到欧阳钦的热情关怀。她深为感动地说：黑龙江的冬天是寒冷的，但黑龙江的领导对同志是热乎乎的。正因为这样，黑龙江有一个时期出现了文艺繁荣的局面，对经济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凡是在黑龙江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数都受到欧阳钦的热切关怀。张权在病中还常怀念黑龙江那段生活，认为那是难得的“黄金时代”。

每到新年和春节，欧阳钦总要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他说，同

志们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我们做领导的，要向同志们表示谢意。看起来这是小事，但促进了上下级之间感情的交流，使人感到温暖，有干头，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黑龙江是全国的重点建设省份之一，不少同志从华东和南方各省支援黑龙江的建设。但严寒的冬天，以及副食品供应的缺乏，使南方来的同志很不适应。欧阳钦多次指示，要关心这些同志，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安心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后来不少同志回到自己原来工作的南方，还经常回忆在黑龙江工作期间给他们留下来的美好印象。

欧阳钦同志对凡是在黑龙江作过贡献的同志总是念念不忘，他常说“王胡子”（指王震同志）为黑龙江建设出了大力，开发了北大荒，应该为他树碑，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他的功劳。他对苏广铭（全国劳模）说，你为黑龙江的工业建设出了大力，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苏广铭经常向工人宣传省委领导对工人阶级的关心。欧阳钦视察“三大动力”时说，你们对全国的电力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三大动力厂是“动力之师”。之后，这三个厂的一条马路，由欧阳钦命名为“动力之乡路”。1963年，他对哈尔滨市的冰灯游园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对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说，你们为哈尔滨市人民增加一个冬天的文化活动场所，这是一个创造。当松花江防洪大坝落成时，他高兴地说，修这条防洪大坝是为哈尔滨人民做了一件大事，保护了哈尔滨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了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了东北和全国的交通畅通无阻，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10多年来，哈尔滨和整个黑龙江省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繁荣、富强、美丽，倘若欧阳钦同志有知，他会含笑的。

难忘的教诲

韩梅村

1947年5月1日，我在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少将司令任内，在原热河省凌源县城率领部队起义并进入解放区。7月初，我带着家

属住到赤峰城内。当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已由热北林西县进驻赤峰，分局秘书长杨清同志亲自到我家看望我，勉励我要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见到我有七个孩子，便建议我送两个大孩子进建国学院学习。当时我的大孩子孟国 16 岁，二孩子孟民 13 岁，我觉得孩子年龄太小，有点顾虑，他立即写信给学院院长徐懋庸，请他予以照顾。

7 月 15 日，我由徐懋庸、杨作材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分局机关党支部举行。杨清同志最后讲话，他说：“韩梅村同志经过长期复杂艰苦的生活，终于体会到要救国救民，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之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并与之采取敌对态度。”他又同时指出：“加入了共产党之后的宇宙观、人生观，就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党内有不少负责同志过去在旧社会做过大官，做过许多事，但都走不通，终于加入了共产党，如朱德总司令、贺龙将军便是。他们之所以能成就大事业，就在于他们具有遵守党纪的高尚品德。朱总司令常说：‘我没有别的本领，就是一切信赖党，彻底执行党的决议。’贺龙同志也说过：‘我带的军队如果换了别人来带而带不好，这就是我的不好。’”杨清同志最后勉励我：“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这番讲话，牢记在我心中，使我在工作中、生活中，时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国解放竭尽全力。不久，我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六师，我担任六师师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正义之师每次出征都受到人民最大的支持，屡获全胜。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回忆。

纪念杨清同志 发扬延安精神

肖 于

1945 年冬，我随着干部大队从延安到达冀察热辽地区，分配在中央分局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分局秘书长杨清同志，他有冷静庄重的政治气度，虽然话语不多，但那和蔼的目光使你无拘无束，亲若家人。

秘书长既掌握方针政策，又领导安排全分局人员衣食住行的生活琐事。我们这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又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汇合，增加了领导工作的难度。在分局干部大会上，分局书记程子华作形势任务的动员报告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抢夺胜利果实，要摘桃子，因此有可能进攻解放区，我们要准备打仗。杨清则通过行政会、党内会贯彻落实。他特别强调要提高警惕，准备继续打仗，要克服胜利后的麻痹松劲思想。提出要牢记毛主席向全党的告诫，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并具体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困难，要求大家团结一致，继承延安精神。党员大会后，我们每个党员谈认识，向党表决心，并作出保证。

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冀察热辽解放区进攻，8月底分局机关撤离承德。经隆化、围场等地到达最北部林西县时，已是天寒地冻，零下40多度的严冬。杨清关心群众冷暖，在战利品中的美军救济物资里发给干部每人一件防寒衣服。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我们在边陲小县将生活安顿下来，很快投入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次年3月，为部署战略大反攻，冀察热辽分局在林西县召开了党代会。我作为宣传部的党员代表，光荣地参加了这次党代会，编入了党直代表团。我还参加了会议的准备工作。为组织安排这次会议，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诸如起草文件、议程，代表的食宿安排等等，杨清几乎日夜忙个不停。

位于塞北的林西条件简陋，安排400余人为期一个月的会议十分不易。杨清在作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各单位负责行政的领导、秘书以及具体办事的同志，反复核算各地委、各机关代表人数，随员人数，马匹数。计算结果，护送武装除外，共约500人、400匹马。

杨清提出会议要保证开好，还要保护群众利益不受丝毫侵犯。因此确定：住房，除本地代表住原处外，还有 300 人需解决住宿。当时塞北天寒地冻，林西人口稀少，房屋极缺。杨清提出坚决不能占用民房，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由党、政、军三大单位，采取抽、挤、腾、并的办法解决。会议室从简，不放桌子，只有主席台和记录放两张桌子。所有桌凳都向单位借用。会议必须添置的水壶、油灯等用具，一律统一保管，不准随意动用。伙食也本着节约精神，每天两餐，每人不超过三角钱。并规定严格经济手续，统一筹划，分散管理，预决算均由大会筹备处审核，不准有丝毫差错。在杨清周密的安排下，这个部署战略大反攻的大会胜利召开了。

党代会上，杨清参加了党直组的小会，他的发言简短但含意深刻，融汇了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他说：“这次党代会是全面大反攻的动员会。我们首先要有敢于胜利的思想，对形势要有充足的估计，要打破不敢胜利，把反攻时期当做防御时期，将发展中的困难当成消极退缩的保守思想。”这番话警醒了干部中一些束手束脚，误认为是持久战，慢慢来，等待胜利，等待别人打天下的思想，也转变了不愿加重负担的本位主义思想。

关于提高领导水平的问题。杨清谈得更深刻。他说：“领导要有预见性，对于每件事情发展的前景和可能发生的偏差要有充分的估计。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为此就要丢掉思想包袱，接受新事物，发现新问题。”这对提高与会的党直机关干部的工作水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又告诫我们“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要讲真话，不骄，不躁，不偷，不装，不吹，老老实实。这是团结干部和群众，取信于民的作风。”杨清的这些精辟言论，直到今天，仍使人感到亲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会上，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了程子华等分局同志的报告，对当时的

国际国内形势和全党的任务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更加有信心；对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的转变、党员肩负的任务，思想上有了准备；对克服目前困难，信心倍增。全国解放的前景，胜利的喜悦，使全体代表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分局党代会后，我军进入了战略反攻。随着节节胜利，冀察热辽分局于 1948 年初离开林西经赤峰、五家子，一步步向平津靠拢。不久杨清便调离分局。我们兵分两路，我先住杨柳青，不久参加了北平解放的入城式。

杨清同志逝世已经 10 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话语，时时在眼前浮现。他的品质、他的作风，凝聚着我党的宝贵财富——延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在战争年代，我们攻克了强大的敌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用延安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战胜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我们纪念杨清同志、学习杨清同志的意义，就在于此。

杨清同志关心蒙古族群众

王若林

1946 年秋冬，我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研究室工作。研究室的直接领导是分局秘书长杨清同志。冀察热辽是华北、东北两战区连接的咽喉地带，条件极为艰苦。为了把在日伪统治下饱受 13 年磨难，又

面临国民党摧残的广大人民解放出来，杨清和分局其他领导人呕心沥血，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调查研究出政策

重视调查研究是杨清的一贯作风。他多次向我们讲解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不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一次，他向我们讲：“究竟调查研究工作是做什么事的？调查研究就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了解情况可以掌握政策、出政策。如果有调查没有研究就没有政策可出。所以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到政策上，为了改善工作，为了做好工作，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为了研究而研究。所以调查研究和政策工作是有很大大联系的。”他又说：“目前，我们对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这件事做得还差。调查的材料不少，但缺少研究。”当时，研究室都是青年同志，大家工作热情很高，但如何进行研究并和政策联系起来的自觉性很差。在杨清同志指引下，我们明确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判断情况的有力分析，这任务很重，也很光荣。在杨清同志的教导和激励下，研究室的同志不怕艰苦，克服困难，提高了调查研究质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二、透过民族斗争形式揭露阶级斗争实质

冀察热辽的北部靠近内蒙古东部的中心区域，大部分地区是蒙汉共居的农业区，也有农牧区和牧区。历史上蒙汉关系比较复杂。我们深入群众调查情况时，首先遇到了民族难题。杨清得知后，向我们讲了一段冀察热辽地区特有情况。他说：“热河省历史上一直是民族冲突地带。汉族地主常把农民对自己的阶级斗争转移为对蒙族人的斗争，汉族农民反对蒙古王公贵族的苛待与勒索，也就转化为民族纠纷的形

式。这里的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的实质披上民族斗争的形式。这种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交织就使农民的斗争性加强。同时武装斗争对他们也很熟悉。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往往被宗族关系模糊了、淡化了。设法减弱宗族观念才能破除对阶级对立的蒙蔽，才能便于启发阶级觉悟。”

听了杨清揭破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实质的精辟分析，我们就象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调查很快突破了民族观念对阶级对立的蒙蔽。我们深入到喀喇沁中旗和阿鲁科尔沁旗和哈喇图克沁旗的农业区和农牧区去调查，发现土地非常集中，其中王府八大家土地占全部土地80%，而人口只占5%。而80%的农民只占有全部土地的5%，极不合理。少数蒙族地主占有大片土地，而绝大多数蒙民却无地少地，辈辈贫困，甚至还残存着落后、野蛮的奴隶制。王公贵族可以无代价的奴役平民（箭丁、随丁、亩丁、陵丁）。家奴是代代为奴或任人馈赠，女奴悲惨地受地主玩弄或与套马杆、烧火棍、锄头拜天地，过着非人生活。拥有大量牧畜土地的蒙奸、恶霸以及地主对佃户、青户、牧工、雇工、萨尔乃红（大群牛羊挤奶者）、苏鲁克（大畜群放牧者）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压在贫农牧民头上，住瓦房、蒙古包，酒肉征逐；而广大贫农、牧民终年劳动耕耘、放牧、挤奶、割毛，却没有衣穿、吃不饱，住的是抹牛粪的破棚，极端贫困。

大量的调查事实说明，蒙民与汉民同样存在对立的阶级关系。杨清说：“这为分局领导制定对蒙民土改政策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中央分局很快制定出对蒙族地区的土改政策。杨清指示我们要将此公诸于世。研究室主任柴沫署名阿木古朗写成《蒙古民族解放之路》一书的出版，用事实揭露了当时“只有民族没有阶级”“内蒙人都是一样，没有阶级，不要阶级斗争”，否认阶级与阶级压迫，蒙蔽200万内蒙人民、阻碍内蒙人民解放事业的谎言，同时揭露了德王、白云梯和

“南京请愿团”吴鹤龄等反动势力破坏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阴谋。

三、尊重民族习惯，关心蒙民生活

土地改革开始后，我们都投入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去。如何发动蒙族群众进行土改又是个难题。杨清同志及时地提出“要依靠民族干部发动广大贫农牧民群众”。并指出不能以大汉族主义包办代替。他再三告诫我们“只能宣传政策，协助搞好思想工作，尽量发挥民族干部积极性。”这时冀察热辽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学院已培养出 1200 名蒙族干部，他们也投入了土改工作。等工作组到阿旗哈尔吐时，正遇到地主米自成等唆使并率领汉族农民抢割蒙族农民的庄稼，挑拨说原是汉族农民的土地被蒙民侵占并阴谋组织红枪会；而蒙族头人黄宝才、白拉梧达等人则散布汉人欺压蒙民，区公所要动武力镇压蒙民等流言。工作组按杨清的指示，先在蒙汉干部进行教育，在大家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召开了蒙汉团结大会。会上，蒙汉两族的干部各自对前一段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揭露了敌人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的阴谋。号召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向坏人做斗争。会后成立了蒙汉联合区公所，进行土改工作。给蒙汉贫苦农牧民每人分得土地 10 亩，又规定汉民不能向牧区移民，以保护牧场等。解决了民族纠纷，出现了汉民教蒙民种地、蒙民租给汉民耕牛的团结局面。有了阿旗哈尔吐的经验，很快蒙族农区、农牧区的群众发动起来了。

在蒙族农业区土改中，也用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牧区是否可以提“牧者有其畜”，“牧民有其牛”的口号？我们都很感兴趣。但杨清认为，应尊重牧民意见，要考虑到他们的觉悟。如果区群众理解不够，可能引起牧主的恐惧，将牲畜杀掉或赶走。同时，牧主还可能利用这一口号煽动牧民起来抵抗，分畜问题不能勉强。“牧者有其畜”口号不宜提。于是，我们在农牧区土改中首先进行的是减轻剥削，提高萨尔乃红、苏鲁克的分成，由原来王公牧主随

意“施舍”改为三七、四六、二八等分成。这样既未引起牧主恐慌，牧民接受也快，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

当时，有些蒙民觉悟较快，他们提出了分牲畜的要求。杨清提醒我们说：“革命的目的是将生产向前推进一步，而不能阻碍生产的发展。牧区牲畜不能分得太散，还要避免发生随意杀吃的倾向。即使分畜也不能分群。分畜后要引导大量繁殖。”他又说：“革命的目的是要使蒙民生活一天天上升，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保证有饭吃，办教育，办文化娱乐。所以牧业要与工业结合，养牛、养羊剪下毛可以织毡布做鞋，可纺线织衣。这样人民生活可以提高。”当时杨清还举例讲英国将农田改牧场，为工业需要而养羊。我们可以与手工业结合，可以逐渐发展。从他的话中，我们深受启发，体会到土改是从减轻封建剥削到消灭剥削，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提高。由于明确了目的和方向，因而我们去牧区工作的同志不仅发动蒙民群众进行减轻剥削的斗争，在保护牧场、促进增殖牲畜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在异常贫困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杨清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高瞻远瞩，乐观地提出牧区人民生活提高的远景，使我们十分神往，战胜困难的意志和信心倍增。两年后全国解放，内蒙地区畜牧业蓬勃发展起来。杨清同志的预言已成为美好的现实。

在欧阳钦同志身边的日子里

李 荣

1946年冬，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实行战略转移，撤退到热河省林西县。欧阳钦同志时任中央分局的秘书长，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到他身边当警卫员的。

当时的斗争环境很艰苦。林西一带地广人稀，原本就比较穷困，加之所有的物资又要尽可能地供应前线，生活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欧阳钦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平房里。屋内除了一盘土炕，没有任何陈设。林西这年冬季天气特别寒冷，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有时甚至达零下40度。分局领导同志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工作特别繁忙，在那么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还经常步行外出开会。欧阳钦的一件黑布面羊羔皮大衣不知已穿了多少年，里面的羊皮已破烂不堪。记得有一次晚间出去开会，黄火青等领导同志在外面等他，可是这件破大衣越着急越穿不上，由于皮子多处绽线破洞，胳膊不是伸进这个窟窿里，就是伸到那个窟窿里，费了很大劲才勉强穿好。象这样的大衣怎能抵御零下三四十度的刺骨寒风呢？我们穿的老羊皮大衣在外面有时都能冻透，何况四处透风的薄羊羔皮呢？然而，欧阳钦从不提及此事，我几次提出向后勤部门反映给换一件，都遭到他的坚决制止。他耐心地对我说：“现在前方在打仗，战士们更艰苦，革命就需要克服困难，人民群众那么困难，还在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我们在后方，比前线的同志好多了，不能再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这件大衣已经陪着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再陪我打完解放战争没问题。”我见他执意不肯换，只好缝缝补补使这件破大衣继续伴他度过寒冷的冬天。在他身边工作期间，我从未听到他在个人生活方面提过任何要求或意见。可是他对别的同志的生活却很关心，经常找负责后勤工作的同志过问分局其他领导同志的生活安排情况，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什么困难和反映。对我们这些“小鬼”也是经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

1947年春，欧阳钦到热东地区领导土地改革。由于长期革命斗争的艰苦生活，他积劳成疾，身体很瘦弱，可是工作起来仍废寝忘食，不顾劳累。欧阳钦特别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经常爬山涉水，深入山区农村访贫问苦，与群众促膝谈心。他十分重视党的政策的执行

情况。当他在调查中发现土改中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在城镇中对民族工商业者也有违反政策的倾向时，立即给东北局领导写了封公开信。这封信引起了普遍重视并在报刊上刊登，在纠偏和坚持贯彻党的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土改过程中，欧阳钦吃住都在农民家里，主食是高粱和小米，很少能吃到蔬菜。他对吃什么从不挑剔，能吃到辣子就很满意了。热东的气候虽不象林西那样寒冷，但冬季气温也常在零下 20 度左右。早晨起来房子里的水缸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乡间小路坎坷不平，连手电筒都没有，欧阳钦有时夜间出去开会往往摔得满身泥土，对于这一切，他毫不在意。正是从这些耳闻目睹的小事上，我逐渐懂得了革命者的真正含义。

欧阳钦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下级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心关怀，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常见到一些干部，有的是职务比较高的老同志找他谈心，同志们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倾吐自己的心里话。有的是工作、生活上遇到什么委屈，还有上下级关系处得不好等等，不论什么人、什么事，也不管再忙、再累，他总是十分耐心，循循善诱地开导，用党的原则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常常谈到深夜。有的来时痛哭流涕，走时高高兴兴。但也有个别干部是为了自己的错误来进行辩解的，欧阳钦对此毫不留情，批评起来非常严厉，当然，也给他指出错误的根源和努力方向。欧阳钦同志对我们这些“小鬼”特别宽厚，犹如对自己的子女，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像一家人一样，无拘无束。无论是警卫员、汽车司机还是马夫，他都平等相待。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从未受过他的训斥，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他也从不声严厉色，总是用启发诱导的方式，使我们知过改正。记得在林西过春节的除夕，我们一伙人在他外屋打扑克打了一个通宵，吵得他一夜未能睡好。可是为了照顾我们的情绪，他一声不响，直到第二天他向来请示工作的一位同志说了句：“小鬼们在守岁，玩了一个

通宵。”我们才知道吵闹得他未能睡好。这使我既感动又内疚。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充分体现了欧阳钦宽厚待人的胸怀。

欧阳钦非常关心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的成长，经常鼓励我要学好文化，告诫我们，打完仗要建设社会主义，到那时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们年纪轻，正是学习的好时光，不要轻易浪费时间。在他即将离开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时，他告诉我：“我要把你们带走。去学技术，学本领。”每逢他的工作变动时，警卫人员也随着更换，主要为了使这些年轻人学习、提高，更好地发展。如从西北转战到东北就换上了我们，从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调旅大地区就把我们换下来，安排了别人，以后从旅大调到黑龙江任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如此。对一批批警卫员都根据不同情况做了妥善安排。欧阳钦到旅大配备新的警卫人员后，就为我们物色学习机会。由于我们文化都很低，我算最高的，过去也只读过两年书，到哪个技术训练班，都起码要具备初中文化，将近20岁的大小伙子又不能上小学，没办法只好把我们先送到警察学校学汽车驾驶。当我的文化程度基本上达到高小时，又把我送到大连一个新建的中专学校的预科，一直读到中专毕业，在工厂工作几年后又被幸运的保送到北京化工学院成了大学生。我的成长过程与欧阳钦同志的热心关怀和培养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位和我同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吴殿彬同志，是欧阳钦的夫人黄葳在宁城县搞土改时带出来的雇农，参加工作前几乎只字不识，经过他们的热心培养，后来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由文盲变成了大学生。由于我的原籍是承德，欧阳钦同志经常勉励我：“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回去建设你们的热河！”老人家的热切期望，是不断鼓舞我前进的动力。40多年过去了，他的谆谆嘱托，仍然时时响在我的耳边。

哲人其萎 垂馨千祀

韩 光

斗转星移，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1978 年的 5 月 15 日，欧阳钦同志逝世那天的前夜，他还兴致勃勃地来到我家愉快地相聚。彼情彼景，10 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如同昨日。

那日，天色将晚。欧阳钦同志的大女儿晓光打电话给我，说她父

亲要出来走走，别处哪里也不想去，就想到我家来看看。我当然非常欢迎，还嘱咐家人到外面买了两个水果罐头，算做一点小招待。晚饭后，欧阳钦同志由夫人黄葳和大女儿陪同来到我家。我把他们让到我家那间有电视机的小客厅里。我们边看电视、边轻松地谈论一些往事。记得那天电视里播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演林黛玉，她的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演到“葬花”和“焚稿”两折时，更是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欧阳钦同志喜欢越剧，也有很高的鉴赏力。他的兴致很高，话也逐渐多了起来。话题从《红楼梦》谈到黑龙江，海阔天空。当谈到黑龙江“文革”时，他显得很激动，说“文革”中黑龙江的造反派硬逼他承认是走资派，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什么走资派，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很清楚，正因为欧阳钦同志刚直不阿，他才受到长时间的迫害。只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才得以幸存下来。但他仅有的一个儿子欧阳湘（湘湘），却被造反派活活整死。

我们一些欧阳钦同志的老战友，都为湘湘之死而深深痛惜，暗暗流泪。可欧阳钦同志却没有过度悲伤。谈到湘湘之死的时候，他没有流泪，表情一如既往，冷静、沉着。他说，不少好干部、好党员，在“文革”中无辜地牺牲了，真可惜。还说：“一个人的生命固然可贵，可是灵魂更为重要。”他的这些话，使我更加坚信一条为人之道：人有躯、亦有魂，无躯不成人，无魂难为人。二者兼得最好，不可兼得，宁舍躯而留魂。他的这种舍生取义的观点，正反映了他作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人生观和价值观。

欧阳钦常说：一个共产党人是不是坚定，常常要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刻才表现出来，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刻就是最能考验人的。他的坚定和铮铮铁骨，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加清楚。

那次谈话，他显得很兴奋，有时很激动，说个不停。考虑到他的

身体情况，我和黄葳同志有意把他的话题引开。那次聚会，他显然说出了许多心里话，他的表情一直很高兴。过去他一直咳嗽得很厉害。可那天在我家却很少咳嗽。谁能想到，那晚的相会，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我失去了相知几十年的尊敬的同志和挚友，内心的哀痛是难以言表的。

这些年来，特别是这两年来，每到5月的这个日子，我和欧阳钦亲密共事相处的幕幕情景，就时时闪现在脑际。他的音容笑貌也历历展现在眼前。

我和欧阳钦同志相识在1940年，我在中央统战部任党派科长，欧阳钦同志是陕西省委书记，回到延安述职。一次，他来统战部汇报陕西统战工作时，讲到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郭紫俊等人进行斗争的工作情况。他的言简意赅、举止稳健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很使我折服。欧阳钦同志的湖南乡音虽重，但谈吐清楚，讲话很有逻辑性，可以看出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者。这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2年，我调任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到了晋察冀。此后好几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1945冬，我到大连主持市委工作时，听说他在热河和程子华、黄火青等同志一起在晋察热辽分局担任领导工作。

1948年7月，东北局派欧阳钦同志来旅大主持地委（以后改为区党委、市委）工作。从此，我便和他开始了较长时间的合作共事。他来旅大前，东北局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早就对欧阳钦同志有很好的印象，自然表示欢迎。他来旅大时，旅大地区刚刚解放不久，苏联驻军对这一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我党组织尚未公开，党内不少同志对旅大地区的形势、特点和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一时议论纷纷。地委虽已开过“十月会议”（1947年）和“六月会议”

(1948年)，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但还缺乏系统地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的定论，因而干部中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欧阳钦同志的到来，使我和地委其他同志欣慰地感到来了一位老练的“掌舵人”。他来旅大后即对我说，旅大的情况，他在东北局时就已听说过，旅大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支援前线和对苏关系方面都搞得不错，希望原在旅大工作的同志，继续努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共同把旅大的工作做好。

欧阳钦同志具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胆识和丰富经验。他每到一个地区，总是首先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分析情况，从实际出发确定工作方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到旅大后，针对干部的思想状况，他分别约我和地委各领导同志谈话，从组织干部学习入手，启发大家，解决思想问题。他接连作了几个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问题。又从旅大的特点出发，肯定了原地委提出的一度争论不休的“以苏为主”的口号是正确的。他指出，面对同国民党的斗争，当时在旅大提出“以苏为主”实际即“以我为主”，二者是一致的。他还根据旅大地区当时的特殊情况，对比旅大与我党领导的其它各解放区的不同特点，大胆地提出，旅大地区是在苏联红军控制下、我党领导的解放区，肯定了过去旅大地委根据本地区特点和国际国内形势所采取的一些特殊工作方法，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是必要的。他指出，有同志说旅大在“闹独立性”，甚至指责旅大“搞独立王国”，都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讲话，从一般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上，联系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旅大地区前段工作作了具体分析和恰当的评价；并且明确了旅大地区的性质和特点，大家听了很信服，因而很快统一了干部的思想。

欧阳钦同志善于抓思想、理论工作。从他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工作，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人的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来进行。端正人的思想，不是一招一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始终坚持，持之以恒，才有成效。在他主持下，当年旅大地区干部教育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并建立了经常性的干部教育制度。

又过一段时间，他在前段地委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口号及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十六字方针。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发展生产与发展文化两个任务中，生产是最基本的。生产发展了，就有需要、并有可能来发展文化。文化发展了，反过来又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提法，如果放到现在，也可算是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了。

欧阳钦同志善于抓大事，抓思想倾向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他主持党委工作，我分管政府工作。他集中精力抓方针政策，抓党的建设，抓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党员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对政府工作，除了方向性的问题和大政方针之外，具体工作他总是放手让我去做。他很放手，因而我的工作也就放得开。他常向干部阐述，在所有各项工作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党的领导，主要有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事无巨细都加以干预。他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对各部门、各系统、各行业的工作，他从不放弃党在大政方针上的领导；但对他们的业务工作，从来就是放手让主管同志去做，真是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做好工作。

欧阳钦同志以他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高瞻远瞩，以及他实事求是待人以诚的优良作风和品质，赢得了和他共事的同志们的敬重。

1954年夏，东北几个省和直辖市合并成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北局根据中央的决定，调欧阳钦和我到新成立的黑龙江省工作。他任省委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在旅大，我们曾顺畅默契地合作过一段，到黑龙江我们将再度共事，我心里非常高兴，

对未来的工作也充满了信心。黑龙江是我的家乡，欧阳钦同志 1948 年也曾在那里呆过。在没有赴任之前，我俩在沈阳小住期间，就建设好黑龙江问题，多次交换了意见。我对他说：“你这南方人到黑龙江来帮助建设我的家乡。可那里，冬天是很冷的，民间流传着诸多谚语和吓人的说法，如‘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解溲要用棍来敲’，……”我的话尚未说完，他即会意地笑起来说：“早就听人说黑龙江很冷，可我却没有感觉到。哈尔滨冬天室内温暖如春，比南方的日子还好过。”他接着说：“黑龙江土地广阔、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很好，我们挖掘它的潜力，发挥它的优势，应当使它对国家有较大的贡献。何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大型骨干项目，在黑龙江安排得不少，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和特种钢厂；哈尔滨的三大动力工厂——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以及飞机制造厂、亚麻厂、量具刃具厂；佳木斯集贤大型机械化农场……等。”他一口气数了十多个工、农业建设项目。接着说：“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木材基地，煤炭产地。当然，工业方面一个不足之处，是还没有找到铁矿和石油。即使如此，黑龙江的建设也是很有搞头的。老韩，我们要把大家很好地团结起来，把黑龙江建设搞好。”这时，他对我国最寒冷的边境省份黑龙江的浓厚感情，已溢于言表。我听后实在高兴。就这样，我俩你一言、我一语，从黑龙江的资源条件，气候条件，工、农、林、牧、副各业生产情况，一直谈到党、群工作基础。不谋而合，我们一致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黑龙江都占有了。而人和，则是建设好黑龙江的关键所在。

新的黑龙江省由原黑龙江、松江两省和哈尔滨市合并而成。干部来自五湖四海，除解放后派来很多外来干部之外，本地干部也已大量成长起来。要想把这个地区的工作做好，就必须依靠原来两省一市的干部做工作，因为他们在当地工作时间相对较长，比我和欧阳钦初来

乍到的更了解情况，合省之后不久，省里召开党代表会议，贯彻全国党代表会议精神，肃清高岗影响。会上，有的同志公开点名指责某人是高岗安的钉子，某人是漏网分子等等，气氛很激烈。这时，欧阳钦和我商量，必须保护干部。我们考虑到被点名的同志都已经做过自我批评，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揪住不放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坚持思想上批评要严、要深，以肃清影响；组织上基本不动，把大家团结起来，做好工作。为此，我们分头向干部做工作，说明团结起来向前看的重要性，很快取得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从而维护了新的省委和省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和稳定，为以后同心同德建设黑龙江打下基础。

到黑龙江之后，我和欧阳钦准备花点时间到一些地区、县份去搞些调查研究。但不久，中央就给黑龙江下达了较重的征购粮食任务，并派林枫同志亲自来黑龙江坐镇督促。这年，黑龙江粮食丰收，全省粮食年产量初估是 700 万吨。欧阳钦同志和我分别与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研究商谈这个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个全省上交国家 350 万吨粮食的方案。方案一提出，有同志就说，这个数字高了。他们认为全省年产谷物 700 万吨，上交 300 万吨比较稳妥。并说，搞不好，冒了，省里老百姓要饿肚皮。可是，中央希望黑龙江能多交些。一时间，征购多少粮食的问题，在领导干部和搞农村工作同志中间成了议论的焦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委专门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欧阳钦同志从国家大局出发，向大家做了动员。他着重指出，黑龙江是全国有名的粮食产地，应当对国家有较大的贡献。中央有需要，地方应责无旁贷地要为国家分忧。他反复说明局部应服从整体和全国一盘棋的道理，他为此提出一个口号：“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他强调，根据掌握的情况，全省向国家上交 350 万吨粮食，不会给黑龙江人民生活造成太大的困难。根据多年的经验，下面报到省里来的粮食产量会留有余地。解放以来，黑龙江连续几年丰收，可以

说“仓廩实”。如果再加上农副牧产品丰富这一优势，全省不到 1300 万人口，留 350 万吨粮食，人吃、马喂，是没有问题的。在他亲自动员说服下，干部思想通了。我作为具体组织执行这个任务的领导人，工作好做多了，350 万吨粮食很快征购上来。到 1955 年新粮食下来之前，人民生活果然没有出现大的困难。为此，黑龙江受到中央的表彰。

其后，我陪欧阳钦同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两次到阿城、尚志、牡丹江、密山、绥芬河、伊春、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实地考察。走访了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路上，他很兴奋，深有感慨地说：“黑龙江地广物丰、美丽富饶，果然名不虚传，真是好极了。”当时，黑龙江西部除少数地方沙粒较多、较干旱外，兴安岭地区、嫩江流域，都是土地肥沃，物产富庶的。东部地区情况比西部还要好。从很多县里同志们的汇报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黑龙江省农业基本情况是，如果东部地区丰收，西部就稍旱一些。无论旱或是涝，都没有形成大范围的旱涝灾害。面对这一事实，欧阳钦同志说，前人给黑龙江留下个错误的标签——“北大荒”，必须驳斥、抛掉。这里明明是“北大仓”、“北大康”嘛！此后，在一些干部会上，他常向大家阐述他的“北大仓”、“北大康”概念。我明白，他抓住“北大荒”这个不利的标签作文章，是为了增强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黑龙江的凝聚力。果然，“北大仓”或“北大康”一词，在黑龙江的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鼓舞了全省人民建设好黑龙江的高昂士气。在安排 1955 年工作任务时，他提出，黑龙江是一个新兴工业地区和重要农业、林业地区。在省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他以此为主题，做了长篇报告。具体分析黑龙江在思想、管理、技术等方面与新兴工业地区不相适应的矛盾，提出要把全省同志的注意力引到抓好农业、林业生产和大力支援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

1955年，在安排全省工作时，我和欧阳钦同志商量，提出了“三个一千万”的设想。即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黑龙江省年产粮食达到1000万吨（1954年为700万吨）；煤炭产量达到1000万吨（1954年为800万吨）；木材采量达到1000万立方米（1954年采量约800万立方米）。欧阳钦赞同这个设想，并且在代表省委的一次报告中，把“三个一千万”作为省委号召全省人民争取实现的奋斗目标。他说，有个奋斗目标好，这样才有奔头，可以鼓舞人心。这个奋斗目标提出后不久，1956年5月，我就离开了黑龙江，调北京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委前身）工作了。1960年，一次中央会议上，欧阳钦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韩，我们那个‘三个一千万’，在你走后已经实现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了大油田，而且年产石油也已超过1000万吨了。你的家乡变样了！”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我内心为黑龙江几年的变化而兴奋和激动。后来听说，欧阳钦提到的大油田——大庆油田，就是他亲自命名的。

欧阳钦同志在工作中，十分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一贯提倡深入实际，脚踏实地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实事。他为黑龙江的建设倾注了十几年的心血。他喜欢黑龙江，热爱黑龙江，如同热爱自己的家乡。他常说，我们的干部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工作，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你只有首先爱她，才能真正建设好她。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恰恰是对他自己最好的写照。他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许多方面堪称典范。

哲人其萎，垂馨千祀。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虽然已经10多年了，他毕生为革命、为人民的事业不停地奋斗和操劳，江南塞北，到处留下他坚定的足迹，洒下他辛劳的汗水。人民，特别是旅大人民、黑龙江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他光辉的革命业绩，他给人们的精神财富，

以及他一生给予人们在思想和工作中的许多有益启迪和教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依然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催发、激励着人们在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努力前进。

这些片断的回忆，记下一些当年和欧阳钦同志相处岁月的往事，以表达我对这位挚友和老同志的深深怀念。

一位具有坚强党性的战友

郭述申

我是1928年夏在上海和欧阳钦同志认识的。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我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一段，因为湖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我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又被国民党政府通缉。1928年春，我以非常急切的心情到上海寻找组织，经过多方奔走接上了关系。不久，一位个子

不高，年纪比我大几岁，讲话湖南口音很重的人找到了我。他说他是党中央派来和我联系的，因为是秘密工作环境，当时没有问他的名字。过几天他通知我说中央决定你去河南省工作。我怀着依恋的心情和这位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湖南同志告别了。1930年春，我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巡视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三省红军武装部队的情况，接待和同我联系的还是那位湖南同志。他安排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工作，并参加了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会后，我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另两位同志分赴鄂豫皖苏区工作和战斗，直到1935年我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又见到了他。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真实姓名是欧阳钦。

我和欧阳钦同志一起工作，是1949年9月我到大连以后的事。那时他任旅大区党委书记，韩光同志和我任副书记。此后，我同欧阳钦同志共事整整5年，朝夕相处，亲身体验到他的高尚思想、作风和品德。尤其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是他领导作风中最显著的特点。

欧阳钦同志初到大连时，正值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面临着许多紧迫的工作。他却冷静沉着地从调查研究本地区的基本情况入手，向原在大连地区工作的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探讨问题，交换看法。同时又找各部门的许多干部交谈，一方面详细考察了本地区的情况和特点，另一方面又深入了解了广大干部的思想状况和意见。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具体分析了大连地区的特点，正确解决了对当时大连地区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由于当时大连地区处于苏军的军事管制下，而苏联还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我党在这里不能公开，在执行政策和策略上也与其他解放区有很大区别。这就引起一些干部的思想混乱，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意见，欧阳钦同志运用辩证的观点对问题作了深刻的

分析。明确指出：大连地区的基本性质是我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同时这里又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这就是共性与特性的统一。由于抓住主要矛盾，正确解决了对地区性质的认识，其他一些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了。诸如我党与苏军当局的关系问题，支援解放战争与发展本地经济的关系问题，干部认识也不尽一致。欧阳钦同志对这些问题都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辩证观点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给予了有说服力的回答。在这期间，他亲自向广大干部作了《关于国际主义问题》《关于阶级与党的问题》《在大发展大胜利中努力前进》《在目前形势下旅大党的任务》等系统的报告。在这几篇报告中，他以高屋建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力量和对实际问题的深刻透彻的分析，澄清了干部思想上的种种疑虑、困惑和糊涂观念，在原地委已进行大量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振奋了革命精神。在全党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明确方针，开创了当时工作的新局面，对以后的工作也有其深远的影响。事隔多年，至今大连的干部回忆起欧阳钦同志初来大连时，理论结合实际地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事迹，仍然感到有如春风化雨，十分亲切，十分怀念。

欧阳钦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眼睛向下，联系群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完整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培养成的可贵品格。在整风中毛泽东同志教育全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欧阳钦同志对此是身体力行的。他真正

把整风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工作、言行和生活中去了。欧阳钦同志在大连工作期间，经常抓紧时间认真读书，并通过每周一次的学习报告会推动全党干部的学习；同时他又注重实际，调查研究，不仅创建了区党委的调查研究室，而且亲自布置调查任务，研究确定调查纲目，听取汇报，审阅和研究调查材料；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召开调查会。以率先示范的行动，在干部中兴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风气，兴起了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调查研究的风气，并使这两个方面密切联系起来。

欧阳钦同志以身作则的熏陶和影响，我是亲聆身受的。我来大连工作后，分管工业方面的工作。大连是解放较早的工业城市，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欧阳钦同志经常强调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业，管好城市。他建议由我兼任旅大市总工会主席，以便更好地联系工人群众，做好工作。他要求我在工人运动中注意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树立典型，推动工作。我到任以后，按照欧阳钦同志的意见，带领干部，深入到广和机械厂作调查研究，协助工厂党委总结出王兆达先进小组的经验；同时又发现和总结了旅顺海军修造船厂刘立富小组的经验。通过对这两个典型的解剖，我们认识到生产小组是企业的细胞，是生产第一线的基层组织。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工作技术革新，以及工人生活福利上的互助，都必须通过小组才能落实。做好生产小组工作乃是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重要环节。在欧阳钦同志的主持下，市委听取了我们所调查了解的情况的汇报和先进小组经验的介绍，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市委作出了在全市推广先进小组经验的决定。市委指出：要使当时正在开展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提高一步，并经常持久地发展下去，必须抓住推广先进小组经验这一个环节。会后，在报纸上公布了市委的有关指示，发表了社论和先进小组经验介绍。使推广先进小组经验的群众运动，在全市

工业系统广泛开展起来。把解放初期以转变劳动态度为主要内容的创模运动，提高到以落实生产责任制和工人参加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创先进小组的新阶段，并逐步发展到创先进科室、先进工段、先进车间的广泛的创先进的群众运动。接着又总结和推广了职工代表会议的制度，发扬民主，提高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这一时期市委在领导工业生产方面的成功经验，都是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他在工作中所体现的坚强的党性，求实的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教育了广大干部，也使我个人受益匪浅。

欧阳钦同志一贯主张，系统周密的调查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为正确制定大连地区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他亲自主持进行过大量的调查。当时由于苏军驻扎，不能同其他解放区同时进行土改，但地委进行了充分的土改准备工作。主要是组织力量作农村调查，全面了解农村的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土地占有情况和贫下中农的困难和要求。地委调查研究室写出了6篇20万字详尽的调查报告。在摸清情况的同时，采取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配官有土地、文化募捐、币制改革等多种方式，逐步削弱了封建势力，初步解决了贫下中农的经济困难。在后来进行土改时，市委根据本地区特点和几年来阶级关系的变化，报请东北局批准，没有采取老区土改平分土地的做法，而采取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调剂土地的方式；根据城市郊区园艺作物经营的特点，对富农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将少数采取近代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果园主，划为农业资本家的成份。由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东北局关于土改的政策，使大连地区的土改能够在生产不受破坏，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历史任务，并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欧阳钦同志对大连地

区土改工作的指导，为我们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观点，灵活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又一范例。

欧阳钦同志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对劳动人民怀有强烈的阶级感情的基础上的。他经常教育工会干部说：工人群众选举你们当干部，你们就是工人群众的公仆，要为工人服务。他真心实意地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到工业生产中的问题，经常找群众商量。经常召集工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是最有智慧、最有知识的。有一次他听到一位铆工根据自己的操作经验编成的顺口溜，他说要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科学。他说：有几十年生产经验的八级大工匠，都是生产战线上的将军，应该象对待将军一样尊重他们。每年春节他都到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家里拜年，和他们促膝谈心。他和很多老工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离开大连之后，许多老工人都对他怀有崇敬和怀念的深厚感情，有的劳动模范还专程到北京看望他。

欧阳钦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他听说造船厂因没有自己的医院，工人看病困难，他立即决定把市委招待所腾出来，改建为造船厂医院。1949年台风袭击大连时，他亲自到各处视察灾情。当他得知平日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带老碱沟，那里住有几十户人家，情况不明。他坚持要去看望，汽车开不进去，他便徒步翻过一座山头前去。他和人民血肉相连，呼吸与共，把人民群众当作亲人看待。这些感人的事迹，至今还在大连的干部和群众中传颂着，引起人们深切的怀念。无论是干部或群众，凡是亲身与欧阳钦同志接触过的，没有一个不为他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所感动，没有一个不对他所体现的坚强的党性而衷心敬佩。

欧阳钦同志在大连工作期间，遵循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

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使大连的各项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他和区党委（市委）所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

欧阳钦同志善于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正确选拔、培养干部，特别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也严格要求干部。在党内斗争错误潮流袭来时，他敢于以唯物主义无私无畏精神，挺身而出，坚持原则，保护了干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欧阳钦同志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一生。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愧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岁月悠悠，风范长存。虽然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永远不朽的。

我与欧阳钦同志的两次会晤

罗叔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全国纷起反对。1946 年，上海各界群众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组成以马叙伦等 20 人的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我是代表团秘书。代表们于 6 月 23 日抵达南京下关即遭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发生“6·23”惨案。周恩来同志指示中共上海局刘晓同志：已暴露的地下党员立即撤离上海，于是

我远走哈尔滨。当时中共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李富春、林枫、李一氓、蔡大姐等同志亲切的接见了。我长期在压抑的、惴惴不安的环境中生活，回到解放区和同志们在一起，感觉到一切都亲切温暖，连透口气也觉得自由自在，空气新鲜，清澈心肺。我多么想留下来呀！可是，周恩来同志来电报，指出地下斗争的长期性、坚韧性，要我继续隐蔽下来。李富春安排我成立中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我担任副经理，奔走于佳木斯、大连等地。1948年7月我去大连时，适欧阳钦同志从冀察热辽分局调大连市任区党委书记。我与欧阳钦、黄葳和他们一个8岁的小湘湘以及警卫人员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经牡丹江、通化到丹东。途中见到了周保中同志并参观了牡丹江纺织厂等工厂；在丹东见到江华同志，他领我们去看了中朝接壤的鸭绿江大桥。然后改乘汽车去大连。当时大连地区是苏联红军控制下的解放区，旅大共产党还没有公开。中途在东北地区与大连市分界处的瓦房店联络站下车，大家脱下军装、放下武器、换上一般市民服装继续前进。在车上，大家毫无拘束地谈笑着，警卫员们谈参军前家乡闹革命的情况。欧阳钦也讲了在苏区和长征途中艰苦奋斗的故事。聪明的小湘湘活泼可爱，大家逗着他玩，真是亲似一家。这样自由活泼的气氛，在我是绝无仅有的，感觉到分外愉快。

到大连后，在大连市委协助下，我建立医药公司的工作进展很顺利，不久就供应军队和群众所急需的药物。黄葳同志则在中苏远东电业公司金属机械厂当副经理。黄葳到厂后，团结全体职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起党组织，培训了一批自己的技术管理人员、技师和技工。按中苏友好协议规定，1950年底，工厂移交给中国，改名为大连起重机厂。她很有魄力和坚强的意志。她受欧阳钦的委托，经常来药店看望我。关心和了解我的情况并询问我有无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还对我讲大连在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应注意的问题，她的真诚和

坦率使我有了个可以讲心里话的人。我们很快熟悉了，相互鼓励做好各自的工作。但她一直不知道旅大市党委对我有党的领导关系，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大连开药店。凡是组织工作的安排与己无关的，黄葳从不向我询问，欧阳钦也没有告诉她，这是党的纪律，尤在那时必须严格遵守的，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1950年第二次与欧阳钦同志会晤。宋庆龄副主席有个愿望，凡孙中山先生生前到过的或提起过的地方，她都想去看看。这个愿望得到周总理的赞同和支持。我在上海时就认识宋庆龄，因之派我陪同她和林伯渠、廖梦醒、沈粹镇等同志于10月去大连，住黑石礁招待所。由欧阳钦、韩光负责接待，市长毛达间、乔傅钰（民主人士）全程陪同。欧阳钦对我们说：他对宋庆龄有无限敬意，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在紧急关头，宋庆龄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发表题为《为抗议违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旗帜鲜明地痛斥汪精卫的反共行为。《声明》张贴在武汉三镇，电波传播五洲四海，影响巨大。其时，共产党人已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转入地下，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当时欧阳钦是中共中央军委组织科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武汉进行营救、疏散、隐蔽等一切善后工作。他亲历其境，深深的敬佩宋庆龄的伟大胸怀和胆略。现在见到宋庆龄同志，倍感兴奋和庆幸，欧阳钦同志循照周总理的指示：一切尊重宋庆龄的意见和习惯作安排。访问、视察了宋庆龄所要去的地方，包括大连、旅顺、秦皇岛等地。在旅顺还登上苏联海军的军舰。宋庆龄对这次访问很高兴、很满意。生活上也是按照她的习惯办理，很简朴。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宋庆龄于是日不会客，不外出活动。室内全拉上黑纱窗帘。市委派黄葳、黄力（韩光夫人）代表市委送去一束鲜花，以志纪念。这一切是欧阳钦和市委领导同志都先征询林老和我的意见办的。

我的真实身份由于工作要求，两次去大连都没有公开，除欧阳钦、李一氓等几位领导同志外，都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还认为我是宋庆龄的秘书。可以看到大连市党组织对保守秘密的严谨态度。

我与欧阳钦同志会晤次数不多，但印象极深，我非常钦佩和怀念他，他为人严肃而随和，做事有识见和缜密，然而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遵守党的纪律，虽在家人面前也不多讲一句不必要讲的党内的事。只此一点，就可见到欧阳钦同志对党的忠诚。

缅怀欧阳钦 学习欧阳钦

傅忠海 康敏庄 陈少景 原宪千

欧阳钦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于1948年5月至1954年8月，在旅大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期间，面对旅大地区极为复杂的特殊局面，同原旅大地委领导同志一起，以革命家的胆识，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东北局的指示，带领旅大人民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为建设、巩固旅大党和人民政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光辉的业绩，赢得旅大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今天，大连沿着革命前辈开拓的基业，已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港口、贸易、旅游和文化城市，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抚今追昔，我们对欧阳钦同志更加崇敬和怀念。

从实际出发确定工作方针

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敢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符合此时此地的方针、策略，是欧阳钦同志的一个突出特点。1948年5月，欧阳钦同志来到旅大，当时旅大有苏军驻扎并实行军事管制。全国尚未解放，苏联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我们党在这里还没有公开，干部中间，甚至一些领导干部对旅大地区的形势、特点和我党应采取的方针、策略，在认识上不尽一致，影响了团结和工作的开展。欧阳钦同志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析了旅大地区所处的特殊情况和干部状况，充分肯定了过去所确定和实行的基本方针，认为部分干部认识不尽一致，有些分歧，主要是由于对有的问题解释的不够明确引起的。欧阳钦同志抓住了干部思想认识问题这一主要矛盾，展开了艰苦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他先从抓学习入手，组织领导干部定期学习，针对干部中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亲自作报告，指出：旅大是有苏军驻扎并实行军管的解放区。实行以苏为主的方针，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旅大地区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在和其它解放区根本任务、目的一致的前提下，采取一些不同于其它解放区的策略和方针，以便放手工作。通过一段学习和工作，特别是欧阳钦同志身体力行，很快消除了干部思想上的分歧，迅速统一了思想认识，团结了干部，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正确处理了中苏关系，增进了中苏友谊。同时

把旅大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对旅大暂时不能实行土改，在干部中也有不同看法。解放初期由于按照苏联驻军的意见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分配官地和文化募捐等逐步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有人认为“不彻底”。1947年党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有的干部又强烈提出要在旅大按照我党我军所控制的解放区模式进行土地改革。欧阳钦同志广泛听取并认真分析了同志们的不同意见，反复地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旅大因照顾苏联外交关系，故暂不能实行土改。只能采取切合时宜的逐渐进展的方式来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但只要等到内外条件成熟时，一下子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也是完全可能的。”1949年8月，全国解放前夕，欧阳钦同志审时度势，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召开了区党委会议，研究在旅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做出了《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并报请东北局批准，文中强调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权、政令力量，在不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生产建设情况下搞好土改。由于欧阳钦同志敢于从旅大地区的特殊情况出发，在1949年底到1950年春开展的土改中，按照苏联外交斗争的需要，对党外称“土地调剂”，没有搞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并且根据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拟定了一些补充政策，如不挖浮财，不许打人，不搞流血斗争等，特别是从旅大农村实际出发，规定了打击面不能超过全旅大农村人口的8%的政策界限（中央规定的幅度是不超过10%），比较好地实现了有步骤、有策略地消灭封建势力的目标，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农民拍手称快。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旅大地区的土改这样搞是完全符合中央《土地法大纲》的基本要求的，绝不是“和平土改”、“放纵了阶级敌人”。

欧阳钦同志经常教育干部：“政策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环境来制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8年7月30日，东北局常

委会发出《旅大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指示》，指出党在旅大的任务，主要是抓生产，搞工业。一是炮弹，二是纺织，这是关系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至关重要的大事。欧阳钦同志和其他地委领导同志一起，坚决传达贯彻了指示精神，在总结贯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工作方针经验的基础上，从旅大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提高文化，培养干部”16字方针，以迎接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为实现这个方针，制定了一个两年（1949——1950）经济建设计划大纲。欧阳钦同志在1949年4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旅大区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发展生产与文化两个任务中，生产是最基本的，是压倒一切的。一切工作都应为建设服务。欧阳钦同志这次讲话，为建设一个繁荣的新旅大指明了方向。在发展生产中，欧阳钦同志一如既往，把领导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放到首要位置，充分发挥已经建立的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建新公司”的作用，为东北和华东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炮弹、炸药以及其它军工产品。还领导旅大人民生产了大量布匹、被服、军鞋等支援前线，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毅、粟裕同志曾亲自签发信件，向旅大党组织和工人阶级表示勉励和感谢。

在欧阳钦同志为书记的旅大党组织的领导下，旅大随着东北和全国解放，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培养了一批做经济工作的干部，使旅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为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1950年欧阳钦同志随毛主席和周总理去莫斯科访问时，在毛主席为斯大林同志于我驻苏使馆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敬了欧阳钦同志一杯酒，表示对他在旅大工作和增进中苏友谊所取得的成绩的赞许。历史的实践越来越证明，欧阳钦同志为首的旅大党组织，当年在旅大坚持的从实际出发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团结爱护干部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

欧阳钦同志一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把团结爱护干部，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看成是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大连所处特殊条件，储存了大批党的干部。从延安、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中原两广纵队、山东省委、胶东、渤海、鲁中区党委和北海地委等各解放区都先后派来许多干部。这些同志经过战争和艰苦生活的磨炼，经过生与死的搏斗和硝烟战火的洗礼，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和热爱，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象灿烂的群星云聚，正象肖华同志所说的：你们大连储存了一大批好干部。这些正当而立方刚之年的同志，有活力、干劲和朝气蓬勃的精神，但也难免有弱点、缺点。各地不同的作风习惯，相处的好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每当回忆起这些，我们就不由地想到欧阳钦同志为此所倾注的心血。欧阳钦同志从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关怀、爱护干部。对各地来的干部都一视同仁，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特点和专长，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当有的干部受到冤枉、打击和诬陷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保护同志。1951年“三反”运动时，高岗挟嫌宣称：“旅大山高林深，虎多，虎大而肥，有50%的干部都贪污腐化。”要整垮一批干部，进而整垮、解散旅大区党委。因此，大搞逼供信和残酷斗争，逼大家讲，大家揭。当时“同利公司”（东北局党产）经理老红军朱华同志被抓了起来，欧阳钦同志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问当时任区党委组织部长的胡忠海同志，是否知道朱华同志被关之事，当回答不知道时，他焦急万分地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不让他们把朱华同志搞死，只要不死，什么话都好说，什么问题都会搞清楚。胡忠海同志听到欧阳钦同志的指示很受鼓舞，便竭尽全力去做朱华的工作。原来高岗想从朱华身上打开缺口，把旅大区党委的领

导成员打成贪污集团。但实际上旅大区党委没有花“同利公司”一分钱，也根本没有挪用过任何财物。由于欧阳钦同志的出面保护，高岗的目的没有达到。“三反”运动结束，高岗又对旅大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高岗反党事件暴露后，有的同志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认为自己被带、被拉做了错事不好工作了。欧阳钦同志发现此问题，立即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会上他郑重地说：“在此，我再一次说明，‘带班子’、‘划圈子’责任在高岗等人，一般的说，被带的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某个人工作，所有被带被拉的同志都不要背包袱，要愉快地安心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简短的一席话，使到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说明欧阳钦同志对同志真诚的关怀和帮助；说明欧阳钦同志的宽宏和高度的党性原则。

欧阳钦同志爱护干部，他同样爱知识、爱人才。他在各种会议和日常工作中曾多次谈到：“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没有知识，没有人才不行。”对待高级知识分子，欧阳钦同志从不以他们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而嫌弃他们，而是着眼于现实表现。1948年10月，欧阳钦同志来旅大主持工作不久，地委就作出了《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发展党员的重点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目前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是不对的。须知这些知识分子在各项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只要他们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就可以慎重的个别的吸收入党。根据地委和欧阳钦同志的指示，各级党组织都认真地检查和纠正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轻视、排斥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当时在大连铁路医院有位著名的医生叫舒柏年，他曾留学日本，做过蒋介石的保健医生，后来在华北地区为我们地下党组织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党还未公开之前，舒柏年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举行入党宣誓时，欧阳钦亲临会场，向他表示祝贺。

欧阳钦同志对培养选拔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尤其重视。他多次谈

到:大量培养当地干部,是解决党的事业发展而干部不足的大问题。旅大解放时间早,又是一个老工业区,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应该发挥“母鸡作用”,要“养鸡下蛋”。要供给新工业区以机器,输送干部和技术工人。在他的领导下,旅大地区曾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政治思想进步,有朝气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还被选送出国学习深造。1949年初根据上级的要求,旅大就抽调了800余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大队输送到全国各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后来在“左”的错误路线影响下,旅大市一批土生土长的干部中,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帽子,蒙受不白之冤,而欧阳钦同志则被诬陷为包庇、重用坏人的总根子、保护伞,遭到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同志得到了平反,洗雪了不白之冤,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30多年后的今天,来回顾欧阳钦同志在旅大工作期间的领导活动,使我们不仅感到他对当时的形势和旅大地区情况的分析,以及据之制定的方针和措施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且实践也证明,他提出的一些方针和措施,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是具有马列主义预见性的。

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欧阳钦同志身上得到完整的体现。他一贯坚持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他刻苦学习,不论白天黑夜,在办公室或是宿舍,一有空闲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悉心钻研。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理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错综复杂问题。他处理问题,坚持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用辩证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妥善加

以解决。他善于集中干部和群众的智慧，总结实践经验，因地制宜，提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原则和方法，指导工作。他在旅大工作实践中展示出来的领导才华和领导艺术，受到广大干部交口称誉。

欧阳钦同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很严，对缺点和错误，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风，从不姑息，总要进行严肃批评，从不讲情面。他批评人是从关心爱护出发的，不记老帐，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使受批评的同志心悦诚服，不背包袱，不存戒心。他襟怀坦白，勇于自我批评。他曾当面严厉批评过工厂的一位负责干部，当他调离大连后得知那次批评使这位同志受了委屈时，深为内疚，多次请大连来的同志回去代向这位同志道歉。1956 年在北京见到这位同志时他又当面作了自我批评，使这位同志很受感动。

欧阳钦同志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身处逆境，面临狂风险浪的时候，仍然是正气凛然，坚定自若，绝不屈服。

欧阳钦同志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废寝忘食，经常工作到深夜。他遵守制度，严格要求自己，总是以普通党员的态度出现，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参加各种会议，都是提前到会，从不延误。1954 年他随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在乘车去火车站的途中想起还未向党的小组长请假时，立即返回来向小组长请了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组织纪律性。他生活俭朴，食宿都在一处不太宽敞的党委集体办公的小楼里。当时有不少没收下来的日本高级楼房空闲着，有些同志建议他搬进去住，都被他婉言拒绝。欧阳钦同志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使党员和干部深受教益，无不心怀仰慕之情。同志们说“和欧阳钦同

志一起工作，心情愉快，能学到很多东西，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

欧阳钦同志与世长辞已经 10 多年了。我们借这篇短文来寄托对他的哀思，表达我们深切怀念之情。

联系群众的楷模

沈 涛

从 1948 年到 1954 年欧阳钦同志担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市委）书记期间，我是市工会负责人，曾参加他主持的多次会议，聆听他的许多教诲。他那一身正气、大公无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对干部、群众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欧阳钦同志主持大连工作 6 年，他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东北局一系列方针、政策，当时对旅大地区形势特点，党内在认识上存

在着分歧，他深入调查研究后，明确地指出：“旅大是苏军控制的共产党当权的地区。说简单一些，是苏军控制，共同性是解放区。”他用这一鲜明的观点，向党的干部进行反复的教育，很快地克服了党内的思想混乱，从思想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旅大党制定了一条符合旅大实际的正确方针。他率先垂范，团结全党，领导全区人民，为恢复建设新旅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抗美援朝，支援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这条正确方针，为以后旅大地区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8年欧阳钦同志到旅大后，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市委把他提出的“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一直做为指导方针。他经常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斗争的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他号召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技术专家、医生、作家、演员等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同志，都要围绕生产，为生产服务。他非常重视群众工作，督促我们要经常总结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推广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小组的经验。注意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运动。在生产中，还要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生产中的重大问题，他主动列入市委常委会会议议程，以市委名义，发出指示，从而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为党、政、工、团各自的中心工作。

欧阳钦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党政机关的中心任务，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机关是为基层服务的。到基层去检查工作，一方面是检查下面执行政策和计划方面的问题，帮助下改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检查工作，发现自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问题，找出领导机关在决定政策、任务、计划以及领导方法方面应负的责任，以便改进工作。同时要主动地征求下级机关和群众对自己领导上的意见，并就自己领导的责任、领导思想、领导作风实行自我批评。这些指示，充分体现出

欧阳钦同志强烈的群众观点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也是他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生动体现。

欧阳钦同志嘱咐工会干部要经常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生产，光讲工人福利；二是对工人疾苦不闻不问。这两者都要反对，要在发展生产中切实解决工人的福利问题。对工会机关要以大部分人力到工厂去，小部分留在机关；对干部个人要求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工厂，少部分时间留在机关；到基层去一定要和工人直接见面，直接交心，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政策贯彻下去，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欧阳钦同志不仅教育我们这样做，他自己更身体力行，经常深入群众。每逢春节他带领我们到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家去拜年，和群众促膝谈心。在他的感召下，当时形成一条不成文的制度，每年春节，市一级领导同志划片分头给模范先进工作者拜年，征求意见，改进工作。这对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激发工人主人翁责任感，鼓舞工人积极性起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提高老工人的社会地位，激发老工人的积极性，经郭述申（市委副书记）同志倡议，欧阳钦同志赞许，每年春节前夕，总工会举行一次敬老会。每次他都提前莅会，亲自向老工人敬酒，问寒问暖，他那浓厚的无产阶级情感，使与会老工人深受感动。欧阳钦同志调离大连后，许多老工人一谈起欧阳钦同志当年的音容笑貌就激动不已，表现出对欧阳钦同志的崇敬和眷恋之情。

欧阳钦同志十分关怀职工群众的进步和成长，重视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注意从工人群众中选拔人才，培养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和政工干部。他把提高文化，培养干部提到战略地位，成为市委指导方针之一。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职工中开展了识字运动，提出了两年扫盲规划，经过两年努力，截至1951年3月，

终于如期基本完成扫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大力组织了职工的科学、技术学习。这一措施不仅在当时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后来为支援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输送大批政治、技术骨干，准备了条件。

欧阳钦同志还经常关心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工会所组织的业余文艺汇演，他每次必亲临观看，一直坚持到闭幕，并接见演员、导演表示慰问。

欧阳钦同志这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强烈的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永远怀念欧阳钦同志

田子夫 江明 辛束 岳志远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10 多年来，我们这些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得到过他亲切教诲的同志，每当忆起他在大连的战斗岁月和光辉业绩，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欧阳钦同志是 1948 年 7 月来大连工作的，于 1954 年秋天离开大连。他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的 6 年中，经历了大连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两年。他为旅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旅大人民建设新生活，倾注了心血与汗水。

40年代后期的大连，是苏联驻军地区，是我党领导下少有的大工业城市之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占掠夺和战后工厂的机器设备被苏军拆走，生产受到破坏，大部分工厂停产，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军事封锁，当时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都十分艰难。面临这一情况，能否把大连工业生产搞起来，不仅对于支援前线，减轻失业，安定民生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党能否在旅大站稳脚跟。欧阳钦同志来后，对大连面临的这种形势做了深刻分析。指出，一方面要迅速恢复经济，另一方面要担负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同时又要考虑是苏军控制和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它与其他解放区的性质是相同的，但所处政治环境又有特殊性。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搞经济建设的。他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经过大量思想工作，很快使党内同志统一了对当时旅大形势和任务的認識，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定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十六字方针，把“两个发展”作为旅大党组织的“两大中心任务。”他告诫我们：“在发展生产与文化两个任务中，生产是最基本的，占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在整个的生产中，又要把工业生产放到第一位，一切工作都应為经济建设服务”。为了确保两大中心任务的完成，他采取了很多实际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亲自主持制定了旅大两年经济发展计划，要求1949年到1950年两年内，工业生产要提高到146.7%，农业要提高到120%，对于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也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由于欧阳钦同志提出的任务明确，实现计划的措施具体得当，所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旅大经济就走上了恢复与发展的轨道，取得了活跃经济，稳定市场，改善民生，安定民心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旅大担负起了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为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枪炮子弹、药品、被服、医疗器械等。能够集中反映当时全地区经济建设成就的是1949年9月大连举办的工业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规模较大，设有铁路交通、机械轻工等 17 个馆，展出时间达 40 余天。举办这样的展览会，当时在东北乃至全国还是少有的，既是对旅大恢复工业生产的一次检阅，又是进一步繁荣发展地区经济的一次动员。

欧阳钦同志在注重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还注意抓好农业尤其是粮食的生产。1946 年、1947 年两年，旅大地区农业欠收，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封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1948 年欧阳钦到旅大后，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他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指示广大农村干部要抓好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互相合作，发放农贷，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籽的困难。坚持自愿两利原则，把分散的农村小商品经济组织到农村合作社中来。同时提倡精耕细作，提倡改良农具、打电井、用肥田粉，建立新式农场等科学的改良经营方式，确保粮食作物、园艺作物及其它作物的增产。由于措施得力，旅大地区的农业当时也上得较快，以粮食为例，1946 年是 12.5 万吨，1948 年一跃成为 20.8 万吨，增长 80%。尽管 1949 年 7 月份旅大地区遭受了台风袭击，但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基本保证，灾后不久，生产迅速恢复。欧阳钦同志不仅在大连时经常要问及粮食生产情况，就是在调去黑龙江工作后，有机会回大连，他还是问大连的粮食上去没有。这使我们深受感动。

回顾欧阳钦同志初来大连狠抓经济工作的这段实践，我们深深感到，他对东北局关于发展旅大经济的指示、决定的贯彻是坚决的。在贯彻执行中，他特别注意调查分析本地的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能够很好地把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他抓经济工作的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善于开创局面的领导艺术，对于当时旅大党内统一思想，增强信心，使旅大成为恢复经济最快的城市，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的这一段实践，为我们大连全面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先行一步积累了经验。

“出机器，出人才”，是欧阳钦同志一贯的思想。他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思想十分明确。他在日常工作和各种会议上曾多次谈到：“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没有知识，没有人才不行。”针对当时许多同志文化低、不懂经济的实际，他提出要在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一方面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组织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学文化，另一方面按东北局指示创立了大连大学，培养技术干部。大连大学于50年代初改为大连工学院。在欧阳钦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大连工学院又筹办了夜大学，组织市里部局级干部、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到夜大学学习，主要是学习物理、化学等工科专业，学习经济工作。现在市里许多长期做经济工作的老同志，谈起那一段的学习生活都十分留恋，都说今天之所以对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能有点基础知识，抓工作能较为顺利，无不得益于当时的干部教育。欧阳钦同志注意发展科学事业，广揽四方人才。他提出，要奖励自由研究与科学发明、技术革新，提倡文艺创作。他亲自决定派人去北京、上海、南京、香港等地，通过地下党组织招聘一批各方面专家和教授来大连工作。人才汇集，使旅大地区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为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欧阳钦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感到十分钦佩的是，他具有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大连期间，欧阳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他曾多次组织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计划局、工业局的领导同志对全市工业进行调查，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我们这几位同志都参加过当时的调查，彼时彼景仍历历在目。对于农业，欧阳钦同志也多次组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欧阳钦同志抓调研非常认真，非常细致，对大型专题调查报告，他都要亲自审阅，甚至对数字百分比都亲自核对，使之准确

无误。他的这种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必须百倍地加强党在旅大一切建设工作中的坚强领导”，是欧阳钦同志经常强调的重要原则。他在大连期间，自始至终注重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他曾亲自领导了 1948 年旅大的整党。此后，一直把党的建设当作一项根本任务和经常性任务来抓。针对当时存在的严重的狭隘民族情绪、妄自尊大、自以为是、轻浮虚夸、软弱散漫等错误倾向，他进行耐心教育和严肃批评。要求党员要建立起实事求是，关心群众，脚踏实地，埋头革命，学习理论，精通业务，艰苦朴素的良好作风。这一切，不仅在当时对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天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搞好党的建设工作，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欧阳钦同志在大连工作整整 6 年。6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然而在这 6 年中，他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大连的新局面。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注重党的建设，提出党在致力于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要发展文化，培养干部，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可贵的创造。所有这一切，都将载入大连人民的光荣史册，给予后人以启迪。欧阳钦同志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思想永存，我们撰此短文，用以告慰他九泉之下的英灵，用以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共勉！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陆 毅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他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去世后，党和国家对他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作出过高度评价。在他长期主持过党的工作的东北地区，许多曾经与他共过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们，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着他。

我认识欧阳钦同志并在他身边工作过二、三年。1948 年 7 月，欧阳钦同志奉东北局之命到大连就任旅大地委（后改为区党委、市委）第一书记，我当时任地委政治秘书，在地委常委集体办公地点——即大连“一品街”一座院落里，第一次见到了他。当年欧阳钦同志还不到 50 岁。他双目炯炯有神，举止很稳重，长期革命斗争的风霜，已

在他略显清瘦的面庞上刻下了不少纹路，在我这个当时只有 20 多岁的年轻人心目中，自然是一位革命长者了。当时很多同志也都在背后称他为“老头儿”。这样的称呼，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尊重、信赖和亲切的感情。

欧阳钦同志在旅大主持党的工作共有 6 年（1948.7—1954.8）。这一时期，旅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得到不断加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欣欣向荣，作为一个恢复较早的大工业城市，旅大在支援全国重点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老同志在回顾这一时期旅大工作的时候，都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欧阳钦同志刚到旅大的时候，面临的却不是这样一种状况。我在这所要说的，就是他到旅大工作初期是怎样解决了当时党内的思想混乱问题，开创了经济、文化发展新局面的一段史实。

1948 年的旅大，在苏军控制下度过了三年艰苦的恢复时期。我们党那时虽然掌握了政权，但由于苏联同国民党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苏联军队长期驻在旅大并实行军事管制。所以这个政权对外只能以地方自治的面貌出现而不同于其他解放区。党的组织也没有公开。在推行我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过程中，必须与苏军当局经常协商（他们还得随时向莫斯科请示），取得他们同意后才能办通。当时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各解放区，虽有农村工作经验，但对于在大城市特别是在旅大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环境的大城市里如何开展工作，是相当生疏的，对于这一地区的形势特点和我党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认识上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我们党既然在这里掌握了政权，就应当照其他解放区一样来推行我党的政策；对苏军当局的某些限制和干预很不满意，时有抵触。有的认为，地委遇事与苏军当局协商，强调“以苏为主”，就是“与苏联一个鼻孔出气”，是“以我为奴”。有的认为，强调这个地区的特殊性，就是“闹独立王国”。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地委在 1947 年和 1948 年上半年曾相继开过两次重要会议来统一党内思想，在有些问题上取得了共同认识，但仍有一些同志持不同意见，直到把状子告到东北局。由于党内存在着这种混乱思想，组织上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软弱现象，使党的领导作用受到削弱。这对于推进旅大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实现支援解放战争的任务，不能不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欧阳钦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主持地委的工作的。他经过调查研究，与地委其他负责同志充分交换意见，在肯定地委前几年领导全区人民为恢复旅大经济与支援前线等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之后，明确指出：旅大是一个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作为解放区，它与我党领导下的其他解放区的性质是相同的，总的政策是一致的；但作为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又不能不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采取某些不同于其他解放区的特殊政策，这与所谓“闹独立性”是根本不相干的。欧阳钦同志的这些看法，得到地委同志们的一致赞同。在取得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欧阳钦同志与地委原来的一些负责同志很快地建立起良好的团结共事关系，他支持大家各司其职地放手工作，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阻碍党的工作前进的思想混乱问题上来。

欧阳钦同志着眼于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从抓思想政治教育入手来解决问题。他倡议地委建立了定期的干部学习报告会的制度，由地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轮流主讲，向党员干部说明党的方针政策和通报工作情况。他亲自带头，连续地向党员干部做了几次报告，这些报告贯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非常明确而有说服力，对于澄清干部思想上的模糊认识，统一党内思想起了重大作用。

欧阳钦同志还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软弱涣散现象，强调提出，必须加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统一领导和加强党的纪律。他严肃地告诫大家，“没有纪律的军队要打败仗，没有纪律的

党也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不管你官大官小，资格多么老，你是天王老子也好，都要遵守党纪与法令。官大的和资格老的，更要做执行党纪与法令的模范。”这番话对当时一些犯有上述毛病的同志来说，的确是震聋发聩的。

由于加强了思想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旅大党内基本上结束了思想混乱状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趋于一致，从而使旅大地区经济恢复、各项建设和支援前线工作有秩序地顺利发展，同苏联驻军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地委的领导威信大为提高，党的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

在着重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同时，欧阳钦同志致力于旅大经济的发展，使旅大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前线的后方基地，又对将来新中国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为此，他从全局需要和旅大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地委原先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方针。强调提出革命就是为了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与发展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方针的提出是富于远见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据这一方针，当地政府制订了1949——1950年两年经济建设计划。在随后的党委会议上欧阳钦还多次讲过，旅大在发展生产与发展文化的基础上，应当“出机器，出技术，出人才”，以支援全国其他地区的建设。到1949年4月旅大党组织公开与群众见面后，这一方针便成为全地区人民家喻户晓的共同奋斗目标。

1949年初，东北局决定将旅大地委改为区党委。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有利形势下，欧阳钦同志和区党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决定，于当年4月1日起公开旅大党的组织。在公开党组织的过程中，为向广大党员进行党员必备条件和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的再教育，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关于党公开的宣传教育

提纲和组织实施方案，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党员重新学习党章，每个支部向群众公开党员身份的时候，党员本人要按照党章对照检查自己并接受群众的评议。经过这些工作，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普遍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旅大党组织面貌一新地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在区党委的领导下，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旅大地区在建国前夕已经完成了战后的恢复而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并以它发展生产与发展文化建设的成就，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以上所说的只是欧阳钦同志到旅大工作初期一段卓有成效的领导活动。作为一位久经锻炼的党的领导工作者，他以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与政治素质，顺利地实现了旅大党的工作“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一贯坚持从严治党，注重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他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干部，教育和爱护干部，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放手为下级同志承担责任……这些优良的作风和高尚品质，在此后的岁月里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日益加深的尊敬与爱戴。当他去世 10 周年的时候，我曾回大连参加过一次老同志为怀念他而举行的座谈会，大家满怀深情，交口称赞这位革命前辈的高贵品德和革命精神，引他为学习楷模。

欧阳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终生难忘的4年

都浩然

1950年，我奉调到中共旅大市委，接替马列同志任欧阳钦同志的外事秘书和机要秘书，任务是负责沟通中共旅大市委与驻旅大苏军三军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系。我在欧阳钦同志身边工作了4年。因工作需要，这4年，不仅跟着欧阳钦同志工作，而且和欧阳钦同志一家人同桌吃饭，同住在一幢房子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4年。在欧阳钦同志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欧阳钦同志忠于党、忠于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

欧阳钦同志是一位政治水平很高，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从实际出发，认真严肃地贯

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模范。当时在旅大地区工作，如忽视苏联在当地驻军并对旅大实行军事管制的特点，工作是很难开展的。欧阳钦同志到旅大后，贯彻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非常重视处理好与当地苏联驻军的关系。他在党的干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阐明了旅大地区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这一特点，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及关于中苏友好的重要性的教育，解决了干部中存在的对苏联驻军的做法不理解的问题，统一了干部思想，进而解决了在一部分群众中产生的对苏军不满的情绪。与此同时，欧阳钦同志加强了同苏联驻军领导干部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我党的方针政策，介绍我解放战争形势和节节胜利的情况，介绍旅大地区的工作情况和我党在旅大实行的政策与采取的措施。他诚恳坦率地向驻旅大苏军领导机关提出整顿军纪，改善苏联驻军与旅大人民之间关系的建议。

由于欧阳钦同志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经过大量的工作，加深了我方与苏联驻军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取得了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良好效果，使得当地居民与苏联驻军的关系得到改善，出现了我方群众爱护苏联驻军，驻军每逢十月革命节、苏军建军节也都邀请我方党政干部、人民群众代表参加庆祝活动，苏军帮助农民春播秋收的融洽景象。

通过这些活动，欧阳钦同志与先后两任苏联驻旅大陆海空军总指挥官别洛包罗道夫上将和史维卓夫上将以及军事委员（政委）和参谋长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1955年5月30日，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撤离时，苏军方面特别提出途经哈尔滨市时要作短暂的停留，以便同老朋友当时已调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欧阳钦同志和调任黑龙江省长的韩光同志告别。根据中央决定，我方派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为首的小组负责把驻旅大苏军指挥部的成员护送到中苏边境。我作为翻译随行。我参加和目睹了驻旅大苏军指挥部从

旅顺口出发，途经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等各主要站口的欢送活动和场面。但最为动人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哈尔滨的欢送活动。运送驻旅大苏军指挥部的列车于深夜抵达哈市。欧阳钦、韩光均到车站迎候，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并设宴招待了苏军高级将领。老朋友相见，互相热情拥抱，畅叙友情。当苏军将领在群众的欢呼声和军乐声中依依不舍离开哈市时，驻旅大苏联三军司令员史维卓夫上将邀请欧阳钦、韩光等领导同志访问苏联。欧阳钦同志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特派黑龙江省副省长、抗联老战士李延禄同志送苏军至绥芬河。这本来都是中苏友好和苏军将领与我方领导同志之间在工作中建立的深厚友谊的表现。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里通外国”的罪状。黑龙江省委中的造反派窜到北京，采取诱供等卑劣手段审讯、折磨我近一个月之久，硬说我和李延禄是欧阳钦指派与苏联建立特务关系的联络员。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在欧阳钦同志健在时，我认为没有必要向他诉说。今天顺便写在这里，目的只是为了消除那些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人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玷污。

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1949年12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前往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欧阳钦同志作为旅大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于1950年1月10日，前往莫斯科与毛泽东汇合。随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在莫斯科的国事活动结束后，欧阳钦同志随毛主席、周总理于3月4日返抵北京。回到大连后，欧阳钦同志十分重视宣传、执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特别在美帝国主

义发动侵朝战争的那些日子里，地处邻近朝鲜半岛的旅大地区的形势十分紧张。欧阳钦、韩光与驻旅大苏军领导机关加强了联系，互通情报，密切注视着美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与驻旅大苏军高级将领共同检查军事设施，他们风尘仆仆，跑遍了辽东半岛，帮助苏军解决征地、扩建机场、修筑道路、加强工事、加固桥梁等问题，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高度热情 and 责任感。

这里，我想再讲一件事。旅大市委在大连，驻旅大苏军指挥部设在旅顺，相隔约 45 公里。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火熊熊燃烧的日子里，为了保持经常联系，在紧张情况下及时互通情况，特别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在欧阳钦同志的建议下，在苏军驻旅大总指挥部与中共旅大市委之间架设了一条直通电话线，我方两架电话机分别安装在我的办公室和我的卧室里，在需要的时候，拿起电话机就可以通话。这本来是一个十分必要的、保家卫国的行动，是为防备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旅大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苏军驻旅大部队总指挥部密切配合，注视美帝侵略军的行径所必需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又成了欧阳钦同志和我的“里通外国”的罪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按照《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规定，苏方将无偿地把中苏合营企业交还中国。后经中苏双方谈判，苏联驻旅大的军队于 1955 年 5 月底撤回苏联。

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以及大连水泥厂、玻璃厂等大型企业，还在 1952 年以前，在韩光同志主持下，就由我国接收过来。中国长春铁路大连分局所辖的铁路工厂、机务段、车务段等也于 1952 年陆续交还我方。唯有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由于苏联的修船任务重，交还我方的时间较晚。1953 年夏，苏联政府派出其负责船舶工作的贝科夫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来旅大

谈判移交问题。我方谈判代表团由欧阳钦同志率领，我任翻译。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工厂交还我方后，我方仍接收苏联船只的修理任务，苏方付修理费。至此，中苏合营企业就全部由我方接管。

为执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1954年春，由肖劲光同志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来到大连，谈判苏联将旅大防务移交给中国的问题。代表团成员有欧阳钦、曾绍山等同志。苏方代表团由驻旅大苏军三军总司令史维卓夫上将率领，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谋长图兰塔也夫少将。苏方首席翻译是李必新中校（苏籍华人，当时任苏军办的《实话报》社副社长，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译者），中方首席翻译由我担任。谈判地点设在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谈判结果达成了关于驻旅大苏军把旅大地区的防务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议，除可移动的技术装备和军械外，将其它所有设备清点造册，在完好无损的状态下，无偿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大苏军于1955年5月底全部撤离完毕。

欧阳钦同志作为旅大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既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签订活动的参加者，又是上述条约和协定的执行者。欧阳钦同志为中苏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和执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

保守党和国家机密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欧阳钦同志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严守党和国家机密的自觉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作为他的机要秘书体会特别深。一次，由于事情急，我把一份密码电报从办公室送回欧阳钦同志的住处给他看，他对此事非常生气。他说：密码电报不许拿出办公室，你带着电报从街上走回来是错误的，完全违反保密规定。我当时确实不懂。对欧阳钦同志这种严厉的批评，确实有点发懵，觉得很委屈，泪水都要流下来了。他给我解释说，密码

电报不光是内容要保密，就是普通的内容，只要是用密码发来的，它就是秘密，电码就是秘密，密码被敌人破译了，就会给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通过这件事，使我受到深刻的保密教育，懂得了保密的重要性，以及保密工作与党的利益的关系。

由于旅顺、大连的战略位置，又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不论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美帝国主义时刻都在窥视着它。这里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1950年秋我到旅大市委工作以后，亲身接触和参加的政治军事活动就很多。我国许多党政领导人路过旅大，到旅大视察工作，到旅大休养，参观旅顺口苏军军事设施。1953年和195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两次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到旅大慰问苏军。在这段时间里，还举行过辽东半岛军事演习等活动。

对这些活动，欧阳钦同志总是教育我们要严守秘密，自己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就绝不要去问，更不准外传和议论。欧阳钦同志以身作则，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我和欧阳钦同志一家同桌吃饭长达4年之久，从来没有听到欧阳钦同志在饭桌上当着家属的面（尽管欧阳钦同志的夫人黄葳同志也是高级干部）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及人事问题。

四

欧阳钦同志很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我是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干部，到旅大市委领导机关工作前，曾在大连铁路分局的机务部门和计划部门工作过。欧阳钦同志认为，在领导机关工作，光有基层的具体工作知识和技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综合分析能力。他要求我学会进行调查研究。他先派我到工厂去蹲点，要求我了解和熟悉工厂资产、设备、生产以及工人和干部队伍等情况。又派我到农村了解当地苏联驻军与群众的关系，还派我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蹲点情况不仅要求

口头向他汇报，而且要求写成书面材料给他看。他对情况总是问得很细，刨根问底，并和你一起讨论研究，力求把问题弄明白，搞清楚。他的这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很大。我从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中确实学到很多东西，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受益匪浅。在这些锻炼中学到的东西，对促进我的成长和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学习搞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欧阳钦同志不仅依靠机关的职能部门，而且亲自作调查研究。除了通过会议听汇报，了解情况外，还经常约请人谈话，搜集材料，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常对他惊人的记忆力感到钦佩。统计是计划的基础。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欧阳钦同志不需要看任何本本就能说出旅大地区的基本情况，列举许多经济、生产等方面的数字。这说明他很注意研究全区的经济情况，并用以指导工作。

欧阳钦同志很注意培养干部，当时在旅大工作经常要和苏军打交道，急需懂俄语的人才。我是1947年2月旅大成立的俄文学校毕业生，虽懂一点俄文，在中长铁路大连分局工作一段，经常与苏方人员接触，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调到市委担任欧阳钦同志的外事秘书仍然感到吃力。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欧阳钦同志与驻旅大苏军指挥部军事委员（政委）谢苗诺夫少将协商，为我和旅大市政府以及大连中苏友好协会的几个翻译专门开设了一个班，配备了专门的教师，以提高我们的俄语水平。在这个夜校班的学习持续将近2年，直到苏军撤离前夕才停下来。通过这次学习，我们的俄语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五

欧阳钦同志在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对干部作出的成绩总给予充分的肯定、鼓励和表扬。但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却从不迁就。他在指出缺点，批评错误时，毫不客气，但分析深刻，常能谈

到要害处，使干部心服口服。至于对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腐化堕落，则深恶痛绝，决不姑息。

欧阳钦同志善于团结、关心、爱护干部，待人宽厚，处事公道，深得人心。他在旅大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干部，在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干部都很尊重他。很多同志在离开旅大多年以后，每当谈起在欧阳钦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个时期，都觉得心情舒畅，甚为留恋，说欧阳钦同志干部政策执行的好。

我自己就是受到欧阳钦同志关心的一个。1952 年底我在工作中扭伤了腰，住进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医生决定让我睡“石膏床”，即按我的体型用石膏打制一个从头颈到臀部的“石膏床”每天只能仰卧在这张“床上”，眼看天花板，苦不堪言。我在这张“石膏床”上睡了近两个月仍不见好。欧阳钦同志到医院看我，对此疗法表示怀疑。当即决定约请驻旅大苏军陆军总医院的医生来给我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苏军医生认为没有必要睡“石膏床”。说越睡越坏，于是把我接到旅顺苏军陆军总医院，经过 20 多天的理疗、体疗，我就行动自如地出院了。为了使我的身体早日恢复，欧阳钦同志又批准我到沙河口疗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从而使我有幸参加周总理率领代表团慰问苏军驻旅大部队的活动。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总有一股感激的暖流从心头流过。如果没有欧阳钦同志的关怀，我今天说不定已经成为残废。

欧阳钦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他的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他和工人心连心

孙文学 王智富

欧阳钦同志虽然辞世多年了，但是留在我们心中的是对他永恒的怀念，不尽的思念。

欧阳钦同志是 1948 年 7 月来大连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当时，极端困难的日子刚刚好转。1949 年 4 月 1 日欧阳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旅大区活动分子大会上作了《在目前形势下旅大党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党建设旅大的总任务：“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

在贯彻旅大党的总任务中，欧阳钦同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大连解放后到 1951 年，大连造船厂属苏联企业，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苏联人。1952 年中苏合营后，欧阳钦同志兼任大连造船厂董事会副董事长。他经常到工厂来，同我们一见面就讲：“你们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一定要向苏学习。这么多苏

联同志在你们身边，你们是向苏学习得天独厚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当时，造船工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在拥党竞赛中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厂工会主席孙文学向欧阳钦同志汇报了8级工王智富、徐积宽、程远章等奋不顾身、无私奉献的英雄事迹，特别讲到王智富带领工人修苏联去北冰洋船的4台坏锅炉，美国人修不了，要拆旧换新得三四年，可王智富领着工友苦干巧干只用75天便修复一新，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破烂不堪的万吨货船上的锅炉逐个修好。苏联人高度称赞王智富是“锅炉大王”，“锅炉大夫”，大连造船厂苏联厂长把王智富的照片挂在厂长办公室里。老锻工程远章在国民党封锁旅大，工厂燃料奇缺时，饿着肚子到铁路枕木道扒煤渣昏迷过去，经医生抢救过来后，仍勒紧裤腰带干重活；锻工打铁他把钳，肚子缺饭没有劲，手把不住钳用肚子顶，两个钳把插进肚子里……欧阳钦同志听到后非常激动地说：“工人虽然语言表达不那么好，其行动就是爱国主义，就是拥护共产党的。”又说：“八年抗战能培养一个将军，却培养不出一个八级工；培养一个八级工得二三十年，造船厂只有六七个八级工，要象对待将军一样对待八级大工匠。”1950年初，孙文学向欧阳钦同志汇报在开展创新纪录运动中，铆工杨青云突破日铆一二百钉的常规，创造日铆500个钉的最高纪录，并介绍车间主席杜兴仁总结杨青云“前腿蹬，后腿弓，铆钉窝子担当中，前手扭，后手转，铆钉不严不能干”时，欧阳钦同志高兴地说：“这是工人创造出来的工作法。不要把科学神秘化，科学是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工人创造的科学工作法，要好好宣传推广，要好好培养典型。”欧阳钦同志任旅大市委书记期间，八级工、旅大市劳动英雄王智富经常出席市里一些重要会议，开会时，欧阳钦知道王智富耳朵有些聋，总是叫王智富坐在他身旁。王智富经常说：“我反映工人的意见和要求，欧阳钦同志都认真听，认真解决，欧阳钦同志依

靠工人阶级是实实在在的。”1952年，欧阳钦同志来厂开完会后，两次用车把孙文学拉到大连火车站二楼看南面广场。欧阳钦同志说：

“把站前青山馆、海味馆搬走，大连火车站前广场宽敞、壮观，不亚于莫斯科红场。”他问孙文学“好不好？有什么看法？”孙文学惊叹道：“太好了！太敞亮了！”欧阳钦同志又面有难色地说：“海味馆是钢筋水泥结构，我目前还下不了决心。”欧阳钦同志对工会和工会工作者要求很严，他对孙文学说：“工会干部要好好为工人服务，不要辜负工人的期望。”

欧阳钦同志培养教育工人的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来大连后，对学习抓得非常紧。每星期六区党委都举办报告会，欧阳钦同志针对当时党内干部思想上对旅大地区的性质、对苏军的关系等方面的模糊认识进行思想教育，及时统一了认识，使我们造船厂职工与苏联人合作得较好。船厂职工和大连工人阶级一道，以忘我的劳动，为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贯彻旅大区党委建设繁荣的新旅大的总任务，欧阳钦同志特别注重职工的文化学习，他对王智富说：“旅大工人当了40年的奴隶，政治上受残酷压迫，经济上受无穷掠夺，长期遭受文化上的奴化统治。现在工人翻身做主人，不学文化不行，不会看图纸不会画图怎么当工程师？！”“必须来一个文化大翻身，为学政治、学技术打好基础。”1949年到1951年，旅大地区开展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扫盲识字运动，责成工会集中精力重点办好扫盲识字班。大多数工人文盲经过两年奋战，按原定识1200字的标准摘掉了文盲帽子，紧接着又按欧阳钦同志的指示，搞文化普及运动，办红专学校，业余高校班、初中班、业余政治、技术学习班等，层层办教育。那时候形成一种浓厚的学习风气，工人下班后都挟着书本去学文化，奋发图强地学习本领。1949年王智富去市委党校学习3年，孙文学进大连工学院夜大学学习。欧阳钦同志不仅

发号召，他自己也认真地去工学院夜大学数理化。学习中还不断检查各单位去夜大学习的干部的学习情况。无数事实证明：扫除文盲和普及文化教育，使工人的精神生活和工厂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识字班、业余文化补习班毕业的学员中，因提高文化而提升了技术等级和提拔当干部的为数不少。苏军 1955 年撤离回国后，大连造船厂中、上层干部绝大多数是从工人、技术人员中提拔起来的，能独挡一面管理工厂。

欧阳钦同志关心人，对工人的生活疾苦关心备至。1949 年，有一次欧阳钦同志和市委几位常委听取当时的造船厂党委书记李衡生和工会主席孙文学的工作汇报。孙文学当年 20 来岁，他讲话直率，如实汇报管理工厂的苏方人员只抓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福利问题，并具体陈述了工人治病方面遇到的一些困难。欧阳钦怀着热爱工人兄弟的炽烈感情，严肃批评：“这些问题就是苏联人的么？你们怎么不解决?!”第二天，欧阳钦同志来到船厂通知我们，市委决定将市委招待所腾出来开办造船厂职工医院，并帮助我们解决了建院所需的资金问题。欧阳钦同志还亲自找来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要由政府拨款，第一批改造大连香炉礁穷汉岭，盖起了 4 万多平方米造船工人村家属宿舍。当时造船工人无不欢欣鼓舞，敲锣打鼓，欢庆乔迁之喜，感谢共产党的恩情。粉碎“四人帮”后，欧阳钦同志重病在身，原宪千，李衡生同志前去看望他时，欧阳钦同志还一往情深地关怀孙文学，问：“小伙子现在怎么样？”1976 年王智富去京到欧阳钦家看望，欧阳钦同志见到老劳动英雄，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语言梗塞说不出话，泪水流到王智富的头顶上。王智富这条硬汉子，遭受奇冤没有哭过，母亲逝世没有流泪，此时见到欧阳钦书记，他竟止不住老泪纵横。欧阳钦同志与工人、干部情深谊厚，真是心心相印，心连着心。

欧阳钦同志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时曾当过工人，他具有真正的优

秀工人阶级的素质，是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他，使他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长期革命斗争经历给了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实际的聪明智慧。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忠诚给了他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他那一身正气、高度的原则性，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大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欧阳钦同志与大庆石油会战

余秋里

我和欧阳钦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已相识。在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中，我们有了比较多的接触。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讲大局、顾大局的高尚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但件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第3号基准井喷出工业性油流，可能在松嫩平原上发现大油田的喜讯迅速传开。从北京石油部机关到西北各石油勘探局的职工们都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一扫多年苦于没有重大发现的沉闷。广大石油职工的心里升腾起强烈的改变我国石油落后面貌的愿望。

我和石油部的几位领导同志在振奋之余，冷静下来。鉴于过去勘探工作的教训，我们不能把一口探井喷了油就看作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即或拿下一定的面积，但油田的规模有多大？油层有多厚？油的质量

好不好？当时还有很多未知数。这就需要根据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反复研究。同时，还需要调整部署，继续展开勘探。

经过重新部署的探井葡1井开钻不久，大约是1959年11月上旬，我们接到松辽勘探局的报告说，东北协作区主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不顾60多岁高龄，冒着严寒和一路颠簸，亲临松基3井、葡1井视察并慰问石油职工。

我看了欧阳钦同志在大同镇石油职工大会上热情洋溢的讲话，深为感动，他讲话的大意我至今仍记得。他说，此地出了油，是天大的喜事，听到他们的介绍，感到石油事业在黑龙江大有希望，你们搞油的是野战军，找油、开发以及将来的建设是很复杂的，也是很困难的。你们的事业，是全党的事业，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大发展可以带动我们机械化、现代化，使国家更富强。你们到这里搞石油，全国要支援，我们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有关的县、乡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这里的“地主”，要尽地主之谊，从省委起要讲大局、顾大局，要教育全省的干部群众认识石油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事。我们要组织全省支援石油勘探，你们要在葡萄花、高台子构造甩开钻机，大战今冬明春，我们要继续组织力量修筑公路，同石油工人一起大战，尽快把这个油田的大小勘探清楚。总之，黑龙江省支援石油开发是责无旁贷，全力以赴，全力支援。

他还说，我们都看到了，石油工人是好样的。你们大部分同志是从部队转业的，为了改变我国石油的落后面貌，继承发扬了我们解放军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我们要像热爱志愿军那样，把石油工人当作最可爱的人。

就是在那次慰问时，欧阳钦同志还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商量，为了有力地支援勘探工作，调来了强有力的干部，加强了大同区的领导班子。在建国10周年大庆的前夕，松辽盆地喜喷原油，他提

议把松基3井所在的肇州县大同区，改名为“大庆区”。后来我们感到欧阳钦同志命名的“大庆”二字，不仅响亮，而且含义深远，一致同意把这个新发现的大油田，取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初，葡萄花构造的第一批探井喷油的喜讯接连传来。从整个长垣的资料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已经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仅是一小部分，边界尚未摸到，形势很好，远景非常乐观。我们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松辽地区的勘探形势和前景，研究了今后的工作。

2月上旬的一天，我和李人俊同志向邓小平总书记汇报石油部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方法，开展一场勘探、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小平同志表示同意，让我们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2月13日，石油部党组向党中央写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7天后，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周总理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不久，一场震撼人心的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新崛起的石油大会战的序幕就揭开了。

在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期间，我们不断地把勘探进展情况向黑龙江省委通报。欧阳钦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在大庆进行石油会战的决策。他连续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支援石油会战的问题，做出了“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决议。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以省委常务书记强晓初同志为组长的“支援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欧阳钦同志强调，这个机构就是石油大会战强有力的后勤部，我来给秋里同志当这个后勤部的政委。当时，省委还责成杨易辰同志负责安排解决会战队伍的粮食、副食品、煤炭、被服等物资供应；陈雷同志负责会战前线机修厂、卫生医疗机构、学校的建立，以及电力供应、通讯线路的架设、组织力量修筑公路等事项。李范五、

陈剑飞等同志也不辞辛劳，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和康世恩同志征求对支援工作的意见，一处一处地亲自检查支援物资的到货情况。还一再转达欧阳钦同志深切关怀的话语：“石油、黑龙江是一家，凡是黑龙江能解决的，就地拍板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积极设法解决，总之省里的决心就是保证大会战的顺利进行。”那时，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处于极端的困难之中。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的无私支援，使大会战前夕就出现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局面。我们对黑龙江这种天高地厚之情，只有由衷地感激，只能下死决心，率领会战大军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以回报党、回报人民。

1960年2月以后，37路会战队伍，迅速云集到“青天一顶，草原一片”的大庆区、萨尔图区一带。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由于会战队伍上得猛，生产、生活等大量物资一时难以筹措齐备。不久，中央批准了3万名转业官兵日夜兼程赶来参加会战，我们一时无法解决食宿困难。省委立即紧急动员，指示齐齐哈尔、泰来、双城、肇东、巴彦等9个市县，协助我们暂时接待2万转业官兵。省里又派出干部把这些转业的同志组成几个修路大队，相继返回会战前线修筑简易公路。这不仅减轻了我们的压力，而且为继续展开勘探创造了条件。

会战队伍上来以后，欧阳钦同志指示“支援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省委领导同志看到我们的钻井、油建工人都在以革命加拼命地精神进行工作，而每人每月仅15公斤的粮食定量，实在太少，感到这是关系到会战成败的大问题。而在那个时候，省里的粮食储备已到了“危险线”，不少地区因农民缺粮，已向省里频频告急。省委认为，粮食确实困难，宁可我们挨饿，也要支援石油会战大军，并决定由粮食部门在定量之外，每月再给大庆调拨7.5万公斤粮食。后来，由于会战职工体力消耗过大，粮食还是不足，不少单位以野菜代食，前线工人出现了4000多名浮

肿病患者。而省内一些缺粮的地区也发现了大批患浮肿病的人，我们再也不能向省里伸手了。但会战队伍因粮食缺乏而出现的疲惫、浮肿，严重地困扰着我们。欧阳钦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焦急，彻夜难眠，省委在千难万难当中，再次决定给会战职工每人每月增加 1.5 公斤大豆。这一消息传来，我们很多同志激动不已。

艰苦卓绝的大会战，进行了六七个月后，又面临着几万人如何度过严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会战就得停下来，待来年春天再上，这样势必推迟拿下油田的时日，给国家造成更大的困难。我们苦苦思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欧阳钦同志也在帮助我们筹划。一次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我想了很久，有一种办法，就是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我们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一致认为搞“干打垒”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干打垒建筑指挥部”，由孙敬文同志负责。不久，欧阳钦同志派来了技术顾问。为度过会战的第一个冬天，我们大张旗鼓地动员会战职工、家属一齐上阵，建了 30 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

“干打垒”的墙打起来了，又因缺少木材，上不了门窗、封不上顶，工程停了下来。李范五、陈雷、陈剑飞几位领导同志立即请示欧阳钦同志，因计划内木材早已调拨完毕，一时也有些束手无策。省委认为其他省市计划用的木材当然也是急需的，但几万会战大军急待解决的过冬问题，是更为急迫的问题。省委、省政府采取非常措施，下令大庆“干打垒”用材尚未解决之前，从小兴安岭发往全国各地的木材列车，在南岔编组站一律换牌运往大庆油田。与此同时，省里动员各方面力量，为会战队伍赶制的过冬被服，在入冬前源源运到会战前线。这就保证了会战职工安全顺利度过第一个严冬，坚持了会战。记得 1960 年 12 月的一天，大庆的气温降到零下 30 多摄氏度，采油工

人却在这一天创造了日产原油 7000 多吨的最高纪录。这一年，生产了 97 万吨原油，勘探工作也取得了决定性成果。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黑龙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援，夺取石油大会战第一年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大庆这片土地，在石油大会战初期，它的寒冷与荒凉，它暴怒的风雪“大烟炮”，确实给我们石油职工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这 136 万亩土地上，却生长着一望无际的优质牧草，是世界上少有的百万亩优良牧场之一。早在解放初期，根据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的指示，就在这里建立了“红色草原牧场”。

1960 年春天，萨尔图、喇嘛甸地区一批探井相继喷油。所获得的地质资料表明，大庆油田越向北延伸，地下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我们果断地决定，挥师北上，集中力量探明萨尔图、喇嘛甸地区油田情况。而萨尔图正是红色草原牧场的中心。牧民们因家乡发现了石油，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他们热情地为会战职工腾出房子，连牛棚也腾了出来。仅 1960 年 4、5 月份，就帮助我们接待安置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还为萨 1 井挖了第一个试油用的土油池。随着石油会战的发展，一口口油井、一座座泵站和油库建设起来，这些设施占去了一块块肥美的草原。牧民们发现，开发建设油田必然要破坏他们生息发展的草原，油和“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牧场和油田的争执不断发生。

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省委，认真分析了牧场和油田的矛盾，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总的原则：“服从大局，‘牛’给油让路。”欧阳钦同志委派曲长川同志和省农业厅长房定辰同志在萨尔图召开了油田土地会议，通过与牧场、油田等有关部门讨论协商，确定了大庆地区利用土地的具体原则：“地上服从地下，油区内‘牛’让油，油区外油让‘牛’。”

可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会战职工在艰苦条件下，吃不饱肚子，体质严重下降，“浮肿”成了常见病。我们为了坚持会战，决定自己动手开一些荒地，种粮、种菜，改善职工生活。这样，油和“牛”的矛盾再度突出起来。欧阳钦同志亲自找有关部门做思想工作，省委再次重申：“宁可牺牲‘牛’，也要确保油。”为了确保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用地，1963年5月13日，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红色草原牧场所属的在油区的4个分场陆续迁出，把一片大草原交给大庆油田使用。事后我们听说，省委、省政府的这一决定，使红色牧场的奶牛和马的数量分别减少了53%和7.8%，这充分体现了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1978年，也就是欧阳钦同志病逝那一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为彻底解决油和“牛”的矛盾，把东北细毛羊、黑白花奶牛、龙江马等优良畜种调往其他牧场，将红色草原牧场完全交给大庆管辖，组建了现在的大庆牧工商联合公司。

大庆石油会战已经过去30年了。30年来大庆职工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为国家生产了10亿吨原油，财政上缴已达779亿元。斯人已去，功业永长存。当年留下欧阳钦同志足迹的草原，如今已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化的举世瞩目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大庆的工人、干部、科学技术人员，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正在向新的高峰攀登。我想，欧阳钦同志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的。

怀念欧阳钦同志

杨易辰

欧阳钦同志是我们党内的一位老同志，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 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1954 年 8 月原黑龙江与松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欧阳钦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我也从原辽西省调到黑龙江省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们共事十几年，工作关系密切，互相信任和支持，彼此也都很了解。欧阳钦同志年长我十几岁，我始终把他视为兄长。欧阳钦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热爱人民，顾全大局，团结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深，工作经验也较多，给和其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怀念，更值得我们学习。

党领导一切，是指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领导，不能包办代替或不适当地过多干预行政业务工作，否则不仅不会加强反而势必削弱党的领导作用，降低党的领导水平。他多次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管好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进行监督，使各级领导机关真正掌握在密切联系群众、忠实于党的人的手中。在工作中，欧阳钦同志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党的建设上，注意研究解决如何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巩固和提高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加强各级领导核心，充实基层，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和增强党的团结，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克服腐败现象等重大问题。他多次就这些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花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许多至今看来也非常正确的真知灼见。欧阳钦同志重视抓党的建设和勇于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些方面颇有建树的工作，对黑龙江省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顾全大局，是欧阳钦同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黑龙江盛产粮食，也有丰富的石油和其他工业资源，在全国工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欧阳钦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非常强调顾全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积极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思想是一贯的、坚定的，即使是在省里有困难的情况下，也从没有动摇过。

黑龙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早在 1954 年冬的县委书记会议上，欧阳钦同志就提出了“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以后多年，这个口号一直是全省粮食工作的指导原则。1959 年至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在欧阳钦同志顾全大局思想的指导下，黑龙江省在粮食问题上仍为国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异常恶劣，各地都发生了饥荒，有的地方饿死了不少人。黑龙江省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连年减产，1959 年比 1958 年减少 5.4 亿斤，1960 年比 1959 年减少 63.4 亿斤，1961 年比 1960 年减少 11.8 亿斤，是解放后产粮最少的一年，全省粮食供应先是突破了“危险线”（全省城市周转粮 20 亿斤），接着又突破了“警戒线”（15 亿斤）。粮食非常紧张，很多人以苞米瓢、豆皮、稻壳磨面制造的代食品充饥。有的甚至将木本、草本植物磨碎掺和在糠面中

烙煎饼吃。省委的工作主要是想方设法渡过灾荒。欧阳钦同志对此忧心如焚。我作为主管财贸、粮食工作的省委书记，每日忙着生产自救、调剂各地粮食供应、生产代食品等事情。同时我们也为中央和全国忧虑。欧阳钦同志看到周总理为说服各地同志多上缴一些粮食而不肯休息的情景，心里十分不安。他向干部们说：“全国农业自然灾害严重，我们也受了灾。但黑龙江是全国的重要产粮区，我们应积极调拨粮食支援受灾更大的地区。”粮食是当时全国最突出的问题。周总理为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日夜操劳。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部署粮食问题。我和欧阳钦同志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总理提出，黑龙江已经调出28亿斤粮食，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全国的粮食危机仍很严重，还要再增调2亿斤支援外地。我当时思想不通（那天欧阳钦同志因病没去参加会议），就同总理争了起来。我主要考虑省里也已经十分困难，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再多调出2亿斤粮食，困难和压力实在太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我作为主管的省委书记，难以向全省人民交代。总理耐心地同我谈，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人，国家要帮助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散会后，我向欧阳钦同志汇报了会上争论的情况，欧阳钦同志也给我做工作，希望我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和欧阳钦同志的帮助，使我深受教育，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省的利益多了，想全局的利益少了。随后，我向总理表示困难再大也要执行中央的调粮计划。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回到省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如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增调粮食任务，虽然加重了全省吃粮的困难，受到了一些人的责难，但分担了全国的困难，因此心里也是安稳的。

1958年，王震同志奉中央命令，率领10万转业官兵开赴北大荒，在三江平原建设国家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欧阳钦同志带领全省人民给

予了热情的支持。他提出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全力支援。省里先后给垦区送去了大量粮食、木材、农机具以及生活用品，还输送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3年自然灾害期间，欧阳钦同志还曾亲自到垦区，看望干部、战士，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50年代末，国家决定在黑龙江省安达地区开发石油。欧阳钦同志坚决支持中央的决定，带领省委一班人，全力支援石油大会战。在他的主持下，省委常委多次专门开会研究支援油田建设问题，明确提出：“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省委成立了“省委支援油田建设领导小组”，并从组织领导、干部配备、物资供应、筑路、建房等各方面作了细致的安排，责任到人，定期完成。我负责油田职工的粮食、副食品、煤炭、服装等物资的供应工作。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足是个大问题，一度曾影响到石油大会战的进行。欧阳钦同志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全省每月再节约15万斤粮食支援油田，并责成我落实此事。在当时那种普遍缺粮的情况下，每月再节约15万斤粮食，困难是很大的。我对省粮食部门的负责同志说：“粮食困难，省委知道。但就全国而言，石油更缺。宁可我们自己挨些饿，也得解决油田会战大军的吃饭问题。”在欧阳钦同志的带领下，全省人民节衣缩食，把大批的粮食、副食、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欧阳钦同志还多次亲往油田，检查物资供应情况，协调开发油田和发展当地经济中的矛盾，教育干部群众服从支援石油大会战这个大局。省委和全省人民的全力以赴、全力支援，有力地保障了石油大会战的顺利进行。大庆油田的发展与当时萨尔图红色草原牧场发生了矛盾：油田重要，红色草原牧场也是全国少有的大牧场，是水草肥美的难得的好牧场，要油和要牛这对矛盾怎样解决？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省委还是痛下决心将红色草原牧场划归大庆领导。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个决心还是下对了。至今，人们仍没有忘记大庆人的艰苦创业精神，也不会忘记黑

龙江人民对大庆的支援。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欧阳钦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既要求别的领导同志这样做，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他主持黑龙江工作期间，无论是在 1957 年开始的整风反右派运动中，还是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也无论是三年困难时期，还是 60 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他都能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身居要职，参加中央和省的会议较多，消耗了他的许多时间，但他总是力戒那种文山会海的领导作风，劝告各级领导少开会多深入。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年 3、4 月间，欧阳钦同志亲自率领省、地、县三级工作组到宁安县渤海公社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结合贯彻《农业六十条》，系统总结了当地从互助组到公社化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欧阳钦同志给毛泽东同志写信，指出了农村食堂存在的问题，批评了农村中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和瞎指挥问题，并提出黑龙江省在调整工作中要把农业和轻工业摆上首要位置。这些意见为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关心和团结同志，善于当好班长，是不少和欧阳钦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共同感受。在工作中，他重视领导集体的作用，善于发挥每一个领导成员的作用。重大问题经过会议研究确定以后，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欧阳钦同志从不过多干预，使每个人都能放手大胆工作。和他一起共事，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也勇于负责，创造性地工作。欧阳钦同志关心干部，爱护干部，更注意严格要求干部，强调在党的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对于违反党的原则和纪律的事情，不管是谁，他都敢于严厉批评。省里一位领导干部是个老红军，资格老，职务高，对他的缺点和错误，欧阳钦同志多次在省委会议上进行面对面的批评，不顾情面。三年困难时期，欧阳钦同志

要求省委机关干部“以身作则，共渡难关”。一次几个干部劳动时带回几斤土豆，他知道后进行了严肃批评，指令他们把土豆送回去。他认为带回几斤土豆事小，丢掉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事大。同志们说，欧阳钦同志批评人，“其势汹汹，其心融融”。在关心团结干部问题上，他确实是从坚持党的原则，在政治上爱护干部出发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也是这样。1967年4月，造反派找欧阳钦核对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的所谓反党材料，他义正辞严地回答说：“他们是党的好同志、好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工作是出色的，人民是满意的。如果说是有点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我来负，因为我是省委第一书记。”在那种人妖颠倒、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在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置自己安危于不顾地保护同志，是难能可贵的。过了很久我才听说这件事，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欧阳钦同志献身革命60年，终其一生，不愧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忠实的人民公仆，他的思想、品格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将永远活在黑龙江人民心中。

回忆与怀念

陈俊生

欧阳钦同志 1954 年 8 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直至 1965 年。我从 1957 年起给他当秘书，直至 1963 年。欧阳钦同志于 1978 年逝世，至今已 10 余年，但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我的脑海里还记忆犹新。

顾全大局 服从整体

现在的黑龙江省，是原松江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合三为一而成的。欧阳钦同志 1954 年到合省后的黑龙江省委任第一书记，当时我是克山县委书记。就在这一年，全国一些地方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大幅度减产，国家急需粮食，几乎上上下下人人谈粮食。东北局负责人林枫同志曾专程到黑龙江谈粮食调拨问题。省里一些同志担心调出粮食多了会影响本省安排，农民挨饿，存在一种少调为好的思想。我记得，合省后第一次县委书记会议（吸收子区委书记参加），就是讨论粮食问题。会上会下都喊粮食紧张，省里粮食征购指标迟迟落实不下去。欧阳钦同志了解到大家的想法后，把与会同志召集到一起，讲了一次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然也是第一次听他讲话。他湖南乡音很重，我听不大懂，大概能听懂 70%，但是感到思想性很强，

谈问题很深刻，听了觉得甚有启发。欧阳钦同志集中深刻阐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粮食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他提出了要“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他站在全局的高度，讲得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他说：“各县确实都有些困难，但国家困难更大，国家目前的困难比县、比省都大。国家形势不好，县里也不会好。我们应该厉行节约，为国家分担困难，这是一个全局问题。”他讲话后，分组进行了讨论，县委书记们思想通了，区委书记们思想也通了，都愉快地接受了粮食征购任务。有的区委书记跟我说：“早这样讲，问题不就早解决了。”也有的说：“这个老革命可不简单，一席话，满天乌云都散了。”事实证明，这年县征购粮任务完成后，农民并没有挨饿，而对缓解国家粮食困难却起到很大作用。

“顾全大局，服从整体”，这是欧阳钦同志一贯的思想，也成为省委工作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时，他一向强调要顾全大局，服从整体。他在1954年12月30日新年干部会上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是永远保持整体观念，而不是分散主义、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1961年在庐山开会时，周恩来总理到各组征求意见，谈调粮问题。一天下午，周总理来到东北组（包括辽、吉、黑），讲形势和任务，反复强调地方要支援中央。如果出粮省不多调给中央粮食，全国日子很难过。省里有些同志说，中央有困难，省里也有困难。当时没有一个人不喊困难的。谈到黑龙江可否多调出1亿斤粮食时，当时我省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面有难色，认为不好接受，讲了很多情况和不能多上调的理由，有点僵持不下。周总理说，你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以考虑少调一些。就在大家争争讲讲、周总理有点松口的时候，欧阳钦同志从洗手间回来了，他马上说：“不要讲了。当前国家困难很大，我们是产粮省，尽管也有些困难，节约点就有了，总理的想法我接受了。”周总理十分高兴。

后来证明，多调给国家1亿斤粮食，尽管省里也有一些困难，但经过大家的努力，日子还是能够过得去。

1956年，王震同志率领10万转业官兵开赴黑龙江，开发北大荒，当时，困难很多。欧阳钦同志全力支持。他说，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这对全局很重要。因此，对部队官兵所需生产、生活物资，省里都积极帮助解决。他还曾多次建议为王震同志这一功劳树碑。

中央于1959年决定在大庆开采石油，省委提出，要全力支援大庆，并指派一名省委书记专门负责支援大庆的工作。在大庆油田建设过程中，曾发生了“牛”和“油”的矛盾。萨尔图的红色草原牧场，养奶牛条件很好，而草原地下发现了石油，是继续养牛，还是打井采油，牧民们舍不得放弃草原。欧阳钦同志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他说，油是国家最急需的，这是全局问题。牛是地方问题，局部要服从全局。这样，另辟了牧场，把红色草原划归大庆油田，有力地保证了大庆油田建设的顺利进行。

欧阳钦同志这种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的思想，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多次表扬。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要揪斗欧阳钦同志。周总理在接见黑龙江造反派代表时多次指出，欧阳钦同志顾全大局，思想路线是正确的，你们不要揪斗他了。

欧阳钦同志顾全大局的思想，给全省各级干部带出了一个好作风。众所周知，黑龙江是个“原”字号省份，每年都要调出大批原粮、原木、原油、原煤。当地有人计算过，哈尔滨火车站，每5分钟就通过一车皮“原”字号的物资调往全国各地。原材料调出的多，但日用工业品调进的少，有些同志有怨言，认为这些原材料不如就地加工合算。欧阳钦同志总是按国家要求，如数调出。当然，他也实事求是地多次向上边反映省里的困难，要求煤炭能少调出一点，以保证省里的需要。

如在 1961 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我省每年向国家调出大批物资，但省里煤炭不足，基础设施差，人民群众生活欠账多（指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一些学校学生的脚冻伤了，连墨水都冻了，希望中央考虑黑龙江的情况。他就是这样，一方面如实反映情况，一方面服从国家下达的调拨任务。

1957 年，第二松花江涨大水，位于吉林的小丰满水库蓄水过多，根据国家气象局的分析和中央的统一部署，放出了一部分水。这样一来，几天之内，松花江水猛涨，哈尔滨市受到威胁。欧阳钦同志心急如焚，每天都开会研究防汛问题，并多次亲自到大堤上察看水情，日夜组织抗洪。有人提出一个疑问：“是不是有坏人在小丰满搞鬼？”欧阳钦同志说：“不能没有根据乱猜疑，小丰满是国家重点电站，要保住，这是应该的。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总不能说小丰满领导人有问题、不可靠吧？”由于全省军民奋起抗洪，松花江大堤加固了，哈尔滨保住了，小丰满泄洪也未受影响。他这种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的思想，已成为黑龙江省的典范。人们怀念他，一致赞扬他这一高风亮节。

坚定的原则性 坚强的组织性

欧阳钦同志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对党的工作抓的很紧。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要有原则性、组织性、纪律性。在这方面，欧阳钦同志从自身做起，言传身教，这是全省各级干部公认的。

1955 年元旦，欧阳钦同志有一篇讲话，作为省报元旦献词，反映很好。这篇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政治性、原则性、组织性、纪律性，要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充分地表现出来，绝不要容忍无原则无纪律的事情存在。一定要防止和克服任何哪怕是细小的无原则无纪律的因素或倾向的产生。他自己就是原则上坚定性的典范，特别是当一股

风吹来的时候，他很注意辨别风向，站得稳，不摇摆。

1958年的大跃进，使一些同志的头脑发热了，吹牛、浮夸代替了求实和科学精神，各地纷纷“放卫星”，每天都有“奇迹”出现。当时，徐水“放卫星”最多，还有“安国天下第一田”，“范县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面对这种形势，黑龙江上上下下议论很多，一些同志指责省委“太右”，说黑龙江工作太死板，进步太慢，跟不上一日千里的跃进速度。为了“在省委领导同志头上击一猛掌”，有人请徐水、安国的同志来“传经送宝”。我接到有关部门请欧阳钦同志出席“经验”报告会的电话，便向欧阳钦同志作了汇报，他听了之后非常恼火，发了大脾气，气愤地说：“什么徐水、安国经验，徐水、安国是他们的爹，非得听他的？粮食生产是科学，有其自然规律，产量不是无限的，怎么能想产多少就产多少，怎么能天天放卫星？告诉他们，我不去听！”由于黑龙江粮食始终没放卫星，省里主管粮食的同志在西安一次会议上受到上面的批评，回来后，欧阳钦同志安慰这位同志，并肯定他在原则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欧阳钦同志说：“现在人们头脑热得疯颠颠了。”他对上面给各省插红旗、拔白旗，根本不在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欧阳钦担任第六小组组长，在讨论形势和任务时，欧阳钦同志说：共产风虽然刮的时间不长，但很危险。人们误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失收的损失占10-20%，以致有些地方发生浮肿、夏荒。他尖锐地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增产无限论”。他说：难道没有胆子地就不打粮食了。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黑龙江肇源县为了表现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县政府给全县每个农民发了一把牙刷、一筒牙膏，实行供给制。欧阳钦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坚决反对，他说：“全国5亿农民，每人都发一套牙具，谁供得起？就是把商店牙刷、牙膏都拿出来，也不够用。”他对大办集体食堂让农民都到食堂吃饭，也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一搞，非造成浪

费不可。他说：“中国人一向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怎么能一下子来个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呢？这不是搞浪费吗？”

在那个年代里，这股风，那股风经常刮来，但欧阳钦同志从不随风跑。坚定的原则性，使他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于抵制各种歪风，这是全省公认的，他的这种品质博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坚强的组织性，是欧阳钦同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对上，有意见敢讲，但中央一经决定，坚决执行。他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尊重，坚决按他们的指示领导全省工作，并且能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实质，很少盲目性。国务院有的部、委打着“中央的旗号”下达任务时，如果不符合中央精神和本省实际，他敢于据理力争，他常说，省委守土有责，上级业务部门的意见，有些是中央领导同志定的，有些意见领导人根本不知道，是小辫子（指小女孩子工作人员）在那里决定的，该反映的我们要如实说明。比如：上边给省林业部门下达了采伐木材的高指标，欧阳钦同志找到国务院有关领导说：“森林应该有计划采伐，一下子砍光了行吗？这不是竭泽而渔吗？”他的这种坚定的原则性和坚强的组织性是一致的，这是他作为一个领导者坚强的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他的这种高贵品质至今仍然萦绕在我的脑际，常使我对他产生敬意。

思、农、工、林及其他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非常重视党的工作，重视抓思想政治工作。工作方法既原则，又具体。早在1954年刚合省不久，他在干部会上就提出：“提高思想，改进作风，是保证完成我们各项工作任务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是：永远前进，而不停滞；永远向前看，而不向后看；永远保持整体观念，而不是分散主义、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永远谦虚、学习，而不骄傲、虚夸、自满；永远保持应有的高度的政

治警惕，而绝不麻痹。”

当时，在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一一种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1955年，在一次有县委书记和企业党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列举了城乡忽视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损失的大量具体事例，阐述宣传工作、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不抓思想教育的危害性，他讲得深入浅出，大家受到很大启发。因为人们很少听到这样好的重要报告，都赞不绝口，认为讲得“解渴”，震动大。会后人们纷纷说：“宣传部长告一状，省委书记打一棒。”意思是说，有些宣传部长把某些党组织负责人不重视宣传工作，不抓思想教育的情况向欧阳钦同志汇报了，欧阳钦发了火，狠狠批评了某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失职行为。并说，这一棒可打清醒了。这些话一直传颂多年。谁一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人提起欧阳钦那次讲话来警告。

欧阳钦同志重视思想工作还表现在他对报纸工作十分重视，他说“党报是党手中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每天都认真地阅读当天的报纸，发现问题，都及时让秘书给报社打电话。他经常主持撰写一些重要社论，对省报一些重要稿件细心审阅。1954年合省的社论，就是他亲自主持写的，在全省起了很好的作用。

群众在想什么，思想动向如何？他很注意。他经常到工厂、农村作调查，倾听群众的反映、群众对形势的评价。1958年4月，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一届八次全委会议上，欧阳钦同志提出，省委及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并提出省委工作的摆法是“思、农、工、林及其他”。这个摆法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这个工作次序及其指导思想在全省各级党的工作中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1961年，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有些争论，

有人说人民内部有矛盾，但没有阶级斗争了，也有人说人民内部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各种议论相持不下。为了澄清这些认识，欧阳钦同志作了《关于对阶级斗争的若干认识问题》的讲话，有理有据地阐述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问题，针对性很强。此文发表后，中央有的领导同志认为很有分量，并在《统战工作》上刊登。

其势汹汹 其心融融

人们乍一和欧阳钦同志接触，都觉得他很严肃，批评人也很严厉，有时使人受不了，下不来台。但时间长了，人们却又觉得他待人很温暖，很愿意接近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同志从不记仇、不算总帐，也从不整人。他对省里一些负责同志，发现问题，毫不留情，当面批评，但批评完就拉倒，不记在心里。当时省委有一个副部长，对省委有意见，但当面不说，背地里却发牢骚。欧阳钦知道后，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这种自由主义的现象，批评得十分尖锐、深刻。过后，有一天，欧阳钦让我通知主管这个部的省委书记来谈工作，这位书记说：“我正在开会，让 xxx 作检讨呢。”我将此事报告了欧阳钦同志，他却说：“还检讨什么，批评了，他认识到了，就完了。对干部要算零帐，以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不要算总账。”大家都认为，欧阳钦同志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心胸开阔，能够容人。

1962 年，省委、省政府一些领导同志到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各省都开了民主生活会，大家畅所欲言，真诚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黑龙江省委开会时，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说：“欧阳钦同志今后应注意批评人的方式方法，你批评人很凶，有时使人接受不了。你对干部算小帐、算零帐，不算总帐，不背地整人，使干部感到工作起来没有后顾之忧，既感到你严肃，又感到你很亲切，你是其势汹汹，其心融融啊。”

欧阳钦同志很注意抓大政方针，很少陷入繁杂的事务之中。工作中，他放手让大家去干，几个省委书记、常委按行业分工，形成“九牛爬坡各个出力”的工作局面。对别人分管的工作，他从不揽权、也不瞎指挥，也从不挑剔、乱指责。有人说，征购粮搞过头了，是主管书记的责任。欧阳钦同志说：“对、错都不是哪个人的责任，这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他特别注意保护工作上有干劲的干部，必要时替这些同志担担子，因而他的同级、下级干部都能放手大胆地工作，毫无顾忌。省委书记们跟他合作，普遍感到很融洽，能够团结共事，心情舒畅，由于没有后顾之忧，工作起来都很卖力气。

关心、体贴、爱护身边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欧阳钦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事例也很多。他对秘书要求很严，有时批评也很尖锐，但又非常爱护。1959年，庐山会议开了50天，会议期间我负责写小组会简报，每天都很紧张。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会后回到省里，组织上安排他到太阳岛休息几天，他让我跟他一起去。当时安排他吃小灶，我便到大食堂去了。他硬是把我叫到他那里一块吃。我说，我吃大食堂就行了。他说：“你还是和我一块吃吧，你这一段也很累，整天整理记录、出简报，身体累瘦了，跟我一块吃，恢复恢复吧。”我既感到很不好意思，又感到很温暖。当时的情景至今我常常想起，每当想及此事，都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怀念。

以上这些，仅仅是我跟随欧阳钦同志工作期间大量事例中很小一部分。欧阳钦同志对黑龙江的贡献不可磨灭，他的党性、他的思想、他的作风、他的为人，他的高贵品质、对党、对人民的忠诚，都是令人钦佩的。他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领导同志，使我永生不忘。时间离的越远，我对他的怀念越深。

忠厚的长者 坦诚的知己

强晓初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他那大无畏革命精神、忠于党和人民的思想品德、襟怀坦诚的作风，时时激励着我们。

1978 年，在悼念欧阳钦同志逝世的悲痛日子里，我曾写了一首小诗表达对他诚挚的哀悼和怀念：

哀君难抑泪沾胸，
踵接征程西复东。
莘莘大端济辈少，
铮铮硬骨几人同？
延河宝塔知甘苦，
黑水白山历雪风。
一响惊雷除四害，
忠魂应慰九州红。

1988 年，在欧阳钦同志逝世 10 周年之际，我同黄火青、张树德同志一起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回顾了欧阳钦同志的革命经历和主要业绩，表达了我们对他的敬重和怀念。这里，从我个人同欧阳钦同志一起工作的角度，写一些点滴的感受和印象。

大事不放过 小事不计较

在 1954 年黑龙江合省后我同他接触中，深深感到，他对大事能抓得住，对小事能放得开；对问题看重主流，不以偏概全。合省后第一件大事是如何把原黑龙江和松江两省及哈尔滨市的干部团结起来共同前进。虽然正式合省前，原两省一市都为迎接合省进行了思想动员，但为了把工作做到家，欧阳钦同志宁可把其他不急迫的事情甩开，聚精会神地主持起草了题为《团结一致 奋勇前进》的省报“八·一”重要社论。由于社论是经过新省委民主讨论通过的，表达了大家的意愿，所以一经发表，便受到原两省一市干部的共同拥护，调动了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做好新省工作的积极性。

第二件大事，是如何看待新的省情？当时对全省工作如何摆法？到底是以农村为主还是以城市为主？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业为主或工农兼顾？其说不一。针对这种情况，在一次省委会上，欧阳钦同志在和省委其他书记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十分明确地指出：黑龙江是新兴的工业地区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这就是黑龙江的省情和主要特点。在省委第二次全会上欧阳钦同志以此为主题作了报告，从而把全省同志思想统一了起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抓好农、林业的同时，大力支援工业建设。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黑龙江省又出现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与副业之间的不平衡。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省委进行了研究，提出要补长农业、轻工业、副业这三条短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协调全省经济建设，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三件大事，是摆正黑龙江省在全国的地位。他十分强调，要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摆在全国一盘棋上来考虑问题。不论在征购粮问题上还是在上调其他工业产品问题上，他总是强调要全国一盘棋，要求同志们“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树立全局观点，

反对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他曾批评当时在征购粮中叫困难的同志：“不要光做农民议员，要做人民代表。”

欧阳钦同志在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工作重点、主流总是明确的，他一贯强调的“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成为黑龙江省对待国家全局的一条工作方针。他非常注重国家在省内的重点生产单位。1958年王震同志率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欧阳钦同志十分欢迎，并热情地给以支持。对有的同志反映垦荒中的一些问题，他总是强调，“要看主流，开发北大荒是件大事，不要太计较小问题，把北大荒开发起来，我们就应给领导垦荒者立碑”。1959年，中央决定进行大庆石油会战。他主持省委开会讨论多次，并提出“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方针，又决定由我（常务书记）和李剑白（书记处书记）组成支援石油会战小组，授权必须做好这项工作，省委还决定把红色草原牧场划归油田。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全省根据省委的方针，节衣缩食，在粮、菜方面和车辆、帐篷、木材、建筑材料、机电工人等方面源源不断地支援了油田，还组织了多次慰问和文艺演出。欧阳钦同志作为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还通过协作区关系，为油田会战从辽宁、吉林抽调了压道机等急需物资。以余秋里同志为首的石油部负责同志和指挥部同志对省委给予的一切支援，特别对欧阳钦同志提出的“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甚表满意。

欧阳钦同志多次强调：“东北是在全国支援下发展起来的，我们东北有责任支援全国”。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赞扬。

历史地全面地看干部不分亲论疏

领导干部的领导艺术，在于首先决定政策，其次用好干部，正确的执行政策。欧阳钦同志可说在这两方面是掌握自如的领导者。我认为他在掌握干部政策、处理干部问题上，有五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

特点是他能把各方面的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本地干部、外来干部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合作共事。他经常强调要搞好“五湖四海”，不搞“拍肩膀”、拉拉扯扯，不搞小圈子。第二个特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说“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批评自我批评的关系”。他对干部鼓励多于批评，或者如他所说的“寓批评于表扬之中”。他对领导干部或一般干部都一视同仁，不管谁有了错误，都不留情面地进行批评，但是批评的目的是让被批评者改正错误，是真正爱护干部。有时他对干部批评很严厉甚至使人下不了台，可是批评过后，仍然照常对待。了解他的同志们说：“老头刚中有柔，批评人气势汹汹，但是其心融融，批评缺点，不忘优点，批评后照常使用，该提拔的照样提拔。”有一位老秘书，因在工作中出了点差错，被他批评的快要哭了，但是在一次党代会前，他却提名这位秘书为省委委员候选人。第三个特点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干部，不以一时一事做定论。记得在1955年，黑龙江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贯彻全国党代表会议精神，肃清高饶反党联盟影响。在会上，有些合省后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指责这个是高岗安的钉子，那个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要把这些同志作为靶子批斗，然后撤下来。我当时就是被指名批判的重点之一。欧阳钦同志为了维护新省委核心的团结和稳定，顶住了压力，没有理会有人给他戴上的“压制民主”的帽子，一再强调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对已经做了自我批评的同志不能揪住不放，绝不能扩大打击面。他对于部的这种冷静慎重的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正确的。第四个特点是他重视真话，反对说假话。他要求干部说到做到，不要说过头话。“大跃进”期间，他对各地大放“卫星”很反感，认为这是欺骗中央，不可效仿。他很赞赏邓小平同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指示。我在领会他的这些思想之后，在一次松花江地委（我兼第一书记）电话

会上强调不可放假“卫星”，要老老实实，不能一看到人家放“卫星”就坐不住，制造假“卫星”来放。我们规定一条，有真的“卫星”就放，没有就不放，如果放了假“卫星”，就是欺骗党，要开除党籍。事后，有些人说我太厉害了。我立即向欧阳钦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就应厉害一些，把歪风压一压。”他的一番话，解除了我的顾虑。“大跃进”期间，欧阳钦同志发现个别县搞供给制和男女分居，立即进行了纠正。肇源县一位负责同志在全县实行供给制，还提出想用百斤谷子种一亩地，又说全县“水产要赶上日本”。松花江地委对他进行了批评。欧阳钦同志对地委的作法及时给予了支持。

大概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两个月，彭德怀同志到哈尔滨了解情况，我和哈尔滨市委书记、市长吕其恩同志，向他谈了“大跃进”中的很多问题，如“劳民伤财”，“小资产疯狂”，大炼钢铁和轴承化是“得不偿失”等等，事后向欧阳钦同志做了汇报，欧阳钦同志说要注意看大方向。庐山会议彭总受到批判，我心里非常不安，估计少不了我是省内的靶子，可是欧阳钦同志回来后，源源本本传达了中央精神，强调从中吸取教训，并没有追究以上问题。很显然欧阳钦同志对批彭是有看法的。

记得在“大跃进”过程中，哈尔滨市党代表会新选出的市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邀请欧阳钦同志讲话。欧阳钦同志说自己有别的事不能去讲话，指定要我去讲。当时我对哈尔滨市过热的风气有些看法，所以向欧阳钦同志说，要我去讲，我就讲“轰轰烈烈有余，扎扎实实不足”，他明确支持我讲这个题目，说：“应该给他们泼点凉水”。

第五个特点是在关键时期，承担责任，保护干部。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不少基层同志认为省里征了过头粮，指名批评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欧阳钦同志毅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说“不是他过头，而是我过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中，他从不谗

过于人，总是毫不含糊的回答造反派：“工作中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第一书记，不要找其他同志。”所以很多同志都把他看成是无私无畏的楷模和可敬的忠厚长者。

看事不看人不唯上

欧阳钦同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讲真理不讲面子，刚直不阿，堪称“铮铮硬骨，耿耿丹心”。1958年他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指责张春桥所谓反对“条件论”的文章是鼓吹唯心论；对批判《海瑞罢官》表示“以后谁还敢研究历史？”认为“文革”中打倒老干部，孤立了毛主席。“文革”中，不管造反派对他如何批斗，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也不同意把别的同志打成“走资派”。

对中央领导同志，欧阳钦一贯光明磊落，从不表现唯上，主张不要前呼后拥，他说：对领导同志“恭敬不如从命”。1958年邓小平、李富春、李雪峰、杨尚昆、刘澜涛等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到黑龙江视察，先坐飞机到齐齐哈尔降落，欧阳钦同志按照这些领导同志事先的招呼，没有去迎接，只派我去接待，要我全权负责。在视察富拉尔基、一二七军工厂、机床厂和碾子山军工厂过程中，我每天晚上向他汇报一次，他每次都强调要搞好安全工作，至于视察哪些单位由领导同志选择。只是到了哈尔滨他才亲自陪同看了几个单位。过去周恩来总理每年总要到东北视察两次，欧阳钦同志也是按照总理的招呼，没有到车站或机场迎接过，而是由主持常务工作的书记负责安排。事实证明由少数人接送比前呼后拥更安全一些，也是党的优良传统的体现。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第一次视察林区，欧阳钦同志自己也没有围前围后，而是由主管林区的书记李范五同志陪同视察。用欧阳钦同志的话说：要讲求实效，不务虚名，主管的同志陪同领导同志视察，汇报情况和听取指示，都会更直接一些，比第一书记包办要好一些。他在工作中对中央部门的意见很重视，但不是唯命是听，一切照办，

而是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从省情出发，常说“我们守土有责”。有的同志不赞成他的意见，说部里说的如何如何，他说“要以是非对待，不能以部压省”。1958年“大跃进”时，中央分管农业的负责同志给东北三省第一书记发来电报，批评东北水利化和深翻搞得不够劲，他收到电报后去尚志县视察，当听到县委书记汇报搞深翻地中的一些过火行动时，当即批评了县委不能这样搞，说“你尚志要有志，要实事求是，这样搞不行。”

不以权谋私 高风亮节

欧阳钦同志一贯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他从不以权谋私，不占公家的便宜，就是外宾赠送的礼品，也是或者交公展览，或者给周围同志所用。

他在旅大任市委书记时，因当时旅大有苏军驻扎，外事活动较多，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当时最好最大的吉斯牌汽车，调往哈尔滨时，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把吉斯车带去，秘书认为带去不好，向欧阳钦同志反映后，欧阳钦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带，刚到哈尔滨时乘坐的是最小的胜利牌汽车，他对此毫无意见。

在黑龙江省工作时，他家里和家乡来人要求安排工作，他都劝说回去。来人吃住费用及回程旅费都由自己负责，不要公家接待，不用一文公款，公私非常分明。

欧阳钦唯一的儿子欧阳湘，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捍卫真理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过两年多，他才知道了被害致死的情由，他虽然非常愤慨、激动，但在爱人黄葳同志指出当时的处境时，他终于平静下来，没有流泪。他知道“文革”中的受害者不仅仅是自己的儿子，全党全国不知牺牲了多少领导者和好干部、好同志。真是公而无私，正气凛然。

在“文化大革命”中潘复生等人炮制的“东北新曙光”反动社论，

提出“打倒欧阳钦”，欧阳钦同志处之泰然，并表示是非总有一天要分晓。他还很关心东北局机关的运动，对机关各部、委负责同志几乎都被打倒很忧虑。他说：怎么都成了坏人？岂不把书记处几个人孤立起来了么？！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宏大的胸怀。

欧阳钦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革命考验，特别是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欧阳钦同志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那鲜明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形象、高贵的品德和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一片丹心 风范永存

冯纪新 李剑白

我们同欧阳钦同志以前并不相识，只知道他是一位党内老同志，负责旅大的领导工作，相距较远，没有什么印象。但从 1954 年合省（由松江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合并为新黑龙江省）以后，我们都在省委工作，欧阳钦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直接领导我们。虽然中间有过东北协作区，以后又成立新东北局，他也是东北协作区和东北局领导者之一（协作区主任和东北局第二书记），但他仍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一直主持省委工作，直到 1965 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受批判、迫害，我们也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相似的遭遇。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北京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久因病逝世。前后共有 20 多年的相识相处，使我们对欧阳钦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忘的记忆。在他逝世 10 多年后，更使我们珍惜这段共同的经历，回忆起他许多优秀品质，往事历历在目。

1954 年 8 月，我们从齐齐哈尔市来到哈尔滨市，住在颐园街一号的小洋楼里，参加合省的见面会。随后我们就从齐市迁到哈市，同原松江省及哈尔滨市的许多同志相识合作。50 年代建国之初，大家都是老解放区的老作风，相互亲密无间，团结一致。那时候我们还年青，不过 30 多岁，虽有不同的经历和特点，但在欧阳钦同志的领导

下，很快就熟悉起来。从这时开始，欧阳钦同志的领导经验，革命老同志的优秀品质逐渐在我们这些伙伴面前展现出来。我们印象深的就是他非常重视团结干部，在新省建立之际，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经历不同，认识各异，他非常强调团结，重视统一思想，对干部不论来自何方，都一视同仁，大胆使用，很快使大家从变动中安定下来，缩短了合并的纷杂过程，开动了新省的领导机制。

欧阳钦同志是我党建党初期的老干部，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任秘书长，又到南满旅大市委作书记，处理过许多重大的问题，因此他经验非常丰富，我们新的省委同志对他十分尊重。他对各方面干部都是团结、信任、爱护的。合省之初，正处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批判肃清高岗的影响，一些干部出于维护党的团结的愿望，出于对高岗的义愤，对合省前各省某些领导同志有过批评，其中也有过分尖锐或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责难，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新省委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考察了解的，因此，欧阳钦同志仗义执言，耐心细致做工作，平息干部中对新省委成员的过分的意见，保证了合省后干部的团结，新省委很快发挥出领导作用。

新省委成立后，欧阳钦第一件事就是抓团结干部，共同研究新省委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他引导大家分析新的黑龙江省在国家全局下的特点和责任，从而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这是一个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的重要素质，认识环境，认识实际，抓住中心环节，有步骤地对党负责地展开边疆大省的工作。那时我们分别负责农村工作、工业工作，也都在进行对新省工农业特点的研究。对新省的工业、农业的重要地位也各有体会，大家在欧阳钦同志组织下共同研究，统一思想。欧阳钦同志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提出黑龙江省是新兴的工业地区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并就此提出各方面的工作任务。黑龙江省那时不到

1200 万人口，显然是国内人少地多的重要农业省份，对国家上缴粮食数量多，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外调粮食大省，对支援国家五年计划建设，全国粮食调配都起着重要作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解放战争中我党领导下的最大城市，支援解放战争，支援野战军进关南下，渡江追歼残敌，直到解放海南。哈尔滨铁路局在恢复交通、军运、支前，以后到抗美援朝都起过重大作用，在支援战争支援新区的工作中，也发展了自己，特别是由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完成，使黑龙江省成为重要的工业地区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以后又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因而在自己岗位上，在欧阳钦同志组织启发下，注意了对省情的研究，对省内各个重点城市、地区的重要性和特点也都深有印象。在农业上，大家都深感责任重大，条件优越，有过“土肥水足日照长，人强马壮机械多”的提法；在工业上，哈市就有三大动力，十大军工，全省机械工业更是门类齐全；论城市则数“哈、齐、牡、佳、鸡、鸭、伊、鹤”等，都有一套共同的语言。这些都是欧阳钦同志领导省委总揽全局，认识环境，统一思想的成果，现在看来当然是很初步的，但当时我们很年轻，在领导经验上无疑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这以后，无论自己分工哪个方面的工作，考虑问题都注意从全局出发，注意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总揽全局，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

合省后，欧阳钦对省内的工业建设非常重视，他提出要把支援重点工程的建设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对属于 156 项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他时常亲自过问，专题讨论。当时省委里懂工业基本建设的同志很多，中央又从全国各地选拔不少负责干部，调给黑龙江加强各大工厂企业的领导，黑龙江工业建设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兴旺景象。

合省之初，省内农业有些灾情，各地同志对于征购粮食任务感到沉重，纷纷提出困难。欧阳钦同志了解全国建设的迫切需要，坚持说

服大家，“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这些指导思想，成为以后历届省委服从大局的优良传统，坚持宁肯本省多克服困难，也要尽力满足国家建设需要。

欧阳钦有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对黑龙江省林业十分关心。当时东北除吉林长白山林区、内蒙牙克石以北林区一部分外，国家主要依靠黑龙江林区发挥主力作用。记得有一次，省委在讨论林区采伐方式时，对于“皆伐”与“择伐”发生了很尖锐的争论。负责林业工作的领导同志主张推广当时苏联实行的大面积皆伐或是“带状皆伐”（即在一片林区中剃光头式的全部砍光，后来苏联不久也改变了这种采伐方式），理由是便于集材又可以成片造林，同时成熟。一部分同志力主“择伐”，即只采大树，留下中小树可以继续生长，只是集材稍有困难，伐木集材时难免破坏不少中小幼林，但是更新较容易，可保持资源继续生长。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当时林业中普遍是以采伐为主，忽视造林。只采不育，资源消耗速度很快。欧阳钦同意多数同志意见，反对剃光头式的过量采伐，尖锐地指出：我们要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现在松花江水都比过去混了，说明山林采伐过度，我们如不重视，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他的这些主张后来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中央提出保持“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方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有扭转重采轻育。采育脱节，过量采伐，现已造成小兴安岭伊春林区资源与经济的危困。回想起来更感到欧阳钦是有远见的，是敢于负责的，是他大声疾呼要保护森林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

欧阳钦十分重视对我省大庆油田的建设，1959年他亲自到安达大同镇，祝贺第一口油井出油并且作决定，要地方对油田全力以赴，全力支援。在他的倡议下，省委决定成立以强晓初同志任组长，李剑白同志任副组长的支援小组，支援大庆建设。组织省政府各主管部门

修公路，调熟练机械工匠等进行支援，并将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曲长川同志调任安达市委书记，组织当地各方面力量支援油田。大庆油田现今已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在大庆人的伟大事业中也有欧阳钦同志的辛苦和甘甜。

1958年，农垦部长王震将军率领全国10万转业官兵，到黑龙江省开荒办农场，在完达山下三江平原一带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荒先后达700多万亩，建设了一片大农场群。并连同以前开发的嫩江上游、绥化、大庆与北安一带，为黑龙江省农场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黑龙江省以至全国农垦十分重要的基地，对国家作了巨大的贡献。欧阳钦对农垦开发北大荒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援，他多次赞美老一辈将军、干部、战士的丰功伟绩，动员地方政府对农垦作大力支援，并多次向中央报告农垦成绩并在省内传播农垦经验。他经常赞扬10万官兵的贡献，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应当为他们树立历史丰碑。

欧阳钦很重视黑龙江省是祖国的北部边境这一特点，他多次在省委会议上指出，我省是祖国北部边境，省委对国家负有重任，他常讲省委“守土有责”，他经常巡视边界一带，亲自到黑河了解形势。发现内地与边境建设不平衡，许多方面都存在困难，他嘱咐黑河地委领导要建设好边疆，指出对岸海兰泡市已建设成为相当发达的城市，黑河也要努力建设，做到“门当户对”。结果这个口号在“文革”中被歪曲，被错误批判。省委领导重视边疆建设，努力建设自己的边城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支持黑河，调整区划，经过国务院批准，把北安与嫩江两县划归黑河，支援边疆经济发展，为黑河建成边疆重镇创造了条件。在当时全国提倡中苏友好的大形势下，发展同苏联远东地区的友好往来，进行小额边贸，稳定了边境形势，创造了友好气氛，打下两岸人民群众友好的思想基础，以利于建设。以后虽然两国关系发生

曲折，至今两岸人民间友好的基础，仍然可以从交往中感到其影响。回忆这些往事，加深了我们对欧阳钦在黑龙江建设历史上的努力开拓、远见卓识的光辉形象。

三

重视思想工作，重视党对科教文卫等工作的领导，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许多同志回忆中提到欧阳钦同志十分重视思想工作，他主张的“思、农、工、林及其他”的领导工作次序的提法，曾受到毛主席的赞赏。说明他在领导上是全面的，是善于摆正各方面工作关系的，不仅重视经济建设而且注意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党的优良作风。他是省委的第一把手，同时在韩光同志调进北京工作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又兼任过省长职务，在纷繁复杂的工农林业建设事业中，他始终重视思想工作，经常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当时黑龙江省正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地区之一，许多工厂企业正在建设，从全国各地调来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而且国家又在这里办起工业大学、军工学院，所以黑龙江省从整体文化水平上与国内相比，当时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不落后的，但黑龙江地处边疆，历史上文化并不发达，比较起来理工等方面人才较多，而文、史、哲、经等社会科学及文化艺术人才相比之下显得薄弱，欧阳钦主张要努力创造条件把这方面补强起来，早作安排，使边疆文化比较协调的发展。他曾提出要把黑龙江建成“文风鼎盛、文艺繁荣”的地方，在他的倡导支持下，当时主管思想战线的省委领导同志和负责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为此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了加强教育科学文化，我省曾几次到关内招聘大批人才，争取北京、上海等地支援。王一伦、刘达等同志还开始着手黑龙江大学的创办工作。以后，欧阳钦对理论研究、科研建设、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方面，提出很多指导性意见。几十年

的努力，为我省今天的社会科学、文史哲经、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些工作还步入了先进行列。欧阳钦同志对报纸、文艺、卫生、体育倾注了很多心血。当时欧阳钦年纪较大、身体不强，但他亲自组织为党报写社论。为坚决消灭克山病，他还专门在省委讨论建立克山病研究所，与专家一起开会研究防治地方病。为了丰富文化活动，他甚至与省委全体成员一起审查新剧目。

四

坚定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而灵活地从地区特点出发，认真执行中央倡导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在长期与欧阳钦共同工作中感受到的又一深刻印象。

欧阳钦是我党老一代革命领导同志，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经历过无数次胜利与失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对中央政治决策坚决贯彻执行，把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变成黑龙江省革命建设的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领导艺术。他反对不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从实际出发的赶浪头的领导作风。当然在一股强烈地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思潮下，由于认识不清，出于主观上良好愿望，谁也难免不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但在当时黑龙江省委书记处的成员中，欧阳钦比我们成熟的多，他遵守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党的领导威信。他对中央决定在执行中从未流露任何的犹豫和迟缓。但对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冲击，认识敏锐，抵制非常坚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的日子里，中央在各地连续召开工作会议，当时流传的主观主义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省委一些部门以及市、地、县委的同志有些坐不住了。那时关内出了一时红得发紫的典型，不少同志纷纷跑去参观学习，有的同志还提出要省委组织大批干部学习，欧阳钦对这种随风跑的苗头十分不满，坚决制止。后来事实证明，那种传闻

水稻高产密植得惊人，水稻穗上都可以托住小孩的典型，都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弄虚作假的歪风。大炼钢铁的风刮来后，我省一些大学甚至机关后院也炼起钢铁来，有人要拆下市内许多建筑围墙上的铁制围栏去作炼铁原料，欧阳钦坚决反对。在炼铁和秋收发生矛盾时，欧阳钦的主张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讲铁矿石在山上，晚一点炼也还在那里，烂不了。农民一年辛苦的丰收果实不及时收割，就会烂在地里，要全力以赴抢收下来。丢下农业丢下正常生产去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什么炼钢、放卫星、深挖地，都完全是空谈。当然那时黑龙江省受到外部压力不小，下边都着急为什么我们就放不出“卫星”来（即出不了全国表扬的新作法新经验），欧阳钦自己也受过某些部门相当严厉的批评。但他反对乱刮风，反对下边随便赶风头随风跑，因而虽然黑龙江在大跃进中也做了不少过“左”的事情，后来大家在1962年全国召开七千人大会上开展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黑龙江省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但因为欧阳钦同志实事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的坚决态度，我们还是减轻了一些损失。后来，中央领导同志来我省检查总结这段工作时，对我省某些工作过“左”的情况，虽也有耐心帮助、纠正和批评，但对有些方面因为省委坚持实事求是，损失较小，还是满意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欧阳钦的身心受到摧残，开始他自己拖着病弱的身躯住在医院里，后来幸亏有周总理的保护才免遭了“群众”的批斗围攻，他曾被送到偏僻县城的工厂接受管制，一些搞专案的人长期多次要他认罪交代，后来公开告诉他：想要得到解放和结合，就得承认是走资派。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他曾对他的亲人讲：我是黑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东北地区的重要领导者，我无权偏离实际，迎合造反派的要求，如果我成了走资派，那岂不把黑龙江省整个领导班子，以及我领导的各方面的领导同志们都推上错

误难堪的境地？我拒绝造反派提出的这个条件，就是给他们想全盘否定黑龙江省委领导这段历史的企图造成最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非逼我跳这个火坑不可，那也没办法，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坚定精神，在他一生最后一次考验中，又一次对我们这些老同志显示了他光辉的高大形象，他不愧为我们的好班长。

欧阳钦同志热爱黑龙江，但他未能实现要再一次看看这片土地的愿望。欧阳钦同志逝世 10 多年了，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欧阳钦同志在黑龙江这块土地上的辛劳和足迹，他热爱黑龙江，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生前的革命风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青年一代应该从中不断汲取营养和教益，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欧阳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任仲夷

我是在 1948 年下半年认识欧阳钦同志的。那时，我还在旅大工作。当时根据中苏友好条约，旅大驻有苏联红军，并对该地区实行军管，我党组织在社会上暂不公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旅大的领导，特派欧阳钦到旅大任地委书记。1949 年春，党中央决定旅大地委改为旅大区党委。同时，苏军解放旅大后成立的政权机关——关东公署改为旅大行政公署，并由副书记韩光同志兼任主任。从此，旅大党组织开始了公开活动。1950 年，经中央决定，又将旅大区党委改为旅大市委，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政府。市委书记和市长仍由欧阳钦与韩光分别担任，郭述申同志任市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欧阳钦到旅大担任领导工作后，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在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增进地方与苏联驻军的友谊方面，成绩尤为显著。旅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面貌。

我在旅大和欧阳钦一起工作了四年多。在他的领导下，我感到工作是顺利的，心情是舒畅的。1952 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调我到松江省委工作。在我离开旅大，赶赴松江省的前一天，欧阳钦曾到我家为我送行，并且讲了许多鼓励和惜别的话。他对我的深情厚谊，使我永远难以忘记。次日清晨，当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候，郭述申同志忽然气喘吁吁地赶到站台来，和我握手告别，依依之情，感人至深。

我在松江省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夏天，党中央决定，哈尔滨改为中央直辖市，党组织又调我到哈尔滨市委工作。1954年夏，中央决定将黑龙江、松江、哈尔滨两省一市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省会定在哈尔滨。说来也巧，这次合省，中央决定欧阳钦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我在哈尔滨任市委第二书记，合省后不久，我任省委常委，以后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这样，我就有机会在欧阳钦的领导下工作了10多年。

我和欧阳钦共同工作十六七年的过程中，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很高，组织性、原则性很强。在工作领导上，他非常注意掌握大方向和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善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团结干部，并能认真执行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因此，无论在旅大还是黑龙江，他在广大干部中都享有崇高的威信。

现在，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一些片断的回忆，以表达我对欧阳钦同志的崇敬与怀念。

欧阳钦到旅大任职之前，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对于旅大由苏联驻军实行军管，思想上有些不通，甚至抱着抵触情绪。因而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地方党、政、警、民与苏联驻军的关系上，常常发生一些问题。在如何根据旅大当时的条件和特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以及如何发动和依靠群众等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歧，甚至有些同志对旅大地委前几年的工作，抱有不满意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旅大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对旅大工作不利，而且会影响支援解放战争等全局性的工作。欧阳钦到旅大以后，根据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和他对旅大实际情况的了解，首先肯定了旅大前几年的工作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等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尤其在支援前线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还根据干部中存在的模糊思想和错误认识，进

一步分析了当时旅大地区的特点，指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强调要在这一特点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并要注意搞好与苏联驻军的关系。他强调搞好和苏军的关系，不单纯是旅大一个地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问题。欧阳钦采取以理服人的办法，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纠正了少数干部的所谓“以苏为主”就是“以我为奴”的错误认识，从而统一了干部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

对于旅大地区的工作，欧阳钦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联系旅大实际，明确的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方针，作为旅大党组织和旅大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旅大地区的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1954年，欧阳钦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后，在建立省委新的领导班子过程中，强调“五湖四海”，团结为重，在不长的时间内，使省委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于黑龙江省的工作，当时存在着以农业为重点还是工、农业并重两种不同的意见。经过省委认真的研究、讨论，最后决定采取以工农业并重的方针。欧阳钦当时是坚决主张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的。他指出黑龙江省是新兴的工业地区，重点建设很多，又是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忽视了哪一方面都会犯重大的错误。后来的实践证明，采取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对于黑龙江省来说，是完全符合实际和完全正确的。

1955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欧阳钦提出：哈尔滨党组织应当把“出机器、出经验、出干部、出技术工人”做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哈尔滨作为一个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四出”方针的提出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的。哈尔滨市的全体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多年来，在这一方针的鼓励和鼓舞下，努力奋斗，为党和国家作出了贡献。

欧阳钦非常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生活。特别在 60 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在工作中，即考虑国家利益，又十分关心群众利益。对农村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的征购工作，他在强调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强调必须为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想，并指出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如在收购生猪问题上，有关部门的主张是，每向农民收购一头猪，只给农民留下一只腿（即四分之一），而欧阳钦则极力主张每向农民收购一头猪，应当给农民留一头自己食用，即购一留一的政策，以调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这在当时经济困难而国家对生猪又实行统一收购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同志深入黑龙江农村进行调查后，反映农民对国家收购生猪的思想情绪是：“你让我多吃，我也让你多吃；你让我少吃，我也让你少吃；你不让我吃，我也不让你吃。”欧阳钦非常赞成王从吾的意见。他说：“我们号召农民养猪，到头来他们却吃不到一点猪肉，怎能有养猪的积极性呢？！”

在同一时期，哈尔滨市为了解决市场副食品供应不足的困难，曾于 1962 年试行开放自由市场。采取这一措施后，平日根本看不到的蔬菜、肉、蛋、鱼、虾等副食品，魔术般的出现了，而且品种愈来愈多。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民都抱着高兴的心情到自由市场去买卖。前者为生活上能够得到一些方便而感到满意；后者因为把少量的农副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可以换得一些零用钱而感到高兴。欧阳钦当时对于开放自由市场的做法是赞成和支持的。但是，由于有关上级领导部门不允许在大、中城市开放自由市场，所以好景不长，这一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措施只好停了下来。

60 年代初期，哈尔滨为了解决市场供应的不足和贫苦市民的生活困难，曾主张在城市中开设一些由私人经营的店铺，并允许那些收入低微、生活极为困难的职工，利用星期天和业余时间，走街串巷，

为居民修理各种家用器具，藉以增加收入，并缓解一些人的就业问题。欧阳钦对于这些几全其美的做法，也是完全赞成和支持的。由于他的支持，哈尔滨在那个期间，曾发展了不少私人经营的缝衣、补鞋、修理自行车的单干户、杂货店和小饭铺，从而解决了一部分贫苦市民的生活困难，并满足了群众的部分生活需要。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欧阳钦却因为同意和支持这些本来是正确的做法，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大搞修正主义”的罪名，受到了极端荒谬的批判。

欧阳钦对于新生事物，一向都是热情对待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黑龙江大庆油田的开发与建设，对中国来说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油田的建设规模、装备和技术上，对于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件从未遇到过的新鲜事物，欧阳钦怀着极大的热情，号召黑龙江全省各有关部门、地区、工厂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特别是哈尔滨、齐齐哈尔、绥化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必须做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无条件地、全力以赴地支援大庆油田的建设。大庆油田之所以提前建成和投产，固然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石油部的精心计划、强有力的指挥，和全国各地积极支援的结果，但同时也和欧阳钦及黑龙江省委满腔热情地支持分不开的。“大庆”这个名字，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由欧阳钦提议定下来的。

欧阳钦不仅在重大问题上积极支持新生事物的发展与成长，他对一般的有利于群众的新鲜事物，也同样抱着热情支持的态度。往年每到冬季，黑龙江省每个城市的公园里，都变得冷清清、黑漆漆，无人问津了。自从1962年冬，哈尔滨搞起冰灯游园以后，闻名全省的兆麟公园，每天冒严寒游园观灯者络绎不绝，昼夜不断，高潮期间日达数万人。全市人民奔走相告，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是，省上有的部门，却认为搞冰灯浪费了国家财物，要派人进行检查。欧阳钦闻知后

说，搞冰灯游园是为群众做了一件好事，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部门的意见，在他的支持下，哈尔滨冰灯游园活动才得以坚持下来。现在，哈尔滨一年一度的冰灯游园活动，又有了很大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很多游客，并且把搞冰灯的经验，做为一种专门艺术，推广到了国外。

欧阳钦非常重视和关心干部和群众的学习。他到旅大以后，建立了每周向干部上一次大课的学习报告制度，报告员由市委常委和各部门的负责干部担任。每次做报告时，按干部的水平和工作需要划分两个层次，分别发给红票和蓝票。欧阳钦以身作则，率先向干部上课做报告。他第一次做的报告，记得讲的是如何正确认识旅大的形势、特点和旅大党组织的任务问题。学习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统一干部思想，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60年代初，哈尔滨市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群众学习哲学的活动。欧阳钦同志对于这个学习活动非常重视。1960年冬季的某天清晨，他一早就来到哈尔滨道里区五金商店，参加该店职工的班前学习。他同营业员们一起学习和讨论，并对他们进行鼓励和指导。欧阳钦还多次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经验交流会。他通过这些活动，结识了不少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并和他们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

1960年，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和团市委为了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能收到实效而不流于形式，及时总结了哈尔滨被服工厂的经验，并把该厂的经验概括为“因地、因时、因人制宜、自愿参加、自选内容、自定进度、自找时间”简称为“三因四自”的经验。欧阳钦亲自到被服厂去视察，并接见了该厂著名的学习模范张宝驹同志。他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三因四自”的经验，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一经验在哈尔滨市和黑龙江省推广后，收到了良好效果。1964年，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举行哈尔滨市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展览时，

曾把“三因四自”作为一个重要经验向全国做了介绍。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把推广“三因四自”的经验，做为欧阳钦“反对和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罪行”进行批判，真是荒谬至极！

1989年，我回哈尔滨期间，曾见到当年的学习模范于清贤、魏淑琴、王洪华、吴桂兰、顾仁莲以及当年的全国劳模、老英雄苏广铭等同志，他们都以怀念之情提到欧阳钦同志。他们对于欧阳钦关心青年一代和职工群众的学习，鼓励、爱护先进模范人物的深情，是终生难忘的。

我在欧阳钦领导下和他共同工作的十六七年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在同志之间，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从来不搞吹吹拍拍，拉拉扯扯那一套。无论哪个干部，只要有缺点错误，他都勇于及时提出批评，不讲情面。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又能挺身而出，坚持党的干部政策，保护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吕其恩（前哈尔滨市长）都被打成“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欧阳钦已调回东北局任第二书记。他在“造反派”蛮横无理的逼迫下，仍坚持说，对任仲夷和吕其恩同志也应该一分为二，不能全面否定。1951年，他在旅大时，对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左”的做法也是不同意的。在那次运动中，他坚决反对逼供信，坚决反对不做调查研究，把某些干部生活和作风上的一般缺点、错误扩大化，坚决反对对犯有某些错误的干部进行过火斗争。由于他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才使一批遭受委屈的干部受到保护，得到温暖。据我所知，在黑龙江和旅大，凡和欧阳钦一起工作过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对于他对干部能够及时进行批评与帮助，而且勇于坚持原则，敢于保护干部的精神，无不交口称赞，并且一致认为，这是欧阳钦的一个美德。这种美德，对于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欧阳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为了革命，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欧阳钦已经逝世 10 多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他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楷模

李力安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着他。我同欧阳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然而，他坚强的党性，他的思想、作风和领导艺术却在我脑海中刻下抹灭不了的印象。

1954 年，东北行政区划调整，原松江省、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欧阳钦由旅大市委书记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1960 年底，他担任东北局第二书记，仍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我 1964 年从中共中央组织部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开始同他一起工作，直至 1966 年春他不再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为止。他同我是同事，是战友，更确切地说他是革命前辈，是我的师长，是我学习的榜样，很多事情至今难以忘怀：

欧阳钦同志顾全大局，特别注意维护中央的领导。事关全国全省的方针政策问题，酝酿讨论中他按组织原则积极提意见，一旦中央定下来，他就坚决去贯彻，绝不打折扣。在讨论中央文件的会议以外，在任何其他场合，我从未听说过欧阳钦同志议论中央的事，说有损中央领导的话。黑龙江是产粮省，五、六十年代，每年都要调出粮食几十亿斤，有的年份欠收，省内粮食安排也十分紧张。欧阳钦同志一面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一面顾全大局，坚决完成中央上调任务。同时，带领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安排好人民生活。50 年代末，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源不足的

矛盾。在莽莽草原上要尽快建成一个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困难是非常大的。别的不说，仅用电和成千上万人的食宿就非易事。欧阳钦同志义无反顾，带领省委一班人全力支持，把困难留给自己，尽可能给开发油田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就这样，大庆指挥部和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在地方，在全国的紧密配合支援下，终于使中央的计划提前实现。大庆的成功，也凝结着欧阳钦同志的心血。这种支援大庆的思想，一直保持至今。

欧阳钦同志十分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省委的工作千头万绪，从何入手？他带领省委一班人，明确各项工作的序列是：思、农、工、林及其它。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点给全省的各级领导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报是党的喉舌，他把党报紧紧掌握在省委常委手中。他说，省党报代表省委，省党报的声音就是省委的声音。因此，省委常常根据形势出题目，指定专人写社论。省委工作再忙，重要社论也要安排在常委会上讨论，使党报准确地传达省委的指导思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多次参加过欧阳钦亲自主持讨论省党报社论的常委会。他还多次亲临报社视察、指导工作，慰问职工。这大大地鼓舞了报社干部职工热爱党、热爱本职工作的热情。

欧阳钦同志特别强调全省一盘棋，十分注意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强调省委的领导作用；强调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各自为政。对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央党报的社论他都组织省委认真学习，钻研的很深，很细。他身体不好，下基层较少，但对全省各地情况，他很注意收集。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对全省工作的分析及工作重点。如1965年春节后，他根据中央精神及本省具体情况，提出“新形势、新任务、新作风”，经常委讨论修改后，全省上下都围绕这个精神进行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省委的核心领导非常坚强，工作有始有终。

欧阳钦同志很重视舆论导向，注意引导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5年春节前，我们的经济形势和生产形势恢复得很好，市场上猪肉积压。节前，黑龙江日报为春节写的社论中，仍然号召大家过一个艰苦朴素的春节。欧阳钦知道后，批评报社不看实际情况，理论脱离实际。他提出，应该让大家过一个欢欢乐乐的愉快的新年，有条件的多吃一些肉。为此，他又指定同志改写了社论。

他对理论工作、文艺工作也很重视。黑龙江省委目前仍在出版发行的《奋斗》杂志，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并选派了有较强理论写作水平的同志负责。龙江剧种的开创，剧团的建立，都是在他倡导下办的。现在已为龙江广大人民喜闻乐见，并曾多次进京汇报演出，得到好评。对各剧团上演的剧目、写的剧本等等他都很关心，他还曾严厉批评有些地方不重视文艺工作的倾向。

欧阳钦同志深谙领导艺术，很注意关心、爱护干部。省委的大事如讨论大政方针、党报社论他都亲自主持。日常的工作，一般问题，他常常让第二书记或常务书记主持讨论，或让分管的同志放手去干，让干部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他在关心爱护干部的同时注意严格要求干部。有的干部犯了错误，他绝不讲情面，批评很严厉；但是一旦干部改正了错误之后，他又能够做到不记旧账，一视同仁。关键的时候，他还能够挺身而出，保护干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迫害他，造反派批判他，说他是黑龙江省“头号走资派”，说他执行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坚决不屈服，拒不签字。因此那些人长期不给他做审查结论，不给他安排工作。他就此曾向一些同志说，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即使有缺点，有失误，也不能说是修正主义路线。我是省委第一书记，我如果为了自己一人“过关”，违心地承认自己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那全省几十万干部怎么办！可见他在危难中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省的广大干部，在关键时刻

不丧失原则，这表现了他的坚强的党性。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我们怀念故旧，是为了继承其优秀品德，更好地开创未来。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缅怀前人，倍感任重而道远。欧阳钦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坚强的党性和思想、情操、工作作风仍然激励着我们前进。欧阳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坚持革命原则 讲究领导艺术

陈 雷

我曾经在欧阳钦领导的黑龙江省委领导班子里工作。在那段永远值得怀念的日子，欧阳钦同志的品德，他的领导艺术，他的工作作风，都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受益匪浅。他的一言一行，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欧阳钦同志是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宽广而伟大的胸襟，有统领全局的气魄和能力，有坚定的革命原则性；他的革命实践与工作经验比我们丰富得多。这些，都是在我和他相处十几年中亲身体验到的。他是当时黑龙江省委领导班子中最有威望的人。

现在，我记述欧阳钦同志几件普通而又不寻常的事，以寄托对他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

1954年8月，原黑龙江省、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合并组建成新黑龙江省，中央派欧阳钦同志（时任旅大市委书记）任新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到来之后，首先致力搞好省委“一班人”的团结。他根据班子成员分别来自原黑龙江省、松江省、旅大和哈尔滨市的情况，特别强调大家要互相学习，和衷共济，互相尊重，通力合作，搞好新的黑龙江省的各项事业。他主持起草的合省后《黑龙江日报》的第一篇社论就是《团结起来，奋勇前进》。社论要求全体党员和干

部要团结一致，集中智慧和经验，作好工作。

1955年5月，省委为了统一安排工作，统一思想，统一工作步调，召开党代表会议。本来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明确的，但在讨论清除高岗影响时，有些同志点名批判某人是“高岗安的钉子”，某人是“高岗联盟漏网分子”等，而且情绪相当激烈。欧阳钦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坚定而不动摇地坚持团结的方针，明确指出，不能把1953年已经清理而且作了结论的问题再重新翻出来。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造成刚刚合并不久的省委的分裂，造成不良的后果。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欧阳钦同志有着高度的革命原则性，这种原则性包含着真理和正义，包含着维护党的利益。欧阳钦同志所坚持的团结的方针，得到了省委的一致赞同，从而保证了新的省委领导班子的团结，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二

欧阳钦同志顾全大局的精神，是至今为人们所称道的。欧阳钦作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一生的老革命家，他深知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是千百万革命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全国人民的幸运，保护这个新中国，是每个公民的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是有觉悟的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最高原则。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欧阳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我只说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欧阳钦同志是如何处理自己所管地区与国家的关系的。

1960年冬，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各种物资供应紧张。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上，各省的同志都反映各自的困难，其中要求调入的煤炭量很大，但也都想尽量从自己的地区少调一些物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感到十分难办。后来周总理听说调出调入的矛盾很尖锐，就把我们各省出席会议的同志邀到国务院小会

议室。周总理对我们进行了语重心长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新中国要靠大家来支持，你们打了天下，还要维护这个天下。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克服困难要靠大家。……总理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大家心悦诚服。总理最后要求我们把各自的任务都“背”回去。

我回省之后，向省委汇报了上述过程。欧阳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他教育大家，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顾全大局，这是对每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考验。随后，在他的主持下，省委常委通过了“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总原则，作为省委处理地方与全局关系的准绳。此后，他一直用这一原则精神来教育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三

欧阳钦同志作为红军时的一位老政治工作干部，始终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凡事坚持思想政治工作领先，所以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工作起来生龙活虎，积极性高，工作效果也很好。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合省之后，黑龙江省的幅员面积扩大了，工作又是千头万绪，都要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一时出现了一些忙乱现象，大家都争着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往前排。欧阳钦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安排工作的顺序和步骤，这就是“思、农、工、林及其他”，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把重点放在农业、工业生产上。因为只有把生产搞上去，才能把其他各项工作搞活。思想一通，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大家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哪里会有干部闲来无事看报纸、喝茶水、扯皮的现象呢？由于大家思想觉悟高，都想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负起责任来，把工作抓上去，抓好。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工作。那时省委会议室只有几个，各部共用，大家都早上班，生怕去晚了占不到会议室，耽误讨论和安排工作。人们越是勤奋工作，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提高得就越快，工作的成绩也就越显著。

四

放手让大家去独立地开展工作，是欧阳钦同志领导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时省委的领导核心——省委常委的成员，都是抗战时期或者是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不用说，这些干部的政治素质是好的，而且都有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因为他们过去都独立工作过。对于这些，欧阳钦同志当然十分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班子的成员都比较放心。大家信任他，他也信任大家，因而能做到上下一心。

在省委的领导工作上，欧阳钦同志是“拿总的”。省委的工作一经决定下来，各分管的书记、常委都各自去贯彻和落实，而欧阳钦同志从不直接干预各条战线的工作，不但如此，他对各战线工作的同志总是给予大力支持。比如我省工业战线在1958年产生了“三华”（建华机械厂、庆华工具厂、华安机械厂）创造的“两参一改”（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经验。欧阳钦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认为这是解决企业领导和群众关系的重要制度和办法。他充分肯定了这一经验，要求我在2天内写出总结报告。这么短的时间要写这么一个重要的报告，当时我觉得有难处。但欧阳钦同志很坚决，就是“开夜车”，也得拿出总结。于是，我便和省委工业部的秘书长汪洋同志、刘达处长一起，奋战两昼夜，完成了这个任务，受到了省委和欧阳钦同志的好评。这项总结报告还上报中央并由中央批转全国各省市借鉴。这件事说明，欧阳钦同志不干预工作的过程，但却重视最后的结果，一旦有了结果，他就会让你拿出总结来。这对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都是很重要的。

五

欧阳钦同志非常注意发挥集体的作用。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活动他都是要过问的。班子成员都在何处，做什么，他都要知道。主管常务的书记和秘书长要及时向他通报每个成员的所在所行。他管着省委

这盘机器的运转，生怕某一个部件出毛病，会影响全盘。有一年，我因事到牡丹江市公出，临行时，本来是向常务书记打了招呼的。走后，适值省委开会。欧阳钦同志见我不在场，就厉声问：“陈雷哪里去了?!”有人答：“去牡丹江了。”于是他严肃地说：“以后每个常委外出，必须请假，不能无组织无纪律，不能松松垮垮。”这番话，是以我为题告诫其他同志的。其实，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一个领导集体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是不可能带领群众完成各项艰巨的任务的。欧阳钦同志维护集体领导原则，这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的工作中养成的优良思想和作风，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六

欧阳钦同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因为他心底无私，一心为公。他有什么话要说，从来是直言不讳。向他请示，他从不回避矛盾，都有明确的态度，没有那种含糊不清的“研究研究”或者“考虑考虑”的推、搪、拖的意思。这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同志以诚相待。

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当时省委在这两次运动中存在着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伤害了一些同志。到了1962年，发现了两次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欧阳钦同志主动与常委们讨论如何纠正过去的错误，决定给那些错戴了“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平反。在平反会上，他首先向那些受委屈的同志们作了面对面的诚恳的检讨，向他们道歉，我们常委也跟着作了检讨，使那些受委屈的同志卸掉了思想上的包袱，心情舒畅了，气也顺了。这件事充分说明，欧阳钦同志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对在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承担责任。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有这种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只有具备这种品质，才能团结干部，并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信赖。

“北大荒”的思念

张林池

欧阳钦同志，在黑龙江省历史上是一位颇孚众望的领导人。他深受全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对开发“北大荒”给予很大支持，“北大荒”农垦战线的广大转业军人、干部、职工，深深地热爱他，怀念他。

1956年，国家成立了农垦部，我由农业部调到农垦部担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从1958年到60年代末，我在黑龙江省兼职，在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领导下工作，与欧阳钦同志接触比较多。欧阳钦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以及关心支持农垦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远见，使我受到很大启发与教育。时间虽已过去20多年了，但许多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终生难忘。

黑龙江农垦事业从初期到发展，一直是在欧阳钦同志的热情关怀、支持和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早在1954年，当时的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同志曾经为安置铁道兵官兵转业，多次亲自到北大荒腹地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一带调查了解情况。他看到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大片原始荒原，便提出在此地开荒建设国营农场“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设想。并于1955年向党中央提出了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欧阳钦同志的支持下，铁道兵9个师的部分官兵，很快地集中到黑龙江省垦荒现场，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开垦荒地260多万亩，建立了第一批国营农场，为以后全面开发北大荒开辟了

道路。

1958 年党中央决定解放军的 10 万官兵转业到黑龙江各地的国营农场，对“北大荒”展开大规模的开发。为适应大规模开发的需要，我提出去北大荒垦荒现场工作。经农垦部党组批准，党中央同意我去黑龙江兼任垦荒重点地区的合江地委书记。大规模地开发垦区，需要省委和当地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密切协作。欧阳钦同志多次讲话，高瞻远瞩地一再阐明开发北大荒的重大意义；同时多次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垦区开发建设给予坚决支持与密切协作。这就使全省上下对开发北大荒有了明确的认识。欧阳钦同志要求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组织力量深入垦荒现场，同解放军官兵和农场职工共同开发垦区，建设垦区。在欧阳钦同志的领导下，土地管理部门和水利部门组织力量奔赴垦荒现场，对荒原进行勘测、规划和设计；建设和交通部门组织力量到现场，帮助农场进行各项工程和道路桥梁建设；商业、邮电部门在垦区和农场建立营业网点，提供生活方便；文教卫生部门协助农场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和医院、卫生所；公安、政法部门与农场共同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等等。这些开发北大荒所必不可少的各项工作，都是在欧阳钦同志的直接关怀与领导下得到顺利解决的。

由于解放军广大转业官兵和农场职工的艰苦努力，加上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开发北大荒进展迅速。几年之间上千万亩亘古荒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近百个大型机械化农场在北大荒上建立起来。欧阳钦同志对这些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60 年代初，在我国遇到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国营农场的困难也是相当严重的。当时有的人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心，影响了农垦事业的发展。欧阳钦同志针对这一问题，于 1962 年冬在东北三省召开的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上，对农场的广大解放军转业官兵和职工在垦荒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给予很大的鼓励。他动员广大群众振奋革命精神，艰

苦奋斗，战胜困难，夺取更大的胜利。他引用《左传》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成语，对广大农场职工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给予很高的评价，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这对我们进一步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战胜重重困难，使“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给予了无穷的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的国营农场经过 10 年改革，更是面貌一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更大贡献。现在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已发展到 101 个，拥有 3000 多万亩耕地，占全省现有耕地总面积的 1/4，占全国农场耕地面积的 1/2。同时办起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工业、商业、建筑以及交通运输企业，还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文化、科研、教育体系。全垦区共有职工 70 万人。农业生产过程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近几年每年生产粮豆都超过 300 万吨，商品率达 50% 以上。1989 年获得了创历史的丰收，粮豆总产量达到 363.5 万吨，交售商品粮 200 多万吨，每个职工年均生产粮食 5000 多公斤，交售商品粮 3000 多公斤，日益成为国家重要的以机械化生产为主、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全垦区工农业年产值达到 35 亿元，每年出口各种商品总额近 2 亿美元，其中出口大豆 50 多万吨，占全省大豆出口总量的 50% 以上，是国家出口大豆的主要产区。每年为国家提供利税达 2 亿元。昔日的北大荒已经变成富饶的“北大仓”，成为农工商学兵融为一体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的农垦集团企业。北大荒的开发，培养了大批人才，造就了一代新人。不断发扬光大的北大荒精神，像驰名的大庆精神一样，已成为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展现，正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北大荒”人艰苦创业，开拓前进。今天，我们面对“北大荒”的巨大变化，目睹黑龙江国营农场的崭新面貌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欧阳钦同志更加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在怀念欧阳钦同志支持、领导农垦事业的光辉业绩的同时，我还回想到他那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60年初，由于受到“大跃进”冲击，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都在探索振兴农业之路。当时我在佳木斯市邻近的莲江口公社，发现他们有的生产队把农业生产任务承包到组，有的联产计酬到户，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我对这些作法表示了赞同的态度。有人抓住这一点“上纲上线”让我作检查。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对这一问题作检查时，欧阳钦同志明确指出：这是农业生产的一些责任制形式问题，不是被指责的那种“包产到户”，不需要作检查。欧阳钦同志这种坚持原则的明确态度，使我摆脱了困境。回忆往事，我更加感到欧阳钦同志在原则问题上的正确性和坚定性。

在松花江抗洪救灾的日日夜夜里

张开荆

1955年至1962年间，我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欧阳钦同志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我们共事多年，深切体会到他是一位党性很强的老同志。他十分关心省军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经常参加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及时指示、帮助军区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使省军区的工作很快地适应形势的需要，为加速黑龙江省工农业建设事业、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深切地怀念我们军区党委的好班长、我的老战友欧阳钦同志。

1957年8月下旬，正当黑龙江人民满怀信心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喜迎即将来临的农业大丰收的时刻，哈尔滨持续20多天连降大雨，松花江水位猛涨，形成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松花江堤岸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哈尔滨市处在危机之中。8月26日，欧阳钦同志立即召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哈军工主要负责人开会，并组成有欧阳钦、冯纪新和我参加的防汛，抗洪领导小组。在会上，他号召全省党、政、军、民立即紧急动员起来，集中人力、物力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坚决战胜洪水灾害，确保哈尔滨市和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切工作都要毫不例外地服从这个紧急的中心任务。

从8月26日到9月17日，洪水超出警戒水位的20多天里，欧阳钦同志和我们防汛领导小组的同志一起昼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他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没有睡过一夜囫圇觉，哪里有险情，

他就出现在哪里，亲自运筹抢险方案，亲自组织指挥调配人力、物力，亲自到险工险段视察汛情，慰问抗洪第一线军民。在防洪抗洪的日日夜夜，他每天都几次打电话向我询问情况，亲自过问抗洪部队的生活，指示我一定要周密组织，确保松花江大堤的安全，尽量减少损失。

9月2日，正当防汛抗洪进入决战阶段，省军区部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广大教职员工和沿江抗洪大军接连战胜三次较大的洪峰，保证了沿江大部地区安全之际，欧阳钦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省委、省政府慰问组，来到省军区防汛抗洪指挥部，当他看到满身泥浆斗志昂扬的抗洪部队时，激动地对战士们和哈军工的教职员工同志们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黑龙江及哈尔滨市的全体人民感谢你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真诚地感谢！”他高度评价了部队广大指战员在这次与洪水的搏斗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勉励部队再接再厉，最后战胜洪水，确保哈尔滨全市的安全，确保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张司令员，你是第一线指挥员，谢谢你的辛苦劳累，可要休息好，别累垮了！这次抗洪抢险战斗主要是靠你的组织指挥领导呀！”听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使我很受感动，看到他日渐消瘦的面容和熬红的双眼，我在想：欧阳政委抗洪以来，统筹全省工作，日以继夜，又何曾得到过休息呢？

9月4日松花江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15公分，哈尔滨市进入与洪峰决战的紧急关头，当天一大早，他就召集我和省委其他几名常委开会，分析这次洪峰的特点和应采取的措施，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风浪、防险情、防破坏、防疏忽大意的四防工作。并责成哈尔滨市委务必在当天做好一切准备，应付紧急变化的情况。他要求部队和抢险民工把救护船准备好，指定专人负责，一有险情能迅速有序地进行抢险，要千方百计地保证哈尔滨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会议之后，

他又亲自到市内各大工厂、医院、学校察看抗洪抢险的准备情况，询问工厂的生产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他鼓励并安慰群众说：“我们有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英勇顽强的人民军队和团结一致的全市人民，任何强大的洪水灾害都吓不倒我们。”事实正是这样，到9月6日，松花江超过历史水位24公分，在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省委、省防汛抗洪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在驻军部队和广大护堤英雄指战员的奋力抢修下，一个个险情都化险为夷，松花江大堤安然无恙。哈尔滨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住了，人民胜利了！欧阳钦同志疲倦的脸上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无不激起我对欧阳钦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仰，他离开我们虽然已经10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刻在我的脑际出现。他为黑龙江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黑龙江省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政声人去后”

陈剑飞

欧阳钦是一位受人敬佩的领导者，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他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12个年头里，我在他的领导与关怀下，多年负责工业口的工作。今天，每当听到工厂的机声隆隆，看到油田井架林立，想到全省工业的蓬勃发展之时，就会忆起欧阳钦高瞻远瞩、指挥若定的战略家气概和他的许多优秀品格，激发我不尽的怀念之情。

欧阳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是1954年8月1日，在新的黑龙江省成立和八一建军节党政军干部大会上。那天，我很早就来到会场。当领导同志开始入席的时候，我看见走在前面的是一个50多岁的同志。他身材不高，穿着整洁的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步履轻快。台下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互相小声转告：“这是欧阳钦同志！”欧阳钦用他那深邃的双眼扫视台下，嘴角挂着微笑，鼓着掌，走到主席台正中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大会开始之后，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黑龙江省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大有可为。他指出，今后全省的基本任务，是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下，全力发展工业、农业、林业生产，做好一切为生产服务的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稳定增长，以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我发现，欧阳钦对黑龙江的情况是熟悉的，分析问题高屋建瓴，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这就是欧阳钦留在我脑海里的第一印象。

随后，在省委1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欧阳钦关于黑龙江特点的分析，即“黑龙江是国家新兴的工业地区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特别“新兴工业地区”的分析，犹如一付清醒剂，使我当

时真有顿开茅塞之感，觉得心明眼亮，精神为之大振。这一思想是开拓性的，抓住了合省后干部思想的症结，把人们的思想从一向注意抓农业，引导转到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当时黑龙江面临的是工业大上，国家很多大的建设项目要在这里进行，如制造冶金设备，发电设备，修理和制造飞机等现代化企业。国家还计划在哈尔滨建设一个机械工业区，在富拉尔基建设一个特殊钢的生产基地。所以，干部思想不转变，就无法适应这样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为此，在这次会议上，欧阳钦要求：思想、组织、干部力量、技术力量及各行各业支援重点建设必须跟得上。欧阳钦这一讲话，至今萦绕脑际，使我对建设美丽、富饶的黑龙江的大战略有了清醒的认识，工作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起来。

合省以后，我负责省政府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那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已经到来，国家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在我们省就有 22 项。面对如此繁重的建设任务，欧阳钦同志日夜操劳。他指示我们，156 个项目是国家的命脉，一定要抓住不放。如果对这一点估计不足，就将犯重大的错误。那时候，他不满足于听汇报，而是经常下到建设工地去检查，教育干部工人要千方百计地保证重点建设。

1956 年年底，在省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副省长以后，开始分管工交口的工作。有一次，欧阳钦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到新的岗位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感到担子很重。准备多下去跑跑，多熟悉下边的情况，遇到问题和大家商量着办”。欧阳钦同志听我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很好。情况不熟，做好工作也难。是要多搞点调查研究，多接触群众。我们党历来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可是实行起来也不易，得下决心沉下去。”按照欧阳钦同志的指示，我曾经多次深入到建设工地、工厂、矿山，和工人、干部在一起研究、讨论工作，一起参加文体活动，有时还参加

工人的班前、班后会，交上了许多基层的朋友。

1956年5月，韩光省长调中央工作以后，欧阳钦曾经兼任过两年省长，他对工业建设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记忆深刻的是他关心和领导大庆油田开发的几件事。

那是1959年，经过地质部门和石油部门的勘探，发现了葡萄花和萨尔图油田。9月26日，位于大同镇高台子附近的第3号探井——松基三井喷出了有工业价值的油流。松辽石油勘探局的关耀家同志第二天就从安达赶来哈尔滨，向省委报捷。当时，省委常委正在“107”会议室开会，听说报捷的同志来了，会议暂时停止。当封仲斌把关耀家介绍给欧阳钦同志的时候，他亲切地向关耀家招手：“来，来，到这儿坐”。于是，关耀家捧着一瓶原油走上前去，坐在欧阳钦坐的长沙发上。关耀家同志准备起身念报捷书，欧阳钦同志摆手让他坐下，说道：“不要念了，你就给我们讲一讲吧！”他指着放在地毯上的原油瓶子问：“这里面装的就是原油吗？”关耀家回答：“是的，这就是从地下1000多米深的深处喷上来的原油”。欧阳钦同志非常高兴地说：“是真的吗？拿火点一点看能着吗？”关耀家赶紧拿纸条蘸了点原油，用火柴点着了。欧阳钦同志高声向大家说“看到了吧！这是真正的原油啊！”在座的常委们都十分激动，高兴地鼓起掌来。欧阳钦同志又对关耀家说：“你懂得这门科学吗？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油是怎样搞出来的？”关耀家谦虚地说：“我懂得不多，可以简要地向首长汇报一下。”于是他就把茶几上放的暖水瓶比作油井，说明经过地质勘探，发现了地下的储油构造，通过钻探，下无缝钢管后，注进水泥固了井通过对油层射孔，使埋藏在地下的原油从油井喷出地面。欧阳钦同志仔细地听着，不住地点头。等老关讲完后，他说：“很好。日本人统治了我们东北14年，疯狂掠夺我们的资源，还没有发现这里有油。如今，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把埋藏在这么深的

地下宝藏——石油开发出来了，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好事。”稍顷，他问：“能登报吗？”关耀家回答说：“正因为这里出油具有战略意义，现在要保密，石油部领导指示，目前不宜公开见报。”欧阳钦同志说：“对，不登报也重要，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登报比登报还重要。”最后他又说：“把这瓶原油留下作为纪念，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胜利！”关耀家同志站起来郑重地向常委们表示：“我们一定不辜负省委的期望，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战胜各种困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拿下大油田！”

报捷的同志离去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大家围着那瓶原油看呀，看呀，怎么也看不够。这是一种长期窒闷以后的激动。很久以前，我们国家就被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依靠洋油过活的日子犹如嗟来之食。那时，我们的心上都有一种沉重的负担，同时也决不相信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大油田。如今，松基三井终于出油了，向国庆1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我们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振奋！欧阳钦同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他亲自主持下，省委连续发出了三个文件，向中央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报告了松基三井钻探和试油的情况。欧阳钦同志还指示我代表省委、省人委到松基三井现场去慰问广大职工。

1959年11月7日，当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忙完之后，欧阳钦同志又亲临大同镇。同行的有李范五、强晓初、李剑白、刘思聪、陈法平等同志和我。车到大同镇之后，欧阳钦同志急急地赶到井场，冒着严寒到工地视察。他握着工人的手，连声说：“你们辛苦了。干得好，有干劲。”他登上正在打钻的钻台，边看边问：“这口井情况怎样？”听到满意的答复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深深地感谢工人们的创造劳动。在大同镇的俱乐部的一间屋里，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李荆和局长向欧阳钦同志汇报松辽盆地凹陷地带的勘探情况和进一步勘探的

部署。欧阳钦同志讲了话，他向松辽石油勘探局的职工和地质技术人员表示亲切慰问，赞扬了他们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忘我工作精神。他要求全省一定要努力做好支援石油勘探和开发的工作，省直各厅、局都要和松辽石油勘探局联系，主动作好服务工作。欧阳钦同志还提议，把大同镇改为大庆，以庆祝高台子出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于是，“大庆”这个后来曾神秘一时，曾经震动世界的地名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1960 年 2 月，全国 37 个石油厂矿、院校的几十个优秀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4 万多名职工，从新疆、玉门、青海、四川等地云集松嫩平原，在余秋里、康世恩同志的亲自率领下，在“头上蓝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的大庆地区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石油大会战。为了支援会战，加快我省的石油开发工作，欧阳钦同志亲自主持省委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开发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的决议，确立了“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方针。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援大庆开发工作。省委专门成立了由常务书记强晓初为组长的支援石油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具体领导支援石油会战的工作。当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财力和物资极度紧张。但是全省人民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切困难，会战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当时省内的粮食供应已经突破了人们常说的“危险线！”），要物有物。木材、钢材、水泥、设备和各种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大大鼓舞了广大石油职工的会战热情。

在这里，我特别要追述一下“牛”给“油”让路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欧阳钦同志的全局观和处理问题的果断精神。

大庆油田的地面大都为草原覆盖。在这广阔的草原上生长着富含蛋白质的优良牧草，对发展畜牧业极为有利。早在东北解放之初，东北局和黑龙江省就各自在这里建立了牧场，新中国成立后，分散在草

原上的牧场统一改为红色草原牧场。当时牧场面积 136 万亩，拥有奶牛 6000 多头，羊 15000 多只，马 5000 多匹，是我国畜牧业和奶制品的重要基地。

但是，恰恰是在这块宝地的地下发现了宝中之宝——石油，而且要在这一带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石油大会战。怎么办？有些同志就是舍不得，感到牧场破坏掉太可惜了。因此，是要油还是要牛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开始，石油会战的队伍是在大同镇附近，尚可说服牧场的同志及其主管部门顾全大局。但是石油大军继续挥师北上，到达红色牧场的腹地萨尔图的时候，矛盾就更加突出出来。甚至发生了牧场职工躺在钻井队的拖拉机前不让开进的情景。为此，我专门赶赴大庆去了解情况，同会战指挥部商量处理意见。回到省里后，我向欧阳钦同志作了汇报。他听到这些情况，颇为发火，怒冲冲地说：“战争年代，我们不怕打烂坛坛罐罐，才有了一个一个战斗的胜利；现在，光计较局部的利益怎么换来大油田！告诉他们，‘牛’一定要给‘油’让路，不让不行。要做思想工作。”省委常委会还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当时定下了一条方针：地下，“牛”服从“油”；地上，“油”服从“牛”。也就是说，地下要出油，地上的牧场也不要马上毁掉。总的精神还是根据油田开发的实际需要，“牛”要给“油”让路。后来，随着油田开发的铺开，在省委和省人委的安排下，红色草原牧场陆续迁出。牧场职工最终还是表现了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小利益的良好风格。

欧阳钦同志生前对大庆的开发建设倾注了满腔心血。他对大庆会战创造出来的经验极为推崇，认为大庆会战精神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瑰宝。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向大庆学习活动，以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他说：“大庆出在我们黑龙江省，大庆精神是在黑龙江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我们要高高举起这面

旗帜，教育我们的世世代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欧阳钦同志对黑龙江的山山水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调离黑龙江以后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黑龙江的开发建设，他住院期间直至逝世前，我每次到京开会去看他，他都问起黑龙江的情况，从政治到经济，从人民生活到社会秩序，打听得很仔细。每当听到有新的成就时，他总是喜形于色。而今，这一切都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化为绵绵不尽的怀念之情。有道是“政声人去后”。在欧阳钦同志逝世 10 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如此深切地怀念他，不是可以说明人民群众对每一个领导者都会有公正的评论吗？

重视党的领导和 思想政治工作的楷模

周文华

欧阳钦同志是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忠心耿耿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对党对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期间，我一直在省委和团省委工作。10 多年间，耳闻目睹，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欧阳钦十分重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在这方面，他确实堪称楷模。

加强党的领导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欧阳钦不止一次地讲过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由于世界革命运动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了，因此，党的建设不可放松，而是要加强。党必须管党，永远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在全国解放初的几年，黑龙江许多党的组织的领导方法基本上是“一揽子”的。随着事业的发展，党组织与行政组织逐渐有了明确分工。但在一些工、商企业、学校和部分乡村中发生了一种片面强调行政权力，忽视和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引起了欧阳钦的高度重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后，欧阳钦首先从解决工业企业中忽视党的领导问题入手，于 1955 年 8 月专门召集了一次工业政治工作会议，检查和批评了这种倾向。以后又分别召开了全省财贸工作会议、文教工作会议和全省党代表大会，对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此后，全省各条战线忽视和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现象，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克服，特别是在工业企业和农村中，更有明显的转变。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会上，欧阳钦结合黑龙江省的工作

实际，专门对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做一发言，摆出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缺点和偏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出现忽视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根源及其造成的危害，提出了今后为彻底克服忽视和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的具体办法。欧阳钦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对于黑龙江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一步重视党的领导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八大”会议之后，欧阳钦更是经常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教育，以提高党员干部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自觉性。同时，他还提出要从体制上、组织机构上、工作方法上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进，调整和加强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在组织上保证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的正确执行。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他还强调必须有正确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1962年前后，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有的人便对党的领导作用发生疑问，对党的光荣、伟大、正确也加以怀疑。对此，欧阳钦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坚决反对。”在同年10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他着重阐述了这个问题。欧阳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予以分析阐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不犯任何错误，那种“至善至美”的想法，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他说：“不能因为我们有了一点错误就影响到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经发现就进行及时纠正，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规定了一系列的改进工作的措施。因此，对于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不应有任何动摇。”

欧阳钦对于党的领导问题总是能够根据不同时期党面临的不同任务，有针对性地予以论述，给人以启发，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有新

的提高。1963年，欧阳钦针对有人受国际上所谓“全民党”的影响，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可以削弱，党的性质可以改变，明确表示，这是反列宁主义的，是错误的。他在一次干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所以能够充任领导，是由于它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任何别的组织都代替不了的。”欧阳钦一贯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他认为，党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上。党要领导一切，决不是说党要包办一切。他说：“如果去包办行政事务和经济业务工作，势必降低党的领导水平。这同样是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一种表现，也是必须反对的。”

在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上，欧阳钦不仅注意理论、认识上的问题，还特别注意解决实际问题。在这方面，他强调“五抓”：一是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二是抓组织整顿，纯洁组织；三是抓健全领导核心工作；四是抓基层组织建设；五是抓对干部的有计划培训工作。欧阳钦不仅这样倡导，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去抓。比如，他为了了解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1964年5月亲自到肇东、兰西、青冈、明水、安达五个县进行调查。调查中，他掌握了两组数字：一是5个县共有6168个生产队，其中740个没有党员，占12%；有2911个生产队没有党的组织，占47%。二是5个县中1963年共发展64名党员而由于各种原因退出党的有343名。通过调查发现了农村生产第一线的党的力量相当薄弱，许多生产队没有党员、党组织和入党人数少，退出党人数多，入不抵出的问题。调查结束后，欧阳钦提出为了更好地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稳妥地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健全起来，补充新的血液，加强薄弱环节。并语重心长地说：“加强生产第一线党的工作是我们目前的严重的历史任务。党的各级组织应经常关心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定期进行讨论。”他指出，各县

委要特别注意检查发展党的工作，把接收新党员这项经常性的工作认真抓起来。同时强调选拔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联系群众，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党员组成坚强的农村支部领导核心。由于欧阳钦的直接领导和督促，此后，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
作得到了加强，在较短的时间内，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
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欧阳钦重视党的领导，强调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对黑龙江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很深，影响很大。多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一直强调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任何风浪面前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各级领导干部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得比较高，领会比较深，抓得比较实，成效也比较显著。这是与欧阳钦重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工作的模范作用分不开的。

在党的各项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欧阳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十分突出的，并且是一贯的。自 1954 年松江和黑龙江两省刚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欧阳钦出任省委书记以来就一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两省刚合并时，他曾提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并把思想工作作为党组织的首要职责”。1956 年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又明确提出：“思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1958 年在省委一届八次全体会议上又提出“思、农、工、林及其他”的工作次序。欧阳钦指出，思想工作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活动中的强大武器，她的使命是用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地教育人民，鼓舞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断获得胜利。

开始时，一些同志对为什么说思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认识不够，有的甚至从“物质是基础，是决定的方面”为理由，或强调“生产压倒一切”，“中心工作太忙，哪里顾得上搞思想工作”，怀疑和否定思

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对此，欧阳钦便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讲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的道理。他指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不是消极的，而是以极大的力量来影响其基础的。如果只看到生产是重要的一面，而看不到思想对生产的作用，看不到先进思想和先进理论对促进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就要陷入庸俗唯物论的泥坑里去。我们不应把经济和政治分裂开来。在实际生活中，政治经济是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经济工作和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通过欧阳钦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使一些对思想工作重要性存有模糊观念的同志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抓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觉性。

随着全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自 1958 年以后，在黑龙江省掀起一个工农群众学习哲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形成是与欧阳钦的积极倡导和鼓励有着直接关系的。他平时十分注重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经常阅读《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同时也教育干部认真学习理论。对工农群众学习哲学、毛主席著作，他更是满腔热情地予以赞扬，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使各种学习（理论、文化、政策、业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使学习和工作得到适当安排，并具体落实到基层。50 年代在黑龙江兴起的工农群众学哲学、学毛主席著作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全省广大干部、职工、农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实现革命化的进程，焕发出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欧阳钦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性、针对性，他多次讲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使人的思想逐步革命化，只有人的思想革命化，企业、机关才能革命化。1964 年，针对美帝国主义将资本主

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二代、第三代身上问题，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并提出必须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他提出要向年轻人讲过去（厂史、村史、家史），讲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讲将来（美好前景）。又说，学校、社会和家庭都要大力抓这个工作，教育青少年是我们的革命责任，我们要用一切方法来进行这一工作。

善于抓住先进典型，教育群众是欧阳钦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1963年2月，庆安县新胜人民公社新安生产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宋恩珍同志为在烈火中抢救公共财产，被严重烧伤后而光荣牺牲。宋恩珍生前为办好集体经济克服许多困难。他带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时时不忘社员疾苦，是群众的贴心人，事迹很生动。欧阳钦抓住这一典型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宋恩珍学习。根据当时农村工作实际，他提出要学习宋恩珍带领农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办好集体经济的精神；学习宋恩珍公而忘私、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品德；学习宋恩珍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欧阳钦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学习宋恩珍这一工作的领导，要通过学习，提高广大人民的阶级觉悟，把人们的精神面貌引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之后，在全省范围内，学习雷锋、宋恩珍活动蔚然成风，这一活动同开展做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青年、好工人、好社员的“五好活动”紧密结合，搞得有声有色。雷锋、宋恩珍的崇高品质和英雄行为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学习活动的开展，新人新事到处涌现，层出不穷，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上进，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善于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及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使其思想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是欧阳钦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特点。1965年4月，欧阳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以《新形势、新高潮、新任务》

为题作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站得高，看得远，十分深刻。他讲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国际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已经出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

“认识高潮、领导高潮，促进高潮，使各方面工作都出现新的面貌。”欧阳钦的这篇讲话传达后，给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鼓舞。当时，干部中产生了一股抓紧时机，全力以赴，组织好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劲头；在群众中也有一股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比学，赶帮，使各行各业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热切愿望。但这一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刚刚兴起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省的整个工作都受到了冲击，当然，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好作法也被破坏殆尽。

欧阳钦同志重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十分突出的。他离开我们虽然已有 10 多年了，但他领导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欧阳钦在重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教诲、经验、作法，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仍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的。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之时，注重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我们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方面工作，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他关怀哈军工建设

刘居英 刘有光

谢有法 李懋之 张衍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我们几个曾经在哈军工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都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这位老革命家，衷心地感谢他对哈军工建设的关怀、支持和帮助。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 1952 年选点筹建，1953 年 9 月正式建成的。万事起头难，建院前，学院领导和苏联顾问经过多处比较选定南岗文庙街作为院址。中央军委任命陈赓同志为学院的院长兼政委。当时的筹备处设在北京灵境胡同，陈院长坐镇哈尔滨主持筹建工作。他曾明确地对学院同志说：“我们军队的传统就是驻在哪里，就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这是党的纪律，军队的传统。全院干部都要树立这种坚强的观念，决不能因为我们的地位高，就不尊重地方党。”陈院长率先做出榜样，他一到哈尔滨就登门拜访省、市领导同志，诚恳地表示“学院受省委领导，我要随时请示报告。”他常常到省委联系工作，有时还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我们以陈赓同志为榜样，注意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尊重省委领导，省、市委同志也都很关心学院的建设。欧阳钦 1954 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后，学院与省委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与陈赓是老战友，来往密切；陈赓有许多工作向他请示，请他支持、帮助。学院虽然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但远离北京，无论工作上、生活上，不少困难是靠省委解决的。这与欧阳钦以及省、市委的关怀帮助是分不开的。

哈军工是我军第一所高级技术工程学府，建设规模大，要求速度快。从 1953 年初到 1966 年 4 月新建校舍 50 多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是在 1963 年前完成的。在当时机械化施工很少的情况下，有的年

度竟完成了 10 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任务极其艰巨。由于省、市委的大力支持和欧阳钦的关心、帮助，工程都如期或提前完成了。

哈军工在哈尔滨算个“大户”。师生员工加上家属共 2 万多人，衣食住行都要依赖省市的帮助。学院堵了文庙街，市民要绕路，有意见。市里就在学院北侧修了马路，直到太平桥，并修通了有轨电车。当时烧煤和吃菜是两大难题。哈市地处严寒，每年供暖 6 个月，加上做饭和实验室用煤，每年约 1 万吨；冬贮蔬菜百万斤以上，这对当地政府和人民是个很大的负担。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在欧阳钦同志的关怀下，省市领导一面组织社会力量，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一面在哈市郊区和邻近县，拨给我们土地，由学院办了两个农场，种粮种豆，养猪养鸡，补助供给。就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能基本上使学员每天能喝上豆浆，一个月吃二次肉，还有一些鸡蛋；老教师每天一、二个鸡蛋，一个月二三斤肉和 10 几斤黄豆；干部、职工家里人口多的还可补助一些粮食。这就基本上满足了营养需要，有力地保障了教学工作。

由于欧阳钦经常关心学院的工作，所以他对学院的情况非常熟悉。每逢中央领导到黑龙江视察，他都主动介绍学院的情况，并多次亲自陪同视察。

为了加强学院与地方的联系，使军队多了解地方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在欧阳钦关照下，省委及省、市人代会均选举学院有关领导同志担任委员或人民代表。每当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省委组织传达学习时，都安排学院有关人员参加。省委党校组织学习班时，也划出名额，由学院派人参加学习。欧阳钦同志对于我院学员的成长，倾注了更大的关怀和爱护。他有时找学员个别交谈，有时召开一定规模的座谈会，同大家交流思想。他循循善诱，以一个老革命家的丰富经验，亲切地教导学生继承光荣传统，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做好革命事业接班

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勉励大家提高信心，克服困难。

对于老教师，欧阳钦也非常关心。学院建设初期宿舍还没盖好，在欧阳钦关怀下，省市专门拨出一处房子给老教师安家；教授夫人在学院安排工作有困难时，省市就想方设法在地方单位安排，解除了老教师的后顾之忧，大大减轻了学院的负担。有的南方调来的教授、讲师，开始不习惯北方严寒的气候，不习惯面食，情绪不安。由于欧阳钦和省、市委的热情关怀和照顾，使他们很快适应了环境，对哈尔滨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欧阳钦对学院建设及各方面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是全面的、无私的、实实在在的。他这种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作风使我们每当回想起来，总是寄予深切的怀念之情。

情系万顷兴安林海

张世军

欧阳钦同志是一位令人难忘的好领导，虽然，他离开我们已10多年了，但每逢与人谈起他时，思念就不住地涌出……我也是年迈体衰，病魔缠身，但听说黑龙江省委将组织编写一本《回忆欧阳钦同志》的书，禁不住提起笔，回忆几件往事，以示纪念。

从1954年8月到1965年底，这是黑龙江省工作的创建时期，打基础时期，也是鼎盛时期。欧阳钦同志曾把黑龙江省形象地比喻成祖国大地的一只天鹅，省委书记强晓初为此作了一首诗《黑龙江颂》，赞黑龙江：

锦绣富饶黑龙江，犹如天鹅昂头唱。

百花齐放天鹅舞，万象更新跃天堂。

新黑龙江省成立不久，我就调任省委林业部部长。那时，全国只有黑龙江省委设林业部，足见林业在黑龙江省的重要。

欧阳钦同志对林业工作很重视，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黑龙江省委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曾制定了这样一条著名的工作方针，即：“思、农、工、林及其它”，把林业工作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我们鼓舞很大。黑龙江省委还两次给中央打报告，要求架设森林铁路，开辟新林区，增加采运造林设备。1964年，开发“绿色森林宝库”——大兴安岭的会战打响了，中央派铁道兵三、六、九3个师进驻大兴安岭，大批的林业工人、干部也开了进去。中央决定成立开发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和指挥部党委，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同志任总指挥，罗玉川同志任书记兼政委，我任副总指挥、副书记。由于周总理认为东北林区任务很重，不叫我长期到大兴安岭去，所以我主要在部里工作。当时，黑龙江省委对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十分重视，省委

组成了以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同志为组长的“支援大兴安岭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吸收组织、劳动、人事和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的领导参加，大力支持，要啥给啥，终于把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成全国重要的林区，成为“绿色宝库”。这既有铁道兵的功劳，也有黑龙江省委欧阳钦同志和许多干部、群众的功劳。

欧阳钦同志对黑龙江林业非常了解，也非常热爱，我举两个小例子：一是，他拿一张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照片，指着照片上的人对我说：“这是李富春，这是蔡和森，这是我。那时勤工俭学很苦，要艰苦奋斗，现在也需要这种精神。特别是开发建设林区，环境艰苦，更需要这种精神。”二是，一次我在全省党代会上有一个发言，集中讲了黑龙江林业的地位和作用。欧阳钦同志会后对我说：“我要去东北局工作了，到那后继续分管农林工作，你的发言很好，我们已录了音，需要的时候就听听你的录音。”可见，他是念念不忘黑龙江林业啊。

欧阳钦同志对林业工作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那时，国家在伊春等林区搞特区，政企合一，垂直领导。由于初搞没有经验，有些关系处理的可能不妥当，引起了欧阳钦同志的不满。他在一次常委会上生气地说：“你们这是搞省中之省，国中之国么！我说我无权、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搞这个。”他又说：“你的林业部副部长我撤不了，但我可以开除你的党籍。”大家说：“那是 xxx 搞的，和张世军无关。”他的气才消了一些。我理解，这不是冲哪个人发火。他是非常重视党的领导的，如果某地区、某单位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他就要过问的。

欧阳钦同志对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是非常尊重的。1961 年，刘少奇到东北内蒙古林区视察，足迹踏遍兴安林海，历时 20 余天。欧阳钦同志说：国家主席用这么长时间视察林业，我们要向刘主席学习，学习他重视林业的精神。周总理视察黑龙江时住在花园邨宾馆，省委常委几个同志要求和总理照个像，总理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排，他把

欧阳钦同志放在前排中间，而自己却站在第三排。欧阳钦同志哈哈大笑地说：“总理从来不为人先，我们要学习总理的高贵品质。”

“文化大革命”中，欧阳钦同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不但“靠边站”好些年，仅有的一个儿子也被迫害致死，但他从来不讲怨言，他说这是那些人未执行毛主席政策，我恨那些人，但我相信党的政策。

“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搬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住。欧阳钦同志身体很弱，我从林业总医院调个医务人员郝玉梅去照顾他，他却叫我不要搞特殊。他非常留恋黑龙江，我几次去看他，他都要问个不停：林业怎样？垦区怎样？哈尔滨平房三大厂怎么样？三大动力怎么样？大庆怎么样？我逐一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有的我也说不清楚。

“文化大革命”使他身心交瘁，终于在1978年5月15日离开了我们。

时光流逝，欧阳钦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我们要学习他，学习欧阳钦同志高瞻远瞩、刚直不阿、谦虚谨慎的高尚作风，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把黑龙江，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回忆东北经济协作区

委员会主任欧阳钦同志

倪伟 王光中

东北经济协作区是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国六大区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决定建立的。195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经济协作区包括辽、吉、黑三省和内蒙的昭乌达、哲里木、呼伦贝尔三盟。协作区委员会主任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为副主任。在哈尔滨设立了东北经济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由倪伟兼任办公厅主任，做为经济协作区的办事机构。

东北经济协作区委员会自1958年7月成立，到1960年秋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经济计划办公厅并入了东北局，工作虽然仅有2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央的领导下，对东北三省和内蒙东三盟国民经济协调、平衡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欧阳钦在担任东北经济协作区委员会主任期间，遵循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认真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思想，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顾大局、识整体，在发展国民经济中贯彻全国一盘棋精神，主张中央重点建设起来的东北工业基地，应该大力支援全国。

他曾在东北经济协作区会议上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把重点放在东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东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发展更快一些。发展东北的目的，也是为了以后发展全国其它地区。第一个五年计划东北发展起来了，这是全国支援的结果，许多工厂都是全国支援的。全国支援鞍山，支援富拉尔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完全应该很自觉地支援全国。打个比方，

为了解放东北，中央把大批干部派到东北；东北解放后，百万大军进关又支援关内的解放。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也是如此。东北工业在全国支援下建立起基础，这次也要‘百万大军’进关，支援全国。”他还说：“以支援外区作为我们的首要职责，要以共产主义精神照顾整体，支持外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支援外区，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应该经常以此精神教育我们的干部，特别在领导机关更应如此。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全国，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主动地、热情地去支援外区……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欧阳钦站在全局的高度，正确处理东北地区与全国的关系，把支援全国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在1958年7月东北协作区委员会成立会上，即确定了“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逐步合理发展”的方针。在这两年以及以后，东北大批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支援西南、西北建设，有些大企业对口包建，对于“大三线”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强调东北地区应当把发展农业放在特殊重要位置。

他在东北经济协作区第五次会议上谈农业问题时说：“东北地区高速度的发展农业具有特殊重要性与迫切性。东北地区目前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达82%；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已达2:3，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的发展，城市人口还要迅速上升，劳动力还要大量增加，农业如不很快跟上去，就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东北地区粮食商品率高，又担负着支援全国和出口的任务，而且东北又是重要战略地区，没有必要的粮食储备是十分危险的。过去几年中农业生产虽已获得很大发展，但由于劳动力不足，农田基本建设薄弱，生产很不稳定。”在东北三省农业书记会议上，欧阳钦强调指出：“如何在东北地区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

针？贯彻这个方针光靠农业方面不行，必须全党动手才能办到。”“农业不发展就会阻碍工业的发展。人不吃饭不行，没有粮食什么事都不能办。毛主席讲：‘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他还在一些会议上指出：“农业问题已经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成为东北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不加速发展农业，工业和城市就将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工业原料、副食品和劳动力的补充。因而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都将不能顺利发展，支援全国的任务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欧阳钦认为东北地区发展农业有许多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他认为东北地域辽阔，有肥沃的土地，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资源潜力很大。还有可垦荒地一亿多亩，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低，商品率也很高，特别是东北地区有较强的工业基础，钢、铁、煤、木、油在全国是首屈一指，这是支援农业、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最有利的条件，要充分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发展农业。欧阳钦非常重视农业机械化，他经常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特别东北土地面积大而且平坦，适合大面积实行机械化。他主张要推行以农业机械化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造。

三、强调东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要全面规划、综合平衡、瞻前顾后，统筹安排，注意比例关系，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欧阳钦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会上报告协作区委员会工作时指出：“经济建设必须有中心、有骨干，全面规划，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东北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建设，而在工业建设中又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因为优先发展了重工业，东北地区才迅速形成了支援全国的工业基地，其他工业部门才随之全面发展起来。农业的技术改造才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带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经验也证明，重工业是不能

孤立的得到发展的。优先不等于唯一，‘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如果没有农业的相适应发展，为工业人口提供粮食和副食品等生活物资，重工业就不能发展，没有轻工业的相应发展，为工业人口提供日用品，重工业同样也不能顺利发展。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必须妥善加以安排，正确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正确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比例关系，在主要方面正确地处理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同时在重工业内部，采掘业与冶炼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生产建设与交通电力等部门之间，也都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样必须严格遵从客观经济规律，注意比例关系，进行合理安排。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协调地向前发展。”欧阳钦结合东北经济区的实际，运用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辩证地分析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等关系，使大家直到现在记忆犹新。

欧阳钦当时曾提出过东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平衡的问题。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加速发展农业乃是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第二，轻工业的发展和重工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不相适应。应贯彻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加速发展轻工业在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中有迫切的必要性。第三，交通运输的发展与生产建设的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加强交通运输的建设，已经成了东北经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第四，重工业和整个工业的内部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原材料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及支援全国的需要，采掘工业跟不上冶炼工业的需要，机械修配的力量不足，煤炭、电力满足不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电子工业基本上还是缺门，产品质量不高，品种还不够全，不少尖端技术还没有掌握。为使东北地区工业

体系完整起来，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都亟需加强和弥补这些部门。

第五，东北地区的工业布局还不够合理，小型企业的发展相对不足，要在发挥大型骨干工业优势的同时，重视发展小型工业，并且提倡小型工业要由土到洋，土洋并举，要发展“小洋群”。欧阳钦主张经济工作要重视综合平衡，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加强薄弱环节。我们现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他始终重视财贸工作

关 舟

1954年合省后，欧阳钦同志就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先任省商业厅厅长、以后任省财贸办副主任、副省长。记得那时欧阳钦同志对粮食购销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并给予指示。黑龙江省是国家的重要农业地区之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作好粮食购销工作，对于保证工业发展和较多的向国家提供商品粮，支援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56年我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难以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许多领导同志都在议论如何掌握政策，讲求工作方法，既要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又要照顾农民的利益，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当时欧阳钦同志提出一方面向中央如实报告情况，另一方面本着“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精神，全国一盘棋，尽量多购一点、少销一点。我们在全省征购粮工作中认真贯彻了这十六字方针，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妥善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关系。1960至1961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农业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粮食供销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全省粮食工作仍然本着这十六字方针，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全力安排人民生活，从而度过了困难时期。在全省粮食库存极度紧张难以为继时，省里派我到中央汇报请求支援，当时中央领导正在北戴河开会，欧阳钦同志也在北戴河参加会议，我只身前往，食宿在欧阳钦同志的住所，在他的热情关照下，我向姚依林同志作了汇报，依林同志决定马上调给我省两列火车粮食，不到一个星期粮食就运到我省，从而解除了燃眉之急。

欧阳钦同志顾全大局的思想是一贯的炽烈的，他认为全国经济是一盘棋，各级要服从国家的一盘棋，在支援大庆油田开发会战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1959年为支援大庆油田会战，加速开发工作，欧阳钦同志确立了“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方针。当时全省正处于经济困难时刻，财力物力极度紧张，但是我省财贸系统仍以极大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切困难，从建筑材料到生活用品，包括大批粮食、蔬菜、副食、衣着、药品等，给予大力支援，同时在全省财贸系统抽调1000多名干部职工支援油田建设，全省几乎每个市县都给油田装备起一个或几个商业服务网点和制油厂、制糖厂、糕点糖果厂等食品加工网点，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为大庆油田加速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欧阳钦对商业工作、财贸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他常说财贸工作是一种复杂的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工作，它与工农业生产、与广大群众生活有着最广泛最直接最密切最敏感的联系，他曾反复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好。1959年他在全省财贸六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在财贸工作中，应该强调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并作了详尽阐述。这对提高全省财贸干部素质，促进财贸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省委和杨易辰同志主持下，财贸工作，对支援工农业生产、安排好市场，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和促进，作了大量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和总结了三个方法，一是通过财贸业务活动和政策措施促进生产发展；二是对商品性大的副食品和土副产品的生产，积极与有关部门协作，规划生产，并通过供销工作，使规划具体落实；三是财贸部门直接经营与本身业务有密切关系的生产，出经验，出技术，出良种，以推动和指导群众生产，这对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作用。欧阳钦同志还特别关心社会饮食服务业，他在全省服务人员代表会上曾说过，象办食堂、办托儿所、当炊事员、理发员、照相、修补、洗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事情，都是最崇高的事业。社

会是一个整体，是各行各业的大协作、大配套，缺一门也不行，这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谁也离不开谁，有些人看不起服务行业是没有道理的，社会风气要变一变。

1957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但是在我省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结构上出现了不平衡的状况，特别是我省轻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市场需要的工业品主要依靠沪、津、辽等兄弟省市进货，人民消费品和工业原料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很不适应。欧阳钦同志在1958年除夕讲话中适时地提出：在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中的农业与多种经营或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关系上，如果说这三个方面是六条腿的话，那么相对地说，目前农业、轻工业和商品性生产这三条腿就比较短一些，应该坚持保证重点与全面发展，补长短腿，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样既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又有利于保证重点生产支援全国需要。1959年全省一届三次党代会上肯定了这一思想，确定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在保证重工业、粮食等重点的前提下，加强电力、交通、轻工业和农业的多种经营等薄弱环节。在当时明确的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是有远见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还特别关心“大厂”（大企业）、“大场”（农场）、“大校”（大专院校）、“大所”（科研院所），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命脉、骨干和中心环节，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进步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黑龙江省被人们称为“北大荒”，是说解放前由于长期遭受敌伪和国民党的统治，这里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在祖国的边疆这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地方还在沉睡中。1945年解放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我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1958 年比 1949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社会购买力分别增长了 9.3 倍、1 倍以上、4.8 倍，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的飞跃发展，黑龙江省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新的重要工业基地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在 1959 年建国 10 周年大庆时，欧阳钦同志向全省人民宣布：形容我省昔日贫穷落后面貌的“北大荒”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繁荣幸福美丽的社会主义的黑龙江省正在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为建设更加繁荣幸福美丽的社会主义的黑龙江省而奋斗。这表达了当时省委对建设黑龙江的坚强意志，也显示了欧阳钦同志对黑龙江省的无限热情和希望。

欧阳钦同志是我的领导、师长，也是我的同志、战友，在 10 多年的工作接触中，我深感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是高尚的，原则性很强，为人诚实正派，平易近人，作风谦虚谨慎。他经常用毛主席的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引导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习党的历史。他的思想品格和光辉业绩，使他赢得了人们的衷心敬佩和爱戴。我们将永远纪念和学习他。

欧阳钦同志 我永远怀念您

谭云鹤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每当我同一些同志，包括并不认识欧阳钦同志的人谈起他，由不得衷心流露出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有着非常强的党性。

开始认识欧阳钦同志，是 1952 年我在东北局组织部任办公室主任兼组织指导处处长的时候，那时欧阳钦同志任旅大市委书记。因工作关系，我到过旅大，有过接触，但印象不深。

真正了解欧阳钦同志是从 1954 年到 1965 年这 12 个年头，我同他在一起，并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虽然，工作问题上有时也发生矛盾，甚至争吵，但我们之间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1954 年，根据中央决定，各大区撤销之后，一些省市进行了合并。以原松江省委、黑龙江省委及哈尔滨市和旅大市来的欧阳钦、韩光等同志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还有个别同志是从辽西省调来的。由于来自四面八方，彼此不了解，因此合省不久，省委内部就发生了一次相当尖锐的矛盾。

记得是 1954 年的秋末，林枫同志为征购粮的事，专程从沈阳到哈尔滨来。那年黑龙江省遭了早霜，收成不大好，而全国那年的年成也不大好。国家那时刚刚结束抗美援朝的繁重负担，不可能拿出外汇进口粮食。为了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完成，为了城市人民的必需，相对来说，分配给黑龙江省的粮食征购任务，显得有些偏重。因此，省委一些同志对是否接受中央分配的征购粮任务发生了分歧。

林枫同志来后，住在颐园街 1 号，省委常委会就在那里召开。当林枫同志询问到当年粮食的收成情况及完成中央分配的征购任务是否可能时，有几个书记、副省长表示有困难，希望中央能减轻征购任

务。这时欧阳钦同志指出：“我们应当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主张应当尽最大努力，完成中央分配的征购粮任务，不要讲价钱。同时对几个过分强调困难的同志也表示了一些不大满意的情绪。散会之后，我听到几个同志私下议论对欧阳钦同志的不满。

因为刚刚合省不久，我怕影响省委今后的团结，回去之后，马上给韩光同志打电话，希望他向欧阳钦同志反映一下，省委常委最好就此交交心，避免产生疙瘩。韩光同志表示，这个意见很好，让我直接向欧阳钦同志反映一下。说实在的，当时我对欧阳钦同志并不了解。合省几个月，我感到他的脾气不大好，因而有些顾虑，但犹豫了一下之后，我还是给欧阳钦同志打了电话，当我反映有几个同志（我没有指名道姓）对今天征购粮的事有意见时，欧阳钦同志开始还不大冷静，说：“他们有意见，为什么不找我当面讲？”我说：“你最后表了态，他们觉得再当着林枫同志的面讲些不同的意见怕你不高兴。”因此，我建议常委支部最好开开会，大家谈谈心，最后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

过了一天，接连两个晚上，在欧阳钦同志宿舍楼下的会议室召开了常委支部会，大家比较冷静地交换了意见。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从这次会议开始，在省委常委内部，经过几年时间逐渐地树立起一个非常好的风气。无论是谁，对谁有什么意见，都开诚布公地拿到桌面上来。在会上，无论有什么争论，只要决定了，大家都认真去贯彻执行，很少有在背后说长道短，拉帮结伙。

1955年夏，常委会上又出现了一次大的争论，这就是企业究竟实行“一长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问题。我和一些同志是主张“一长制”的，但欧阳钦同志却十分坚决而肯定地主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了强调党的领导，他说：“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没有例外的。”并且各自都引经据典，

争论十分激烈。我当时抓住他“没有例外的”一句反驳他，我说：“你去看看党章，其中就有一条，机关党委就不能领导一切！”他语塞了，气得两手直哆嗦，还跑到楼上去把联共党史搬出来，念结束语中的几条。会后，我后悔了，欧阳钦同志这么大年纪（其实那时他 56 岁，我才 33 岁呀！），身体又不大好，有话好好讲，何必使他生气呢？到第二年，中央明确规定了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后，有一次，我同他闲谈起那一次的态度不够好，并且我的意见看来不对了时，他淡淡的一笑置之，说：“中央还没有决定之前，征求意见，各人可以讲各人的意见嘛！”

1958 年秋季，有一次在他宿舍楼下开常委会。当时大炼钢铁之风正炽。连省委大院里都竖起了两座小高炉，我们轮流换班，日夜奋战，为完成全省钢铁翻几番的任务而奋斗，压力是非常大的。但全省农村出现了一个大的矛盾：一方面要奋力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一方面秋粮已经成熟，急待抢收，在这个矛盾面前，众说纷纭，都怕完不成大炼钢铁这个“硬”任务挨批。欧阳钦同志是讲实际的，不怕承担责任，他坚决主张：秋收季节，农村要全力抢收，把粮食颗粒归仓。他说：“那个铁矿石留在山上，它也烂不了，粮食如果不及时抢收，一场大雪下来，全捂在地里了，你想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炼呢？”在他的坚持下，省委明确了工作方针，使 1958 年农业大丰收没有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更需要一种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勇气。

欧阳钦同志为人非常正直，党性很纯。但他有时候脾气不好。虽然我也是这个脾气，常常在常委会上互相顶了起来，但我在他领导下，没有一点不安全感。甚至在他个人要搬房子的问题上，他的两个秘书都先后找过我，我都举出几条理由，表示不同意见。第三次他亲自同我谈，我仍持不同意见。但他并没有因为我触犯了他而迁怒于我。他

争论归争论，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实行打击报复。相反，他却把我从合省以后当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委员提为常委、秘书长，以后又提名为候补书记。由于对他有了一个根本的了解，所以有时我有些做得过火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内疚。在他因病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常去看他，并且一坐就是一、二个钟头，说不完的话，非常亲热。有好几次我怕影响他养病，坐了一阵之后要走，他不让我走，“再谈一会儿嘛！”有一次我说：“你看，过去在省委时，我们两个常常争论，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却这样深厚。”他笑了，笑得非常天真。有一次我要走时，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两个照个像吧。”他勉强地站起来，我们合了一个影，这是我同欧阳钦同志最后的一次合影。

欧阳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走了，但他的一身正气和敢于坚持原则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欧阳钦同志，我深深地怀念着你！

高屋建瓴 统领全局

陈元直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 10 多年了。10 多年来，他的音容笑貌，高尚情操，思想和工作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欧阳钦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工作中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善于抓大事。1954 年，他来黑龙江省任省委第一书记，一开始，在这方面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正是原松江省委、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刚刚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在干部中，不少人对合省后如何开展工作，抓什么，怎么抓，存在着等待观望思想。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明确合省后的工作纲领和奋斗目标，欧阳钦同志就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合省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让《黑龙江日报》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起草了一篇题为《团结起来，奋勇前进》的社论。我当时兼任黑龙江日报社总编辑，这篇社论由我执笔。在讨论和修改这篇社论中，欧阳钦同志讲了很多精辟的意见，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在社论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致振奋精神，动员千百万群众，为实现“一五”计划而奋斗！他的这种坚持依靠党，依靠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的指导思想，一直贯穿在以后的各项工作中。

欧阳钦同志 1924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十分重视加强党的领导。他在工作中和日常言谈中，反复不断地强调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他常讲，党就象原子核，虽然体积小，但能量大，质量高。在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无往而不胜。并和各种忽视党和削弱党的领导的思想作斗争。在一次会议上，他强调提出，党要领导一切，不是只领导这

一部分，不领导那一部分；不是只领导这一层，不领导那一层；党的领导是绝对的、全面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动摇的、没有例外的。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组织观念教育。

欧阳钦同志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合省不久召开的省委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着重阐明，共产党人历来都把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指针。他强调必须克服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大大地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1958年省委召开的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依靠党、依靠群众、有中心、有重点、全面规划、全面跃进”的方针。确定全省工作安排次序是：“思、农、工、林及其他”。各级党委必须把加强思想工作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做经济工作，完成经济建设任务，不能忘记政治失去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正是为了保证经济建设任务的完成。

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欧阳钦同志十分注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重视系统的、经常的、带根本性的思想建设工作，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的战斗性。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工作中和思想上的各种问题，去识别资产阶级思想及各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抵触的思想，去进行批判和斗争。1955年，在他的倡导下，省委举办了高级干部学习班，我作为学习班的具体组织者，同时参加学习，深感用两个来月时间离职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著作受益匪浅。对于在职干部，则组织他们带着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欧阳钦同志十分重视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唯物辩证法，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组织干部带着三年“大跃进”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著作，提高对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违背了必定受到惩罚的认识。在省委常委的学习中，欧阳

钦同志循循善诱，引导大家畅所欲言，达到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联系实践，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目的。

欧阳钦同志满腔热忱地支持从 1958 年以来在我省逐渐发展起来的工农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他主张要理论从理论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锐利武器。他认为广大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理论不仅能够学得好，而且能够用得好。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他多次接见学习积极分子，并总结和概括许多学习积极分子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感到学了以后比过去“站得高了，站得稳了，看得全了，看得远了”。因而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推动了生产和工作。他号召各级党委必须把这项工作放在首要地位，要注重抓两件大事：一个是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辩证法，搞好社会主义教育；一个是组织工农业生产新高潮。

欧阳钦同志十分重视文教工作。黑龙江省地处北大荒，文化教育原来比较落后，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1956 年省委召开文教会议，欧阳钦同志在接见文教代表时，着重强调提高人们对文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着重阐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强调对文教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号召一方面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文化艺术活动等。一方面建立培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的黑龙江综合大学和许多科学研究所。欧阳钦同志深刻地指出，如不及时地把培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从长远看，将会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欧阳钦同志十分关注文化艺术工作，多次亲临观看演出，并多次接见文艺界代表，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他喜爱民族的古典的文化艺术。让文化局引进了善于表现民族古典艺术的赣剧。还翻印了关汉卿的词发给省委常委欣赏。

欧阳钦同志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抓工作善于抓主要矛盾，抓带本质性的问题，站得高，看得远。他讲问题思想性逻辑性很强。在常委会议上，他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作总结言简意深，对有的问题一针见血，使人听了豁然开朗，深受教育。他对同志满怀热情，平易近人，在原则问题上又要求很严，是很好的严师良友。在他的领导下，感到心情分外舒畅。缅怀欧阳钦同志，我们要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回忆欧阳钦同志二三事

王 钊

尊敬的欧阳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 10 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那老一代革命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气质，刚直不阿的形象却始终活在我的心中。

欧阳钦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多方面的，我想还是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说起吧。

1954 年秋天，省委派我去伊春林区工委工作。到职后听到的议论是什么“先企业后政府，大企业小政府，富企业穷政府”，这就是说，当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与企业什么关系的城市和政府才适应林区的开发建设。对此认识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多划几个县成立专员公署，有的主张成立一级完整的政权性质的特区。正在众说纷纭、犹豫不定的时候，1957 年初春，欧阳钦同强晓初到伊春林区检查工作，先到五营自然保护区步行观察了林相，返回岱岭试验校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说：鉴于伊春林区新开发，既集中又分散的特点，为方便生产与生活，可考虑建设一个小城镇群式的市，实行政企合一的一级完整的政权机构，林区党委改为市委。欧阳钦同志定音的基调，不仅统一了认识，确定了伊春林区城市建设的方针，而且是没有先例的创举。据我所知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级的政企合一的政权机构。当时会上有人提出，建设伊春类型的城市和机构，宪法没规定，全国无先例。欧阳钦同志说：要从实际出发嘛，宪法没有规定的，我们可以试验嘛。这充分表明他的胆识和魄力。伊春林区的开发建设一直沿着欧阳钦指出的方向进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黑河是个边境地区，以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开发建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1959 年 6 月欧阳钦到黑河视察时，

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黑河人口少，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前途不大，不安心工作，有自卑感等情绪，在地委扩大会议上风趣地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们这里是人不在多有物则名。这个地区很美，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风景优美，潜力很大，很有前途。必须首先破除地区落后、小地方、没有发展的自卑感，要有决心有信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黑河。他提出了“人兴财旺、五谷丰登、门当户对”的发展建设的指导思想。欧阳钦同志的讲话既指明了建设边疆的方向，又鼓舞了干部的斗志。我 1963 年调黑河地区工作后，按照欧阳钦同志“人兴财旺、五谷丰登、门当户对”的指导思想，首先抓了农业，不到 3 年就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达到了自给有余。当时我兴之所至，循着欧阳钦的思路，写了一首《黑河是个好地方》的歌词，表达我的激动心情，也借以激励和鼓舞干部群众热爱黑河、建设黑河的感情和信心。实践证明，欧阳钦的思想，对于黑河地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始终是推动黑河地区人民建设边疆的强大动力。

欧阳钦很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像一块磁铁，紧紧地把班子的同志吸引在自己的周围，让班子里的成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去做自己分管的工作。他推功揽过的优良风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了成绩他从不记到自己的名下。总是说这里某某同志和大家做的；出了问题他从不诿过于人，总是豁达大度地承担责任。我总忘不了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件事，那是 1960 年，我省征了过头粮，许多基层干部埋怨当时主管财贸工作的杨易辰同志，说他是“杨过头”。对此，欧阳钦不止一次地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说，把征过头粮的责任放到杨易辰头上是不公平的，他是执行省委的决定，要说责任首先应由我来负。1964 年牡丹江垦区的负责人王景坤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据说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震同志用人不当的问题。因此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组成了有将军率领的工作组去垦区检查，工作组对问

题看得比较重，在 107 会议室欧阳钦同志主持的同检查组的座谈会我参加了，交换意见时，欧阳钦同志说：对王震同志要先树碑后批评。他率领 10 万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是有历史贡献的，应该充分肯定。他这种实事求是、直言不讳、主持公道的态度，在座的同志无不敬佩。

我们地市和省直的一些同志谈起欧阳钦同志时都说，他是一位嘴硬心暖的人。他对干部能严格要求，对缺点错误决不姑息迁就，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他常对干部说，不好好工作我要撤职。但他不轻易批评干部，一旦看准了你的缺点错误，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批评得很严厉，不留情面，但受批评的同志感到是关怀和爱护。他从不轻易处分干部，也没有见他撤过谁的职。我多次听到他对省委和地委的同志说，要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对干部要算小账，不要算大账。经常地算小账，就是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提醒干部不犯大错误，这是真正的关心爱护干部。如果平时不管、不教育、酿成错误后再去算大账、算总账就毁了干部，实际上是对干部不负责任。特别令人感动的是，1972 年春天，我从“黑帮队”里放出来，允许到哈尔滨看病。我到省立医院病房去看望杨易辰同志，向他打听欧阳钦同志怎么样了。易辰对我说：老王啊，欧阳钦同志比我们高啊。“文革”中怎样批斗，他始终不承认是“走资派”，他说，说我工作中有错误我承认，如果说我是“走资派”，不能承认，那样把全省的干部又置于何地呢？我得对全省干部负责。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高风亮节啊！他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者，我省广大干部都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尊敬他、怀念他、绝不是偶然的。

谁都知道欧阳钦同志看问题和处事都从大局和整体出发，他提出的“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名言，响彻龙江大地，成为全省干部处理问题的座右铭。但相对地说，人们对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表率作用就知道的不多了。我所见到的

他，不论在本省检查工作还是在东北局开会，吃饭都很简单，很少让人陪餐，常穿有补丁的衬衣。他对家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夫人黄威同志是一位有很高学识的老同志，从未听到过欧阳钦同志为他的夫人争过什么地位待遇。他的孩子们都学习好，懂礼貌，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同普通工人一样拿饭盒去大食堂买饭，从未见有什么额外要求，这显然是和他的教育分不开的。说欧阳钦同志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当之无愧的。

欧阳钦同志在黑龙江大地辛勤耕耘了 12 个春秋，他以心血、热情和行动，在黑龙江人民心中塑造了高大的形象。他是一棵不畏风霜的苍松，沧海横流中的磐石，令人敬佩的师长，品质高尚的共产党人，黑龙江人民永远怀念他。

执行统战政策的典范

张瑞麟

欧阳钦同志在黑龙江省工作十几年，为黑龙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领导干部的优秀品质。他有坚定的党性，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有很高的理论政策水平。他重视统战工作，关怀统战干部，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

1954年，我当时是合省后的统战部长，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欧阳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他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始终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全局上去考虑，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把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牢牢握在手中，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捍卫它、运用它。

1956年，党中央指示在原有基础上，规定各省、市在政权机构中安排党外人士，要达到厅局级以上干部总数的25%的比例。中央统战部同时向在京出席会议的各省、市委领导同志打了招呼。欧阳钦同志对中央的指示贯彻得非常坚决，他亲自由北京往回打电话，要求我们立即物色符合任职条件的党外人士。由于省委重视，各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党委的大力支持，统战部很快就落实了一批党外人士担任省、市及政府厅局职务的名单，经欧阳钦书记批准，陆续安排了职务。如安排民盟主任委员杜光预先生任副省长兼司法厅厅长；无党派民主人士著名教育家王清正先生任副省长兼教育厅厅长，还有著名中医专家高仲山任卫生厅副厅长；著名林业专家邵均任林业厅副厅长；任兽医研究所胡群壁为农业厅副厅长等。这样在“文革”前我省有2名党外人士任副省长，有3名任正厅级，有13名任副厅级。当时我们把名单报中央后，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同志来

我省检查工作时说：“你们安排的人物很不错，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又有代表性，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物。”从这件事上，我深切感到，欧阳钦同志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是坚定的，政策水平是很高的。

他把团结、保护党外人士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大多数。欧阳钦同志理解掌握了这个真谛，所以，他时刻不忘团结党外各界人士，特别是党外的朋友，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1957年反右斗争时，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一些同志出于关心党的建设，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当时，在“左”的路线干扰下，一些党外人士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甚至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对这个问题，欧阳钦同志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党外人士绝大多数是有业务专长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国家建设是有利的，对极少数右派分子攻击党的言行要坚决回击，但不要扩大打击面，对说错话的人要分析，不要轻易扣帽子，要团结他们，保护他们，通过学习提高他们的认识。在那段日子里，他经常对我说，统战工作是党的法宝，你们要掌握好哇。九三学社的一位教授当时刚从国外回来，正赶上整风，由于对国内情况不大了解，说了几句过头话，单位要给他戴帽子。我知道后，请示欧阳钦同志，他明确指示我，象这位教授那样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胸腔科专家，能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来是很难得的，我们要保护他。在欧阳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才没给他戴右派帽子。同时，我们把需要保护的党外知名人士拿出名单报给欧阳钦同志，经他批准保护了几位党外厅局长在内的一大批党外人士。我省有一位著名工商界代表，运动一开始，有人就要抓他右派，欧阳钦同志知道后，马上指示我送他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避免了被揪斗。许多党外人士忆起那段经历十分感动，他们说，欧阳钦同志是党外人士最亲密的朋友，他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最好，我们永远忘不了他。当

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统战部的工作如果没有欧阳钦同志这样的领导的关怀，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当时保护了众多党外人士，直到今天，虽经屡次政治运动，但许多党外人士一心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为稳定黑龙江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做出了贡献。

他热情支持统战工作，关心爱护统战干部。欧阳钦同志无论在阅历上、经验上、理论政策水平上都是我们的师长，在他领导下工作，既学知识又长经验，工作起来心情舒畅，腰杆硬、胆气壮。他非常关心统战部的工作，凡是我們上报请示，报告和提出的有关问题，他都认真审阅，能决定的立即拍板，需集体讨论的，及时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反右斗争时，统战部的一举一动都是上纲上线的，左右都不是，统战部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随时都有被扣上右派或左倾帽子的危险，统战工作伸不开腰。欧阳钦同志就在工作上大力支持我们，逢会就宣传统战政策，经常鼓励我们。当时，他为我们撑腰，政治上把关定向，我们才能顶住各种压力，大胆工作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欧阳钦同志对我个人的关心和爱护。“文革”那年3月份，我到北京做脑肿瘤切除手术。住院期间，他多次派人到医院看望我，打电话要我出院后不要急于回省工作，他说龙江气候冷，你的脑手术怕着凉，让我到南方几个省去看看，休养一些日子，他还指示省委办公厅，以办公厅的名义给几个省发函。我常常这样想，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全体统战干部，全省的统战工作。作为我个人只有加倍工作，把黑龙江省的统战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欧阳钦书记对我的信任、支持、帮助和关怀。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但他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高大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难忘的往事

张 厘

五六十年代，欧阳钦同志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至1964年，我任省委副秘书长，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经常受到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和思想情操的直接熏陶。现在，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他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激励我不断前进。

欧阳钦同志在主持黑龙江省委工作期间，很重视文化艺术战线的工作，他不仅经常教育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生活，不要脱离群众，还强调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他对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爱护和谆谆教导，至今有些同志一谈起来，仍然念念不忘。

记得1964年元旦晚上，省委举办新年联欢晚会，哈尔滨市工人艺术团的部分演员演出了几个精彩的小节目。晚会结束时，已经11点了，欧阳钦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同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同志一起会见了参加演出的演员。两位领导同志和演员们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大家非常高兴。欧阳钦同志的湖南口音，不少同志听不大懂，我就当了翻译。他在询问了一些演员同志的姓名、工作单位等以后，就和大家亲切交谈起来，一直延续了一个多小时。

在座谈中，欧阳钦同志说，做好文艺工作意义很大，它是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得以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精神面貌提高了，就会产生力量，就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欧阳钦同志在谈到党要重视文艺工作时，还对着我和在场的其他同志说，你们都要关心文艺，不关心文艺不是一个好革命者，一个领导干部，不能只埋头抓经济，甚至陷在事务圈子里，不注意意识形态。当时我回答说，文艺的重要性是知道的，但是不大懂，可以说是外行，我以后要注意

学习。

欧阳钦同志强调说，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就要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要演唱自己的东西，特别是黑龙江的。当然，外地好的节目要演，外国好的东西要吸收，但要加以改造，使之具有民族的形式和地方特色。我们要演唱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这就要深入到生产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要脱离群众，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这次联欢晚会上，哈尔滨市工人艺术团演出的节目，都是土生土长的相声、双簧和民族歌曲，欧阳钦同志看了很高兴，其中有一首歌名是《三江平原好地方》，他很喜欢，他深情地说，三江平原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有丰富的水源，有很多没有开垦的土地，是发展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及各种工副业生产的好地方。整个黑龙江物产丰富，潜力很大。镜泊湖就很好，山连山湖连湖，资源丰富，风景优美，是过去抗日联军活动的一个据点，可是现在没有人编出一首好的歌曲来！

李范五同志插话说，文艺活动不要脱离生产，因为脱离了生产也就脱离了群众，当前有的变相脱离生产，也不好。欧阳钦同志接着说，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产，深入生活。搞业余文艺工作的，也要经常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情绪，要从群众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中吸取营养，慢慢集中起来就能写出好的东西来，一次写不好，可以组织人加工。古今中外多少天才的著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比较了解当时的现实生活。没有这一条，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唐朝大诗人李白、杜甫就跑过好多地方，比较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他勉励在座的同志说，现在条件好了，新时代下新人新事多得很，你们接触实际生活的机会也多得很，你们要联系更多的人，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我们要做改造人的工作，要拿艺术感染人，把落后的思想

改造过来。我们也要和你们这些人多联系，通过你们联系更多的群众。

那天，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业余的。因此，当时欧阳钦同志还对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专业与业余的关系等方面，作了一些阐述。他说：你们是业余的，专业团体不要把你们调上来。你们不要脱离生活。有些人就是光喜欢搞洋东西，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有点民族自卑感，或者只愿意搞专业的，不愿搞业余的，不愿意为广大群众服务，只是为少数人服务，这都是不对的。他还说，要多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普及到群众中去，就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普及了才能提高。欧阳钦同志这些话，现在看来，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工人文化宫的同志觉得受益匪浅，希望领导同志多开这样的座谈会。省文化局的同志还埋怨我为什么没有预先通知他们参加。这次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内容丰富，是欧阳钦同志善于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体现，至今想来，很值得我们学习。

1964年前后，欧阳钦同志在不同场合，对文艺问题作过多次谈话。后来，根据他的这些讲话，整理成一篇题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地总结了黑龙江省的文艺工作。这篇长达6000多字的文章，既充分肯定了当时我省文艺战线在党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所取得的成绩，也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提到，当时“最基本的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这是许许多多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看来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的提法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欧阳钦同志论述了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

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指出了文艺工作的重要地位。他还论述了文艺和经济的关系，以及自觉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问题。他号召我省的文艺工作者，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要具有民族的风格和地方特色。他希望我省的文艺工作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自己工作的第一位，必须经常到人民群众中去，同他们打成一片，熟悉、了解并学习他们。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自己革命化。他说，文艺是革命的武器，是促进人的革命化的武器，这个武器必须紧紧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他批评有的过分的强调文艺的“消遣”作用，说什么“歌唱的再好，戏演的再好，也演唱不出粮食和机器来”。欧阳钦同志针对这种说法，指出：固然，文艺不能直接出粮食和机器，但它在振奋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方面却能起很大的作用，群众有了革命的精神，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可以多出粮食和机器。联系现在我们文艺战线的形势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经严重干扰了我们党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回头看，欧阳钦同志的这些论述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因此，把文艺队伍建设成为一支既有高度革命思想，又有高度艺术水平的队伍，才能担负起繁荣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重任。

欧阳钦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些基本思想观点是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我们怀念欧阳钦同志，就应当学习他坚持党性原则的坚定性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把我们今天所担负的工作做得更好。

一位党性坚定原则性强的革命前辈

卫之民

欧阳钦同志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爱戴、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几年，与他交往较多，他的优秀品德和崇高形象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从1954年合省到1965年欧阳钦同志调离黑龙江的整整12年中，我一直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多次陪同他深入工厂、农村视察工作，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参加省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他的讲话、报告，从中深刻领略到这位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很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胆略。

他留给我的突出印象是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党性、组织纪律性非常强，对党无限忠诚。他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从不打折扣，不搞阳奉阴违、弄虚作假那一套。他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期间，始终如一地向全省党员和干部灌输顾全大局、分担困难的思想，反对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建国初期的黑龙江，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还十分艰难困苦。但与内地相比，黑龙江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做为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既考虑黑龙江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又积极为国家多做贡献。记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把全省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的思想由一向注意抓农业引向在抓农业、林业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欧阳钦代表省委提出了实现“三个一千万”的奋斗目标，即一千万吨粮食，一千万立方米木材，一千万吨煤炭，此后，全省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艰苦努力。为此，那段时间里，全省各级干部经常深入基层，帮助基层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我那时也到过很多工厂、矿山、农村和林区，亲眼目睹了翻身后的农民、工人焕发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和热情。广大群众和职工吃不饱，得浮肿病照常坚守岗位，没有消极怠工或旷工现象。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黑龙江也出现了严重的局面，到1961年，粮食总产量降到解放以来历史最低水平，只有95亿斤，1962年上半年，

粮食突破了人们常谈的“危险线”，稍有摆布不当，就有可能出现粮食断空问题。为此，省里采取了压缩城市粮食销量，降低粮食和食用油供应标准，种植早熟作物，大搞代食品等应急措施。即使这样，也比关内一些省市情况好一些，当时有些省已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为了顾全大局，欧阳钦同志代表省委，动员全省党员和广大群众，节衣缩食，支援比黑龙江更困难的兄弟省。为此，全省人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硬是从自己的嘴里节省下 50 多亿斤粮食，支援了国家。

1958 年，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我省迅速掀起的同时，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也盛行起来，那时，我省第一个成立人民公社的是尚志县的长寿公社，省里派了很多工作组帮助他们搞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说什么要把尚志建成黑龙江的“徐水”。当时人们头脑相当热，“深翻地”、“大会战”、“昼夜连战”等口号在尚志喊得特别响，好象只要肯吃苦，拼命干，“共产主义”在几个早上就可以实现了，其实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数，我那时也是带着好奇心到的尚志。在长寿公社看到社员把地深翻 3 尺，把能促进植物生长的熟土翻到下面，却把些生土翻到上面，我很纳闷，我也是庄稼人出身，觉得他们是在拿种地开玩笑，这种办法种树还差不多，种庄稼怎么能行呢？听公社党委介绍他们的五年规划，更令人啼笑皆非，很多规划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什么 5 年内修个公社飞机场，办起个什么样规模的大工厂，农业如何实现现代化等等。他们介绍说全公社已实现了吃饭食堂化。我参观时发现，食堂的锅碗瓢盆都是从社员家拿的，事实上是共了社员的产。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多人似乎认为这已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吃饭不花钱，不管是不是本队的人，老老少少吵吵嚷嚷进食堂。有了食堂，人们似乎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结果不到三个月这个长寿公社的食堂就垮台了。除尚志外，当时的阿

城、肇源、密山等很多地区也都搞向共产主义过渡。浮夸风甚嚣尘上，密山当时要搞钢铁联合企业，办多少多少机械加工业，甚至要办油矿，结果全民大办工业，地里的草长得比苗还高。牡丹江说什么农民手里钱多得没处花，社员每天平均1元5角钱，可事实上有的生产队一天工分是一张邮票钱，这股风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欧阳钦及时批评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我听说欧阳钦去牡丹江视察工作在火车返哈路经尚志时，尚志县委书记的汇报使他大为发火：“搞黑龙江的‘徐水’我怎么不知道？现在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吗？”当听了深翻地的口号“昼夜连战”、“冷也翻，冻也翻，十冬腊月当春天”，欧阳钦生气地说：“地冻了怎么翻？”“‘昼夜连战’，那还能劳逸结合吗？”对阿城、肇源搞共产风的做法，也都提出了批评。这些情况今天听起来，似乎理所当然，可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赶英超美”的年代里，人们的头脑极度狂热之下，欧阳钦同志能冷静思考，敢泼冷水，使人们发胀的头脑清醒起来开始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实在不简单。记得也是那个时期，五常县报出该县已有亩产1000斤的公社。欧阳钦心里很不托底，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亲自到五常调查研究，这次是我陪同前往的。我们到了民乐公社，欧阳钦一块地一块地的查看苗情，他见朝鲜族社员种的水稻高产田，青苗长势很旺，就向社员详尽了解丰产原因，发现朝鲜族社员地侍弄得好，肥也施得好。按一亩地播多少种，出多少苗，每棵苗结多少穗，一个穗产多少粒粮，估算出丰产田能产多少粮，低产田能产多少粮，最后计算出这个公社平均亩产可以达到1000斤。到了这时，欧阳钦脸上才露出宽慰的笑容，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欧阳钦同志留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这位老同志为人正派，在组织路线上一贯讲五湖四海，讲团结，不搞小圈子，反对搞宗派，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合省之初的黑龙江，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同级

干部成堆，如何选贤任能，正确使用这些干部，不搞任人唯亲，调动省委及党政班子的积极性，成为摆在新省委面前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欧阳钦同志一到黑龙江就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我记得《黑龙江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在领导作风上，欧阳钦同志以身作则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重大问题经过民主讨论，亲自订方针，定原则；对具体工作，他放手让分工负责同志或职能部门去办，自己不乱加干预，不陷入事务堆里。所以，和他共同工作的很多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能放开手脚，整个领导班子团结得很好。

欧阳钦同志留给我的第三个印象就是特别爱护干部，在黑龙江至今他对一些干部问题的处理，都被当作故事流传下来。合省之初，高饶反党联盟揪出之后，为肃清其影响，省里召开了党代会，会上很多人揭发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也摆出了与高饶有牵连的人和事，呼吁要揪出高饶安插的代理人，提出XXX不能当书记，XX不能进省委，XXX与高岗有过交往等等，发言很激烈，气氛异常紧张，一些已进入新省委领导班子，原来又与高饶有工作来往的同志一时处于被动挨整的地位，双方都很关注欧阳钦同志态度。此时，如果欧阳钦往主张揪人的一方稍一倾斜，批判风就会立刻燃起，一些同志就会被当做高饶分子揪出。欧阳钦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严格掌握政策，不搞无辜株连。他说，高岗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与他有工作来往的人多啦，能都当做高饶分子揪出吗？那样搞新省委不垮台了吗？现在每当老同志聚集一起谈起这段往事，大家无不感慨，都感到老人家气度非凡，有胆有识，的确是力挽狂澜的人物。

在爱护干部问题上，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被苏联长期关押流放的同志有的被遣送回国，如原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等，他们回到哈尔滨后，一些当年过界到过苏联

的抗联老同志纷纷去看望他们，他们也去拜访当年一起工作战斗过的战友。结果有人反映到省公安厅，说有人与刚从苏联回来的人有接触，怀疑他们是否是给苏联搞情报的间谍，我听后觉得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这些同志 40 年代随抗联过界到苏联，被编入“八十八特别旅”，那时“八十八特别旅”的抗联同志经常以小部队形式回国为苏联搞日本的情报，为苏军进军东北做准备，这是革命活动。今天不能因中苏关系破裂无端怀疑为革命做过贡献的同志。我把想法向欧阳钦汇报后，他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他说：“斯大林时代给苏联搞情报是革命行动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应有区别，人家已向组织讲清楚了，不能因中苏关系有变化再去追究！即使对这段历史没讲的，讲了也就算了。”省公安厅贯彻了欧阳钦的指示，没有乱抓无辜。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把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处理，诬蔑为“包庇苏修特务”，我为此遭到很长时间的批判。

还有一件事，那是 1964 年，省委派工作组到哈尔滨市公安局搞“四清”，当时几个地市的公安局的领导班子都被“四清”搞垮了，哈市公安局也没逃脱这个厄运。可就在工作组给市公安局班子定性的汇报会上，欧阳钦异乎寻常的批评简直使我震惊。前去汇报的是工作组组长、省纪检委一位副书记和国家公安部三局一位副局长和我，当这位副书记汇报到市公安局班子已经毁掉的时候，只见欧阳钦越听脸绷得越紧，汇报刚结束。他的批评就象倾盆大雨，劈头盖脑倾泻下来，他说：“你们把公安局说得漆黑一团，难道他们一点优点没有吗？如果他们都是坏人，我这个省委书记和其他省委领导还有安全保证吗？我不能相信你们这个结论，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坚决反对。”转而 he 生气地对这位副书记说：“你们监委专整别人不整自己，难道你们就没一点错误了？”欧阳钦的这个态度，不仅挽救了一批干部免遭迫害，而且给我们专政机关工作中如何看待问题，敢

于坚持原则，敢于修正错误树立了榜样。

在重大转折关头，在原则问题上，欧阳钦从不让步。他不仅保护了干部，而且对群众更是关心爱护。他经常利用周末晚会找我了解敌情动向、社会治安及群众反映，并及时作出指示。他告诫我说，做公安工作的，最忌讳的是枉抓枉杀无辜，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枉抓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记得有这样一件事：1957年，由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太快，一些富裕中农不愿入高级社，认为穷、富混在一起，自己是“拉帮套”，养活了一帮穷棒子，因此闹着拉马退社搞单干。个别地区出现了偷杀耕牛，破坏生产的行为。实际大多数人属思想认识问题，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是全国第七次公安会议，提出了再给反革命几个打击。当时有个省委书记根据这一精神，和农村出现的治安状况，要求公安机关一个大队抓一个人。欧阳钦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说：“我不赞成他这一套，不能头脑发热嘛。”他对我说：“群众为什么抢粮杀牛呢？首先要了解群众有无饭吃的问题，然后再处理个别少数煽动、带头抢粮的人，不能逢人就抓，盗杀耕牛及猪羊的人都应这样处理，对农民犯法和坏人犯罪要区别对待。”由于第一书记及时给我们敲了警钟，我们在处理农村治安问题过程中没有犯扩大化的错误，只抓了一些有严重盗窃行为和趁火打劫的刑事犯。

欧阳钦的很多品德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往事历历在目，只回忆这几件小事作为对他的悼念，寄托哀思。

深深的印象 久久的怀念

肖杰

1954年原黑龙江和松江两省合并之后，到1966年“文革”前，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因工作关系，我同欧阳钦同志经常接触，并直接听到他所作的一些报告和讲话。尤其在工业方面，还亲自聆听过他的一些重要指示，通过工作接触和多年来的实际体察，我深深感到欧阳钦同志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原则性很强，领导经验丰富，胸怀宽广，善于用人，团结同志，清廉自律，秉公行事，处处以大局为重，全部精力都用在革命事业上，是一位很有理论修养、思想修养的优秀领导者，是深受广大干部尊敬和爱戴的良师益友。他的崇高形象，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志难忘的深刻印象。

合省后的黑龙江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矛盾纷乱复杂，工作千头万绪，到处是需要开垦的“土地”，到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作从何抓起？这对新任的领导者来说，不能不是个严峻的考验。欧阳钦敢于直面考验和困难。在干部问题上他抓了“团结”；在思想认识问题上他抓了黑龙江特点的形势教育；在工作摆法上他提出：“思、农、工、林及其他”；在奋斗目标上他提出了实现“三个一千万”（即一千万吨粮食，一千万吨煤炭，一千万立方米木材）。他的高瞻远瞩，他的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很快令黑龙江干部折服了，大家聚拢在新省委周围。那时，我们工作方向明确，省委有胸怀和肩膀，大家心情特别舒畅，毫无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了甩开膀子大干！

那时，我曾兼任一段省劳动局局长。从1956年开始，回到省委地方工业部、省委工业部，直到后来改为省委工交政治部。工作的直接接触，使我深刻感到他对黑龙江的热爱，对黑龙江工业工作的高度重视。他在分析黑龙江特点时，反复强调黑龙江是新兴工业地区，想方设法将干部的思想由一向注意抓农业转到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因为当时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我省就有22项。除哈、齐、牡、佳4个综合性的工业城市之外，还有鸡西、鹤岗、双鸭山三大矿区。森林面积占全国1/6，每年木材采伐量占全国1/2。所

以，欧阳钦提出新的省委领导工作重点，要由在不放松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向侧重抓工业建设上来，省委领导同志在分工上也把工业工作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同志除管省政府全面工作还管工业，任仲夷、王鹤峰两位书记也分管工业工作，省委工业工作部部长李剑白、基本建设部部长陈雷、林业部部长张世军同志均为省委常委。还组成了以主管工业工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为首的、吸收工业部、省计委、省总工会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领导小组。省委常委会议，经常听取工业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分析全省工业战线的形势，确定各时期的工作任务。适应大规模建设和省委对全省工业领导的需要，合省之后，省委有国营工业、基本建设、林业和地方工业4个部，150余名干部分工负责抓全省工交、基建和森工战线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基层工作，对推动全省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欧阳钦非常重视工业企业中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合省后的1955年7月间，省委就召开了第一次工业政治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全省部分工矿企业推行“一长制”，存在着忽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倾向，欧阳钦同志从理论上，从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上，作了一篇深刻有力的报告。他尖锐提出：“党的领导是统一的、整体的、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毫无例外的”。“一切部门、一切企业，都必须绝对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推行“一长制”中出现的某些摆脱和削弱党的领导、错误的倾向，端正了企业的政治方向，使全省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受了一次很大的震动及党性和党的组织观念的教育。

我记得是1959年秋，以省委的名义，在佳木斯纺织厂召开了全省工交和基本建设系统的干部和部分先进生产者参加的生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的目的是通过企业内部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调动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绕着提高产品

质量，降低原材料、燃料消耗，攻克生产技术关键，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改革企业的落后面貌，广泛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省委责成我具体主持这次会议。在我向省委常委汇报会议的筹备情况和会议开法时，欧阳钦同志对这次会议很关心，他说这次会议内容很重要，对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加快工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定要开好。当时正赶上哈尔滨和佳木斯之间民航飞机首次开航，在佳木斯机场剪彩，要求省里领导人去祝贺。这件事本来应由陈雷同志去最适合，但他有事未能前行。于是欧阳钦同志就让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前去剪彩。而我那时年纪很轻，从未参加过这样隆重的场面，思想多少有些压力。欧阳钦同志看出我的心情，便说：“怕什么，这也是锻炼嘛！”贺词是由李曦沐同志撰写的（曦沐同志是欧阳钦的秘书）。在欧阳钦同志的鼓舞下，我以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乘哈佳首次航班到佳木斯，顺利地完成了开航剪彩祝贺的任务。这件事表明，欧阳钦同志对我省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每个工作环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对干部既有原则要求，又有具体指导。使人感到有一种难能可贵、催人奋进的领导艺术。

实行两手抓，既抓国营工业重点项目的建设，又抓薄弱的地方工业发展，是欧阳钦主持省委领导工业工作又一重要特点。他认为黑龙江省工业结构煤、木、机和军工等所占比重较大，相对来讲以轻工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却是一条短腿。于是他提出省委要采取“保证重点，补长短腿”的方针，充分发挥重工业、国营大企业的优势，加速地方工业的发展。并确定地方工业的发展，必须贯彻执行“三就”（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四为”（即为国营工业、基本建设、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大中小型并举，加快地方工业发展步伐。为了加强党对地方工业的领导，合省后的1956年，省委决定设立省委地方工业部，将对工业管理有丰富经

验的原东安机械厂厂长邹问轩同志调任地方工业部部长，我同邹光辉同志为副部长。地方工业部成立两年的时间里，在促进地方工业发展、推动私营工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省委领导对地方工业工作的重视和领导的加强，有力地改变了有些地方党委重国营工业、轻地方工业，只抓大型企业，忽视小型企业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的倾向，使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得到了较协调的发展。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群众的头脑，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社会主义觉悟，是欧阳钦同志指导工业工作的一贯指导思想。他肯定和赞扬哈尔滨市部分企业职工采取“三因”（因人、因地、因时）、“四自”（自愿结合、自选内容、自定计划、自学为主）的方法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他一再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启发群众自觉自愿，要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注重实际效果。一次，欧阳钦同志针对工厂交接班时背诵毛主席语录曾批评说：“这有多少用处，还不是形式主义！”他向基层干部讲：“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什么都联系，随便联系表面看是毛泽东思想，实际是形式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了。”针对林彪提出的所谓“十六字”（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方针，他强调学习是个慢功夫，应由浅入深，逐步提高，持之以恒。在欧阳钦同志的积极指导下，一度在全省出现了职工群众学哲学、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典型。大庆的“两论起家，铁人精神”，都是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光辉典范，成为全省广大职工学习的一面红旗。

就是这样一位早期参加革命活动，饱经风霜，为革命、为国家、为党的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十年动乱”中却惨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身心受到摧残。

“文革”后，我去北京看望欧阳钦同志两次，他不仅对党毫无怨言，反而还自谦地说：“龙江工作我有错误，龙江的干部是好的，龙江工作有基础，龙江大有希望。”短短数语，催人泪下。欧阳钦同志这种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高贵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博得全省共产党员永远的怀念和敬仰。

革命的风范 光辉的榜样

宗克文

1954年合省至1963年我调国家外交部工作以前，一直任黑龙江省委办公厅主任（后任省委副秘书长），这使我有许多和省委第一书记

记欧阳钦接触的机会，在那段平凡的日子里确实有很多与欧阳钦同志有关的、值得我回忆的、不平凡的往事，以及值得后人学习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貌。

欧阳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黑龙江的热爱，他的口头禅是“守土有责”，他对黑龙江的建设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看着合省后的地图，首先发现了她的天鹅形状，他与工作人员谈起，大家都说很像，从此，他把黑龙江比做天鹅，这一提法还多次出现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他决心把黑龙江变成塞北的江南。为此，他躬身奋斗 12 年。

作为省委书记，欧阳钦的很多思想和品质是值得后人学习的。他善于当“班长”；注重抓大事；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顾全大局为国分忧。特别在北大荒的开发，大庆油田的建设以及三年困难时期征购粮等一系列问题上，充分体现了老革命家的博大胸怀。这些方面的内容很多同志都已经提及，我不再赘叙，只想就感受深的几件事进行回忆，以示纪念。

黑龙江地处边陲，与苏联有 3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欧阳钦对边境建设十分重视，他的“门当户对”思想一直是我省开发建设边境城市的指导方针。所谓“门当户对”，即是我们的边境城市要与对岸苏联的城镇门当户对地搞建设。黑河的对口城市是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我们叫海兰泡，按着欧阳钦的思想就是要把黑河建设得象海兰泡一样。那时，两个城市就进行过以物易物的小额贸易。但是，那时我们的经济不发达，边境上交通、电讯都十分落后，曾出过这样的笑话：老百姓看到对岸群众敲锣打鼓，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苏联人在庆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为此，欧阳钦亲自指示黑河，狠抓了边防站的建设，增添了通讯设备和机动船，架电线、设电台、筑路、建桥，改善边疆与内地联系的条件，使黑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欧阳钦的革命坚定性是所有和他接触的同志都明显感觉到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报纸上连续报道河南、山东放卫星，河北丰产田一亩地产多少吨粮。欧阳钦同志在这种时候提出八字原则：不务虚名，力求实效。那时候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人算了一下按河北丰产田提供的数量，粮食铺在地上得一尺厚，在那种浮夸风鼎盛时期，做为领导的欧阳钦不务虚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气魄和政治远见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人也提：我们为什么不放卫星？黑龙江落在了全国后头等。欧阳钦同志说：我们就是不放卫星，我们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干事情。当时很多领导象邹文轩（已去世）、任仲夷等同志与欧阳钦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记得当时在领导班子中开会，议论当时河南年产4亿吨粮食时，欧阳钦说：“他们是务虚4亿吨，虚实并举2亿吨，真正务实1亿吨。”

胡耀邦同志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灾难，“大跃进”是半个大灾难。的确，从1960年就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里既有天灾也有人为的因素。

省里负责农业的领导到山东某县参观过那里的深翻，翻地1米5，平常的铁锹不够长，还要接一块。参观的同志回来以后就想在我省提倡，还要组织省里农口到该县开现场会。但在向欧阳钦书记汇报时，欧阳钦斩钉截铁地说：“瞎胡闹，你们是受山东省委领导，还是受黑龙江省委领导，如果受黑龙江省委领导，我不允许去。”非常坚决果断。实际深土翻上来不仅增不了产反而要减产，会破坏生产力。由于他的阻止，避免了一次劳民伤财的事情发生。

在我负责省外事办期间，有一次我列席参加常委会，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说：“我有一个小事要谈。”欧阳钦同志说：“什么事？”我说：“是外事。”他马上接上来说：“外事无小事。说吧！”对于

外事工作，总理提出：“责任重大，授权有限。”欧阳钦同志的“外事无小事。”也是说明这个道理。当时我听了他这句话感慨很深，这不仅表现了他对外事工作的关心重视，同时也表现了他头脑清晰，思想敏锐。在以后的工作中，特别是我先后在匈牙利、捷克、塞拉利昂、塞内加尔、朝鲜做外事工作时，我时时都在用周总理和欧阳钦同志的这些原则督促自己做好外事工作，把这些话当成了我后半生的座右铭。

欧阳钦同志对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常委会议上，有的副书记迟到，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随他从大连调来的干部李曦沐同志，是他的文字秘书，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大学生。欧阳钦同志很喜欢用历史典故，还能随口吟诵一段唐诗，当时工农干部多，一般对不上，只有曦沐同志能答上来，他是很爱护，也是很尊重知识分子的，但是他批评曦沐同志也是严厉的。在大跃进时，有些年轻同志曾问过他：“为什么我们不放卫星？”欧阳钦同志回答：“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有时他针对一些在身边的年轻干部的不正确言谈，不留情地说“这是右的思想。”

记得有一次，欧阳钦书记通知我在 107 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当时的事情多，这件事给忘了。欧阳钦同志到点便准时去了会议室，一见没有人很发火，我知道出了漏子，赶快把地委书记找了去。事后他批评了我，但并没因为这件事改变对我一贯的看法，以后还是照样信任和使用。

欧阳钦同志是一位很有气魄很有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他经常告诫干部，既要善于处常（平常的工作）又要善于处变（突发事件），而且要多谋善断。那是 1954 年至 1955 年发生的事，他乘火车到齐齐哈尔市视察工作，在列车到达齐市之前，齐市同志汇报，几万名山东移民把政府包围了，正在闹事。原因是，我们在山东动员那里群众到东北来的宣传工作，有些夸大其词，说东北这里是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但移民来了一看只有草房荒地，气候又这么冷，就一起找政府了。当时那里有些领导很担心，准备动用军队。欧阳钦同志听完汇报，当机立断，立即起草一份《告山东移民书》，印刷了几万份，内容真实地介绍了当地的条件，说明这里需要建设的情况，最后给了政策，来去自由，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结果不用一兵一卒，就迅速平息了这一事件。这件事使我受益匪浅。以后在国外，无论是出任政务参赞或是大使期间，经常处在较多的突发事件中，我都能比较沉着地和他们协商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和当年欧阳钦同志的教诲有直接关系。

欧阳钦对安排会议的要求是：内容要和形式紧密结合，就是说，会场的布置和各项准备工作都要求很细致。他平时对自己的仪表也很讲究，在什么样的场合着什么样的服装，很注意保持领导者的风度。开会有他参加，门卫谁也不会拦他，但他仍然持票入场，对下面的同志很尊重，不失小节。

一次，周总理和邓颖超一同视察黑龙江时，他对为总理夫妇安排的住宿亲自检查，对房间的安全过问得很详细。

当时，黑龙江发展较晚，经济落后，地处边疆，外地人很少来到这里。中央选在各地区开的会议，也很少选在黑龙江开。欧阳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件事，他说：为什么中央有些会议不能到哈尔滨开呢？为了这个目标，他提出建北方大厦和花园邨，并委托李剑白、吕其恩，我和赵云生几位同志一起筹划。北方大厦 1959 年春动工，年底就盖好了。花园邨是吕其恩同志亲自抓。当时北方大厦被称为“政治工厂”。

欧阳钦同志的业余生活不太多。他只喜欢跳跳舞，看看电影。他对跳舞的格言是：不做音乐的奴隶。无论三拍还是四拍，他都踩一个节奏一种形式。可看出，欧阳钦只是把这当成消除疲劳活动身体的运

动。他说：跳跳舞除了健身外，还是联系群众的好方法。有一次我们为他安排的电影是战争片，他看了以后对我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白天也要不断开会，晚上看电影也要打仗开会。”后来我们考虑让他放松思想，消除紧张疲劳，便选映一些娱乐片。

“文革”期间，他受到很大冲击。他唯一的儿子欧阳湘也在一起“红心箭”事件中被逼无奈跳楼身死。以后总理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患有哮喘病。当时我在国外工作，有时回到北京去看望他。他始终不承认什么“黑省委”，即使有人说：你只要承认走资派就给你安排工作，他也不承认。他坚持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认为自己有错误，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因为一时好受瞎说一气，给组织调查造成麻烦。他说：大事情，是真的我也承认；小事情，只要不真实也没有。

我从1967年1月到1970年8月从国外回国参加“文革”，那时把我揪出来批斗，欧阳钦同志的那种精神，给我增添了不少勇气。“文革”时期没有真理。你哭，人家说你是鳄鱼的眼泪；你笑，人家说你是笑里藏刀；不哭不笑，人家说你无动于衷，就连晒太阳也被说成是“逆流”。真理只有在我们自己心中。

1978年，欧阳钦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他带着那么多的遗憾走了。我们深切地缅怀他。他对黑龙江初期建设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历史会记住他。

一叶知秋

陈冰岩

欧阳钦同志从1954年8月到黑龙江省任省委第一书记至1966年2月调任东北局第二书记，这段时间我和他有过多工作接触，特

别是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经济工作时，我做为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常去列席会议，从他的言论行动中，受到很多教益，深感这是一位政治方向坚定，党性原则很强，作风深沉稳重，善于团结同志，能够把中央方针政策与实际情况很好结合起来进行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革命者。

下面我举三件事来说说我从他身上所受到的教益。

第一件事是 1954 年冬全省征购粮期间，在地、县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了“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当年黑龙江省遭受了低温早霜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作为全国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当时称“北有龙江，南有四川”。这两个省是国家商品粮的支柱，其粮食征购状况关系全国人民的生活。当时国家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城市人口增加很多，而且关内有些省份受灾，需要国家拿粮食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求黑龙江省能多购调一些粮食帮助国家度过困难。而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地、县、委书记纷纷反映灾情，要求削减征购任务。我当时正抓粮食征购工作，常到乡下做调查，和农村干部座谈年成和“三留”（口粮饲料种籽）时，农村干部说国家政策规定每个农民口粮标准是 560 斤，马料是 1200 斤，种籽按需要留够，所以农民有个说法叫做“够不够，560”。按这个政策标准很难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农村干部提出质问说是政策服从任务，还是任务服从政策？我找农民社员了解情况时，农民也说“够不够，560”，人吃不饱，马喂不肥，明年的地就难种了。这就出现了局部和整体、地方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每个领导干部所面临的重大原则问题。欧阳钦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全国一盘棋”思想，力排众议，并经常委会多次讨论，提出“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方针。

他亲自在地、县委书记会议上进行动员讲话，教育大家要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着眼来处理问题，共产党员更应想到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我们祖国的光明未来，也就没有黑龙江人民的前途。我省今年虽然遭灾减产了，但比起有些省来，情况还是好一些，只要我们厉行节约，克服浪费，是可以为国家分担一些困难的。他号召各地委、县委向广大农村干部并通过他们向全省农村社员讲解全国形势和省委的这十六字方针，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尽量向国家多交售一些粮食。他的讲话提高了与会者的思想认识，大家情绪起了根本变化，原来要求削减任务的地、县委都表示尽力工作，完成征购粮任务。原来只想完成原定任务的地、县委也表示尽力挖掘潜力，争取超额完成任务。欧阳钦同志代表省委所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不但在粮食征购上起了正确的指导作用，在其它经济领域及各条战线也都是按这一方针行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好掌舵人，好领头人，我也从中深受教益。

第二件事是他在 1959 年冬的全省财贸 6 级干部会议上，向全省财贸干部和职工工作的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的讲话，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当时全省财贸部门暴露出的问题是和生产部门有时协调的不好，和群众关系有时不够融洽，一些生产部门反映商业是“多了砍，少了赶”，不支持生产，反映财政部门是“要的多，给的少”，不培养财源；反映金融部门是“管卡压多，雪里送炭少”。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方向原则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财贸部门如何正确处理和生产单位、消费群众的关系。财贸部门有不少先进集体，既是支援扶助生产的后勤部，又是为群众优良服务的红旗单位。欧阳钦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全省财贸 6 级干部会议上，深刻阐述了财贸工作应树立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即在政治上要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服务，在工作上要坚

持从生产出发，通过流通和分配，促进生产开展，在生产开展的基础上，保障日益增长的人民消费需要。他说生产是财贸的基础，生产不发展，财贸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他要求财政金融部门通过资金扶持来发展工农业生产，开辟财源，扩大积累，克服单纯财政金融观点。要求商业、粮食、供销、外贸部门通过参与生产，规划生产，建立示范基地，扩大购销活动来推动生产发展，增加商品量，增加市场供应，增加出口货源，把内外贸易工作牢固地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克服单纯商业观点。并要求财贸部门实行“三参一改两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内部群众和外部群众监督相结合，以提高财贸工作的群众观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欧阳钦的这一讲话当时震动很大，全省财贸干部和职工一致感到受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认为财贸工作的方向更明确了，路子如何走法更清楚了，工作前程更有奔头了。虽然后来受“左”的路线的影响，像其它战线一样，财贸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但讲话的精神一直牢牢地扎在广大财贸干部的心中。

第三件事，时间大约是1971年冬，他在省立医院10病房住院治疗。那时我的审查接近尾声，还未最后做出结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先是“以走资派”，后来又“以苏修特务”嫌疑关在“牛棚”，隔离审查。造反派批斗时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欧阳钦为首的“黑省委”的黑干将，是“黑省委”反党叛国集团的成员，让我揭发欧阳钦和省委的问题。这自然使我不断惦念欧阳钦同志，他的遭遇如何呢？他的现状如何呢？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年岁又比较大了，这场疾风暴雨的打击他能受得了吗？实在令人担心。当时我在反省室，没有人身自由，外界的消息听不到，内心很是忧虑。但不管造反派怎样逼问，我坚信欧阳钦同志是搞社会主义的，不是搞

资本主义的，诬蔑欧阳钦和省委，陷害革命领导干部，实在令人愤慨。我反复回想欧阳钦在省里 12 年的所言所行，怎么也接受不了当时造反派所捏造的以欧阳钦为首的原黑龙江省委的罪名。欧阳钦不断教育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他从言论到行动都是真诚拥护毛主席的，怎么会是反对毛主席的走资派和黑龙江省反党叛国集团的首脑呢？我越想越思念欧阳钦同志，越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当我听到他在省立医院治病时，赶快去医院看望他。当时他的夫人黄葳陪伴他。当我走进病室看到他闭目仰卧，面色苍白，身体非常瘦弱时，一股辛酸之情涌上心头，这么一个 20 年代就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下与国民党无畏奋战，经过长征，遭受千辛万苦的老革命家、老共产党人竟被折磨成这样，内心更加悲愤，感到干革命太不容易了。我努力抑制自己，轻声说：“欧阳钦书记，我来看你了，你身体好吗？你还认得我吗？”，他听出我的声音，立刻睁开眼睛，伸出瘦弱的颤抖的手和我相握，激动地说：“我怎么能忘记你呢，我们在一起相处 10 多年，你是陈冰岩，搞财贸工作的。”又说：“人家说我是省内最大走资派，‘黑省委’反党叛国集团的头子。这次造反派和省革命委员会把我从北京揪回来批斗，先放在五常县城看管，因我有病又把我送到这里，硬要我承认犯走资派错误，我坚决不承认。我是跟毛主席闹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怎么能说是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呢，如果我不顶住，省委其他同志怎么办呢。他们看我态度坚决，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改悔。问题就这样搁着。”他问我的情况怎样，我说已经解除了反省，尚未最后结论。不过苏修特务的问题是完全否了，他们还想定我犯方向路线的错误。欧阳钦又说：“你们跟我受牵连了，我已把我的意见寄给周总理，如果我定不了什么，你们的问题也解决了。”我看他语言微弱，呼吸吃力，说话颤抖，祝他好好养护身体，把病早点治好，赶快出来了。没想到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这次

探望使我深深感到欧阳钦同志真不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贞不屈，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这是我从欧阳钦同志身上所受到的又一教益。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 10 多年了，我也过了古稀之年，岁月无多，仅记这三件事来表达我对这位卓越的领导人的永远怀念和敬重。

他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

梁志超

在欧阳钦主持省委工作期间，虽然除工作之外，我很少和他个别接触。但他那种对人民无限忠诚，工作上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至今还时时教育、启示、鼓舞着我们。

我是做教育工作的，“文革”前一直任省教育厅厅长，工作接触使我深深地感到欧阳钦十分重视黑龙江省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重视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在他的领导下，合省后我们狠抓了扫除文盲的工作，省委常委会议曾多次专门听取教育部门关于扫盲工作情况的汇报，足见省委对教育工作是多么重视！一次汇报中，我们讲困难讲得多了些，如经费问题、扫盲标准问题、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学习问题等。欧阳钦听后在最后总结发言时说：扫盲是件大事，不论工厂、农村，文盲充斥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高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关系到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技术水平，所以十分重要。但工作方法要灵活多样，要求不能过高。扫盲工作是群众性工作，要大力依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解决种种困难。经费除国家帮助外，更重要的是依靠群众，解决师资问题也是如此。可以以民教民。对工作要有信心，要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党要我们在那里做工作，就是要我们去解决困难的。这次会议省委其他常委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给我们教育、启示鼓舞很大。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终于使全省文盲比例明显下降。并于1958年获得了国务院奖给的一面“扫盲先锋”的红旗。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出现了一些夜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客观提出了不仅要发展技术科学，还必须重视发展基础科学。不然技术进步和更新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此，欧阳钦十分重视，1958年他亲自过问初创的黑龙江综合大学的建设。他决定除外语学院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外，从师院和其他院校抽调一部分师资，还要到京、津、沪去招聘师资，并决定当年投资100多万元，扩建校舍、试验室和图书馆，调刘达同志任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抽调一部分学有所长的部局级干部充实学校领导班子，

任命六七个人任系主任、总支书记，并指示学校要加强党的领导，重视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教学业务上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劳动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从而给黑龙江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欧阳钦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又创办改造了几所为本省经济建设服务的高等院校。如工学院、商学院、煤炭学院、轻化工学院、农机学院等。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普通教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后，得到了空前发展。每个大中城市都有几十所完全中学和初中，每个县城都有一所、几所完全中学和初中，乡有初中和完小，村有完小，屯屯有小学分校或下伸点。教育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强调政治思想工作领先，注意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思想教育，学校和师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教育与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许多学校有了小农场、小饲养场、小林场以及小工厂、小试验园地等，这些都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这一切都为今天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创造了条件，也为以后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做了物质和师资的准备。

回顾黑龙江教育的发展，我们十分怀念为之付出辛勤努力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虽然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实事求是的典范

刘振荣

欧阳钦同志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黑龙江省工作了十几年时间。我虽然与他直接接触的时候不多，但是他高尚的思想品质、丰富的领

导才能和严肃、求实的工作作风，却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每当我回忆起他的时候，使我感受最深的一些事情总是历历在目，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和崇敬。

作为省委书记，欧阳钦致力于振兴黑龙江经济。1954 年他任新的黑龙江省委书记不久，就在讲话中指出，黑龙江省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要快速的发展黑龙江，就要突出抓发展生产力这个经济建设的中心。在省委召开的第一次干部大会上，他明确要求近几年内全省的粮食、煤炭、木材的产量要为突破三个“一千万”而努力奋斗。这个战略目标是他经过细致调查研究，周密的分析预测后提出来的。那时我任省商业厅长，负责收购、销售、工农业主要产品，这个目标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54 年全省粮食产量 703 万吨；原煤产量 713 万吨；木材采伐量 909 万立方米。因此，经过努力实现“一千万”是有根据的，欧阳钦把发展黑龙江省的生产力水平的立足点放在了粮、煤、木上，这是他高瞻远瞩的领导水平的体现，这个政策确实是符合我省省情的，发挥了优势，扬其之长、避其之短。

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1958 年全省粮食产量就达到 878 万吨，1956 年原煤产量就达到了 1101 万吨，1958 年原木产量也达到 1072 万立方米。支援了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急需。

作为领导者，欧阳钦注意掌握政策，驾驭全面。1955 年 11 月，省委召开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会议。根据欧阳钦同志指示，制订了黑龙江省对私人工商业改造规划。可是 1955 年 11 月末，北京市宣布对私营工商业全部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在这一形势推动下，全省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为龙头，各地、市、县于 1956 年 1 月 27 日也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宣布实现了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

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在这种骤变的形势下，欧阳钦同志显示出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很快就发现公私合营之后，出现了缩短营业时间，减少经营品种，降低服务质量；特别是有些地方，不适当地把小商贩、夫妻店合并了，违背了自愿互利组织合作的原则，网点的减少给居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鉴于此种情况，欧阳钦同志及时指出，这样做是违背 1955 年 11 月 16 日由陈云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六点意见”精神的。要求各地、市、县必须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做必要的调整工作。而后，我省商业部门转变了经营作风，方便了群众。

1957 年秋，省委召开一届二次党代表大会，哈尔滨市的领导人在大会发言中，批评国营商业部门在工业部门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中，有严重的官商作风，尤其是对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的产品既不收购，又不准在市场上销售，简直蛮不讲理，是一种恶霸作风。听了这些不实之词，我要求在大会上发言，说明问题、澄清事实。大会主持人怕冲淡会议的民主气氛，只允许我书面发言。欧阳钦得知后，他认为在党的会议上，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才是真正的发扬民主。当我在大会发言中讲明情况后，代表们由气愤转向谅解。认为工商产生的矛盾，来源于统购统销和统一分配，还有质量、价格方面的问题，双方都应消除抵触情绪，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政策协商解决，共同做好市场供应。

1960 年到 1962 年，全省发生了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农业欠收使 1960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 106.8 亿斤比 1959 年的 170.2 亿斤下降了 63.4 亿斤，1961 年的产量下降到 95 亿斤。这样的收成不但不能支援国家，连本省城乡人民的口粮也保证不了。在这种灾情下，省委要求我们商业部门想办法，度难关。各级商业部门积极落实省委的指示，充分利用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等

制造出各种代食品和代饲料 200 多种，从而保证了人吃畜喂。1960 年 3 月，欧阳钦同志在省二届党代会报告中指出：“生产决定流通分配，流通分配反过来又影响生产，这是一条辩证规律。”因此在农业遭灾的困难时期，要求商业部门从农业生产出发，通过流通和分配，促进农业生产尽快恢复正常。

这几件事情是我亲身经历的，虽然过去了 30 多年，我还记忆犹新。欧阳钦同志就是这样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善于明辨是非，敢于负责，出于公心，正确地处理各种纷纭复杂的问题，以实际行动教育了大批干部。总之，欧阳钦同志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虽然离开我们 10 多年了，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在，将激励我们前进。

关心妇女工作的好书记

吴琳涛

作为省委书记欧阳钦对妇女工作是十分重视和关怀的，他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关心群众，体贴入微，至今回忆起来仍是那么感人至深。

那是 1962 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欧阳钦同志主动提出要接见各界妇女代表，并请她们到 107 招待所观看文艺节目。在研究接见的具体事宜和准备工作的汇报会上，欧阳钦的发言对我们触动很大，他说：“被接见的妇女代表中，不仅要有经常参加省里、市里一些活动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知识界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等，更要注意那些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不容易被人注意和重视的妇女代表来参加，尽管那些角落里工作的人数不多，也要有代表来。比如，扫大街的清洁女工，经常值夜班的护士、助产士，幼儿园的教师等等。”他要我们“好好想一想，挖掘一下，还有什么角落有妇女同志在辛勤工作。不仅这次要请她们的代表来参加活动，而且今后有关类似的活动，都要请她们的代表参加。”他强调说“要给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创造条件，这也是宣传她们的工作，对她们的工作的实际肯定嘛！要使社会各方面认识她们的工作，重视和支持她们的工作，才能提高她们的政治地位”。他嘱咐我们要做好组织工作。欧阳钦书记的这一席话，使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我们被省委书记心中装着广大妇女群众，关心着她们的生活、地位、权利的强烈的群众观念折服了。

更使我感动的是 3 月 7 日晚当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庆祝活动结束时，已是晚上 10 点多钟了。欧阳钦同志穿好大衣走出会场准备回家，却发现许多与会代表还站在走廊里，原来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了，他二话没说，转身去找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吩咐马上派车送代表回家。直到最后一位代表上了车，欧阳钦才满意地离去。这件事情虽小，但足以见省委书记欧阳钦是何等关心群众、体贴群众啊！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感触颇深，50 年代时，哈尔滨的外国专家有一二百人。每年省妇联和哈市妇联都请外国来华的女专家、专家夫人以及外交官员等，参加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联欢会，我方有

省、市领导及他们的夫人出席。每次欧阳钦及夫人黄葳同志，总是彬彬有礼，礼貌待客，他们以主人的姿态，主动热情招待客人。在客人们到来之前，欧阳钦和黄葳同志，总是先于客人到场，等待客人们到来，陪同客人们一起入场。联欢会结束，也总是等外宾们走完以后，他们才离去。我们与欧阳钦接触不多，但就在这不多的短暂接触中，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优秀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重视妇女工作，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强调全党做妇女工作，是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省委的一贯思想。从1954年8月合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省历届妇女代表大会，欧阳钦及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到会接见与会代表，并做重要讲话、报告。平时省委除书记处有一位书记分工负责领导妇女工作外，在省委常委会上，还要直接听取省妇联党组的工作汇报，并进行讨论，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今后努力方向和贯彻执行的意见。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妇女工作，每年不少于一至二次，并且形成了制度，坚持执行。省委还经常把省妇联党组向省委的报告批转各市、地、县委贯彻执行，推动全党作妇女工作。此外，省工会、省妇联、团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这些会议有的是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或全会）精神的；有的是讨论省委重要的工作部署的；有的是学习讨论重要社论或文件的等等。这样一来，使群众团体的负责干部便于领会省委的精神和部署，安排好本部门的工作，完成好本职工作。这是欧阳钦同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形成的党加强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一套优良的工作制度和传统作风，我从1954年合省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0多年间，一直担任省妇联副主任、主任、党组副书记、书记，在工作实践中，对此感受很深，受益匪浅。

回忆往事，我们对欧阳钦同志无限怀念，他对妇女工作的关心，

他对妇联工作的指导，他的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至今仍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永远怀念老书记欧阳钦同志！

学习欧阳钦同志的优秀品德

李曦沐

从 1950 年到 1957 年，我在旅大市委和黑龙江省委给欧阳钦同志当了 7 年秘书，以后在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直到 1960 年调东北

局，在欧阳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达 10 年之久。现在，虽然时光已经流逝很久，但他的一些重要事迹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是画大字的”

熟悉欧阳钦的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他是非常注意并善于抓大事的。他作为第一书记，具体工作放手让别人去做，对大事则亲自出谋划策，抓得很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画大字的。”

欧阳钦同志抓大事，突出表现在，他到一个地方工作，首先研究分析这一地区的形势、特点，把它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确定工作方针，统一干部的思想。在旅大如此，在黑龙江也是如此。

欧阳钦同志 1948 年到旅大任区党委（后改市委）书记。当时旅大还由苏联驻军实行军事管制，我党在那里还没有公开。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有外交关系，并订有条约，我们实行与其他解放区不同的政策和做法。有些干部对此意见纷纷，认识很不统一，不断争论旅大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区，意见的分歧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欧阳钦同志去了以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明确提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作为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要大力支援解放战争，这是共性，但作为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又必须照顾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有外交关系这一情况，在一些问题上不能采取与其他解放区完全一样的具体政策和作法，这是它的特性。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旅大形势，向干部作报告，深入地阐述了这些问题，并批判了“以苏为主就是以我为奴”、“不能和苏联一个鼻孔出气”等错误和片面的说法，组织干部反复学习，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这样，旅大作为最早掌握在我党手中的工业城市之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发展很快，在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旅大的一

些老同志在回忆欧阳钦同志在旅大工作那一段历史时，也说那是旅大的一个黄金时代。

1954年东北大区撤销，松江和黑龙江两省及哈尔滨市合并组成新的黑龙江省，欧阳钦同志调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到黑龙江以后，也是从研究形势特点入手来确定工作方针。原松江和黑龙江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大家对抓农业比较熟悉。对抓工业则比较生疏。但是，经过抗美援朝时的“南厂北迁”（1950年10月，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国家调整东北工业布局，从沈阳、丹东等地北迁来哈尔滨12个大中型企业），已增加了不少工厂，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又新建并正在计划新建一些工厂，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黑龙江就有22项，到1954年已有10项施工。在此情况下，黑龙江省工作到底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业为主，抑或是工农并重，就成了大家议论的重要问题。合省之初，欧阳钦同志刚到那里，情况还了解得不深，在他主持起草的“八·一”庆祝新省成立的社论中提出黑龙江省是重要的工业、农业地区，无论工业、农业、林业生产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但他觉得这样还未完全说明问题，就继续深入研究和思考，不久就提出黑龙江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地区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并要我搜集材料，准备一篇报告。我详细向省委主管工业、基本建设、农业、林业的李剑白、陈雷、于杰、洪澍、张世军等领导同志请教以后，根据欧阳钦同志的授意，起草了《关于黑龙江省若干情况特点及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经过他和省委常委多次研究修改，形成了他当年11月代表省委常委向省委第二次全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分析省内的工业和基本建设情况后，明确提出黑龙江省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地区，必须“把对工业建设的领导摆在最重要的地位，把保证重点建设的完成，保证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保证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如果对这

一点估计不足，我们就将犯重大的错误。”要求“把全部工作结成以工业为中心的整体，使各种工作都能适应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适应工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与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孤立观点，加强配合协作。”报告还进一步分析了工业建设内部的状况，提出要解决高度的技术要求与现有的技术水平、技术力量之间的矛盾；解决先进企业与落后的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针对职工队伍迅速扩大，新工人成份大量增加的情况，要加强职工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报告同时也详细分析了农业、林业的情况，阐述了其重要性，要求在加强对工业建设的领导时，绝不放松对农业、林业的领导，防止发生片面性。全会一致同意这个报告，并报中央审批，这就成了新的黑龙江省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把全省同志的注意力从一向主要抓农业转向在抓好农业、林业的同时，大力支援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对黑龙江省以后几年工业建设及其它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后随着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暴露出农业、轻工业以及农业中的副业与重工业不相适应的矛盾，欧阳钦同志又适时地提出了“保证重点，补长短腿”的方针，经过全省同志的努力，使经济得以比较协调地发展。这也是欧阳钦同志注意并善于总揽全局研究确定工作方针的一个重要表现。

欧阳钦同志注意抓大事，还表现在他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不论在旅大或在黑龙江，他作为第一书记，对应由政府管的事情一般都不加干预，而放手由政府去做，他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思想领导上。因此，长时间与他共事，在旅大任市长，在黑龙江省成立之初任省长的韩光同志，在他逝世10周年时说，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实际上就已是党政职能分开了。欧阳钦同志很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在旅大和在黑龙江的头几年，他精力还好，党报的所有社论在发表前他都亲自审改。1955年3月，黑龙江省委召开有县委书记

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他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列举大量事实，批评了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种种表现，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党的思想工作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每个党员都要把思想工作看作自己份内的任务”。这篇讲话引起很大震动。在 1956 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他专就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作了大会发言，批评了把党的组织摆在行政组织的附属地位和事无巨细都摆到党委会上讨论这样两种忽视和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会议休息时，毛主席见到了他，说讲得好。1958 年，他对省委和全省工作提出这样的次序：思、农、工、林及其他，也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毛主席的赞许。

“既能处常，又能处变”

在欧阳钦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盛赞他作为第一书记掌舵掌得好。1959 年在黑龙江省委常委的一次交心会上，杨易辰同志说欧阳钦同志“既能处常，又能处变”，这对他是很中肯的评语。处常，相对地说还比较容易；处变，则需要有更高的认识能力和更大的魄力，有时还需要有反潮流的勇气。欧阳钦同志自己也常说：“一个干部到底怎么样，往往要在转弯抹角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正是在转弯抹角、风急浪涌的时候，欧阳钦同志更显示出一个高明的掌舵者的胆识和本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那时全党全国都发了高烧，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刮遍祖国大地。欧阳钦不能说一点也不热，但相对地说比较冷静，在基本理论观点上没有失去清醒的头脑，在实践中没有忘记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张春桥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条件论”，文章登在中央的党刊上，显然是有来头的。但欧阳钦同志没有顾忌这些，在省委一次常委会议上公开批评这篇文章是鼓吹唯心主义。他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讲条件就是唯心论。徐水的经验那时被吹得神

乎其神，成为最先进的样板，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一个问题时，有关部门提出一种办法，欧阳钦同志表示反对，有的同志插话说：徐水就是这么办的。欧阳钦听后突然发起火来，大声说：“难道徐水是我们的爹？”当年秋天，全国大搞深翻地、水利化、轴承化，东北进展不快，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给东北三省第一书记发来电报进行批评。欧阳钦同志看到电报后到牡丹江地区检查工作。到尚志县的时候，县委书记汇报说，为了大搞深翻地，把男女老少都动员下地了，有的孩子妈妈把孩子锁在屋里自己哭着去下地，因为工作不力，他当场撤了6个支部书记的职。欧阳钦听了以后说：“你尚志有志，这很好。但这样搞不行，不能不讲政策。”那时，全国都在大搞“小土群”，大炼钢铁，到处放“卫星”，对黑龙江压力很大。全省已上去20万人，铁的产量还是上不去。欧阳钦同志在外地视察的时候，家里的同志讨论，准备再动员一二十万人上山找矿石炼铁，并起草了一篇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的社论，送到鹤岗给欧阳钦审阅。他听了前来同志的汇报，看了社论稿以后说：“现在正是秋收时节，矿石一时拿不出来，不会烂掉，但粮食拿不回来就会烂在地里，大炼钢铁的人一个也不能再加了。”这些在今天看来都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了解情况的人知道，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正是由于作为第一书记的欧阳钦同志在那样的时候仍能采取比较冷静的态度，使黑龙江省减少了不少损失，1959年还能向国家上交30多亿斤粮食，超过四川成为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为国家分担了困难。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欧阳钦同志的这一特点更有突出的表现。1966年5月，全国正在批判《海瑞罢官》，他在北京治病，我去看他。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是学历史的，并知道吴晗是我的老师，他深有所思地对我说：“这样批判，以后谁还敢研究历史？”这说明，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的那一套

就有不同的看法。后来我又听说，他对于给他作的走资派错误的结论，一直拒不接受，宁肯继续靠边站不出来重新工作也不肯在结论上签字。对把省委其他书记定为走资派错误，他也不同意，说我是第一书记，有错误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唯一的儿子欧阳湘被迫害死了。欧阳湘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生活朴素，喜好读书，对人诚恳谦虚，毫无高干子弟的特殊化习气和优越感，小时候同志们给他起外号叫“老百姓”，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就入了党，毕业后在长春搞尖端科研工作，风华正茂，不幸惨死。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自己被打倒了的全身是病的老人是何等残酷的打击。但据黄葳同志说，老人对爱子的死虽然极度难过，但仍然很平静。1975年我到北京出差去医院看他，他也只喃喃地说了一句：“湘湘死了。”我怕他难过，赶忙用别的话岔过去。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狂风恶浪袭来的时候，愈加显示出欧阳钦同志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就是要美丽二字”

1959年黑龙江省召开党代表大会。在准备欧阳钦同志代表省委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时，欧阳钦同志给报告命题：“为建设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省而奋斗。”对这个题目中的“美丽”二字我几次表示反对，欧阳钦同志对我的坚持已见很不高兴，生气地说：“你不写我写，我就是要美丽二字。”他为什么要坚持用这两个字呢？后来我联系一系列事实体会到，这是因为他热爱黑龙江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早年立志救国而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现在革命胜利了，可以建设了，他充满雄心壮志和热情要搞好建设，因此，到一个地方就热爱一个地方，就要建设好这个地方。在旅大，在黑龙江都是如此。他常说：“凡是搞建设我都支持。”

1949年4月我党在旅大公开。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代表

区党委作报告，提出“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口号。在全国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作为总的工作方针，应该说是很有远见的。为实现这个方针，他和区党委不仅十分注意工农业生产，积极提倡向苏联学习，加强企业的计划、技术、财务管理，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使工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提高，而且很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48年他派沈其震同志到香港去，聘请一些思想进步愿到解放区工作的专家、学者来到大连，随后办起了大连大学。当时大连还建立起由文化宫、文化馆、文化站组成的群众文化教育系统，开展了很有生气的群众文化活动。对在职干部，也提倡业余学习科学文化。由于大连解放较早，工业较多，并有向苏联学习的有利条件，加上市委提倡学习，大连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随着大军进关，大连外调的干部，许多人成为经济工作的领导骨干。

欧阳钦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建设大庆油田和开发北大荒的支持上。1959年正当开始出现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时候，大庆油田发现了。国庆前夕，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支援油田的开发建设问题。欧阳钦同志深知这个油田的发现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提出“全力支援，全力以赴”的口号，组织了由省委主管常务的书记强晓初同志任组长的支援大庆领导小组。大庆需要什么，只要省里能解决的都全力给予支援。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油田的命名。常委同志都很兴奋，提出了各种名称，最后欧阳钦同志说：正好是10年大庆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油田，就叫大庆吧！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从此，这个油田以大庆闻名于世。

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王震同志带领10万官兵到黑龙江组建农垦局开发北大荒。欧阳钦同志对这项开发建设事业也给以热情支持。在开荒过程中，难免同地方有一些具体矛盾，当下边反映这些问题的时

候，他总是说：“你们不要再讲这些了，王震同志带领人马来开发北大荒，我要给王震同志立碑。”

“顾全大局，服从整体”

欧阳钦同志热爱他工作的地方，一心想建设好这个地方，但地方利益同国家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总是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他常说：在全国大力支援下建设了东北这个工业基地，东北应该大力支援全国。

1954年，他到黑龙江不久，就赶上布置征购粮的任务。当年关内一些地区遭到了严重的水灾，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也需要更多的粮食，国家给黑龙江下达了征购粮360万吨的任务。为布置这个任务，省委召开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会议。会上，大家反映完成任务有困难，省委常委中也有的同志认为任务重了。欧阳钦同志从支援全国的大局出发，力排众议，主张坚决完成任务。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他亲自到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既讲了国家的需要，又讲了实际的可能。他说：“我们是有困难，但只能叫作小困难，而国家的困难则是大困难。为了克服大困难，我们就必须承担和克服小困难。”

“我们要对国家负责，绝不能只看到自己而不看到整体。”同时提出，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不讲政策，办法是深入发动群众，通过节约粮食来完成任务。最后，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四句话，终于说服大家接受并完成了当年的征购粮任务。他提出的这四句话，后来被大家接受成为黑龙江省处理国家和地方利益关系的总的方针，多年来一贯坚持。“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在说服要揪斗欧阳钦同志的红卫兵时还提到了这一点，说欧阳钦同志是照顾大局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解决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问题时，又讲到了这个问题。

“其势汹汹，其心融融”

毛泽东同志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欧阳钦同志作为领导者在这两件事上都表现得很突出，大家称道他也往往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他善于团结同志，使用干部，五湖四海的干部都能团结，反对过他的干部也能团结。在旅大和在黑龙江，他主持下的市委和省委领导班子都很团结，大家都能心情舒畅地、无顾虑地工作。他团结同志不是搞封官许愿，拍肩膀、拉拉扯扯那一套，而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爱人以德，与人为善，并且不念旧恶。他要求干部很严格，批评干部很严厉，批评起来不留情面，有时也不分场合，但内心里很爱护干部，不整人，在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保护干部，有同志说他“其势汹汹，其心融融”“算零帐不算总帐”，这是恰当的写照。

1953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人说旅大“山高林密，虎多而肥”，东北局派来的工作组，对旅大市委形成很大的压力。在运动中，有些问题揭发出来还没有调查核实，工作组就提出来要对一些干部撤职查办。其中有一位同志叫朱华，是红军老干部，商业局长，工作组的负责同志几次在市委会议上提出要撤他的职，欧阳钦同志一直不表态。会后他说：“朱华长征时候是肖劲光同志的警卫员，长征时死几千人才剩下一个人，问题没有查实，我怎能撤他的职？”他不但不同意撤他的职，当听说他家里的家俱被搬走，自己坐幼儿园里的小板凳的时候，还让我去看看是否如此。正是主要由于他的保护，旅大不少干部才免于遭到错误的处理。

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东北高干会后，旅大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贯彻两个会议的精神，不少同志提出东北局派到市委来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带班子，安钉子。大家发言中点了许多人的名，并要求欧阳钦同志总结中也要点几个人的名字。欧阳钦同志非常明确地表示：我在总结中只点两个人的名，其他的一律不点。这

个“其他”中的一位同志，后来经东北局决定，同欧阳钦同志同时调到黑龙江省工作。在选省委委员时，仍提了他的名，作为省委候补委员的候选人，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欧阳钦同志说服了大家使他当选。

1955年，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肃清高饶反党联盟影响，会后，黑龙江省委召开省党代表会议贯彻全国党代表会议精神。在这个会上，也有一些同志在发言中点了一部分同志的名，说这个是高岗安的钉子，那个是高岗集团的漏网分子。被点名的同志中，有些就是新省委的领导成员。欧阳钦同志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这种态度和作法。他指出，这些同志的问题不是那种性质，并且都已作过自我批评，问题已经解决，不应揪住不放。有的同志说他“不民主”他也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来说服大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坚持了党的干部政策，而且保持了新成立的省委领导集体的稳定，实践证明欧阳钦同志是正确的。

作为一个主要领导人，能不能替一起工作的同志和下级担担子，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是爱护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使干部敢于大胆工作的重要条件。欧阳钦同志有这个长处，也有这个肩膀。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号召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黑龙江省到会的一些同志批评省委负责财贸工作的领导同志购了过头粮，欧阳钦同志这时主动出来对大家说：“不是他过头，是我过头。”正是由于他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为主要领导人应有的品质，所以大家乐于在他领导下工作。

对欧阳钦同志爱护干部，我自己也有亲身的感受。欧阳钦同志说他自己是个“简单生硬”的人。他平时不假辞色，不苟言笑，但其实对人很关心。1951年“三八”节，我刚到欧阳钦同志处工作不久，我的爱人第一次分娩，那天快到中午了我还在办公室里工作，欧阳钦同志过来对我说：“你快到医院里去看看，今天是“三八”节，妇产

科女同志多，怕都去开会游行了，不要出事情。”我那时年轻，不知道女同志第一次临产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听到他的提示后才去医院，果然是难产，幸好未出问题，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欧阳钦同志表面似乎很冷，其实心肠是很热的。我是个有很多缺点的人，欧阳钦同志常常批评我“小资产”，说我是《此风不可长》一文的“鼓掌派”，一次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我起草的一份文件，他忽然想起一件与文件无关的事批评起我来，我读一段，他批评一通，几乎使我无法卒读。当晚他出发去北京开会，我到车站去送他，一见面他就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批评你不高兴了吧？”我说：“没有，这是对我的教育，我有许多缺点。”他说：“是啊！一个人要成熟就得锻炼，锻就是用锤子打，炼就是放在炉火里烧。”欧阳钦同志虽然常常批评我，但并不是把我看得一无是处。1959年“反右倾”时，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他问当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李剑白同志：“李曦沐有架子没有？”剑白同志说：“没有架子。”他说：“嗯，他有精神架子。”又问：“他检讨了没有？”剑白同志说：“检讨了。”他问：“检讨得深刻不深刻？”剑白同志说：“深刻。”他说：“他这个人还纯。”就在这以后不久，省里开党代表大会，提名我为省委候补委员的候选人，我自己觉得不够格，跑去找欧阳钦同志要求不要提我的名，他说：“这是体现政策，你代表一个方面，这是组织上的事，你不要管。”后来他在代表的小组长会议上说：“有两个姓李的来找我，说不要提他们的名，一个是李曦沐，一个是李景和。”又说：“李曦沐做了不少工作，省委的许多重要文件是他起草的。”从对待我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欧阳钦同志虽然责人很严，批评人很凶，但他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能够全面地、本质地看干部的。

哲人其萎，垂馨千祀。在欧阳钦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曾在《辽宁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纪念文章。现在，转眼之间，他离开我们

已经 10 多年了。在这些年里，老同志们在一起谈到欧阳钦同志时都
不胜其怀念之情。甘棠遗爱，历久弥深。我上面写的一些事情，虽然
有些在其他同志的纪念文章里已经谈到，但我觉得还有必要根据自己的
记忆把它写出来，因为这些正是这位老革命家的主要特点，也是最
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的地方。艰难曲折尖锐复杂的中国革命锻炼出我
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欧阳钦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优秀
品德、高风亮节，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永远能从中受到
教益。

点点滴滴 永志难忘

王兴华

我同欧阳钦同志认识于 1951 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常常得到他的教诲。“文革”后期，1972 年我去北京治病，借机跑到

他家里去，结果是他不在家，没有见上，只好快快而归。后来再去北京想见他时，老人家已经逝世，使我心中好长时间感到不安。

我第一次见到欧阳钦是 1951 年初在沈阳。那时他是中共旅大市委书记，常到沈阳市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会议。正好我在东北局做秘书工作，常常在东北局的会议上见着他。每次见面，他都那么平易近人。我那时才 30 岁左右，欧阳钦每次见着我都十分热情。1950 年我随党中央组织工作者赴苏参观团回国后，党中央让沈阳、旅大、哈尔滨三个市的市委先学苏联共产党的做法，在党内设工业部。经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同欧阳钦商量，派我去中共旅大市委建立我党最早的党内工业部。本来，我已经决定，随参加东北局会议的欧阳钦一起到旅大上任，临行前却因故派我到中共哈尔滨市委建立市委工业部。当时，对这件事我感到很惋惜，一方面感到没能在这样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工作，丧失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另一方面也感到没有去旅大这样一个在当时东北工业比较发达的工业城市工作，是个损失。历史却也碰巧，1954 年原黑龙江与松江省合并后，欧阳钦又调来任省委书记，这事确使我很高兴。由于有这一段相识的历史，欧阳钦来省后，常常找我谈谈，有时还找到他家汇报哈尔滨的工业状况。

在我同他多年的接触中，使我最难忘怀的是他关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鲜明立场。记得有一次他找到吉林街宿舍专门汇报工作时，再三向我讲党对我们事业的领导，是绝对的，不可动摇的，这是一条根本原则。汇报后，他决定要中共哈尔滨市委就党对工业企业的领导问题向省委写一份报告，并代省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党对企业领导的决定》。当把欧阳钦这一意见向哈尔滨市委汇报后，我又受市委委托，起草了《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加强党对工业企业领导状况的报告》，向省委报送。

欧阳钦在政治上十分敏锐，他尤其对企业中出现的新事物十分支持。在接触中也常询问工厂中出现了哪些新经验，听后总是要加以评断，有时还让我陪他去参观。

一次，我陪同他视察哈尔滨银光电镀厂。这是座落在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个小厂子，过去生产落后，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个工厂。1962年，哈尔滨市委工业部根据市委的指示，组织大厂帮小厂，让哈尔滨电表厂的电镀车间帮助银光电镀厂进行了技术改造，使工厂职工摆脱了繁重和污秽的体力劳动，并使产品质量大为改观，后来又实行部分干部与工人轮流换岗，砍掉了车间这一级行政机构，由工厂直接领导班组，使工厂在生产管理上有了新的突破。我向欧阳钦汇报后，他很快就到这个工厂来视察，并号召全省工厂向银光电镀厂学习，这对该厂鼓舞很大。这以后，很多工厂派人来学习他们的经验，并被全国工交会议评为哈尔滨市最早的大庆式企业之一。当时哈尔滨市有一大一小两个大庆式企业。一大指东北轻合金厂这个万人大厂，一小指银光电镀厂这个只有上百人的小厂。

欧阳钦对哈尔滨玻璃厂救火英雄张太斌的关怀，也使我至今难忘。

张太斌是哈尔滨玻璃厂的工人，在一次意外火灾事故中，他奋不顾身地扑向火源，用手把正在燃烧的一桶油搬了下来。大火扑灭了，国家财产保住了，但张太斌却被大火烧昏过去，后经医院检查，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三十，而且手、胸、咽喉、脸等部位尤为严重。欧阳钦知道他的英雄事迹后，很快部署省、市级报纸广为宣扬，号召大家向救火英雄张太斌学习。可1966年“文革”一开始，张太斌所在工厂的造反团，却把对张太斌的宣传变成了“罪状”。他们把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和我一起揪去，开着几十辆车在全市进行游斗，汽车边开边辱骂欧阳钦和我们，然后又把我看押在工厂，斗了一个星期。“文革”过去了，救火英雄张太斌仍然受到人们尊敬。

1990 年春天，省总工会成立全省老劳模技术攻关队，仍然把张太斌请来参加会议，使他重新走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场。我在这次会议的会场上见到了张太斌，谈起这段往事，大家都非常感慨。

1963 年，我同陈剑飞去大庆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大庆召开的东北现场会议。那时，大庆还在初创时期，大庆的经验在全国也还喊得不那么响亮。我们从大庆回来后，根据欧阳钦和省委的号召，在全省开展了学习大庆经验的活动。我当时在哈尔滨市，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做了 30 多场学习大庆经验的报告，嗓子都讲哑了。欧阳钦同志听说后，特意打电话对我说：王兴华同志，你讲得好，嗓子哑了，弄点胖大海泡水喝。作为省委书记，欧阳钦日理万机，竟为我嗓子哑这区区小事专门打来电话，这使我非常感动。

欧阳钦不仅在生活上体贴干部，而且在政治上对干部尤为关心，不少人评价他有“肩膀”，关键时刻敢于为干部担担子。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那是在学大庆活动中，我和哈尔滨市工业战线的一些干部都曾经大搞评功摆好，我自己不仅在三十几场学大庆经验报告中，大讲评功摆好，而且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宣扬评功摆好的文章。可是不久以后，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尖锐地批评“评功摆好是不搞阶级斗争的人搞的”。这个批评传来，真是好大的压力啊！毛主席这样严厉的批评，怎么受得了啊？我当然背上了个大包袱，可从心眼儿里说，却绝不是要反对阶级斗争。正在这时，传来欧阳钦同志的话：“要给下边担担子，搞评功摆好的责任不要由他们负！”这一席话，实在是暖人心啊！这是一个真正老共产党人的品质，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欧阳钦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那种老共产党人的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平易近人，爱护干部，敢说真话，支持新事物，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他时刻把人民的健康挂在心上

金 才

欧阳钦同志在黑龙江省主持工作的 12 年里，始终十分重视爱国卫生工作，时刻把人民的健康挂在心上。

记得合省不久在一次全省卫生工作会议上，他就曾激动地讲过：“旧中国，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是对我们的极大污辱，新中国建立了，我们要立志搞好卫生雪耻，用我们健康的体魄去回击

他们的无耻谰言！”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干部：爱国卫生运动是关系到人民健康、民族兴旺的大事，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各级领导一定要抓好这项工作，并且要抓出好成绩。这是欧阳钦就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不久的一次讲话，新省委书记如此重视卫生工作，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1956年夏季，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代表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期间，欧阳钦同志邀请主席团成员和部分代表开座谈会，他亲自主持，亲自听取汇报。当双城县的代表谈到修建厕所还存在问题时，他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一年都要亲自抓几次，真正抓出成效。卫生工作必须与生产相结合，建造厕所既方便人民生活，又可积肥，有利于生产，一定要搞起来，领导干部下乡要带头挖茅舍。干部嘛，不干叫什么“干部”！这次讲话又使我受到深刻教育，它不仅体现了欧阳钦对人民生活的无比关心，而且看出作为省委书记，欧阳钦立志改变黑龙江落后面貌的决心！

这以后，他亲自担任黑龙江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吉、黑三省爱国卫生检查团总团长。他还利用星期天和秘书步行到哈尔滨市奋斗副食品商店检查卫生情况，之后，亲自召集卫生和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专门研究如何搞好食品卫生问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还把爱国卫生运动列入日程。他要求省卫生厅应该把农村卫生作为重点。遵照他的意见，我们决定在农村开展“五有三勤”（家有厕所；户户有灰仓；猪羊有圈；牛马有棚；水井有裙、台、盖。勤起、勤垫、勤扫）工作。重点是改变农村环境卫生。1958年6月，他亲临视察肇州县农村“五有三勤”工作。他走村串户，检查厕所、灰仓、鸡架……等设施，然后高兴地说：“搞得很好，是移风易俗的革命举动，这里能做到，别处同样也能做到”。

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我省肝炎流行很广，对干部和群众身体有较大危害。欧阳钦同志对此十分关注。当他看了卫生厅关于防治肝炎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把我找去听取关于肝炎对人体危害的汇报（如患急性肝炎不及时治疗会变成慢性肝炎，进而发展为肝硬化，将成为不治之症）。听后，他很认真地说，卫生厅提出防治肝炎的几项措施一定要很好落实，尤其要警惕不要出现旧社会那种“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流行的悲惨局面！

遵照欧阳钦同志的指示，省卫生厅动员全省医药卫生人员开展了对肝炎病人的治疗工作。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中西医结合、休息与营养结合的“三结合”方法治疗病人。当时物质非常缺乏，欧阳钦、杨易辰二位领导千方百计为医院和肝病患者特批了一批药品和营养食品（糖、豆、蛋）。正是在省委及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我省的肝炎才迅速得到控制，避免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历史重演。

1963年3月15日，省委为了贯彻周总理对卫生工作指示，卫生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要抓好爱国卫生运动和计划生育两项重要工作。欧阳钦与省委书记处的同志又一次接见了全省卫生行政会议全体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欧阳钦又一次强调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卫生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组成部分。哪里有人，哪里就要讲卫生，哪里有牲畜，哪里也要讲卫生，要生产就得讲卫生，要学习，也得讲卫生。啥都离不开卫生，所以卫生工作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今天把各市地委书记们都请来，就是请你们重视”。他要泰来、哈尔滨、平房等鼠疫多发地区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否则损失不堪设想。学校的卫生尤其要搞好，如果孩子们身体不好，那就无法好好学习，小学生们都带眼镜，一代不如一代就会变成残疾，就要亡国灭种。第一书记的这些忠告至今卫生界的很多同志还记忆犹新。在这次会上，他又讲了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新医学，

卫生人员要认真学习白求恩，特别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生育无计划必然会冲击计划经济。

欧阳钦同志对我省卫生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从他对卫生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可以看出他十分热爱黑龙江人民，时刻把黑龙江人民的疾苦挂在心上，特别“文革”之中，当他住在北京医院我们去看望他时，老书记还在打听农村卫生工作搞的怎样？“五有三勤”是否坚持下来了？并嘱咐我们回省向为他看病的大夫问好，向全省卫生人员问好。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兢兢业业奋斗终生的老革命家。

欧阳钦同志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我省卫生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一直浇灌着黑龙江的大地，无数枝芳香的卫生之花，在祖国边疆肥沃的土地上竞相开放。

让党的思想工作传统永放光辉

张恒轩

我所敬仰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欧阳钦同志，于1978年5月永远离开了我们。从1953年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一直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幸在欧阳钦的关怀和领导下工作，聆听其教诲，学习其思想和作风，从中深刻领略到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风采。尽管时间流逝如云，但很多往事还深深印在脑海里。

欧阳钦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他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领导黑龙江工作的12年的时间里，一贯注重抓大事，该他管的，毫不放松；不该管的，属“甩手掌柜”。他始终矢志不渝地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狠抓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狠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1954年8月1日，新的黑龙江省成立。为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统一对建设新黑龙江省大政方针的认识，欧阳钦先同省直各部、委、办、厅、局200多负责干部亲切会面和广泛交谈，提出加强团结，艰苦奋斗，勇挑重担，全力开发建设，为在50年代末实现全省粮食和煤炭总产量各达一千万吨和木材一千万立方米，为发展本省经济和支援全国，做出龙江人的新贡献。随后，他请来报社社长陈元直，商谈在新出版的《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一篇动员全省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提高士气、大讲团结、催人奋进的社论。他深情地对这位社长讲：这是新报出版后的第一篇社论，必须写好！同志们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来，就是为开发祖国北疆这块资源十分丰富的宝地的。社论必须把大家的思想凝聚在一起，要使大家认清黑龙江的形势，振奋精神，团结奋进。为此，他提议社论题目为“团结一致，奋勇前进！”接着他将自己几天来的构思合盘托出，使这位多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社长深为感动——跟着这样的领导干部工作真痛快！他思路清晰，思想深刻，交待清楚，干脆利落。将他的构思稍加整理即是一篇好文章。我记忆中，在这第一篇社论里，欧阳钦就突出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指出要把思想工作作为党组织的“首要职责”，“思想工作”是“强大武器”。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1955年2月，召开全省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邀请各县县委书记和大厂党委书记参加，省委决定欧阳钦到会讲话。他除了详尽听取

全国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外，还给省委宣传部布置了具体任务，让我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情况。省委宣传部并组织地、市、县委宣传部的大多数同志，都下到了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发现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是严重的。记得那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空口说白话，不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把生产建设与政治思想工作对立起来，产生了注意抓生产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一些党委忽视了对思想工作部门的领导，有的甚至认为可有可无，根本没有摆上党委的议事日程。在农村，问题更加严重，由于忽视思想工作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有的互助合作组织没有很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出现了歧视、排斥贫农和下中农现象。那次调查发现，农村普遍存在的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以及瞒产私分等现象。为了改变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欧阳钦同志在全省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胜利前进》的重要讲话，将我们调查的城乡种种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后果的具体事例，引用到他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和不抓思想工作的危害性。他讲的浅显易懂，使与会同志深受启发。记得他在讲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经济工作的胜利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胜利，没有这个条件“经济胜利就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他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学会经常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工作中和思想上的各种问题，去识别资产阶级思想及各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抵触的思想，去进行批判和斗争。”现在听起来，这铿锵的语言，不也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吗？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会议，进一步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都面临着工业大上，农业大

上，各条战线都要大上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黑龙江怎么办？如何落实中央对各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要赶上或者超过当地的农业总产值，使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要求？省委召开了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工作安排次序时，欧阳钦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他对工作的安排次序是“思、农、工、林及其他”，这一摆法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在“大跃进”形势下，欧阳钦能沉着冷静，全力捉住主要矛盾，把思想工作摆在首位，这是他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高度体现。这一工作摆法还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称赞。此后，人们提起欧阳钦就想到他的“思、农、工、林及其他”。

1959年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宣传部领导同志在哈尔滨召开了关于思想战线形势汇报会，中宣部副部长李卓然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李卓然和欧阳钦是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老战友，会议由这二位老前辈主持。当我汇报到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和混乱认识时，欧阳钦和李卓然当即指出：

“食堂化”、“共产风”等等“吃大锅饭”的思想和行为，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主观唯心论的一种表现，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他们还针对黑龙江省某县委书记提出的“在本县要一年建成社会主义，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批评说：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标准的降低。欧阳钦还以商议和鼓励的口气，要我立即动手，写一本小册子进行正确的宣传。他风趣形象地打比喻说：女人生孩子还要9月怀胎呢！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要有个过渡时期，且是很长的时期。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跨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欧阳钦还针对不少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存在的强迫命令等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问题，要我写一本宣传解释“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通

俗读物，做为党员学习的教材。我满怀激情地担起了这一重任，并邀请杨致中、孙庆林、赵风池等同志参加，共同完成了这两本小册子的编写任务。对此，欧阳钦很是高兴，称赞我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我本人和参加写作的同志都很受鼓舞。作为一个领导者，欧阳钦在一种风潮席卷而来时，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善于扬汤止沸。人们怀念欧阳钦，更多的是感到他不同于一般的领导者，在他领导下工作，大家都有一种奋进心和安全感。

1960年到1961年，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反思“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组建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中心学习组，欧阳钦亲任学习组长，我被指定担任学习秘书。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欧阳钦从中央办公厅那里得来的打字稿的毛泽东的《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读书笔记》等等。学习以自学为主，有时也进行集体学习。由于他们都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同志，我为他们做学习服务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常常在工作中搞得满头大汗。欧阳钦每见此状总是和蔼地笑着说：“擦擦汗慢慢来，不必着急。”中心组学习，开始时每周一次，后改为每月一次。学习气氛异常热烈，态度很是认真，有时为弄通一个观点，“引经据典”查找大量资料。有时为一个问题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我记得杨易辰和冯纪新常常发生“战争”，各有高低互不相让。他们的学习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谈体会，讲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发人深省。欧阳钦经常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见解提出来同大家共商共议，不断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受惩罚”，就是欧阳钦在这次学习中反复强调的两句话，这也是他从“大跃进”的失误中经过反思所概括出来的深刻体会。

欧阳钦不仅重视省委一班人理论水平的提高，而且对工农群众学

哲学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1958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全省城乡、工矿企业，商店学校有成千上万的人投身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中来，学哲学用哲学蔚然成风。对此，欧阳钦十分喜悦，他深知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他对那种对工农群众学理论的怀疑和非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分别在《奋斗》，《黑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以《毛泽东思想——劳动人民手里的尖锐武器》为题，驳斥了这种论调，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根本观点，是让理论从理论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劳动人民手里的尖锐武器！”他对工农群众学理论积极分子说：“不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多么神秘和高不可攀的事情。”他说：“广大群众不但能够学，能够用，而且可以学得好，用得好”。他鼓励一些学理论积极分子，把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向社会做宣传。其中有：哈尔滨和平机械制造厂水暖工人杨文，通过学理论进行了67项技术革新，仅“废气回收”一项，一年就给国家节约了原煤19000多吨。学理论积极分子新风加工厂技术工人沈关根，在学习《矛盾论》的启示下，为了解决切料和操作的关键问题，反复进行了117次试验，终于搞成了一台自动化切料机，生产效率提高18倍等，欧阳钦对这些经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关心这些积极分子的成长。一次，欧阳钦把我找去，听取全省学理论情况汇报。汇报中他特意询问王洪华、魏淑琴、孙锡仲等学理论积极分子的近况，并说：“他们是全省的旗帜，要注意保护”。当听说王洪华要和一个出生在富农家庭的干部结婚有人干涉和指责时，欧阳钦说：“不要干涉人家……主要看表现，不要唯成份论。要唯成份论，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好办了。”欧阳钦还让我转告这些同志，“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总之，欧阳钦亲自组织并推动省委一班人及宣传部门，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热情讴歌和大力支持工农群众学理论这一新

生事物。

做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欧阳钦自然对 60 年代后，林彪一伙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庸俗化的作法十分反感，他尽自己的可能进行了抵制。1964 年春，他到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参观，看到工人交接班时背诵毛主席语录，回来后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交接班时背诵毛主席语录有多少用处，还不是搞形式主义！”省委根据他的意见，发了一个指示，要求各单位认真对待少数单位出现的形式主义的苗头。1965 年 4 月，在一次接见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时，欧阳钦谈了在学习中如何防止和克服形而上学的问题，举例子举到三八理发馆，随口询问这个理发馆是否还有？杨易辰回答：“现在只理发，不烫发了。”欧阳钦立即说：“为什么？女同志可以烫发嘛！烫发都不行，大是大非就搞不清了。”并对在场的女同志说：“要穿花衣服嘛！”“把穿花衣服看成是资本主义，不穿花衣服就好，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太庸俗化了！”欧阳钦不仅反对形式主义，而且他的很多观点都和后来当上“副统帅”的林彪针锋相对，如：林彪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欧阳钦则说：“立竿见影，怎么个立竿见影法？学习不比旁的，今天看了一篇文章，不知啥时候用上，不一定能立竿见影。”又说：“学习这个东西就要潜移默化，是个慢功夫，急不得的……勉强地机械地套用，就是搞形而上学。”林彪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背熟警句”，“活学活用”。欧阳钦则认为“主要的在于个人‘埋头书案’，‘伏案攻读’，独立思考。”他极力反对“死背教条”，林彪号召“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欧阳钦却说：“每个人的文化基础，接受能力不一样，从事工作不一样，每个时期的形势也不一样，所以学习内容不必强求一律。”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欧阳钦不愧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的无产阶级的坚

定性和不畏邪恶的斗争性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欧阳钦同省委宣传部的各位部长同志，以及黑龙江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社联、省文联、省作家协会、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定期地邀请这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到他的办公室或住处交谈。一般来讲平均每个月都请我们宣传部的同志到他那去一次，有时一个月二三次。他有个习惯，思考问题总是在房间来回不停地踱步，有谁想到，正是在这踱步中，我们省的很多大政方针孕育成熟，一些战略性的思想产生了。有时他踱着踱着，忽然想起一件事，立即让秘书打电话，询问一些数据或有关情况，我就曾被她调去过好多次。他常与我们宣传部的同志谈论国际与国内形势，讨论思想理论问题；有时了解一下新闻工作、教育和科学、卫生、体育工作；有时关心文学艺术创作。他常让延泽民向他介绍新戏、新作品，有时还与延泽民一起去看新剧目的排练。他在文艺界有不少好友，大家有什么困难和心里话都对他讲。记得有一次黑龙江日报社的领导同志提出：省委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运用报纸宣传和指导自己分管的工作，这是件好事，可使报社更紧密地依靠省委。但也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报纸版面有限，可各位领导积极性很大，有的自己动手，有的组织他人为报纸写好了文章、新闻报道或社论，要求报社发表。有时一个晚上接到有关领导批示要在第二天见报，并且都要登头版头条的配套文章达七八份之多，夜班编辑很不好处理，不发谁的都可能受到埋怨，甚至批评指责。欧阳钦听后笑着说，这很好啊！报纸也像一辆公共汽车，谁都可以坐但要服从司机和售票员的管理和指挥，你们报社可以立个规矩，我支持你们，要省委各条战线的“司令官”也支持，听从你们的统一安排。大家对欧阳钦既视为领导者和导师来敬重，又作为同志、朋友、无拘无束地同他交谈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互相启发切磋，许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就是先经过这样充分酝酿之后再提交

省委集体讨论并做出决定的。

欧阳钦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堪称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

农业是安邦定国的行业

骆子程

在 1954 年至 1965 年期间，欧阳钦同志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我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由于工作上的缘故，我和他接触较多，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和参加有关会议，并和他一同到农村进行工作考察和社会调查。所以得到他的帮助和教诲也比较多。现在回忆起来，距今虽然过去了 1/4 世纪的时间，

但是这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欧阳钦同志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在黑龙江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对经济工作，他抓得很紧，尤其对农业，他始终予以特别注重。“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安邦定国的行业”，“农村稳，天下稳”，“农业上，各业上，农业停滞，各业也上不去”，“占中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教育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工农联盟能否巩固，关系人民政权能否巩固，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只要和他谈到农业，他总是反复强调以上这些话，这是欧阳钦同志用自己切身的体会，诲人不倦地提醒人们要重视农业、发展农业。

记得 1954 年合省（原黑龙江、松江省与哈尔滨市合并）后不久，当时国内大环境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的重要时刻，同时又面临“一化三改”（国家工业化，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热潮。新成立的黑龙江省，是国家重要的工、农、林业地区，国家工业重点建设的 156 项工程，其中有 22 项放在黑龙江省。合省后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较为缺乏，在这种前所未有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同本地区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正确确定本省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是摆在当时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欧阳钦同志集中了省委领导成员的集体智慧，在 1954 年合省不久后召开的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于新黑龙江省基本情况做了全面分析。指出：“它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农业和林业地区。一定要重视工业、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如期完成”。同时他着重指出：“我们绝不能低估农业在黑龙江省工作中的重要性，在加强对工业建设领导的同时，绝不能丝毫放松对农业的领导。如果我们忽略了农业，如果农业得不到应有发展，则不仅农业经

济会受到重大损失，而且也必将因而影响工农联盟，并妨碍工业建设的前进。”他这种指导思想和工作指导方针，经过广大干部学习和贯彻，在较短时间内，统一了全省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从而使以后全省的经济工作一直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地向前发展。

在这以后数年中，欧阳钦同志抓住各个时期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适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如 1957 年以后，经济工作中一度出现急于求成、贪大求洋、片面追求工业“高速度、高产值”而忽略经济效益的偏差，在实际工作中一度挤了农业，削弱了农业的地位，造成农业、轻工业落后于重工业和人民生活需求。针对这一情况，1958 年在欧阳钦同志主持的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他重申必须把农业摆到重要位置上，强调全省整个工作必须遵循“思、农、工、林及其他”的安排次序。思，就是坚持政治思想工作领先，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农，就是要把农业放到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1959 年他又提出了“补长农业和轻工业的‘短腿’问题”；1961 年又提出要通过发展重工业支援农业和轻工业，以及通过发展商业促进生产，保证供应，和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在当时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欧阳钦同志不仅能够适时正确地提出加强农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而且在自己领导工作的实践活动中，身体力行。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善于把群众分散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总结、归纳，提到政策、思想理论高度，再坚持下去，经过典型示范，指导全面。现在我回忆起和欧阳钦同志下去一同进行社会经济和农业工作的考察经历主要有：

1956 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到牡丹江地区、宁安、东宁等县农村考察。1958 年的合江地区农村工作考察。1962 年的渤海乡调查。

1964 年到西部嫩江地区、拜泉、克山、望奎、北安、齐齐哈尔等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考察等等。

这些对实际情况的考察，都对进一步搞好当时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例如：1964 年那次农村考察，欧阳钦同志就提出，必须要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注意粮食生产；必须搞好农村分配；要注意改变农村贫困户和贫困地区面貌等重要问题。

黑龙江省从 1953 年——1965 年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全省经济基本上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工业有极大增长，农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的购买力和对国家的贡献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全省粮食商品率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40%以上，大豆等重要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更高。这期间全省每年平均向国家净上缴提供商品粮食都在 15-20 亿斤左右，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受到中央多次表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当时也居全国先进行列；农民购买力 1959 年比 1949 年，每人平均提高 4.8 倍。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得到不小的发展，解放初期农村没有拖拉机和动力排灌机械。到 1959 年已有拖拉机 10000 多台（标准台）和 10 几万匹马力的各种排灌机械。全省当时（1959 年）已有 20%左右的耕地使用机器操作（主要是翻地、播种、运输等）这在当时是全国机耕面积比重较大的省份。所有这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和欧阳钦同志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工作分不开，是他十数年如一日始终注重农业、关心农村建设这一符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的结果。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对共产主义理想无比坚定，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对同志严格

要求又宽厚仁爱，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的这些崇高品质和高尚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龙江大地，他立下千秋业绩，将永远载入青史。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风范长存，他的光辉思想和实践，将永远鼓舞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调查研究的典范

李景和

欧阳钦同志逝世 10 多年了。好多同志张罗要为他写传，或写回忆录，把他一生的光辉事迹记下来，留给后人，永志不忘。有些同志同我作过交谈，在谈到欧阳钦同志的党性原则、领导水平、爱护干部、在党内外的威信时，总是敬仰不已，表现出对欧阳钦同志的深厚感情。

我在欧阳钦同志领导下做工作，是从他来黑龙江省任中共黑龙江

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的。当时，我是中共双城县委书记。因为双城离哈尔滨近，交通方便，省里的领导同志们常到双城去。在 1955 ——1960 年的五年时间里欧阳钦同志曾三次到双城去视察指导工作，还有几次委托他的秘书李曦沐同志向我传达他的工作意图，要我在工作中做出典型示范。有一次，还让我带领三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到省委去，向他直接汇报农村的实际情况。这些工作活动，使我受到很大教益，对双城县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5 年 2 月，省委召开县委宣传部长会议，让哈尔滨附近的县委书记来听欧阳钦同志讲话。这是合省之后，我第一次听欧阳钦同志讲话，题目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讲：什么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县委应该怎样做好这项工作等重要问题。他不是只讲一般的理论，而是把在农村中出现的雇工、放高利贷、贫困户种不起地、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抑等现象，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引导做农村工作的干部去看清在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新的剥削行为，新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启发干部觉悟，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子和方法，讲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边听边想，越听越觉得他讲的好，许多事情是我没认识到，在工作中没注意到的。他还批评了一些县委书记，不该是一年到头地抽出县委宣传部长到农村去蹲点，只抓中心工作，放松了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他进一步指出：县委书记一定要抓好党的建设，要搞好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这好象是推进党的活动的两个轮子，抓好了，一齐动，才能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从 1955 年起，双城县委改变了县委成员“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采取了充分发挥县一级的各个部门的职能作用，用各种组织去推动工作的方法。由于党的工作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各种组织步调一致，农业合作化运动，生产建设都比以前有了更大进展。

1955 年秋，欧阳钦同志只带了一位秘书到双城县委，来考察希勤村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经验。这个经验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同双城县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于 1954 年挂锄期，在希勤村与基层干部、农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肯定了这个经验。欧阳钦同志来双城之前，给我打了招呼，要我作好准备，向他作系统的汇报。他到县委之后，听了我的汇报后，和县委的同志进行了讨论，共住了 4 天。他对双城县的同志们说：希勤村的经验是成功的，毛主席肯定了，向全国作了推荐，你们一定要做好希勤村的工作，在全县用好这个经验。这个经验的实质是：依靠贫农中农、团结富裕中农，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在领导工作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有规划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家一户搞生产变成二三十户集体搞生产，人力、车马、土地都集中使用了，这样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定会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条件，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有意地去加强领导。

到了冬天，欧阳钦同志派他的秘书李曦沐同志、省委农村工作部的邢泽民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双城，传达了他的意图，要我选一个已经全部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发展农业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到那里去作试验，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用于发展农业经济。我们选择了靠拉林河边的吴家村。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同基层干部、农民群众一起商议，制定出一个发展合作社经济的全面规划，包括发展粮食、经济作物、畜牧业、养殖业、村办工业等。这个发展农村经济的全面规划，欧阳钦同志报给了毛主席，载入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到了 1956 年冬，全省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全部实现了高级合作化。欧阳钦同志让李曦沐同志给我打

电话，要我派干部到工作状况处于上、中、下不同情况的三个村去，帮助党的支部书记研究实现高级合作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弄明白之后，由我带领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到省委当面向欧阳钦同志作汇报。要求一定把农民的思想、意见、要求，农村工作发展的趋向、出现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反映上来。有一天，我带领三位党支部书记去欧阳钦同志办公室，他亲自主持了这个小型座谈会，由他发问出题，三位支部书记轮番作答。那时的农村支部书记都是土改时期的老农会干部，没文化，不会作笔记，情况全是装在脑袋里带来的，往外掏材料一丝也不难。有问就答，点题就论，有相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看法，谈得真实、坦率、热烈。我基本上没作发言，只是在对一些问题商讨时作过插话，一天的时间基本上由他们四位给包了。当会议结束时，欧阳钦同志说：谢谢你们，帮我了解了情况，研究了问题。什么叫领导？领导是互相的。当我代表省委作报告时，我是领导你们。今天，你们向我讲情况，讲看法，讲意见，就是你们领导我。我们只有分工的不同，为党做工作的权利、义务是一样的。我很赞赏三位支部书记的大胆议论，更钦佩欧阳钦同志平等待人，虚心下问的品德。

1959年春，欧阳钦同志和强晓初同志要到双城去种试验田。县委给做了准备工作。到种地时，领导同志来了，我们一起到了幸福乡，同基层干部、农民下到了指定的地块。由农民帮助刨、灌水，强晓初同志往墒里施肥，我给覆土、踩墒。种完一块地，欧阳钦同志对基层干部和农民说，我种的地一定不如你们种的好，得的产量也不会比你们的产量高。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体验地是怎样种的，“粒粒皆辛苦”是怎样来的，生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常务书记到农村种试验田，给双城的各级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0年4、5月间的一天，欧阳钦、李范五、李剑白三位领导同志到双城，研究城镇工作，着重地研究了如何发展面向农村、支援农

业的地方工业；如何发挥商业的作用，当好工农业生产的纽带，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问题。对双城县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议论中，欧阳钦同志提出一个新想法，对我说，你给省委写个报告，将双城县改为市，由市领导农村。我没表示态度。中午休息时，李剑白同志问我：你看县改市行不行？我答：不行。双城是个农业县，大量的工作在农村，县改为市直接领导城镇，会削弱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利于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我看这个报告就不要写了。李剑白同志没有立即表示可否。可是我没写出这个报告，欧阳钦同志也没再催我办。看样子，是李剑白同志向他反映了我的意见，他接受了。然而，在30年后，他的这个想法确实实现了。

1961年初，省委调我去做欧阳钦同志的秘书。干了3年5个月。在这期间，我身体不好，时常患病，为他做的工作不多。直接相处的时间虽不长，而感情确实是增厚了。

1976年12月，我到北京去开会，看了欧阳钦同志两次。第一次是和别的同志一道去的，老人谈话不多。隔了两天，他的保健护士郝英梅同志到了招待所，找到了董彬同志和我。她说，是二老（欧阳钦和夫人黄葳）让我来找你们俩的，要你们在星期天再到他们家去一趟。到了星期天，我和董彬同志去了。欧阳钦和黄葳说起往事，滔滔不断，主要是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同“四人帮”的迫害所作的斗争。我和董彬同志只能是听讲，连插话的机会都难以找到。他们讲了这么一段事：省委机关造反团去了两个造反派，带了一份给欧阳钦同志定的“走资派”的处理决定，念了一遍，让欧阳钦同志签字。欧阳钦同志一听就火了，对造反派说，什么“走资派”？我不是，省委其他书记也都不是。可见，欧阳钦同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实是炼成一身铮铮铁骨，在自身难保的危难时期，仍在关心干部，保护同志。我和董彬同志往回走的路上，深表敬佩，赞叹不已。这次谈话

竟成了最后的聆教，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

深切的怀念

巴 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最后见到欧阳钦同志距今已经有 20 多年了，但欧阳钦同志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

欧阳钦同志是在 1954 年 8 月原黑龙江省、松江省与哈尔滨市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时，出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当时，我是在新成立的嫩江地委任副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年。我们的直接接触虽然是有限的，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给我的感受，确是难以忘怀的。

欧阳钦同志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他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合省后不久，他来嫩江地区视察农村工作时，就向我们在地委工作的同志指出：“每个党务工作者都必须学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只要把群众的思想工作做透，把基层工作做好，我们的整个工作才能有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就可以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物质力量。”在视察某军工厂时，他勉励工人同志说：“大家要注意学习，注意自身思想建设，要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投身生产并参与管理好企业，为国防建设多出产品，出好产品。”一番话，给这个厂的干部、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在战胜三年自然灾害，调整国民经济时期，欧阳钦同志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当时从嫩江地区看，1962年的农业生产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前几年“共产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真可谓积重难返。在临近春耕播种的时候，农民的口粮、马料、特别是种籽还没有完全解决；粪肥本来就少，但由于畜力不足还不能全部送到地里。就在这燃眉之时，欧阳钦同志细心地听取了嫩江地委主要领导的汇报，他指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农民越是对政策不托底的时候，越要宣传党的政策，特别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当时农民最为关心的一项政策）的政策。当然，你们也要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归根结底是要用政策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这样做了，确实大见成效，很快就稳定了人心。由于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齐心努力，这一年的农业生产不仅获得了丰收，而且顺利地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工作之余，我常提醒自己要铭记欧阳钦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指示，并把它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

身为第一书记的欧阳钦，工作是繁忙的，但很多重要会议、文件，

甚至一份电报，他都要亲自到会并进行传达。1955 年的一天，省里有一份重要电报要传达，欧阳钦同志就把我们几个地委的负责同志请到他家的接待室。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欧阳钦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严肃、认真、廉洁、求实，感人至深。这份中央来的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南共联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路线上的分歧问题。当时正是西方反共势力加紧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渗透的时候。欧阳钦同志在亲自传达完电报原文后，谆谆告诫我们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这次传达，不只是体现在一份电报上，而是省委书记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把我们请到他家里，使我们倍觉亲切，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55 年 7 月末，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向几千名与会人员传达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了保证传达的效果，他唯恐自己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家听起来吃力，还特请一位省委书记当“翻译”，对不易听懂的地方加以说明。他这种对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深受教育。当时的天气虽然很热，大家都能集中精力，静心地听，细心地记。这次会议对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欧阳钦同志始终是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他常对我们讲：“要善于把党的每一个政策都能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还要求我们“要用党的政策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如在 1958 年后“大跃进”的年代里，当“共产风”在全省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嫩江地委的一些领导头脑也热起来。积极推行吃饭“供给制”，一味追求“共产主义因素”，急于“割掉私有制尾巴”而“过渡”到单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甚至提出“和镰刀扁担绝交”等错误口号。欧阳钦同志发现后，针对这种思想，及时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他说：“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一蹴而就，天真地想在一个早上就会实现。要努力发展生产，积蓄财富，如果和镰刀扁担绝交，拿什么去生产呢？‘过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所有这些，都应很好地思索、总结。”

又如在欧阳钦同志极为关心的粮食问题上，也可看出他执行政策的严肃性和负责精神。1959年，嫩江地区由于低估产量、扩大灾情，欧阳钦同志经过调查，提出了批评。要我们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我参加了这年的秋收大检查，从安达、青冈、拜泉、北安，一直到克山、依安，一路所见所闻都是大丰收的喜人景象。许多群众在喜悦中编出顺口溜，形容丰收的庄稼是“干割不见倒，干拉不见少，场院放不下，越打粮越多”，这完全证实了欧阳钦同志的预见。这一年，嫩江地区出人意料也完成征购粮达100万吨之多，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在1960年却因高指标、浮夸风、虚报产量，又犯了“高征购”的错误。当发现农村留粮不足，许多群众已开始饿肚子的时候，省、地有些领导同志却视而不见，还一味坚持征购，批判所谓“右倾”，致使干群关系极为紧张。据后来知道，也是在欧阳钦同志的主持下立即停止高征购，并及时安排了群众生活。这一举动，在关键时刻解放了干部，改善了党群关系，从而保护了农村生产力，为下一年度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顾全大局是欧阳钦同志的一贯主张。早在1954年冬，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头一年，他就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以后多年，这一口号不仅一直是全省征购粮工作的指导原则，也一直是处理地方和中央关系的指导原则。当时，在讨论粮食征购问题时，我们嫩江地区的县委书记和全省各县的书记一样，都表示：“宁肯我们困难点，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党中央、毛主席。”以后多年，我们一直是这

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始终遵照欧阳钦同志提出的“顾全大局，分担困难”的思想，做到既考虑农民的留粮，有利于生产，又尽量多征、多购一点，为国家分担了困难，支援了其它受灾地区。

嫩江地区在当时是全省调出粮食最多的地区。因此，欧阳钦同志十分关心和重视嫩江的工作，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几乎每年都要来视察一次，听取汇报。他深入农户问寒问暖，征求意见，而且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嫩江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很大，你们一定要把工作搞上去，为我省分担国家困难多做贡献。”在粮食问题上他特别关心并要求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技活动，改革农业技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欧阳钦同志的一席话，对我们教育很深。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不论工作顺利与否，广大干部、群众都能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并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欧阳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了，但黑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怀念他。他的思想、品德、精神无一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终生奋斗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去学习、奋斗。

亲切的关怀

肖步阳

1963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小麦试验田工作，忽然接到电话通知，说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到克山县视察工作，要到我们克山农业科学研究所来，县里让我立即到克山镇去接欧阳钦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意外，欧阳钦能够在百忙之中到克山所视察工作，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我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赶到了县里，县领导把我介绍给欧阳钦。只见他个子不高，瘦削的脸上一双睿智的眼睛充

满了和蔼、慈祥的微笑，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热情地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了不起啊！怎么样，带我到你的麦子地看看吧！”听到这话，一时间我感慨万端……

建国初期，全省小麦秆锈病流行，严重年头和严重地块，以致绝产；一般年头也由于秆锈病的危害，产量极低。群众把小麦视为“危险作物”，不敢种植，严重地威胁着小麦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省农业厅组织起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着手解决这个难题。我作为课题负责人，带领科技人员，经过数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在1957年，培育出了具有抗病性强，适应性好，而且丰产三大优点的“克强”、“克壮”两个姊妹系小麦新品种，并于1958年确定推广，深受农民欢迎，摘掉了小麦是“危险作物”的帽子，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大幅度地提高。

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我们为小麦育种只不过是做了本职工作，尽了应尽的责任，没想到却得到了欧阳钦书记这么高的称赞，我心情十分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说：“那好，那好”。上车时，欧阳钦拉住我的手说：“来，我们坐在一起接着谈”。汽车启动了，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开始，我感到很拘束，能和省委书记坐在一起交谈毕竟是第一次，可欧阳钦谈笑风生，不时地拍拍我的肩膀，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神态，我的紧张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欧阳钦问：“育成一个品种要十来年的时间，真不容易呀！你们能不能继续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我说：“我们正在搞。现在的品种抗旱性较好，不能抗涝，所以只能针对自然环境研究出对应的品种，搞生态育种”。他问：“国外有没有搞的？”当我回答说还没有时，他兴奋地拍着大腿说：“好呵，你们这是一个创造呵！我支持你们，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吗？”听了这话，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一方面，欧阳钦这样关心、理解、支持我们，我们理当加倍努力工作，可另一方面，

我们克山所 1960 年就改成马铃薯研究所，我们再搞小麦育种是名不正、言不顺哪。欧阳钦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问道：“你们是怎么改成马铃薯研究所的？”于是，我将改所经过做了汇报，欧阳钦听后，深思了一下，又问：“你是搞农业的，这样改究竟对不对？”我说：“哪种作物在哪个地区种植面积大，就应在哪个地区研究，否则就会造成损失。克山一带是小麦的主产区，我的看法是应当改回来。”

“对，这样做，既浪费，又违背自然规律，这不是拿国家财产闹着玩吗？嫩江地区不应这么做，农科院也不应该这么做。回去后，我让他们改回来！”他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有了这样尊重科学、关心科技人员的好领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

在谈笑声中，克山所到了。我考虑欧阳钦同志年纪大，一定十分疲劳，就说：“请您先到办公室休息休息吧，一路上十分辛苦。”欧阳钦一边摆手，一边说：“我这算什么，你们才是真正的辛苦啊。快领我到你的试验田看看吧。”一进麦田，欧阳钦兴奋地说：“好啊，试验材料多么丰富啊！科学的力量真是无穷呵！”边说边蹲下身，用手抚摸着麦苗，细细地察看。我一一地介绍着情况，欧阳钦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欧阳钦问：“你们究竟是怎么研究出抗病品种的呢？”于是，我介绍了抗病品种经几代杂交分离才能产生的过程。就这样，我们边看，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整个试验田都看完了。来到地头，欧阳钦又一次拉住我的手：“你们的育种工作是科学的，符合毛主席辩证的思想。有机会我还要来看看，你们努力工作吧。”我说：“我们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希望，争取搞出更好的小麦品种。”

汽车开远了，留下了一片温暖和无限的深情。

后来，我到省里出席人代会和政协时，见到了欧阳钦几次。每次他都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询问我们的科研工作，“小麦搞得怎么样了？各种类型的是不是都有了？”我说：“我们要研究出三种类型，

一种抗旱的，一种耐湿的，另一种是丰产的。因为我们的生产不能总停留在一种环境条件下和一个生产水平上，所以必须不断地研究，搞出丰产等类型的品种。”他高兴地说：“你们就大胆地干吧，以后我有机会一定再去看看的。”可惜的是，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没见到欧阳钦同志。

这些往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每当我走进我的麦粒王国，看到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麦穗，就想起欧阳钦同志的谆谆教导和殷切的希望。正是在欧阳钦书记的关怀和鼓励下，我们小麦育种工作者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迄今为止，已经培育出 40 个克字号小麦良种，累计增产粮食 168 亿公斤。相当于全省 1900 万农民一年生产粮食的总和。

我与欧阳钦交往很少，但他对农业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关怀，以及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斯人虽去，风范永存。欧阳钦同志，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永远怀念您。

在欧阳钦同志身边的一段艰难岁月

邬芳林

我在欧阳钦同志身边工作时间不长，又大部分是他病休在外地，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所以接触到的工作方面的情况不多。但是，在那风云剧变的岁月里，我和这位革命老前辈朝夕相处，体会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风范，感受到的教益是不寻常的。

—

1966 年 4 月，欧阳钦同志病重住在北京 301 医院。一天，早饭

后我来到病房，欧阳钦躺在床上，点头示意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刚坐下，就听他说：“你封锁消息。”我愣住了。他可能以为我没听清，又重复说了一遍。我以为这是对我的批评，有点紧张。我这个新秘书来的时间短。来之前又带着听人说这位老同志很严厉的印象，所以在他面前还比较拘谨。这时心里想，从到他身边工作以来还没有受到过批评，这次出了什么差错呢？没等我想明白，又听他说一句“为什么不送文件？封锁消息”，说着他清瘦的面庞微露笑容。我才明白这并不是对我责备，而是要看文件。这又使我想起听人说的，这位老同志虽很严肃但有时说话也很风趣。的确，从他住进医院以来，我没有送文件给他看。

欧阳钦 1965 年 10 月免去了兼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专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因健康状况不佳，当时没有到沈阳去。1966 年 3 月下旬以东北局第二书记的身份从哈尔滨来京参加“中央小组工作会”，也就是揭发批判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会议中间他总是闷闷不乐。一天晚饭后，他突然发生脑血栓昏倒在地，经医院连夜紧急抢救脱险。这时病情虽已稳定，但身体十分虚弱，语言口齿不清，一侧手臂和腿脚不好使，按医生嘱咐还不能过问工作。现在他提出要看文件，经与医生商量，以后我就每天带些文件去。先是会议文件，后是东北局、黑龙江省文件和报纸。这些还不够，黑龙江省的春耕情况如何，工业生产怎样，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兴凯湖农场的领导关系等等，他都要了解。报纸上发表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后，还问到“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和黑龙江京剧团修改《红灯记》剧本等情况。我手头有材料的就拿给他看或念给他听，没有材料的就打电话问。欧阳钦讲的意见还要转达。不仅如此，而且有暇还要修改《红旗》杂志约他写的文章“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修改稿。这样一来，实际上我已经是每天到他住的病房去“上班”了。这使我认识到

了一个思想上的差距。从欧阳钦住医院后，我认为主要任务是照顾好他的医疗和护理，没有想工作方面的问题；而欧阳钦这时却已不把自己当做“病号”了。这种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工作的精神是我没有想到的。

欧阳钦在看文件、听消息中，很注意当时初露端倪的“文化革命”情况，但是那时除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化界的动态之外，中央没有什么正式文件。在处理《红旗》杂志所约文稿时，经常接触《红旗》杂志一位编辑，欧阳钦有时问他一些情况，这位编辑说，他听说文艺界从30年代以来就有一条黑线，现在将要有一场大的斗争，中央正在组织左派队伍，等等。可以看出欧阳钦对“文化革命”怎样搞法十分关心。中央“五·一六通知”批判了这年2月中央转发的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欧阳钦看了这个“通知”后，叫我把“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找来给他看，有一天我到医院，他把看完的“提纲”退给我，指着这个文件问了一句：“这有什么错？”我一时无言以对，但他的目光还盯着我，我只好说了一句：“‘五·一六通知’上讲了”。他对我这句话未置可否，却又高声说了一句：“他们是什么左派！”而且面带不高兴的样子。这话是指谁说的，我没敢问。但从这几天的言谈和当时神色来看，显然是指“五·一六通知”中提到的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人。涉及这样的大问题，资质浅薄、生性懦怯的我是不敢插嘴的，话也就没有展开再谈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欧阳钦当时对“五·一六通知”是不以为然的。

二

这年6月，欧阳钦出院回到东北，按医嘱继续疗养。初夏的沈阳，幽静的北陵休养所，苍松泛新绿，烟柳一片青，疗养条件很好。但是，欧阳钦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一到沈阳他就找东北局同志来谈“文化革

命”的情况。这时，报纸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万岁》等，接连发表，导向所及已经不止是学术、教育、文艺、出版、新闻“五界”的“文化革命”，而是无所不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报纸上一再宣称的“黑线总头目”“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谁，已是人所共知了。东北三省的运动也在迅速发展，但是这场“革命”怎样搞法，谁也不知道。这时欧阳钦天天看材料，连大字报汇编都要看，时常找掌握情况的同志来谈，可能是想从中找出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然而得到的却是这里大字报的矛头已指向党委，那里的领导人已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的消息。人们对运动深感忧虑。欧阳钦反复对我们说：“要相信毛主席”，并提出对当前运动的意见，一是党委要加强领导，二是运动要限制在“五界”，三是大字报要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但是，事态的发展离他的这些意见越来越远了。

在关注“文革”动态的同时，欧阳钦还要修改《红旗》杂志约他写的那篇文章。文稿在北京改完第三稿，标题改为《伟大的实践，伟大的理论》，中心是论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文稿带回沈阳要再修改一遍定稿。欧阳钦说，“文化大革命”不要只是批判反面的，也应当有正面的东西。抓紧把这篇文章修定发出去，也算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把以前帮他修改过此稿的东北局李曦沐同志又请来，文稿修定之后寄回了《红旗》杂志。可惜他用半年左右时间写出来的这篇论著被“文革”吹得无影无踪了。

不知是一个老革命家的政治敏感，还是有什么兆头，这时候欧阳钦特别关心黑龙江的老同志，他不止一次地问黑龙江省委每位书记的情况。有一天，强晓初同志来北陵看望他，临走时两人一起下楼，走到门口，欧阳钦叫我把前两天他看过的黑龙江省委印发的两份常委会议记录拿来给强看。我不知何意，回房间把记录找出来递给强。欧阳

钦说：“这两次会为什么任仲夷没有参加？人家还是省委书记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强说没听到有什么问题，回去问问是怎么回事。我拿着记录回到房间，心里深感不安。会议记录我先看过，但根本没注意谁参加会谁没有参加，更没有想到从这里会看出什么问题。过了两天，得知任仲夷同志没参加会是有事请假。我告诉了欧阳钦，他点头未语。这件事使我意识到，面对那场前途未卜的政治运动，这位老同志是在思考着很多的问题。

三

在沈阳北陵休养所住了1个多月，7月下旬来到长春。欧阳钦来长春的用意是，他虽已调出黑龙江省，但工作还没有交代，是去北京参加会议离开的。这次从沈阳北上，在长春停留一段，使身体逐步适应，然后到哈尔滨，向黑龙江省委交代工作。

长春的南湖，绿树成荫，湖水涟漪，环境与沈阳北陵休养所差不多。这时倒有一段短暂的宽松，欧阳钦在京病倒之后，组织上就调他的夫人黄葳同志前来护理，这时一同来长春，儿子欧阳湘在长春工作，常来南湖，两个女儿暑假也常来看望。我们希望这种天伦之乐能有益于欧阳钦恢复健康，实现他的北上计划。但是为时不久，欧阳钦的哮喘病发作了。这种病过去有过，据说一般是由外部诱因引起的。这次是什么原因？医生查来查去说是他对南湖住房新刷油漆的气味过敏所致。因此从南湖搬到一号招待所去住。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后，人们以为无论如何运动总算有所遵循了。但是接着来的却是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决定》不但没有象人们所期望的使运动走向正轨，而且北京百万人大会，红卫兵运动，越来越乱了。东北局文革办转来黑龙江省的消息，从“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到省委书记一个个被大会小会批判，运动在逐步升级。这对连哪位书记没参加会

都那样关心的欧阳钦，在精神上该是多大刺激！欧阳钦从“文革”开始以来就对有些说法和作法有反感。刚听到“造反有理”口号时，他说：“造共产党的反也有理吗？”长春市红卫兵上街“破四旧”，他听到后说：“什么是四旧？不能乱来。”这时看到北京百万人大会，“红卫兵”大串连的消息，他说：“这不是要天下大乱吗！”“这不符合中央的决定。”可以看出，他心里想的已经不只是哪个同志、哪个地方，而是整个运动，整个国家，整个党了。

不久，揪斗之风也刮到欧阳钦身上来了。8月下旬一天晚上，强晓初同志从东北局打来电话，说哈尔滨的“红卫兵”来沈阳，要把欧阳钦揪回黑龙江，他们已经知道了欧阳钦在长春。为了安全，东北局希望欧阳钦连夜回沈阳。我听到这个消息，甚是惊慌，可是报告欧阳钦后，他却冷静沉着，不仅明确表示不同意连夜回沈，而且坚持他的北上计划。他说：“黑龙江我有责任”，“哪有共产党人怕青年学生的！”这种凛然正气，实在感人，但是我们跟着他的人都增添了几分担心。经与吉林省委、省军区领导同志商量，确定当夜不走，明天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作定夺。第二天，强晓初同志乘飞机来长春。经过一番详谈，我们一同飞回了沈阳。这样，欧阳钦回黑龙江交代工作的计划终未能如愿。1969年欧阳钦回到黑龙江已时过境迁，那是在所谓战备疏散中被遣送回来的，住在五常县一个什么地方。当时我在被造反派审查中，回想在长春这一段经历，已经是人事全非了。

四

再回到沈阳，仍还是住在北陵休养所。9月初，北陵休养所在大字报、大串连的气氛中，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加之欧阳钦哮喘病剧烈发作，就住进了沈阳军区总医院。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是风云紧急，到处一片混乱，东北局机关已失去正常工作秩序，其他领导同志处境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下，欧阳钦还是要看文件，要了解情况，看到有什么问题还要发表意见。但是正常联系渠道已经不行了，东北局办公厅安排书记处会议秘书王惠芳同志和我单线联系，沟通情况，送退文件。再回到北陵休养所时，正是到处“炮打司令部”。对这种作法，欧阳钦说：“不能看主席写大字报就也到处乱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打，不要党的领导了吗？”还说：“把老干部都打倒是孤立毛主席。”他针对红卫兵大串联的混乱情况，说“学校应当复课，学生有地方管就好了，免得这样乱。”在医院，看到黑龙江造反派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摘抄，他说：“黑龙江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不少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对国家是有贡献的。”“黑龙江省委是好的，说黑龙江复辟了资本主义是错误的。”这些话显然不只是为了说给我听的。但是当时我除了向王惠芳同志说说，两人空加感叹之外，已经无处向上反映，更无法向下传达了。

转眼到了秋凉季节。欧阳钦的哮喘时好时犯，严重时影响饮食，影响睡眠。“文革”的消息越来越对他的病情不利，黑龙江省委原来的老书记今天这个被罢官，明天那个被打倒。东北局的领导同志也很难来看望他了。欧阳钦在经受疾病和运动的双重折磨，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在他那病弱的身体中蕴藏的与“文革”相排斥的力量，无从发挥。也许是他开始感到无力影响运动了，有一天，张树德同志到医院来，欧阳钦对运动怎样搞反而没讲什么意见，而是对他说：“要抓秋收，运动不管怎么搞还是要吃饭。”还问张：“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中央有没有说法？”当然，张无法作出使他满意的回答。后来，“文革”这场全国大动乱竟达 10 年之久大概是谁也没料想到的。

五

在宋任穷同志与周总理办公室联系安排下，这年 11 月，欧阳钦转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他的脑血栓愈后需要复查，哮喘病也要继续治

疗。离开了沈阳，东北局和黑龙江省的文件材料也不能按时送了，我的工作也不多了，主要是为欧阳钦联系医疗方面的事情，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有时还可以说从我到他身边工作以来没有过的坐下来闲谈。从他的法国勤工俭学生活说到卢浮宫，从巴黎的波洛业森林谈到爱伦堡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能够这样为他解除一些烦闷，我是求之不得的。有一次，谈到《红旗》杂志约他写的文章未能发表，惋惜之余，联想到帮助他写作的同志，他说要感谢李曦沐，还有陈俊生。他说陈俊生这个同志“埋头苦干，好学深思”，并告诉我要向他学习，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忠于党的事业。欧阳钦对我仅有的这一次当面教诲，至今记忆犹新。这段时间的接触使我感到，这位老同志并不像听说的那样严厉，而是和蔼可亲的。

这些生活中的插曲，并没有冲淡欧阳钦对“文革”运动无时无刻的关心。这时文件没有了，他就天天看报纸听广播。有时还叫我去街上去看大字报找传单。有一次一张红卫兵小报，引起欧阳钦发了脾气。12月的一天，我从街上带回来一张小报，是首都红卫兵批斗“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第二天早饭后送给他，他看后发火了，说：“怎么能这样干！无法无天！”“他们这样干，毛主席知道不知道？”“这是革命吗？”说话声音很高。护士进来，才算罢了。从这以后一连几天他的心情不好，闲谈就少了。

在空军总医院过了新年。

1967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和东北局机关造反团来4个人，找欧阳钦核实材料，让他揭发交代问题。经国务院办公厅与医院安排，每天上午谈一次，每次不超过三小时。第一天，来人说明来意后，拿出两份铅印的大字报汇编，第一本标题是“三反分子欧阳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第二本是当时已被打倒的几位省委书记的材料。欧阳钦一看标题，就把材料抛在一边，毫不

含糊地说：“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对党忠心耿耿的，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说别的书记是走资派，我也不同意。”谈话就这样开始的。接着，谈了几次。凡是谈到运动中揭发的省委和他个人的问题，他都是既讲成绩，也讲缺点，总的说成绩是主要的。当来的人问他有没有错误时，他说：“工作上的错误有，但不是走资派。”谈到对其他书记的看法，他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是革命财富。”问到材料上揭发的别的书记的问题，他说：“他们的工作是好的，如果说有错误，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我是第一书记。”几天的谈话，如果说核实材料，欧阳钦确实坚持了他过去一再讲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于说要他揭发交代问题，那是根本没有的。也许是因为有国务院办公室的交代，整个谈话还算是平和的。有时欧阳钦还向来的人问黑龙江的一些情况，并对他们说：“你们有的是干部，有的是学生。当干部的应当完成好本职工作，学生应当好好学习。”在那样的情况下，欧阳钦还表现了对青年干部和学生的善意关怀。

这年6月，我回到黑龙江。时光易逝，9年后再见到欧阳钦，已是粉碎“四人帮”的前夕，那时看他的精神比9年前还好。不料哲人其萎，又过两年我再到北京竟是参加他的追悼会了。

欧阳钦同志逝世十几年了，回忆当年在他身边那一段往事，我心中犹有不尽的敬仰和遐思。

他指引着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

王昭文

欧阳钦同志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热爱黑龙江，重视体育工作的很多情景，至今仍在我脑中萦绕。

1954年至1965年我一直任省体委秘书长，曾多次与省委书记欧阳钦接触，深深感受到他非常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经常过问体育工

作，抽出时间接见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听取汇报，指明方向，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强调开展体育运动要为人民健康服务，要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他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运动，要彻底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希望用人民健康的体魄去回击外国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诽谤。

每当省体育界取得优异成绩时，欧阳钦都给予热情鼓励。1959年，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黑龙江省以 999.7 分名列第七名，欧阳钦和省委书记处的同志们亲临祝贺，欧阳钦高度评价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他鼓励大家说：“29 个单位名列第七名不是中游嘛，可以称得上是上游，不要自满啊！我们前面还有 6 个单位，人家实力都比我们强，我们应迎头赶上去。”他要运动员力争上游，争取第二届全运会突破 2000 分，比现在翻一翻，他说：“建设社会主义都要有一个力争上游的思想，体育本身就是一种竞争运动，运动员在比赛场上不畏艰苦，勇于克服困难，奋勇争先的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必备的品质，值得各行各业学习。”

1963 年，黑龙江省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轻井泽举行的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罗志焕夺得了男子 1500 米世界冠军，在国际冰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王金玉、罗志焕又创造了男子速滑全能的世界纪录，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使许多华侨目睹五星红旗在日本冰场上升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国际滑冰联合会主席拉夫特曼（瑞典）说：“中国滑冰技术提高的快是用了‘东风’的力量。”4 月，省委书记处同志接见了载誉归来的运动员，欧阳钦就国际冰联主席拉夫特曼的话即兴发表了演讲，他说：这个“东风”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树立了爱祖国、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能在世界冰坛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你们毫无畏惧，以顽强的拼搏精神，争取了胜利。这种革命英

雄主义，为国争光的奋斗精神，激励和鼓舞着全省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团结奋进。第一书记的关怀和鼓励使运动员们十分振奋，大家决心继续拼搏，一定为祖国再立新功。

黑龙江省冬季漫长，滑冰滑雪条件好，国家把我省作为冰上运动的重点基地，省委对此十分重视。欧阳钦曾专门找省体委领导研究我省冰上运动的发展问题，他要求省体委要抓住体育运动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的规律，要不断地普及冰雪运动，组织有关生产冰雪运动器材的厂家，生产廉价、适用的冰刀、冰鞋和滑雪器材，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要把训练青少年运动员放在重要地位，教育他们，勤学苦练，掌握过硬的基本功，不仅在国内争第一，还要在世界夺冠军。

欧阳钦同志不仅对黑龙江省体育运动指明方向，还亲自解决发展体育事业所需的建设问题：

1956 年国家体委拨款，拟在省里建立一所体育学校，培养体育师资和干部。当时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反冒进，省委常委在讨论 1956 年基本建设时，欧阳钦同志表示体育学校的基本建设应当上马，他说：“我们北大荒旧社会文化教育落后，各种人才很缺，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和体育急需大量的人才，建立一所体育学校是必要的。”但国家计委把建校物资计划已在 1955 年下达给辽宁不能更改了。常委在讨论时一致表示，国家只给投资不给物资不要紧，所需基建物资纳入省计划。木材，水泥由省地方超产部分给予解决，支持省体委把体育学校建设起来。经过一年的努力，1956 年底 8228 平方米的校舍建成，后经续建，1958 年初具规模，哈尔滨体育学校升格为哈尔滨体育学院。多年来，该学院为黑龙江省体育事业培养了数千名体育教师、教练员、体育干部和科学人员，为我省体育人才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

如今黑龙江的体育事业已有了蓬勃发展，欧阳钦当年的愿望都已

变成了现实。省里不仅有实力较强的各种专业体育运动队，而且各种业余体育运动队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现城乡劳动人民把参加体育运动作为强体健身的一种手段，在机关厂矿和企业，工间操已成制度，青年工人、农民打篮球、排球、赛跑成为业余爱好，许多城镇居民黎明即起，清晨在公园、广场上、树林里，打拳、练剑、做操的人成群结队，大街小巷跑步、竞走的不少。在群众性体育运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各项运动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在国家和国际各种比赛中，黑龙江省运动健儿都拼搏努力，取得了好成绩，为祖国争了光，这也是我们可以向欧阳钦书记告慰的。

光阴似箭，时光荏苒，老书记欧阳钦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回忆往事，欧阳钦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黑龙江体育界的同志们永远缅怀他。

欧阳钦同志与五常县的水稻开发

伞裕民 高洪吉

五常县是黑龙江省人口最多的县，是我省重要的水稻商品粮基地。为此，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欧阳钦同志极为关注，两次亲临五常县视察，对五常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五常县的水利资源极其丰富，境内的拉林河、牯牛河、溪浪河、

阿什河及近 300 多条支流白白地流淌着，一俟洪水泛滥竟酿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解放后，特别是 1957 年以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以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五常县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根治水害，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引水种稻，变水害为水利。

是时，欧阳钦和省委、省人委对五常县的水利化建设给予了有力支持。1958 年 4 月省委批转了五常县的社办为主，建立小水库群，坚持常年治理，集中治理，连续治理，综合治理七道河子水域的经验，以此推动全省的水利建设。1958 年 10 月，省委、省人委又做出了以县为主，省县合建龙凤山水库的决定。水库的建成不仅能根治牯牛河的水患，而且可以利用水力资源发电和灌溉水田。根据这一决定，省里投资 90 万元。大规模水利建设为水稻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到 1959 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发展到 41.7 万亩，五常县的水利建设和水稻开发取得了可喜成绩。

五常县山多、水多、地多、人多。五常县经济的全面发展，势必对全省的农村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欧阳钦同志不顾高龄，不辞辛苦，亲自到五常各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五常看全省，探索指导全省农村工作的规律。

欧阳钦第一次视察五常是 1959 年 10 月 14——16 日。陪同视察的有张向凌、雪浪、卫之民、刘思聪、韩绍卿等省、地领导同志，我（伞裕民）当时任五常县委第一书记，有幸陪同参加了这次视察。欧阳钦一行风尘仆仆到达五常后，在县委招待所听了我关于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等简单情况汇报后，立即驱车奔赴水稻主要产区，朝鲜族聚居的安家人民公社和民乐人民公社。在民乐公社的高产田里，欧阳钦书记看到水稻获得丰收非常高兴。他仔细询问种植品种、播种规格、耕作深度、种植密度、插秧期、施肥量和整地次数等

基本情况，并拿起水稻，认真地查看了稻穗粒数和成熟度，表示非常满意。他对我们说：“你们的水稻种得好，获得丰收，关键是按照‘八字宪法’做了。这才能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做到多种、多产、多收。”

在绞关动力机工作现场，几台脱谷机在绞关动力机的带动下旋转着。欧阳钦书记为农民劳动负担得到减轻兴奋了，他仔细倾听着解说员的讲解，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然后，迈步走向脱谷机，抓起一把又一把的水稻和农民一起脱起谷来，边脱谷边和农民攀谈。在场的人们感动了；一把稻谷一片深情，这寄托着第一书记对五常县人民多么大的希望啊！

在离开脱谷场的时候，欧阳钦书记对我说：“基层是生产知识和经验的来源，一定要多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这才能把工作做好。”他还要我们推广一下绞关动力机，尽力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并以此推动整个技术进步和工具改革。在民乐公社，欧阳钦书记访问了十几户社员家庭。在朝鲜族社员柳范生的家，他象走亲戚一样坐在柳家炕头上，和柳范生从家庭人口谈到家庭收入，又从家庭生活谈到水稻生产。当他听说柳家有几辈人开荒种稻的历史时，鼓励柳范生说：“朝鲜族同志种稻早，有经验，希望你能总结实践经验，带动全社、全县为水稻的大发展做出贡献。”在省劳模、民乐村党支部书记李七夕家里，欧阳钦书记鼓励他要保持荣誉，要传播低产变高产的生产技术，欧阳钦书记说：“你是劳模嘛！劳模就要带动大家。”在慰问残废军人朝鲜族社员陈永浩时，欧阳钦书记对村党支部书记李七夕和乡党委书记穆润堂讲：“对这样的困难户要好好照顾！”对陈说：“你为人民立过功，人们不能忘记你！”走了十几户社员家庭之后，欧阳钦又视察了民乐村的幼儿园。第一书记对这农家幼儿园十分满意，他紧紧握着幼儿教师的手，热情地鼓励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他激动地说：农

村办幼儿园，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也使孩子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集体主义观念。他仔细询问了孩子们的起居、学习、游乐、膳食情况，谆谆嘱咐教师好好教育孩子，离开前他还与教师、孩子们合影留念。

从民乐公社返回县城已是下午4点来钟。我们担心欧阳钦书记的身体，可他精神矍铄，毫无倦意，又坚持视察了农机修配厂和农业展览馆，晚间又兴致勃勃地看了五常县剧团演出的龙江戏《樊梨花》。这一天的视察活动实在是太紧张了，剧散场后我们着急送他回县招待所休息，可他却利用这个空当，向我了解全县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各级班子状况及全县下一步工作打算。他嘱咐我要全面上（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千万不要单打一。在第二天召开的县委常委、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欧阳钦重点讲了农业是基础、发展地方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他勉励五常县的干部：你们在五常工作，就要把五常改造好，建设好，用五常来影响全省、全国。五常县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县，人多要做更多的事情。

欧阳钦的这次视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深入实际，体恤民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干部树立了榜样。这次视察成为推动五常县工作的动力，打这以后，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以水稻开发为重点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出现了新的高潮。按照欧阳钦的指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全县共修筑、加固水库塘坝694座，清理修复引水渠道380余条，万亩以上灌区达到15个，新开水田6万余亩，到1960年，全县水田面积实现47.7万亩。这些水利建设成就和水田的开发，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得历史上水灾最重的1960年损失却降到最低限度，占耕地面积18%的水稻，产量却占粮食总产量的37%。

1960年11月11日，欧阳钦同志第二次视察五常，陪同欧阳钦

书记此次视察的有副省长陈雷，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同志。

欧阳钦书记一行此次视察重点是龙凤山水库。

龙凤山水库位于牯牛河上游，在龙凤山和滚蛋岭间筑坝拦河，坝高 17 米，蓄水 2.47 亿立方米，是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承担着下游 8 个人民公社近 30 万亩水田的供水。

当年 8 月，山洪暴发，水库大坝后侧出现“管涌”现象。县委调动 13000 多名民工，突击 3 天 3 夜，在后坡填石镇压，在前坡刨土堵塞涌水进口，方才排除险情，保住了大坝。否则，洪水溃堤，就会危及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毁掉 30 万亩水田，欧阳钦对此倍加关切。

为了加固大坝，不再出现险情。“管涌”发生后，调万余名民工抢修加固，到 11 月份还在继续抢修加固。欧阳钦书记到工地时，万余名民工正顶风冒雪作业，见此情景，他甩掉大衣，操起工具，投入劳动的人群中。他用力地帮助民工推运料车，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民工们心疼了，谁也舍不得再让上了年纪的欧阳钦象年轻人一样跟车来回跑。在大家极力劝说下，欧阳钦才放开运料车，一边挖土装车，一边向身旁的民工们了解水库的有关情况。

午饭是在水库工地吃的。工地指挥部为了迎接欧阳钦一行，准备多做几个菜，被他制止了。吃饭时，他走进工棚，坐在草铺上和民工们一起吃起同样的饭菜来。他一边吃饭一边问民工：“活这么累，吃消吃不消，你们怕不怕？”大家说：“不怕，挺得住！”欧阳钦说：

“这就对了，我看大家也是挺得住的。为了千秋万代的幸福，吃点苦挨点累是划得来的。”他指着大坝东面的山说：“过去那山叫作‘滚蛋岭’，我提议改为‘胜利岭’，因为我们在这座山下拦河修坝胜利了，堵塞管涌渗水胜利了。水库也再加个名叫做‘幸福湖’，你们同意

吗？”大家齐声说：“同意！”并对欧阳钦书记的命名报以热烈掌声。

饭后，欧阳钦书记登上大坝视察。

看到电站出口处，旋回的水流冲击坝根时，欧阳钦说：“要把坝脚加固一下，修个围墙挡住回流水，改变一下水流的方向就好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及早解决的问题竟被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个想到并提出来了。他反复告诫我们：“象龙凤山这样的大水库一定要很好地巩固下来，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子孙万代，万年幸福。在水库工作上，你们过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点做到了，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点做的还不够，现在就该做这篇文章了。”他还嘱咐我们：

“要按标桩逐段搞个档案，及时记录，留待查询。”当他听说加固水库尚有许多物资县里解决有困难时，便当即请陈雷副省长帮助解决，也请任仲夷书记给予帮助，并指示市管县以后，市要支持县、扶持县。不允许市“吃”县。他反复强调，省、市、县要共建共管，确保水库安全，确保水田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还建议我们为水库建立一个纪念碑，用简短的碑文记录下水库建设的艰苦过程，要在正面用毛主席的字体题上“龙凤山水库”五个大字，以教育后人鼓舞斗志。

这次视察，正是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期。在视察光辉人民公社的时候，欧阳钦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十几名农民群众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当场能解决的，他立即拍板，暂时解决不了的，他提出了处理意见。

当有的社员提出，供应农村的布匹数量少、质量不好时，欧阳钦当即指示省、县商业部门，要将好棉布送到农村，要关心农村，关心农民。

当有的社员提出因饲料困难许多社员都不养猪，吃不到猪肉时，欧阳钦书记对我（伞裕民）及在场的其他县、乡领导同志说：“这个

问题你们要好好解决呀！没肉吃怎么能行呢？要鼓励社员养猪，帮助养猪群众解决饲料，给社员分点自留地。”接着他说：人民公社要把畜牧业抓起来。马是重要的生产力，一定要喂胖一些，多养母马，母马生小马要给予奖励，做到养猪留肉，养马有奖。

当了解到因遭灾减产，一些地方出现的估产不准、报产不实的现象，欧阳钦十分忧虑。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实事求是，估产不要偏高偏低，不要制造人为的紧张。”面对经济困难，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关心和安排好人民生活，要关心人民的吃、穿、烧、用、住房、道路、文化、卫生、体育各个方面。他说：“过去东北有大吃大喝的经验，没有省吃俭用的习惯，现在要搞出一套生活制度来，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活习惯。”

第二次视察，欧阳钦就当时普遍关心的所有制、分配、工农关系，五常的工农业生产，粮食、生活等方面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对我们战胜困难、发展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和鼓舞作用。他曾表示，要争取三来五常，看看五常的发展和变化。五常县的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大家多么希望再亲耳聆听欧阳钦书记对五常工作的指示啊！遗憾的是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

转眼 30 年过去了。如今倍受欧阳钦书记关注的五常县水利建设和水稻开发已获得了巨大发展，在发展自流灌溉的基础上，大面积推行了打井种稻，水稻面积发展到 80 多万亩，占全省水稻面积的 10%，并不断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开展优质、高产攻关。可以告慰欧阳钦的是现在五常县每年向国家交售水稻 2 亿多斤，占交售粮食的 60%，以其突出的贡献被评为全国水稻生产先进县和售粮大县。随着农业基础的加强，工业、财贸和各项事业也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欧阳钦书记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两次亲临五常视察，在五常广

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基层，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品德一直被五常县人民传颂，并鞭策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勤政务实，做好人民的公仆。

难忘的欧阳钦书记

丛 深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 10 多年了，但他在黑龙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哈尔滨市、松江省和原黑龙江省合省不久

的时候。那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哈尔滨话剧院）剧场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我坐在观众席上听他讲话，他的乡音浓重。尽管如此，我却感到他具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我始终聚精会神地仰望着他。他身材不高，两颊清瘦，但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宽阔的额头泛着光泽，两眼炯炯有神，讲话声音洪亮。听老同志说，他曾和周总理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是1924年入党的革命前辈，我不禁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中央派他来担任合省后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我觉得这是对黑龙江省的特别重视，也是我们的光荣。

1956年7月，我参加中共黑龙江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欧阳钦书记向大会做的报告，边听边看报告稿，当然就完全听得懂了，而且熟悉了一些湖南口音的规律。在哈尔滨市代表团讨论报告的会上，一些从延安来的老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杨清同志，我以为是“阳钦”二字，休息时我问一位老同志：“欧阳是复姓，你们怎么减掉了“欧”字呢？”那位老同志告诉我，欧阳钦在延安时期曾化名为杨清，所以大家现在仍喜欢这样叫他。这使我觉得这些老同志不但敬重他，而且在感情上和他很亲近，这是很难得的。

1961年秋天，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黑龙江和内蒙，东北局让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出摄制组随行拍摄纪录片。10月初，著名的老摄影师包杰率摄制组来哈编片，他们向省委副秘书长宗克文提出，希望由丛深来写解说词。于是我和摄制组一起住在北方大厦，根据初编的样片和他們介绍的情况，开始撰写《刘少奇主席视察黑龙江》和《刘少奇主席视察内蒙》两部纪录片的解说词。这期间，我在小会上多次见过欧阳钦书记，关于如何写解说词，他和其他省委领导一起提出原则要求。脱稿后，我又根据他和其他省委领导的意见做了几次修改，直到最后一次，在花园邨礼堂给东北局的几位领导和省委领导放映编好的影片，同时由解说员照画面朗读我写的解说词。欧阳钦书记看完后

显得很满意，其他领导同志也没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我算完成了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视察内蒙》纪录片也委托黑龙江省委审定，欧阳钦书记对这两部影片都非常重视。

“文革”风暴来了，省内和北京的造反派来找我追查这两部“大毒草”的“黑后台”，其目的是针对东北局的领导和欧阳钦书记。我不了解什么“内幕”，这使造反派们相当不满，逐段逐句地批判解说词，连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当成一大罪状，追问我根据什么这样写，我说这是以前《人民日报》上的提法，那时刘、周、朱、陈、林、邓都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并非只有一个林。这表明一些造反派没有历史知识，也是他们企图给欧阳钦加重罪名的心情太迫切了。

1963年春，我在北方大厦参加中共黑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的第四次会议。有一天，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叫我准备在大会上发言，我熬了一个通宵写出发言稿，宣传部的领导审定后，我在大会上照稿发言，中间有一段话是：“有的同志只喜欢轻音乐，不喜欢进行曲，只爱听‘没有你我不能活下去’，不爱听‘我们都是神枪手’”。当我读到这里时，忽然听到从讲台的左侧传来朗朗笑声，我听得出，那是坐在主席台第一排的欧阳钦书记的开怀大笑，那分明是赞赏的笑声，他的笑声带起台下一片笑声和活跃的气氛，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当年的年末，为迎接1964年元旦，省委及市委领导在和平邨会议室接见省市文艺界代表，欧阳钦发表讲话，为了让大家能听懂，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当翻译。欧阳钦在讲话中又当众赞扬了我在省党代会上的发言，他说：“丛深同志的讲话很好，文采风流啊！”

在此之前的1963年8月，我写的大型话剧《还要住在一起》由哈尔滨话剧院打印出剧本，并决定排演，油印本转到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都要上演此剧，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

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争着要拍故事片。在当年 10 月和 11 月合刊的《剧本》月刊发表了这个剧本，根据编辑部的意见，将剧名改为《祝你健康》，这时的剧本根本没上阶级斗争的纲。这个剧本先在文艺界有了较高的呼声，话剧院决定尽快进京首演。市委领导破例在排演场看了连排，第二天早晨，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郑依平同志把剧院领导、编剧和导演找到他家，说市委领导看戏后都很兴奋，直到后半夜还互相通电话讨论这个戏，并说领导要求把剧名改为《千万不要忘记》，并按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加写一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话。我们当然只能服从市委领导的指示。12 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欧阳钦及夫人黄葳和省、市委的领导同志们在话剧院剧场审查《千》剧彩排，看完戏大家坐进贵宾室，欧阳钦叫大家谈是否同意进京演出，最先表示同意进京的是杨易辰同志，其他领导也都同意，欧阳钦很高兴，他也完全赞成进京，这就一槌定音了。此后他对这个戏一直是非常关心的。

1964 年 1 月初，哈尔滨话剧院在京公演《千》剧，很快轰动全国。4 月，剧组载誉返哈。欧阳钦高兴得很，特意在省委食堂请市委领导和我们话剧院的几个同志吃饭，开饭之前任仲夷书记告诉我们，欧阳钦临时有急事不能来了，让他代表招待大家，我非常感激欧阳钦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1966 年 6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7 月闭会以后，外宾分三路参观。东北路参观沈阳、鞍山和长春，将哈尔滨话剧院的《千》剧调到沈阳，为亚非作家演出，这是由周总理亲自审定安排的。这时欧阳钦同志已调任东北局第二书记，接替他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是潘复生。他插手准备为亚非作家演出的《干》剧重新排演，多亏后来受到欧阳钦书记的坚决抵制。

潘复生调来黑龙江时我正随中国记者组在战火纷飞的越南南方

访问，1966年3月回国后又一直留在北京工作，直至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事后我听说，潘复生叫剧院把姚母改成资本家，还要求在剧中加入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我不在家，剧院领导和导演只好硬着头皮改动。剧组到沈阳后，在东北局礼堂排戏，欧阳钦书记极其重视，两次亲临现场，从头至尾看连排，他对于根据潘复生意见改动的地方很不满意，他说：“原来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嘛！”过后，他的秘书邬芳林同志又明确地告诉剧院领导和导演，叫把硬加的毛主席语录都拿掉，姚母也恢复了小业主的原貌。欧阳钦书记的胆识多么可贵！

为亚非作家演完《千》剧以后，一天上午，东北局的车把我们剧院的四个人接到北陵的东北局干休所，当时欧阳钦书记和黄葳同志正住在这里，他们请我们吃午饭。去的人除我之外，有顾为民同志，他是话剧院“四清”中间派来的新院长；有新委派的《千》剧导演肖致诚，原来进京演出的导演、副院长王志超同志，在“四清”中成了“走资派”，这时仍属于“半导体”，所以不能用；还有姚母的扮演者宋湘同志，她当年在留哈剧组演姚母，进京演出和拍电影的姚母扮演者彭彥同志，周总理看戏时特别称赞她的表演。但这次重拍《千》剧却不用她，因为“四清”工作团认为这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右倾”，她不愿揭批剧院的领导。

吃饭时邬芳林同志也在座，欧阳钦和夫人都特别高兴，黄葳总是不停地给我们夹菜，欧阳钦非常亲切地跟我们谈了许多话。他希望我继续写反映黑龙江的作品，他说，黑龙江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他还说，有不少好东西和先进经验是黑龙江先搞起来的，可惜有的我们没有坚持发展，墙里开花墙外红，别的省学了去发展起来了。例如我国的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最先在哈尔滨制造出来的，后来却落在上海等地的后头了。当天，顾为民和宋湘根据他们的记忆写了一份欧阳钦书记

谈话的详细纪要，回哈报给了省委宣传部，现已无从查寻了。老顾于1975年病故，宋湘也于1981年病故，不然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回忆回忆，可以忆起更多的欧阳钦这次谈话的内容。

欧阳钦在接见我们以后不到一个月，全国大动乱就开始了，他的一家遭受了多年的严重迫害。他的儿子欧阳湘也被迫害致死，只因他写了一封揭潘的匿名信！我在话剧院受工宣队审查时听到这一消息，心里非常沉痛，非常同情欧阳钦和黄葳同志的悲惨遭遇，我恨透了这一悲剧的制造者！

相隔12年以后，我又见到了欧阳钦。那是1978年春天，我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开幕的那天，欧阳钦乘坐的轮椅就停放在离我坐席不远的过道上，我急忙走过去问候他：“欧阳书记，您还认得我吗？”他那憔悴的眼睛望着我，声音微弱地说：“不记得了”。“我是从深。”他微微点头，说：“知道，知道！”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但我看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大会闭幕之前，中央领导与全体代表合影，我们站在大会堂东大厅的铁架上等候，在中央领导到来之前，一些革命前辈和各代表团团长先后在前排两侧就坐，其中有欧阳钦。他刚被搀扶着坐下，罗瑞卿大将坐着轮椅经过这里，他激动地握住欧阳钦的手大声说话，我站在高处，听不清他的语音，便问靠近前排的一位我省代表：“罗总长说的什么？”那位代表告诉我：“他对欧阳书记说：当年是你把我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嘛！”啊！原来欧阳钦竟是赫赫有名的罗瑞卿大将的革命引路人啊！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欧阳钦书记。没过多久，传出了他与世长辞的噩耗。他虽然看见了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的覆灭，却没能看见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新时期，这多么遗憾！

我接触欧阳钦书记的机会不多，但他的音容笑貌我是永远不能忘

怀的。我们黑龙江人永远缅怀德高望重资深功大的欧阳钦书记。

欧阳钦同志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高柔

1957 年末，我和李维信同志带着刚满四个月的儿子，从北京中央交通部文工团调黑龙江广播事业管理局，来到了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城。此后，我分配在广播电视文工团（当时正在筹建中），维

信在广播说唱团任相声演员，这使我们有幸结识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

我与欧阳钦及省市委一些领导同志接触与逐渐熟悉，是在当时省里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文艺晚会上。欧阳钦书记留给我的印象是豪爽、乐观，没有领导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对人和蔼可亲，一派长者风度，他讲话带着很浓的湖南地方口音，我们既尊敬他又爱戴他。看节目时，经常能听到欧阳钦书记“哈哈……哈哈……”那特有的爽朗笑声。晚会上，他时常鼓励搞创作的同志，要他们“写黑龙江，唱黑龙江”，要写出有“黑龙江鲜明地方风格与民族特色的作品！”后来我们团遵照欧阳钦的指示精神，创作演出了一批歌唱党、歌唱人民、歌唱黑龙江的新作品。如大合唱《达斡尔人民歌唱共产党》、组歌《黑龙江颂》、男女声小合唱《黑龙江好地方》、女声独唱、合唱《寒江关——樊梨花五更》等。舞蹈《春归雁》是在欧阳钦的具体提示下编排的，演出后，他又细致耐心地提出了修改意见。

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我的爱人李维信和于世德同志遵照欧阳钦书记“写黑龙江，唱黑龙江”的指示，他们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创作了相声《天上与人间》。在这个段子里，他们歌颂了黑龙江人民不畏艰难困苦战胜1957年特大洪峰，气死龙王取得防洪伟大胜利，歌颂了亚麻厂，引得天上织女星都要下凡落户，歌颂了黑龙江各项事业的大发展等。这个段子在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中被评为优秀作品、优秀表演和优秀节目，并参加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巡回演出，受到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回省后，欧阳钦高兴地会见了他们，并在107餐厅请他们俩吃了味道醇美的炖狗肉，而且以后几次炖狗肉，欧阳钦都用车把他俩接去解馋。

1959年，省委把广播电视文工团和伊春歌舞团临时合并，集中在沙曼屯文艺干校整训排练，要排出一台新节目，为10年国庆献礼，

同时，经省委审查批准后出省巡回公演，命名为黑龙江歌舞艺术团。在国庆献礼晚会上，我演唱了东北地方戏选段《王二姐思夫》和《杨八姐游春》，还有专为 10 年大庆创作的东北民歌《大庆子》等歌曲。我的演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和好评。后来出省巡回公演也受到各地群众的欢迎与好评。回省后，省委领导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以后每次在 107 演出我唱完准备的新曲目之后，不知为什么欧阳钦总要让我再加唱一首《大庆子》，而且唱完以后，总能听见“哈哈……”他那特有的爽朗笑声。开始我不理解欧阳钦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后来一次也是加唱《大庆子》之后，欧阳钦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对我说：“我们接受你的意见，把石油会战取得成功的萨尔图改名叫‘大庆’了。”说完后，他看我有些茫然不解（我当时想：我没有提什么意见哪！），又接着说：“萨尔图改名叫‘大庆’是受了你唱的东北民歌《大庆子》的启发。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和成功是我们黑龙江对全国的贡献，中国人从此要摘掉石油落后的帽子了！”他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我听省委的同志讲，欧阳钦在和省委领导同志们讨论给油田起名字的时候，借鉴了《大庆子》的内容，欧阳钦说：“人家老百姓给心爱的小孩子起名字，都能思前想后挑选个有意义的名字，石油城在我们黑龙江，又正是国庆 10 周年之际，我们也叫它‘大庆’吧！”这我才理解欧阳钦为什么特别喜欢《大庆子》这首歌的缘故。我理解这一点以后，在又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后面的一句道白改了，（原来道白为“为了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叫我看哪…改为“为了欢庆咱们大庆石油城的胜利，叫我看哪，就叫他大庆子……”）果然欧阳钦书记听了以后立刻“哈……哈……”地笑了起来，他那特有的爽朗笑声久久回荡在我的耳边。

欧阳钦书记很重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也非常关心每一个文艺战士，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大概是 1961 年冬季，欧阳钦等省

委领导在 107 会议室召开了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我和李维信同志都有幸参加了。开始主管财贸的书记杨易辰没来，欧阳钦特地派人把杨书记请来了，还说：“易辰书记得来呀！他今天得唱主角啊！”原来，欧阳钦书记看到三年自然灾害中同志们生活得非常艰苦，为了关怀照顾文艺界同志们的生活，他请易辰书记特批一些副食、糖、豆、烟及细粮等给文艺工作者，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待遇。座谈会上，欧阳钦号召我们深入生活，繁荣创作，他说：“我们黑龙江幅员广阔，地大物博，出粮食，出煤炭，出石油，出木材，工业上我们有三大动力，量具刃具、亚麻厂、轴承厂等，你们应该写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和先进思想，应该写黑龙江对全国的支援与贡献，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嘛！”欧阳钦书记反复强调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

“文革”十年浩劫，我是歌舞团有名的铁杆保皇派。一次，八区广场斗争李范五、陈雷等省委领导。有的红卫兵往他们身上浇墨水，有的拿皮带抽，看后我心里很不好受。昔日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人，今日竟遭此蹂躏，这是什么“革命”啊？百思不得其解，讨论会上我气愤地说：“这些人都是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这样对待他们，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那年月我说这些话是犯忌的，果然不隔夜就传到了造反派头头那，于是我一时成为歌舞团的众矢之的……为什么对这些领导同志我会有这种感情和立场呢？就是因为我与省市领导接触较多，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国分忧，为民着想，为黑龙江的建设和繁荣呕心沥血的伟大胸怀和高尚情操留给我深刻印象的缘故。我当时十分担心欧阳钦书记，如果被揪出来斗争，他的身体怎么能经受得了！后来听说总理把欧阳钦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我真从心底里感谢人民的好总理啊！但欧阳钦书记唯一的爱子欧阳湘却被迫害致死，我从心底里为欧阳钦和夫人黄葳失去爱子而难过心疼，老年丧子是人生最大不幸，这对他们二老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听

说“文革”后欧阳钦一直有病，身体很瘦弱。我想如果没有这十年浩劫，他一定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我十分怀念我们的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听见他那特有的爽朗笑声……欧阳钦是党的好干部，黑龙江人民的好领导。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热爱黑龙江的广大人民群众，时刻不忘对党中央、对全国人民多作贡献！时刻不忘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时刻不忘弘扬民族文化。他的丰功伟绩黑龙江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铭记在心！欧阳钦书记：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热情的鼓励 谆谆的教诲

魏淑琴

每当我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就会想起欧阳钦同志的谆谆教诲。1959年至1965年期间，我先后被欧阳钦同志接见20多次，他那些充满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寄予无限期望的教导，至今仍然是那样的深刻、亲切，而又催人奋进，象一股暖流在我心中奔流，使我永生

难忘。

记得 1959 年国庆节前后，我作为学理论积极分子参加了在哈尔滨铁路文化宫举行的学理论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开会前，我们都坐在前厅里的长条会议桌周围。我坐下后，一抬头，看见桌子对面坐着一位容光焕发的老同志正微笑地看着我，啊，原来是欧阳钦书记！我当时才 21 岁，而且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能和省委第一书记坐得这么近，还是第一次，所以有些拘束。欧阳钦见状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回答：“魏淑琴”“噢！你就是魏淑琴同志，你的事迹我都知道了。了不起呀！一个售货员工作之余坚持学理论、学哲学，年轻有为呀！”接着他又深情地说：“你是营业员，我是省委书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所以我们是平等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国家底子薄，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要靠我们的共同努力，但更主要的要靠你们青年人。”这亲切的话语，深情的嘱咐，充满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年青一代的殷切希望。我十分激动，在心中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1960 年 6 月，中宣部、团中央等单位在黑龙江召开了全国理论学习现场会，我也做为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全省出席会议的学习标兵个人和标兵单位的代表被邀请到省委常委会议室，受到了欧阳钦、王一伦、杨易辰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欧阳钦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微笑着同我们一一握手，并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各自汇报了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及今后的打算后，欧阳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我们说：“学习是无止境的，要理论联系实际，用学到的理论，说明工作中的问题，说明的越多，你的成绩就越大。学好哲学，在工作中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希望你们成为工农群众的理论家。”如今，30 多年过去了，但回忆起欧阳钦同志的谆谆教诲，依然是那么

亲切，那么鼓舞人心。

按照欧阳钦同志的要求，我努力带动周围同志学哲学、用哲学。我们哈尔滨市第七百货商店（现百货大楼）青年自学理论小组的17名同志，利用每周星期二、四、六早5点半到6点半和下班后的时间坚持学习，一直坚持到1966年6月份。“常年坚持学习，必有好处”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身上取得了效果，得到了实践的证实和时间的考验。

我们学理论结合实际自学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马克思的《资本论》部分章节，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十几本书。通过学习，使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摆正了个人利益同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在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在学习中，注意了和实际相结合，总结创造出“接一待二眼观三，人不到话先到”的售货法，受到同志们和广大顾客的赞扬。我结合实际写学习笔记100多万字，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哲学研究》，《奋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0多篇；并在“文革”后写出《售货艺术》、《售货员指南》、《让哲学在时代的洪流中闪光》三本书。1960年3月7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售货员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文章，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并在3月24日天津会议上号召大家看看。毛泽东同志说：“：哈尔滨市魏淑琴同志学哲学的文章可以看看，哲学是一种方法，不会就懂工作方法，工人学哲学要来个普及运动。”

正是在欧阳钦同志的教育、指引下，我才在学哲学、用哲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总结出了“读、想、问、写、讲、用”的学习方法，使我由一名普通的售货员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被评为市、省、全国青年学理论的标兵，市、省著名劳动模范，1960年6月1日出席了

全国文教群英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在 1964 年第九次共青团中央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是和欧阳钦等老一辈领导同志的重视、引导、教育、鼓励分不开的。每当回想起这一切，我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我将永远铭记欧阳钦同志给予我的鞭策和教诲。

朴素的感情 深切的关怀

张太斌

我是 60 年代哈尔滨玻璃厂的工人，在一次意外的火灾事故中，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工人的安全，被烧成重伤。在全面治疗和重新工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关怀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一个普通工人朴素、真挚的阶级感情，从而激励着我为家乡的化工事业奋斗不息。

1963年12月21日晚9时许，我正在高温熔化炉前低头检修送料机，突然听到一声大喊：“炉顶上冒火了！”抬头一看，只见炉顶上火光闪闪，浓烟弥漫。我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炉子上空柴油机管道阀门上接漏油的铁桶溢油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排除，后果将不堪设想。一闪念之间，我奋身一跃，迅速爬上了滚烫的炉顶，去摘那只油桶。油桶一晃动，又洒出一些油来，火上浇油，油助火势，把我的全身一下子烧着了。我忍着剧烈的疼痛，终于把油桶解下来了，为了避开下面的制瓶机和人群，我又提着油桶转身走了几步，扔到一个钢架子上，工人们七手八脚地把火扑灭了，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事故。当时，我已经成为一个火人了，从炉顶跳下来后，就昏厥过去了。

我当即被送进香坊区人民公社中心医院，经医生诊断：全身烧伤面积达30%，而且都是手、胸、咽喉、脸等部位，伤势极为严重。消息传出后，省、市、区的领导纷纷前来看望和慰问。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亲自指示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治好我的烧伤。欧阳钦亲自选调省、市医院的专家、教授给我联合会诊。他还从上海、北京请来全国著名的医生来治疗，又指示民航部门从上海、北京空运必要的仪器和药物。市委在欧阳钦的领导下，组织了大批群众为我义务献血、献皮。这些非常具体的关怀使我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1964年2月13日上午，欧阳钦亲自来医院看望我。他到病房后，首先向我祝贺春节，表示亲切的慰问。他对在场的人说，张太斌同志抢救火灾的英勇行为，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坚毅勇敢的优秀品质，表现了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伟大风格。张太斌同志的这种公而忘私的行为，就是生动的革命活教材。大家都具备了这种革命精神，必将大大加速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后他对我说，你要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岗位，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欧阳钦走了，我久久地回味着他的话。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的伤势有了好转，但限于条件，有些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欧阳钦听说这一情况后，指示有关部门把我送往北京治疗。临走的那一天，他亲自来我家送行，嘱咐我要积极配合治疗，勇于和善于同伤病做斗争。他还安慰我不要惦念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组织上会照顾好这一切的。望着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听着那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我激动不已，无言以对。一个普通工人受到党和政府这样的重视，享受这么高的待遇，在解放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啊！我流着热泪，带着党和政府的温暖，去北京接受治疗。

在北京治疗过程中，欧阳钦仍然给予了方方面面的关怀。他指示省驻京办事处领导每星期来医院看我一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来北京开会，委托秘书带着营养品专程来医院看我三次。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治疗，我的伤势进一步好转，可以出院了。

1965年春节前夕，厂领导把我接回家里，同家人团聚。大年初一，欧阳钦亲自登门，给我全家拜年。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伤势和治疗情况，还仔细察看了几处烧伤痊愈的部位，关心备至。看到我的伤势大有好转，他非常高兴。欧阳钦同志临走前，同我们全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欧阳钦走后，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人民的好书记欧阳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千百倍的努力报答党的恩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说我是欧阳钦树立的“假劳模、假英雄、黑样板”，三番五次地拉出来批斗，给我造成了重大的心灵创伤。一个时期，我心灰意冷，工作也不想干了。后来，欧阳钦托苏广铭给我捎来口信，告诉我不要气馁，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群众运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一个劳模的贡献。他还嘱咐我加强政治学习，爱惜身体，永远保持劳模应有的本色，为化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欧阳钦同志的话使我很受教育，也很受鼓舞，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

鼓足干劲，多做贡献，做一个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劳模。

20 多年过去了，欧阳钦同志的关怀和教诲，我一直铭刻在心，只要生命不停止，就要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

欧阳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

黄 葳

1945 年 10 月 13 日，欧阳钦同志和我带着湘湘离开延安赴东北。欧阳钦开始在冀察热辽分局工作，1948 年 7 月调到旅大市委，1954 年 7 月调到黑龙江省委，我也随同调动。他在领导机关工作，我先是在基层搞土改，后来在工厂和科研部门工作，彼此都很忙，平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们是平等的，各做各的工作，坚持组织原则和纪律。

我工作中的事直接向主管上级请示汇报，他的事我不过问，也从来不同他到中央开会的地方去。两人互不干扰，互助、互勉、互谅。我到下边工作，他总是嘱咐我要特别注意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

节假日，他好轻车简从到近郊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我也常带两个女儿陪同他前往。他随便和农民谈话，我们走后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他通过这种方式，亲自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这也是女儿们最高兴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是我们两人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也是我们全家和他患难与共、对他了解最多的一段。

一、在周总理的保护下

欧阳钦同志 1965 年离开兼任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专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在代表东北局参加 1966 年 3 月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时突然病倒昏迷不醒，住进了 301 医院抢救。这次病得很重，身体已很虚弱。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以他这样的身体和刚直不屈的性格，如果遭到造反派的直接批斗，不要说是体罚，就是听到那些诬蔑、侮辱和咒骂，他也会被斗死和气死。他之所以能够挺过“文化大革命”幸存下来，看到“四人帮”的覆灭，首先是因为有敬爱的周总理的保护。

欧阳钦 1926 年 6 月，从法国勤工俭学和到苏联学军事后回国，在浏阳参加叶挺独立团任见习官，经过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战役，围攻武昌时，调到聂荣臻同志为书记的湖北省军委任组织科长。1927 年 7 月至 1932 年 6 月，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和中央苏区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组织部长和苏区中央局书记时，欧阳钦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任组织科长、秘书处长、秘书长等工作。此后在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在西北、在东北的工作表现，周总理也都有较多的了解，

可谓知之甚深。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以他崇高的威望一再替欧阳钦说话，挡住了造反派揪他回黑龙江批斗的要求。

1966年10月，欧阳钦在北京空军总医院治病，周总理接见黑龙江省两派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谈大联合和成立省革委会时，造反派提出要欧阳钦回黑龙江。周总理说：“欧阳钦历史上没有问题，在黑龙江工作中的问题，大家可以提，但欧阳钦有病不能回哈尔滨。”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成立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报上发表了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2月间，东北局机关和黑龙江省的造反派窜到北京空军总医院，想偷偷地把欧阳钦揪回哈尔滨批斗，已经买好了机票，准备好了棉衣棉鞋。周总理获知后，立即告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派秘书传达他的指示：“欧阳钦身体不好，工作中的问题可以提，材料可以送来，但人不能回黑龙江。”造反派无计可施，只能悻悻然在医院散发了许多大字报悻然而去。1967年4月、10月造反派又两次来医院带着“彻底批判欧阳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屈从苏军的奴隶主义罪行”等莫须有罪名材料，批判欧阳钦，前后连续15天，逼他逐条承认。欧阳钦严厉批驳、坚决反对。他向周总理写了报告，“我决不是三反分子”。此后他的身体更差了。

1968年4月，中央办公厅派孙吉太同志到空军总医院接欧阳钦住进了中直招待所，奉命和黄火青等许多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住在一起，摆脱了造反派的冲击。

1971年9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审查欧阳钦的定案组通过李强同志向周总理调查欧阳钦的历史，周总理又一次说：“欧阳钦在上海没有被捕过，没有历史问题”。定案组记录在案。

1973年欧阳钦在北京医院住院，周总理到医院看望熊瑾汀同志和傅作义先生，见到了我，知道了欧阳钦也住在这里，随即到欧阳钦

的病房看望了他，询问了他的病情，要他好好休息治疗。这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面。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王震、余秋里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周总理说明欧阳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等人的斗争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过去在黑龙江工作时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黑龙江给国家运了大量的粮食、煤炭、木材；他对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开发大庆油田、开发北大荒、安置移民和复员转业军人，都是积极支持的，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也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周总理看到这封信后说：“你们写得对写得好”。

正是在周总理不止一次明确表态的保护之下，欧阳钦才得以在造反派猖狂肆虐的“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地保护了党内外许多同志，欧阳钦就是其中之一。

二、在吓人的罪名下

欧阳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避免了遭受造反派的直接批斗，但却被加上了许多吓人的罪名。什么“刘少奇在黑龙江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其中，始终抓住不放的，一是“走资派”，二是“高岗余孽”，三是“以欧阳钦为首的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

欧阳钦受高岗的排斥和打击，凡熟悉西北和东北党内历史情况的同志都是了解的。欧阳钦说：“在我任陕西省委书记时，1941年成立西北局，高岗任书记，陕西省委常委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提出：高岗同志对大后方国民党区域工作似颇隔膜，因此我们认为西北中央局现有领导成份有加强必要。从此，高岗对我恨之入骨，把我由陕西省委书记的岗位调去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调虎离山’安插而已，后

来，在延安康生搞‘抢救失足者’时，高岗诬蔑陕西省委地下党是‘假党’、‘红旗党’，将曾在陕西省委领导下的许多好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关起来批斗。”欧阳钦说：“历史事实证明，陕西省委和党员同志们正确执行党中央在国统区的‘精干隐蔽’十六字政策，巩固了地下党，尽量发展统一战线，建立了扎根于支部的武装交通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李先念同志曾说过：康生诬蔑陕西地下党是个假党，我说怎么是假党呢？陕西的党是个真党，是个好党！我在陕西走的那条路说是白区，实际上是红区，很安全。少奇同志也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好多人（郑位三、陈少敏、王震等）都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批斗这些同志也是对着我和陕西省委来的。后来我到旅大担任市委书记时，高岗也屡次给以打击，并曾想把我调出旅大。”欧阳钦说：“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和省革委会的当权者说我是‘高岗余孽’，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对此，欧阳钦认为不值一驳。他说：“我在西北、东北都受到高岗的打击，现在竟成为‘高岗余孽’了，真可笑！”

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捏造出一个“以欧阳钦为首的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把许多同志罗织进去，这个骇人听闻的罪名当然也是弥天大谎。欧阳钦识破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险恶用心。他深刻地指出：“他们抓路线上、工作上的错误问题，群众是看得到的，可以辨清的，不足以推倒人。必须以莫须有的罪名，诬称你是叛徒、特务、反党叛国，才能打倒你，才能夺权。他们捏造出一个反党叛国集团，用意在此。”

对所谓走资派问题，欧阳钦始终认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黑龙江省十几年的全部工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不论有多大的压力和什么样的诱饵，他都毫不松口，一直拒不承认。他说：“我1954年到1965年在黑龙

江省工作期间，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作上有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但不是走资派或犯走资派错误。”当专案组负责人说“省委其他书记已经承认了走资派，解放了，工作了，全家团聚了。其他书记都承认了走资派，你省委第一书记不承认，把错误推到他们身上，风格太低，不是一个领导人的态度”时，欧阳钦说：“我不信。其他书记定走资派，我也要向中央提意见。我是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十几年来走的是什么道路，我负主要责任。我要向中央报告请示，问十几年来黑龙江省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至于你说承认了可以重新工作，那么我要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专案组负责人又说：“你不承认走资派，就凭农业三自由，一年也可以批你三次。”欧阳钦说：“批斗多少次，我不怕，要革命就有斗争。”他就是这样和整他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黑龙江省革委会初期的负责人垮台以后，欧阳钦的专案组改成定案组。定案组经过复查，认为欧阳钦的问题确是工作上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报经省委批准，把欧阳钦由“走资派”改为“犯走资派错误。”对此，欧阳钦仍不同意。他说：“我不是走资派，也不是犯走资派错误”，要求向中央上报时把他的意见也附上去。

为什么欧阳钦连承认了就可立即解放重新工作的“犯走资派错误”也不承认？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原来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全省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干的。倘若我承认了走资派或犯走资派错误，那就等于说我领导的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工作和劳动，这是对黑龙江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污蔑。”

欧阳钦不仅自己坚决不承认走资派和犯走资派错误，并反对给省委其他书记定为走资派，而且对别的同志的政治命运也非常关心。当听说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有一半被打倒时，他对专案组说：“抗联

是毛主席肯定了的。1950年我们从苏联回来，在哈尔滨国际旅行社的屋顶上看市容时，毛主席对李延禄说：抗联的成绩要肯定，缺点是没有很好地走群众路线，没有建立根据地。”欧阳钦还要我在见到李延禄的夫人高云清时告诉她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有一次我在南岗邮局见到高云清，同她讲了这个问题，让她告诉李延禄同志。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无限上纲、打倒一切，欧阳钦曾经反复地思虑过，并且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过分析。他对我说：“我牢牢地记得，1931年8月30日，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苏区中央局工作时，周恩来同志着重指出，苏区反AB团斗争存在简单化、扩大化的问题。要纠正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减弱我们自己的阶级坚信心。但是对于这个教训没有很好总结，在历次运动中又屡犯这个错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失足者’，冀察热辽土改中的‘扫地出门’、‘搬石头’，旅大地区‘三、五反运动’中无根据地抓‘大老虎’，现在‘文革’中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转到我们头上来了。这都是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削弱自己的阶级坚信心，伤害和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把坚持真理、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的革命者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这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相信一定会搞清楚的。”说罢这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些，就是在那个黑白颠倒、人妖不分、阴霾满天的年代里，欧阳钦所取的态度和所作的思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欧阳钦的这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坚贞不屈的态度，感动了定案组的几位同志，他们实事求是地对原来给欧阳钦所列的罪状，逐条地进行复查、核实、纠正；还将欧阳钦被抄去的一些手稿妥为保存，不使失散，最后又交还给我们。对所谓“以欧阳钦为首的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的材料，他们也全部封存起来，不同意销毁，为日后的平反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这些，他们曾被扣上

“右倾”的帽子，但他们始终没有动摇。由于他们坚持原则的努力，使欧阳钦的问题能早日搞清，为平反提供了条件。后来谈到这些情况时，他们谦虚地说：“这只是做了些应该做的事，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这也是欧阳钦同志平时对我们的教育以及在‘文革’期间所表现的那种坚定立场、高尚品格、坚贞性格对我们教育感染的结果。”

三、在沉重的精神打击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欧阳钦同志的一个沉重精神打击是我们两人唯一的儿子欧阳湘的惨死。

湘湘是我于1940年4月在西安生的。当时欧阳钦任陕西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关中分区的照金，我因怀孕没有转移到解放区去。生下湘湘的第三天，敌人就要到医院来抓我，是八路军办事处派出林伯渠的汽车，在地下党同志的掩护下，把我们接了出来。后来随朱德同志的车队从西安到了延安。我们为了工作和学习，把湘湘托付给枣园的一位农民养大。长大后，这孩子很朴实，很好学。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就入了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但他主动要求先到安徽寿县戴楼大队锻炼，并在写了思想总结以后才到自动化所报到。工作后，他把头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忧国忧民，给他认为可以信任的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揭发批判了当时的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就于1968年底，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从他正在与人进行合作研究的长春，揪到哈尔滨，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然后又被押回长春，不久被残酷迫害致死，年仅28岁。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肝肠欲裂，心想他出生3天就有特务来抓，幸有党的营救得免于难，而今却死于林彪等人的追随者之手，真是悲愤万分。但是考虑到欧阳钦的病情和当时的处境，一直瞒着他。时间

久了，总没有湘湘的消息，他常问“湘湘怎么没有消息？”我说：“他到外地搞科学技术研究去了”。他说：“为什么连一封信也不来？”我说：“搞尖端，保密，不准通信。”就这样一瞒瞒了3年。1972年1月，我写信给周总理和有关部门，要求查清欧阳湘被害真相。信写好后，我忘了及时收起来就到厨房里去，被欧阳钦看到了。回到住室时，我看到欧阳钦呆坐在床边，两眼发直，脸发青，手发颤，知道瞒了他3年的事他终于知道了。我不得不压住自己的悲痛，平静地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只是没有讲湘湘惨遭毒刑和两个妹妹晓光、晓明也因此事一度同时被捕，以免引起他更大的痛心和愤怒。听后，他无比沉痛地说：“湘湘是个好孩子。毛主席、周总理保护了我，他们搞不倒我，就搞孩子。他们搞下一代，是想搞垮我们老一代，搞垮老一代，为的是搞垮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按照他的性格，他是一定要坚决斗争的。但是，我们共同分析了当时的处境，我们的一切直至生命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本来那时中央规定子女可以住在一起，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不使晓光、晓明也遭到湘湘的命运，我安排她们两人在辽宁农村插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强忍住自己的悲痛和愤慨，并且相互勉慰不能因悲痛而示弱于人，也不能因此而搞垮了身体。出乎意外，欧阳钦说：“革命就要有牺牲，”表现得很镇静，虽然内心极度悲痛，却始终不形于色，革命意志丝毫未减。但是，他的病情还是加重了。

四、在干部、群众的关心帮助下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欧阳钦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的医院和中直招待所里，生活和安全还是有保障的。1969年10月20日，林彪发布一号通令，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到中直招待所向住在这里的各省负责人说，由于战备紧张，北京疏散人口，各省负责人大部分要回本省，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一）你们虽然尚未作出结论，

但属人民内部问题；（二）是党员，应交党费；（三）可以看文件，可以到各地看看工农业生产情况；（四）发全工资，可以和家属住在一起，安排好生活，同时当场宣布欧阳钦和黄火青回辽宁。我们理解，让欧阳钦也回辽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前欧阳钦已离开黑龙江到沈阳专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党的关系和户口都已转到沈阳。但不知是何原故，他却被送回黑龙江。

欧阳钦回黑龙江，是由两位解放军同志护送，并有晓明同行。到哈尔滨后，解放军同志向省革委会和我都传达了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所讲的几点，并交代说：“欧阳钦身体不好，生活上要特殊照顾，中央很关心欧阳钦。”但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并没有执行中央的明确指示，而是把欧阳钦严密地隔离封锁起来，使他在哈尔滨市和五常县过了3年多的幽禁生活。中央指示：欧阳钦他们都是人民内部问题。但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却继续召开所谓“批判刘少奇在黑龙江的代理人欧阳钦”的大会，报纸和电台也不断地发表和广播“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钦”的文章。中央指示：欧阳钦等同志可以看文件，可以到各地看看工农业生产情况，可以和家属住在一起，安排好生活。但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却以欧阳钦的“安全”为名，专派一个人来监视他，不让他与群众接触，更不准他外出，甚至连我们家人的行动也受到限制，并在生活上设置了种种困难。

我们之所以能度过这3年多的幽禁生活，主要是依靠许多好同志的帮助。这里有原来省科委、省委和省直机关的干部，有医院的医生、护士，有省委招待所和我们家里原来的服务员，有许多好的群众。当我想方设法出了软禁我们的院子，和外面的同志取得联系以后，他们知道我们生活上有困难，就多方给以帮助。有的到市场上为我们买蔬菜和用品，有的给我们买议价粮，有的还节约自己的口粮和配给婴儿的奶粉送给我们。哈尔滨医大附属医院和省医院的医生、护士，熟悉

欧阳钦的体质和病情，我到他们家里口述欧阳钦的情况和血压、体温，他们就给开药，并叮嘱护理上应注意的事项。晓光、晓明来哈尔滨时，都是由小时候照顾她们的阿姨刘春兰和她的丈夫陈有才接送，以保护她们的安全。“文革”前我们没有带往沈阳的东西存放在省委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服务员机智地把我们寄存的木柜搬到阅览室，夹在机关的木柜中保存了下来，如此等等。正是在这许多同志的关心、照顾和帮助之下，我们虽然在被幽禁的院子里，但仍然感觉到生活在群众中，并不孤立无援。欧阳钦在黑龙江工作了10多年，是好是坏，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十几年的心血在干部和群众心中扎下了根，是想置欧阳钦于死地的人永远也拔不掉的。

幽禁生活大门的打开有点戏剧性。1972年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带着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组的十几个人（大都是欧阳钦老战友的子女），从大庆回到哈尔滨，一下火车，就由省科委的同志领着，直奔我们所在的分部街，到了幽禁我们的地方，由随队的保卫人员叫开大门，一冲而进。从此，冲破了对我们的封锁。这年冬天12月25日，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报，欧阳钦被送回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结束了在黑龙江的3年艰难岁月。

1973年5月10日，欧阳钦在他的自我检查中写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和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保护，可能早被潘复生给我捏造的‘走资派’、‘高岗余孽’和‘里通苏修反党叛国’等罪名置于死地了。”这是他自己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所作的合乎实际的总结。

欧阳钦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特别是周总理以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保护，得以度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覆灭，1978年3月28日党中央批示撤销“黑龙江省委关于欧阳钦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同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

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但令人痛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给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本来就有病的身体到了极度衰弱的地步，以致在 1978 年 5 月 15 日突然逝世。他没有能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和亲自参加新的黑龙江省委召开的“以欧阳钦为首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平反大会和给欧阳湘平反的全省有 29 万人收听的广播大会，也没有能够实现要回到他热爱的黑龙江去看看的热切愿望，更没有能够看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巨大变化。这不仅是我们全家，也是他的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们都感到深深遗憾的。

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0 多年了。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在行将进入改革开放之前结束了自己革命的一生。我和他共同生活了 39 个春秋，我亲眼看到，他是一个一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一心为公的老共产党员。这是他在我心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形象，也是我学习的榜样。生前，他为党和人民贡献了全部心血。身后，他以自己的思想作风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对他的怀念是永恒的。

回忆父亲

晓光 晓明

我们是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出生的，父母给我们起名叫晓光、晓明，取天已破晓、出现光明之意。

我们出生的时候，父亲已过 50 岁，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他是一个繁忙、严肃、受人尊敬的人。他平时少言寡语，从不轻易流露感情。父母工作都很忙，母亲在工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父亲常常开

会很晚才回来，有时一连四五天不见他面。父亲的办公室对我们是“禁地”，我们从不随便进入。那时，能与父亲、母亲在一起吃晚饭，我们就很高兴。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他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随便。在我们记忆中，早些时候，每顿饭给父亲的一个特殊菜是干煎辣椒，后来我们在院子里种了苦瓜、丝瓜等南方蔬菜，父亲的食谱里，除了每天增加一瓶酸牛奶外，又增加了炒苦瓜。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了一位一级厨师做饭，父亲请组织把他调到国际旅行社，他说：“一级厨师到那里才能发挥他的特长，家里只要有阿姨做些家常菜就可以了。”

父亲很爱我们，从不对我们发脾气。每当他从外面回来时，我们就扑到他的怀里玩耍嬉闹。吃饭时，我们有时因他碗里剩下几粒米，而大声批评他，向他大讲“粒粒皆辛苦”，他会带着支持与纵惠的神气看着我们一本正经地“教训”他，并表示接受批评，高兴地吃掉几粒剩饭。有时，在夏日假日的傍晚，我们全家到松花江畔散步看日落，父亲和母亲并肩漫步，我们两人跑前、跑后，美丽的江畔风光，恬静欢乐的气氛，给我们留下幸福美好的回忆。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父亲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关系。每年春节，他都要在家请警卫班战士和秘书、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一起聚餐，这是我们家一年中最丰富的一顿饭。有一年还为警卫班的一位回族战士专门做了清真饭。饭后，父亲和大家坐在一起谈谈，谈话中他总是强调：我们是革命的大家庭，为革命工作走到一起来了，只有革命工作分工不同，没有上下，高低之分。我们一群小孩给大家表演节目。这时分不出省委书记还是锅炉工，是首长还是战士，大家欢聚一堂，犹如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在春节期间和节假日里，父亲经常带我们全家乘车去乡下转一转，不事先通知，也不到县乡机关，随意走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到田间地头，与老乡闲聊，

老乡们不知他是谁，很自然地与他谈生活、生产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因此得到了许多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我们常跟父亲下乡，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农村的状况有了一定认识，也耳闻目睹了农民的勤劳与辛苦。有一次下乡前，警卫员事先通知了公社领导，我们到大队后，只见县、社领导来了，屋里桌布崭新，茶具干净整齐，与以往大不相同，仔细一问才知道，他们将供销社的东西拿来接待。父亲很生气，责令他们送回，并严厉批评了他们。有一次，我们在下乡路上碰到一队解放军战士，当汽车与他们相错之际，认出来是曾经在我们家值过勤的解放军战士，换防到这里，父亲立刻停下车，与他们亲热地攀谈。我们也非常兴奋，像是遇到了久别的亲人。

我们的哥哥欧阳湘比我们大 10 多岁，当我们上小学时，他已经上大学，父亲对他要求很严，与他谈话也较多。哥哥放假回来，父亲安排他随省里到五常、呼兰农村工作的同志一起去乡下调查研究和体验生活。大学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安徽肥西、寿县农村劳动锻炼，参加社教工作。哥哥勤奋学习、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前，虽然父亲在省里任省委第一书记，我们从小就没有特殊化的概念，妈妈常常夸奖哥哥在中学住校 6 年、没人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的儿子，我们也从不炫耀自己的家庭，没有优越感，与普通工人的子女一起学习劳动，相处得很好。

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结束了。虽然我们只有十几岁，但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和教育，使我们从小树立自强自立、艰苦朴素、平等待人的思想，为我们的人生观奠定了基础，使我们在十年动乱中经受住了各种磨难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父亲在北京参加会议，因突然发病住进了 301 医院，出院后回东北疗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

保护他免遭造反派的批斗，周总理安排他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治疗。1967年元旦，妈妈响应毛主席“到群众中去”的号召，将回哈尔滨参加“运动”，临行前，我们全家在医院相聚，父亲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我一生为党的事业奋斗，不管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坚决跟党走、跟毛主席走。”父亲的话在我们心里引起很大震动，从小我们一直生活在幸福快乐之中，尽管父母年龄较大，但他们总是朝气蓬勃、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投身于工作之中，而现在却忧思重重，也许那时父亲已预感到一场浩劫即将来临。我们听了他的话后，心情很沉重。

自那以后，我们一家人天各一方。父亲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开始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对他很尊敬，也很照顾，病房条件也很好。1967年初，东北的造反派到医院企图把他强行带回东北批斗，总理得知后，制止了他们。总理在接见造反派时说：“欧阳钦历史上没有问题，在黑龙江期间的问题可以揭发批判，他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回黑龙江，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说。”造反派没有达到目的，就把所谓“欧阳钦反党罪行”的材料散发给医生、护士和病员，医院里医护人员的态度随即起了变化，病房也被挤占。晓明多次听到护士对父亲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你是犯了错误的。”父亲对这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只是淡淡地说：“你们不了解情况。”随后不久，秘书、警卫员也相继离去，妈妈在黑龙江被批斗，只有父亲一个人住在医院。这段时间里，他很孤独，心情也极为压抑，一下变得苍老了许多。父亲多次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申述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一再要求出院。后来中央派办公厅孙吉太同志接他出院，与许多省的省委书记安排住在一起，保护起来。

妈妈原来把我们分别安排在北京和大连的亲戚家里，这时我们的亲戚都遭到批斗和关押，我们俩只好回到沈阳，住在东北局大院宿舍

里。每月仅有很少的生活费，节衣缩食度日。爸爸只能与我们通信，通过我们了解妈妈和哥哥的情况，他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自己照顾好自己。他一再说明：爸爸决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九大”以后，老干部的处境略有好转，父亲来信告诉我们，中央允许家属去探望，我们俩一起去北京看望他。在中直招待所，我们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父亲。我们得知，父亲和被中央保护的各省领导住在一起，互相帮助，交流思想，尽管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承受巨大压力，他却能乐观积极地面对逆境。父亲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大、身体最差的，在生活上常常得到其他老同志的帮助。父亲恰巧在工资冻结前拿到了几个月的工资汇款，就成了他们中间的“富翁”，可以常常资助其他人。父亲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比过去好多了，他断断续续写了《我的生平》的材料。

各家的亲人都到北京来了，这个寂寞的招待所变得热闹起来了，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大家都认为“解放”这些老干部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可是阴云并未散去，1969年林彪发出“一号通令”，汪东兴同志代表中央通知住中直招待所的这些老干部疏散外地，并传达了四条原则：一、你们尚未作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二、是党员、应交党费；三、可以看文件，可以到各地看看工农业生产情况；四、发全薪，可以和家属住在一起，安排好生活。父亲原被安排回辽宁，不知何故又改为去黑龙江。黑龙江在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的控制下，违背中央指示，继续掀起新的大批判浪潮，就在父亲从北京启程的当天，召开了全省大会，“批判刘少奇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欧阳钦投降主义的外事路线”。此后，各种批判不断升级。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我们希望全家团聚，父母也很需要我们在身边照顾，但为了我们的安全和精神

上不受过大的压力，他们忍受了骨肉分离的痛苦，让我们继续留在辽宁，妈妈一个人帮助父亲承担了政治上、生活上的沉重压力。

我们下乡到盘锦后，每年农闲放假才能回来看望父母。每次临走时，都深深感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心情。父亲经常说“爸爸年纪大了，不知还能不能再看到你们了。”他也常问起“湘湘为什么不来看我？也不来信？”我们怕他承受不了，一直不敢告诉他哥哥被迫害致死的真相。一次春节回家，返回农场的那天，正是正月十五，这本是全家团聚的日子，可我们却要离家远去，父亲送我们走出房门，我们回头透过玻璃门窗，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他拄着拐杖一直目送我们，这一情景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回家期间，多次看到专案组的人来找父亲“谈话”，逼他写检查，承认是“黑龙江最大走资派”，专案组长声色俱厉，而父亲每次都义正辞严地把他顶回去。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之后。由于父亲的“顽固”态度，他长时间得不到“解放”，不能安排工作，但他说：“我不是要作官，而是要革命的，如果我承认是走资派，那是否定了黑龙江省十几年搞社会主义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了解父亲后，才知道这正是他一贯的党性、原则性的表现。他参加革命不为任何私利、无私无畏。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品格是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在黑龙江度过了3年压抑幽禁的日子后，在中央干预下，1972年底，父亲离开哈尔滨赴北京治病。我们仍在盘锦插队，每当农闲放假时，来北京替换一下每日奔波于医院和招待所的妈妈，到医院照顾父亲。

1973年年初的一天，周总理去北京医院看望熊瑾汀和傅作义先生后，走进了父亲的病房。经过几年的磨难之后见到总理，父亲激动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周总理关切地询问了他的病情，叮嘱他好好

休息治疗。1976年1月8日当父亲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悲痛万分，他不顾身体发烧，去向总理遗体告别。以后的许多天，他晚上常常不能入睡，暗自流泪。一天晓光在医院陪护，王震叔叔来看望爸爸，刚说了一句：总理对你一直是很关心的……。两人都说不下去了，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父亲与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和友谊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当父亲受到迫害时，是总理保护了他；当父亲和“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斗争时，又是周总理支持了李富春、王震、余秋里三位老同志站出来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周总理肯定了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肯定了父亲的工作和贡献。这是对父亲的有力支持。父亲平时言语不多，与人的私人交往也不多，但是他对人真诚、坦率、为人正直，他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情谊是真诚的，经得起风浪的考验。

总理逝世后不久，一位老同志的儿子要回西安，临行前向父亲告别，我们当时也在场，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和你父亲及老一代都是经受了許多磨难过来的，现在总理又逝世了，你们这一代要准备经受更大的磨难。”那时“四人帮”还在继续横行，父亲是在告诉我们作好思想准备，经得起更严酷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他的身体也逐渐好转，他参加了五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看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压抑了10年的心情终于舒展了。这时晓明要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学，临行前，父亲向她谈了三条：“第一，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第三，不要靠父母，要走自己的路。”对第三条，他又加重了语气“不要依赖爸爸妈妈，要靠自己闯，走自己的路，爸爸年轻时就是靠自己闯出来的。”父亲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鞭策，不论是在学校还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始终激励着我们，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踏实地工作，不辜负父亲的期

望。

父亲生前很少谈自己，他从不炫耀自己的历史，我们对他的过去也了解得很少。他去世后，我们陆续看到他过去写的文章、讲话稿等等，从别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中了解到他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是怎样为党工作和斗争的。我们深深感到父亲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党员，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特别是在风云变幻的时候，他对党始终忠贞如一，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斗争实践中，他认真学习和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使我们更加敬重和钦佩父亲。现在我们都早已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虽已近不惑之年，却还没有作出什么突出成就和贡献，相比之下，深感不安。纪念我们的父亲，我们更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为捍卫和发展父辈们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欧阳钦同志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戴中溶

1934年，由于懵懂无知，我接受了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分配，去甘肃天水国民党部队第一师胡宗南那里工作。任务是为他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和建立无线电通信网。

译电与电台是通信工作的两个部分。译电室是机要重地，除胡本人和参谋长外，其他人不能擅入，我是例外，因此，我能看到刚译出

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我都能看到。这是后来我为党工作的有利条件。

因为我不安心西北的工作，乘“双十二”事变后，胡宗南去南京，我也离开胡部回上海。1937年春，交大又介绍我到庐山海会寺特训班教书。特训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最高训练基地，是魔鬼的巢窟。特训班对我们“礼聘”的专业教官，表面上很放松，可以自由出入营门，可是便衣特务密布四周，偶而到户外散步，也引起他们注意。信件一般不露痕迹地检查后送到我们手里。我们无异受到幽禁。我受不了这种法西斯统治和恐怖气氛。抗战开始更平静不下来。接到胡部武汉办事处主任程开椿转达胡宗南要我回胡部的通知，又听说胡宗南部队在上海淞沪战场抗击日寇，虽一击即溃，退关中地区整顿，毕竟是一支抗日队伍，我又生幻想，以为回胡部能上抗日前线。所以1938年春我回到胡宗南总部。

胡宗南部队经整顿扩大，由战前的第一军上升为十七军团、廿四集团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西安绥靖公署，可是再也没有出潼关一步，忠实地执行着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方针，我一到胡总部即了解到蒋介石反共内情，他调胡宗南部队到陕西是要包围边区，伺机进犯。我不能参加抗战，反违背良心做屠杀抗日军民的帮凶。悔恨痛苦之极，我决定不能再留在胡宗南部。但何去何从，踌躇莫定。

正在这时，妹妹黄葳从武汉去延安经过西安。1938年11月，她来凤翔看我，我虽不确切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实际她上大学时就已入党），但我急于要把心中积愆向她倾诉。我谈了我的工作情况，也谈了我内心的痛苦和思想活动。我说：“我想找机会去延安，投入真正抗日队伍中去，改名黄苏。”黄葳未作任何表示，劝我暂时安心工作。

不久，我调胡总部任机要室副主任。机要室设有：文书科（机要文件的收发、整理、管理）、无线电管理科和译电组，我能接触到胡部机要的范围比第一师时更广了。

1939年春，组织上决定黄葳留陕西省委工作。在欧阳钦第一次见到黄葳征询她本人意见时，黄葳即将我的情况和在凤翔我提出去延安的意愿向欧阳钦作了汇报。这引起欧阳钦的重视，立即详细询问我的情况，不仅问了我个人经历和思想动态，对我家庭和弟妹情况也作了详细的、全面的了解。经过缜密的、审慎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我的经历虽极复杂，尚不失为一个有志的、正直的、要求上进的青年。利用我在胡部的特殊地位和有利的工作条件，可以为革命做出较大的贡献。出于对党忠诚和负责精神，他大胆果断地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建议让我继续留在胡部发挥作用，得到中央的同意。

在西安，我和黄葳又见面了。我和黄葳会面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这次是她来胡总部告诉我“组织上要我留在胡部工作”。我说：“我很想去延安，但我服从组织安排。”她如此大胆，因为1936年胡宗南最亲信的机要秘书兼机要室主任王微在北平时，黄葳和我弟弟中孚曾以我弟妹关系和清华大学教员身份到王微家访问过。胡总部有很多人知道我有个妹妹是清华教员，所以黄葳来胡总部看我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在一次公共场所，她以偶然相遇方式介绍小张（即罗青长同志）与我相见，接上了关系，以后即在罗青长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从此，在我精神上、思想上发生了截然与过去不同的变化。过去我在胡部工作，良心上受到谴责。而现在则心神愉快地完成这崇高的使命，我在内心中觉得自己可以昂起头来无愧地做一个中国人了。

工作一直是平静的，没有引起人怀疑。罗青长同志介绍从延安来的王金平同志到我处工作。有了联系人和帮手，工作更加顺利。罗回延安，赵耀斌（王石坚）继续与我联系，工作也很顺利。胡宗南进犯

延安前，我和王金平在新成立的交通处工作，他主管交通、运输、通信。进犯前夕，部队、武器弹药和给养调运繁忙。即时性的指挥、调度是用电话直接传达的。交通处内各科室电话昼夜不断，进犯延安的计划实施情况，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这是非常重要的情报资料。我不在，王金平也能掌握。所以我虽随胡总部到了延安，西安方面情报没有中断。

胡宗南和王微是绝对信任我的，我是第一师时代的老人，谁也不会对我有怀疑。1940年4月黄葳生欧阳湘到西安待产时即住在我处，王金平也经常来。后黄葳生湘湘第三天，国民党特务发现黄葳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要逮捕她，是我通过关系通知八办转告欧阳钦，掩护黄葳和孩子脱了险。他们也没有怀疑我。假使不是1947年9月北平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不会有麻烦。北平电台事件涉及到与它联系的各地地下电台，被捕的人很多，赵耀斌、王金平先被捕，我于10月3日被捕。“要犯”于年底从各地解到南京军统保密局集中。国民党专设“特种刑庭”审理此案。绝大多数同志威武不屈，忠贞不渝。敌人也找不到我有任何实质性的“罪状”，以我有妹妹黄葳在延安（这在胡总部包括胡宗南、王微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给我定了“通匪”罪。淮海战役后，南京告急，我们又被解到杭州军人监狱。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才出狱重获自由。

我1949年8月到北京后，分配到军委三局（后改为通信兵部），参了军（授中校军衔）并入了党；1958年调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后到国家科委一局、三局；“文革”中，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合并时，我到中国科学院三局历任处长、副局长等职。“文革”中，国家科委造反派诬指我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幸有周总理、罗青长同志作证，我很快得到解放，而黄葳却以此多了一条“国民党特务”的罪状。

我不好交往，亲友间无事也少走动，自 1952 年我去大连看望生病的妈妈时与欧阳钦第一次会面后，相会的时间不多。我有事去长春光机所先后不下 10 来次，没有顺道去看望过欧阳钦他们。欧阳钦来北京开会，会议空隙，有时来我家，我也曾去他住处。每次会晤时间极短，又不知从何谈起。他的工作和正在开会的情况，党的纪律不容许我多作询问。他却对我的工作备加赞许，语多勉励。1966 年，他参加军委 3 月会议，突然病倒，我去 301 医院看他时，尚在昏迷状态抢救中。“文革”后期，我常去医院或招待所看望他。我们有很多话要谈。在“文革”中，他和黄葳遭受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儿子湘湘又被“四人帮”的追随者迫害致死，我也有许多问题想不通，很想听听他对“文革”的看法。可是他已十分虚弱，讲话很吃力，我又不忍再触伤他的痛处。我们多是默默相对。

回忆 1939 年，他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多么敬佩他的远见卓识和胆略，我认识到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作的决策。以当时的情况，万一失着，对党组织将带来严重的危害。但他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出于经过调查了解后对党内同志和青年的信任，大胆地向中央提出留我在胡宗南部的建议。这不仅使我有了为人民效命的机会，而且使党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内多了自己的耳目，应该说，这是对党的一个重要贡献。从我的这件事身上，也可以看出，他真不愧是一个对党忠诚、无私无畏的老革命家。

欧阳钦传略

武尚文 孙雅坤

—

欧阳钦，字惟亮，曾用名杨清、杨文渊，1900年8月3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邓家冲。

欧阳钦的父亲欧阳玉池，是个读书人。母亲李氏操持家务，靠自学粗通文字，在欧阳钦刚满周岁时病逝。

幼年丧母的欧阳钦，幸得外祖母疼爱，将其抱至家中抚养教育。

外祖父李裕生是乡间的士绅，生活较富裕，因热心倡导资助建桥修路等公益事业，很受乡邻拥戴。外祖父为了寄托对亡女的思念之情，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欧阳钦的身上。在他呀呀学话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念《三字经》、《百家姓》，学认字，吟古诗。7岁时，就把他送入当地私塾读书。幼小的欧阳钦不仅得到较好的文化教育，而且也受到外祖父正直为人、热心公益和公平处事的良好品德的熏陶。

欧阳钦8岁时，父亲把他接回宁乡县，又亲自在家教他3年，至欧阳钦11岁时，把他送入高小学习。少年时代的欧阳钦在外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下，勤奋好学，具有顽强的毅力，因而赢得了优异的成绩。

1915年，欧阳钦考入长沙市的湖南省立长郡中学。他勤于动脑，善于思考，逐渐对枯燥的孔孟经书和八股文章不感兴趣，每每在背诵完指定的课文之后，便广泛阅读古今小说，并被书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所激励。尤其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和辛亥革命的一些文献、宣传品之后，更使他萌发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

在全国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欧阳钦的视野更加开阔。对比当时社会现状，他不仅为宁乡县父老同胞的命运担心，更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人民怎样才能得救？国家的出路又在哪里？欧阳钦苦苦地思索着。然而，那时的欧阳钦，虽然倾心救国，渴望改变黑暗的现状，却还没有找到救国的真正出路。

二

1918年，是欧阳钦在长郡中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华法教育会在北京创办了高等法文专修馆工科班，专门招收中等学校毕业青年，学习一年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然后赴法国勤工俭学。不但有工作，还可有书读。这使欧阳钦欣喜无比，于是他毅然肄业离校，准备赴京。

7月，欧阳钦告别亲人，来到北京，经同乡亲戚成湘的介绍，进入高等法文专修馆工科班（亦称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新思潮的孕育和传播地。特别是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学习社会科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潮。欧阳钦和专修馆的其他青年，在学习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潮的杂志和小册子。在这里他有机会结识了毛泽东、肖三等人，受到深刻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看了北大出版的新思潮杂志等，思想起了大变化。”

1919年3月中旬，欧阳钦提前结束了在专修馆工科班的学习，按华法教育会的安排，由北京抵上海，3月17日上午11时，他和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乘日本远洋轮船“因幡丸”离沪，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于5月4日到英国伦敦。因办理护照在英停留5日，10日上午抵达法国巴黎，受到华法教育会的热情接待。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要找条件较好的工厂去做工，很不容易。欧阳钦等湖南籍、四川籍同学共50余人，暂被分入蒙塔尔纪中学，学习了3个月法语之后，欧阳钦和赵昂、孙杰等人一起，被介绍到李石曾主办的都尔中华印字局做排字工，兼做其他活计。

由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欧阳钦到法国后思想比较活跃，经常参加勤工俭学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1920年，他被吸收加入了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肖三等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的进步团体——工学世界社。

在这里，欧阳钦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在初期，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1920年4月，他在《旅

欧周刊》第 23、24 号上连续发表的《社会改造观》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好的社会”有“很多错误，很多的罪恶”，必须“彻底的改革”。但怎样才能实现改革，他在文章中认为“只要先使人类都受平等的教育，把知识与能力的阶级打破了，那其他的各种的阶级都会迎刃而解的”。他还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类都受平等的教育”，“人人都来劳动”。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欧阳钦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批判，但也明显看出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

1921 年 2 月 28 日，欧阳钦参加了中国旅法勤工俭学历史上著名的“二八运动”，在工学世界社的组织领导下，他同 400 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高呼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用遣送勤工俭学生回国的经费来暂时维持大家生活；同时无条件向中国勤工俭学生开放里昂、中比两所大学；由北京政府津贴每人每月 400 法郎，以 4 年为限。结果，请愿群众被中国驻法公使陈录召来的法国警察强行驱散。在斗争中，欧阳钦看到陈录等中国官员那种蛮横狡猾的态度和被法国警察殴打的同学们的伤痕和鲜血，逐步认清了自己原来的那一套改造社会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同年 9 月，欧阳钦又参加了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9 月 6 日，蒙塔尔纪勤工俭学生，为了解决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全体学员的求学问题，在巴黎召开会议，成立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争取里昂、中比两大学无条件地向勤工俭学生开放。这个要求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迫使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进占里昂大学的行动。勤工俭学生先后两批到达里昂，共 125 人，于 9 月 21 日进占了里昂大学校园。学生代表曾与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磋商，吴拒绝解决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问题，并勾结法国警察，把 100 多名勤工俭学生拘留在里昂兵营。10 月 14 日，除欧阳钦等少数人趁看守疏忽而逃出外，

其余被拘禁的勤工俭学学生都被法国当局于10月间全部押送离法。

由于欧阳钦思想激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翻印了陈延年等人的革命文章；又由于参加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护照被没收。1922年1月都尔中华印字局也以减员为由，把欧阳钦辞退。于是，他不得不去乡间做杂工。数月后，他又设法回到里昂，在里昂中法大学勉强谋得一个旁听位置，学习了近一年。后因经费不支，又停止了学习。

1923年，欧阳钦到巴黎，进入雪铁龙汽车工厂做磨工。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又经过就业——失业——再就业这种艰难生活的磨炼，特别是他投身于大工厂同产业工人一道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增进了同工人的了解和友谊，而且还亲身体验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和伪善。他在工学世界社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述和宣传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时，他彻底批判和清除了自己在初期思想上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4年2月，由林蔚、张增益介绍，欧阳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比映谷团支部的训练干事，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欧阳钦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1925年6月14日，欧阳钦与旅法爱国华人一起，积极参加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7月初，法国当局宣布欧阳钦等许多同志限期出境，他被迫离开法国前往德国。

1925年8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旅欧组织决定派欧阳钦去苏联学习。到莫斯科以后，他被送往郊外莫洛霍夫卡营地（即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在那里，欧阳钦与朱德、王佩璜、唐兆铭等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一起接受军事教育。主要学习军事侦察、巷战、爆破和军事理论等，为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革命的实际战斗进行必要的准备。

三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前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欧阳钦离开苏联，途经香港回到上海，被派往叶挺独立团任见习，参加北伐战争。

欧阳钦一入伍就投入攻平江、打岳阳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同年9月，他被调到聂荣臻主持的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任秘书。

10月下旬，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从广州去四川，推动四川军阀杨森倒戈易帜。他在赴川途中到达上海，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加强四川方面的力量，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暴动。此时，中共中央在军事问题上“是很持重的。……国民政府得武汉后，只求守住武胜关以南，从容统一西南诸省，以准备攻奉之军力”。根据“从容统一西南诸省”的考虑，中共中央对四川军事更加重视，决定派欧阳钦去四川协助工作。

1926年11月上旬，欧阳钦与刘伯承到达万县。在原宝隆洋行朱德办公处开秘密会议，分析万县和全川军事形势。朱德介绍了在杨部的工作情况。他说杨森秉性奸诈，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迈出武胜关，才表面上归服革命。欧阳钦听后气愤地说：“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朱德看透了杨森的本质，严肃地说：“杨哪能交印”。

第二天，欧阳钦随朱德参加了杨森召开的会议。会上，杨森表示，只有有利可图，方可倾向北伐军，没有一点合作的诚意。事实证明，试图用较为和平的方式建立革命武装的设想，是实现不了的。于是，朱德、刘伯承、欧阳钦一起讨论了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州顺庆起义的战略构想。之后，欧阳钦迅速返回武汉汇报，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杨部的动向。

次年初，欧阳钦担任了汉口《民国日报》编辑，并兼任中共湖北

省委负责人张国焘的秘书。出于工作需要，经组织批准加入国民党。4月，被调到中共中央军事部任组织科长，下旬，他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严重关头，欧阳钦根据党的决定，立即转入地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寻找失掉组织联系的同志，帮助他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还帮助暴露身份的同志脱离险境，把一些同志秘密掩护到南昌，以准备参加南昌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欧阳钦留在武汉，在罗亦农主持下的中共长江局任秘书，继续完成秘密转移同志的任务，并妥善地处理了一部分被捕和牺牲同志的善后事宜。由于他辛勤积极的工作，使党减少了许多损失。11月，欧阳钦到上海，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科长。

192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欧阳钦担负秘密护送六大代表从上海路经哈尔滨赴苏的任务，由于他布置周密，使全体代表都安全到达莫斯科。

六大后，欧阳钦在中央军事部先任组织科科长，后任秘书处秘书。当时，中共中央为实现在白色恐怖下工作方式的转变，进行了很大努力，很多领导同志到工厂、农村和社会上寻找职业，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欧阳钦的家也以开咖啡馆为掩护，成为中央军事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各方面的同志看文件，找领导同志谈工作，都要到他家里联络接头。他还担负中央的秘密交通，冒着危险传递信息和文件。欧阳钦以惊人记忆力，清楚地记住许多同志经常变化的姓名和地址。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把上级党的关怀，战友间的情谊化作自己的言谈举止，浇注在同志们的心田。

1930年，在红十四军工作的张爱萍在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

江苏省委秘密送他到上海治伤。伤愈后，军委派欧阳钦与他联络。第一次见面时欧阳钦亲切地、仔细地询问了张的受伤经过、伤情及手术恢复情况，深切地表达了组织的关怀和慰问，张爱萍十分感动，当即提出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的请求，欧阳钦诚恳表示一定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第二次见面时他带来了恩来同志从张身体状况着想，要张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意见。张爱萍听后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希望重返前线的决心。欧阳钦十分理解他的心情，表示一定如实向恩来同志转达。第三次见面，欧阳钦带来了恩来同志同意张重返前线的答复，并告诉他去中央苏区的路线，嘱咐他耐心等候，秘密交通来时，方可上路。三次接触，欧阳钦的老成持重、办事沉稳、待人热忱真诚，给张爱萍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因为秘密工作的规矩，张爱萍却未能问及欧阳钦的姓名，一丝遗憾一直留在心中。直到1932年秋，在江西瑞金红军学校再度重逢，张爱萍才知道眼前这位中等个儿，面庞清瘦，明亮双眸里透出亲切、和善的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便是当年任军委组织科长的军委联络员。

郭述申同志与欧阳钦也有这样一段难以忘却的交往。1928年春，因湖北省委遭到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又被国民党通缉的郭述申，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代表党中央和他取得联系的是一位个子不高，湖南口音很重，比他长几岁的人，这位同志将中央决定派他去湖南省工作的意见转达给他。1930年春，郭述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巡视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三省红军武装部队的情况，接待并和他联系的还是这位湖南同志。他安排郭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并参加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两次接触，欧阳钦在郭述申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也是由于秘密工作的纪律约束，他每一次都是怀着依恋的心情和这位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湖南同志告别。直到1935年郭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再度见到欧阳钦时，才知道他的真

实姓名。欧阳钦就是这样秘密联络掩护了不计其数的同志。他靠敏锐的眼光、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机警果断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的宁都县小布成立。欧阳钦被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在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了近一年时间。每当回忆这段往事，他都十分感慨地说：“在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触中，所得教益颇深。”1931年5月，他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亲身体会到毛泽东战略方针的英明正确，为使中央了解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的情况，中共苏区中央局派欧阳钦去上海汇报。他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时，热情地赞扬了中央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功绩，称颂了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汇报了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对他的汇报和苏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说：“根据XX同志来此的报告，中央很欣喜地知道最近8个月来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与群众的艰苦奋斗情形”。又说，“在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深入，在最近一年多红军的英勇战斗中，在苏区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进攻中，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他的伟大成功。”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后，不断非难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并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同时，也排挤了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同志。1932年春，欧阳钦因为被认为“受毛影响很深”，被调出苏区中央局，到瑞金红军学校，初任中共总支书记，后任政治部主任。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献给了红军建设。他经常在学校办的刊物《红色战士》上发表文章，给红军学校的学员和部队的战士作报告，分析形势、传授知识，受到学员和战士们的信任和爱戴。

1933年冬，欧阳钦调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后改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夏，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长征途中，当部队行至云南白水镇时，欧阳钦不幸被敌机将左肋及左臂上部炸伤。剧烈的疼痛，使他几度晕厥，醒来后，在伤口处敷点药，又顽强地跋涉在长征路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六师被缩编到其他部队，欧阳钦伤已痊愈，又重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聆听了毛泽东传达的遵义会议精神，更加坚定了胜利信心。

同年9月，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欧阳钦任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供给部政委。当时军需物资供应极端匮乏，部队生活极端艰苦，军队后勤供应工作困难极大。尽管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为保证和改善部队供应做出努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1月，毛泽东直接指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对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苏区中央局改称西北中央局（后改中共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国苏区党的工作。欧阳钦调中央局初任秘书长，后任组织部科长。他为了适应党中央把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新局面下工作的需要，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干部调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不久，欧阳钦调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翌年2月，红军主力东征抗日，国民党乘机占领南部地区。由于根据地缩小，5月陕甘省委撤销，为了坚持游击区和半游击区的斗争，成立了陕甘工委，欧阳钦改任陕甘工委主席，并兼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响应，也引起国民党内部

的分化。中共中央为了利用矛盾，实现“逼蒋抗日”，加强了对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所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和争取工作，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中央工委，在有关地区还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加强了对国民党部队的统战工作。同时，还加强了边区的群众工作、武装工作，以及征粮、筹款等工作。陕甘工委的任务，主要是做驻防在陕甘一带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工委主席欧阳钦为争取东北军采取了各种方式，利用了各种场合。派与东北军上层军官以至下级班排长有亲属、同学、朋友关系的十几位同志，以会亲访友为名，向其晓以民族大义及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中共的主张。如派刘培植打入到驻防洛川的一〇五师，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与该师师长和参谋长结识，并就如何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长谈，终于使对方赞同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决不以红军为敌，共同携手，一致抗日。又如 1936 年 11 月 10 日，我游击支队与三十八军驻防富县的王劲哉旅某营，在油坊原发生了流血冲突，欧阳钦派申力生同志与曾在十七路军中做过地下工作，又与王劲哉旅长熟识的孙作宾同志一道进县城与王谈判、磋商，使王旅长认识到“双方互相打是朋友打朋友，双方实力受到损失，抗日国防力量也受到影响”，于是双方决定：一是驻防延安、甘泉、富县地区的王劲哉旅与红军和游击队接壤地段，各自后撤 15 至 20 华里，留出缓冲地区，双方严加约束自己的部队，不准进入缓冲地区活动，杜绝再次发生摩擦冲突；二是互通情报，友谊往来，有事协商解决；三是互相通商。对于那些经过工作还坚持与苏区和红军为敌，不断骚扰、挑衅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欧阳钦则指示工委所辖的 2 个独立营、5 个游击支队，采取武装争取的方式，向对方游击，以牙还牙，对捉到的俘虏，经过教育再放回去，屡捉屡放，以达到对其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的目的。对连排长以下的广大官兵，则采取了宣传教育的方法。工委还办了个小型印刷

厂，印刷标语、传单，欧阳钦经常亲自撰稿，拟定标语口号。他主持编写的《打回老家去》的小册子，在东北军下层士兵中，反响颇大。经过工作，东北军一些官兵对我军的态度日益转好，在红军驻肤施、顾丕、甘洛、石门子、傅村等办事处，经常有东北军往来，与红军关系友好。许多东北军士兵，对于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的宽大胸怀深为折服。有的部队经常将蒋介石对红军作战命令通告红军，作战时向空中放枪。

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欧阳钦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到陕甘工委所属地区检查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及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建设情况。他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制定党的组织发展与党的工作计划，并亲自与东北军中的党员谈话，告诉他们：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营垒必然发生破裂，我们的同志要遵照列宁的教导，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和矛盾，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在提高认识的同时，他布置了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在有条件的部队中建立中共组织的任务。在欧阳钦的耐心帮助下，广大党员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和任务，坚定了信心，掌握了工作方法，更加愉快地工作。经过努力，在东北军的一些部队中很快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若干个党的支部。由于欧阳钦能把争取上层与争取下层相结合，把党的统战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工作相结合，使党的统战工作在东北军中收到了积极效果。

欧阳钦除负责抓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外，还调动工委的各职能部门，如财政部、粮食部等，在工委管辖的3个苏区县，2个白区县的范围内，积极完成征款征粮等项任务，以保证全工委的后勤供给及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此期间，欧阳钦对于工委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党的策略方针、工委工作的情况、问题及经验教训等，都经常向中共东线工委和中共陕北省委报告。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情况，他还

多次，有时甚至二三天一次，以工委或个人名义给周恩来、叶剑英写信请示汇报，及时地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上级机关的指示和鼓励。周恩来曾写信给欧阳钦并转陕甘工委，表示：中央嘉奖陕甘工委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绩。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上级党组织决定调欧阳钦去做杨虎城所部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他从陕甘工委驻地行至中央所在地保安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上级改派他赴西安。在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乘张学良将军派来的飞机先期出发之后，欧阳钦随后也抵西安。

12月25日，秦邦宪代表中央，宣布重建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欧阳钦为省委常委、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重点负责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和西北军中党的工作。省委机关设在西安二府园李焕卿家。

由于国民党的疯狂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中共陕西省委曾多次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因此，省委重新组建后，把恢复全省各地各级党的组织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抓。欧阳钦全力以赴建立省委与西北军党的工作联系，通过在西北军中工作的杨信，很快了解了西北军中党的组织状况及党的工作情况，并通过杨信将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及时传达到西北军党员中去。他还派专人寻找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和作战中负伤失散的同志。他派孙作宾到西安师范与西安地区学生运动负责人董学源取得了联系，并向董转交了省委关于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的一些文件材料。之后，欧阳钦委派董学源前往甘肃接收秘密发展的党员。欧阳钦指示：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些人尽快找到”。在各方协助下，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终于使那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很快回到党的怀抱。陕西省中共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西北军中秘密党员很快达千人以上，这与欧阳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由于蒋介石长期反共，镇压革命，当时，西北军中一些党员，对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采取的一些方针政策很不理解，孙作宾曾向欧阳钦谈过自己的思想，他说：“我到下边给党员传达、宣传释放蒋介石，一致抗日，实际上我自己还没想通呢！”欧阳钦耐心地解释说：“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一致抗日的这一重大决策，是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情况，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是非常正确的。具体地说，就是要把我们党过去提出来的‘反蒋抗日’口号，转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这对于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和发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欧阳钦在积极耐心地做这部分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还派人深入到部队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中，进行宣传教育，使同志们的思想很快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

1937年7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险，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抗战。中共陕西省委积极贯彻中央方针，发表了“拥护国共合作，立刻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宣言。全省各地党组织加紧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作为省委军委书记，欧阳钦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军地下党工作的具体指导。他指示在西北军一七七师做地下党工作的吕剑人，加紧做好部队和驻地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为迎接日寇渡河后将出现的新的严峻形势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吕剑人按他的这一指示，在“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抗战积极性，增强对敌斗争的认识和决心，发动团结地方广大群众一起抗战”的口号下，在合阳、韩城、大荔、朝邑等县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军队中的统战工作，从友军中抽派党员和进步

分子到地方上组织人民自卫队，利用暑假在学生中开办训练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组织妇女联合会，掀起抗日宣传热潮。孙作宾、申敬之等同志也都在三十八军中积极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工作。孙作宾利用老关系，通过赠送革命书刊，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加深了与进步军官、警备二旅孔从洲旅长的友谊，并将其培养为在三十八军发展党员的对象。经过艰苦的工作，党在三十八军中争取了大批官兵，为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

五

193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出版《西北》周刊，宣传组织广大军民，为完成陕西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而奋斗。

此时，欧阳钦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主管《西北》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经费少，编辑人员缺，印刷发行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他发动同志们出主意想办法，多方奔走和努力，克服了困难，《西北》周刊于1938年1月21日正式出版。此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但中共陕西省委仍然处于地下，而公开出版《西北》，就需要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对此，欧阳钦作了巧妙安排，由已经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并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李初梨和曾在高校任教的徐彬如分别挂名为《西北》的“编辑人”“发行人”，为方便对外联系，在他俩住地许士庙街15号挂上了“西北社”牌子，并以李、徐名义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申请了登记证，使《西北》获得了公开出版的合法地位。印刷、校对和发行工作由史悦负责。这使欧阳钦和从事编辑工作的林放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秘密进行地下工作并与党内各方面联系。

欧阳钦除了亲自为《西北》撰稿、编辑外，还经常向省委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西北》编委组稿，以保证《西北》稿件的质量，发挥

其省委喉舌作用。据出版的 40 多期《西北》周刊的不完全统计，欧阳钦仅以杨清笔名发表的社论和文章就有 28 篇之多。这对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欧阳钦以《西北》为阵地，以笔做刀枪，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他的文章论战性强，言简意赅，旗帜鲜明，常常使一些亲日反共的丑类无地自容。为了使他有充分时间写作，省委在民先队西北队部结束时，将该队妇女队长黄葳（笔名陈源）调到“西北社”作资料工作。有了这个方便条件，欧阳钦写文章更多了。在《西北》周刊第 21 期上，他发表了《取消一切派别小组织与执行抗战救国纲领》一文，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1938 年 5 月 18 日，国民党公开登报下令解散陕西 13 个救亡团体，并于 5 月 30 日逮捕了这些组织中的 3 名领导人；7 月，又分别逮捕了这些组织中的另外两名领导人。事件发生后，欧阳钦根据省委确定的方针，在《西北》周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意见》一文。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青年，恢复被解散的抗日团体，并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在《西北》第 41 期上，他发表了《从实施宪政谈到抗战中的民主》一文，论述了实行抗日民主与抗战胜利的关系，痛斥了为国民党摧残抗日力量辩护的所谓“战争时代是军事时代，军事与民主有不相容性”的反动观点。1938 年 6 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中原，威胁武汉，也威胁陕西和西北地区。面临这种形势，欧阳钦以杨清的笔名于 7 月 19 日在《西北》发表了《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一文。8 月 1 日，他又与陕西省委其他领导人关锋（贾拓夫）、张德生、汪锋等共同署名，以《我们对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意见》为题，发表文章。这些文章科学地分析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陕西与西北的严重形势，批判了侥幸苟安的思想，从陕西

与西北的实际出发，分析取得战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动员，武装民众，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原则，宣传解释了中共的有关政治主张和改善人民生活等经济工作方针。《西北》以它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锋，成为西北地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欧阳钦不仅为《西北》撰写了大量稿件，而且为保证《西北》的排印和发行，付出了极大心血，每期付印前，他都迅速地将版面大样画好，并在文稿上注明标题字号与字体，为在有限的纸张上多刊载文章，他每页安排的字数比一般刊物多数百字。他工作极端负责，在创刊初期，每期上机器印刷前，他还要看大样，甚至再校阅一遍才放心。为扩大《西北》的发行数量和邮寄中的安全，他安排地下党员张道吾（介人）在西安当时最繁华的南院门开设了“胜利书店”为《西北》的总经售。把邮寄陕西及全国各地的《西北》包裹，交史悦直接送到西安邮局负责加盖邮戳和打包的地下党员手中，绕过了国民党在邮局的检查。在欧阳钦的努力下，由于采取了多种措施，《西北》的发行数量由初期的2000份，增加到6000份，这在当时其他刊物只发行一二千的情况下是个很高的数字。

《西北》在陕西民众面前高举起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高举起坚持抗战胜利的旗帜，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恼火。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由“溶G”改为“限G”与“反G”，《西北》出版越发困难。同年冬，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一律要将出版物的清样送他们审查。《西北》在送审中，每期都有被删除的段落和句子。欧阳钦指示不改动版面，把被删除的字换成“X”或“口”表示抗议和不满。年底，尽管想尽各种办法，终因印刷厂家不敢继续承印，《西北》出版到第30期后被迫休刊。

1939年春，在陕甘宁边区的淳耀县，“西北社”和安吴青训班用

2000 元合买了一套印刷设备筹建印刷厂。初夏，建厂成功。7 月 1 日，《西北》复刊。在欧阳钦的关怀和领导下，印刷厂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西北》的印刷任务，而且还承担了毛泽东著作的印刷任务。其中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除在《西北》上登载外，还作为《西北丛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了 6000 多册。《西北》在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展统一战线，领导抗战，以及进行党内教育等方面尽到了党报的责任。在它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为它题词：“要把西北上的事办好，人民必须有言论自由”。

1940 年 3 月的一天，敌军两个师，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石门关骚扰，距《西北》印刷厂所在地潘家峪很近。欧阳钦得到情况后，立即派人飞马至潘家峪给“西北社”的安群送信，信中说：“国民党反动派派 2 个师将从石门关通过，距印刷厂很近，要保护好印刷设备，情况危急时可拆卸隐蔽，如与省委失去联系，可组织工人打游击。”为了保护“西北社”和印刷厂的安全，安群遵照欧阳钦的指示，马上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安排。因群众的掩护，加之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通过时没有发生意外，工厂安然无恙。但是，由于形势越来越严峻，向国统区发行已非常困难，印刷厂的安全也受到威胁。4 月，《西北》出版了第 49、50 期合刊后，欧阳钦经请示中央批准，《西北》停刊，印刷设备移交延安解放印刷厂。至此，《西北》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作为宣传部长，欧阳钦不仅对舆论工作高度重视，而且对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也极为关注。1938 年 7 月，陕西省委机关决定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时加强抗日宣传，扩大政治影响，鼓舞广大人民抗日勇气，反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当时，省委机关驻泾阳县云阳镇，对外称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省委决定派两个同志去安吴青训班，请青救三团、战地服务团能歌善舞的同志到云阳给当地群众演一场节

目，谁知人家也接到中央通知，要进行扩大宣传，抽不出人来。欧阳钦听了汇报后指示道：“既然请不到外援，我们就自己搞，能搞成的话，以后就不用再求人。”于是同志们大显身手，各尽其能。白衣和程波涛合写一幕《英勇奋斗十八年》的短剧，苏一平、李冰（曹冠群）合写一出话剧，斯曼尼按《三娘教子》的格式，写一出《新教子》，把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融汇进去，旧瓶装新酒，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抗日热情。

节目排好后，演出地点就定在国民党联保处的戏楼上。演出那天，正逢“国民月会”，群众来的很多。新颖通俗的自编自演节目，吸引了人山人海的观众，十分红火。待到《新教子》出场，群众一听是陕西地方戏秦腔，顾不得前边坐的是干部、首长，潮水般地往前面挤。看到这种情景，欧阳钦立即指示干部们往后退，把前边的好地盘让给群众，让群众看好戏。云阳镇地处关中腹地，人实在多呀！联保处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一下子把联保处给挤“炸”了，群众觉得很稀奇，没想到共产党八路军还能演秦腔！谁不争着、抢着来看共产党的秦腔戏！

戏演完后，欧阳钦很兴奋，半夜把斯曼尼叫去问：“你们搞的那是什么戏？为什么群众那么喜爱？”斯曼尼回答说：“我胡凑合哩！这叫秦腔，是陕西地方戏曲。”欧阳钦说：“难怪群众这么爱看，秦腔好啊！群众爱看就是好戏，搞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工作就上去了。”欧阳钦这一鼓劲，干部们编秦腔、演秦腔的热情一下起来了。除了宣传打日本救中国，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揭露他们派夫抓丁，逼粮逼款，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等等罪行。群众看后拍手称快，认为共产党替他们说了话，出了肚里的气。

1939年，经欧阳钦和赵伯平倡导，省委决定成立业余剧团。欧

阳钦给剧团定名为七月剧团（后改名为西北剧团）。这个剧团既演陕西人民喜闻乐见的秦腔，又演话剧、舞蹈、歌咏，还搞黑板报、漫画等多种艺术的宣传形式，以后，这个剧团变为专业剧团。欧阳钦经常过问剧团工作，听剧团领导汇报，从演出内容、形式、体裁、效果到演员生活问题都关怀备至。剧团努力宣传党中央、八路军的抗日革命思想，活跃省委机关和关中分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并专程到延安向党中央作过汇报演出。在革命斗争中，西北剧团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文化人才。

1940 年秋，剧团调往延安学习演出。行前欧阳钦、张中秘书长前来欢送，欧阳钦微笑着给大家讲了话，嘱咐剧团的同志们要保持以往的优良作风，要讲“三化”，即军事化、政治化和艺术化。指示目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鼓励同志们不怕牺牲，奋勇斗争，准备迎接新中国的黎明。欧阳钦的热情勉励，使这伙青年文艺工作者，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脚步迈得更加有力了。

六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开始把政策由抗日转向反 G。陕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反 G 中心，他们一面加紧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蚕食和摩擦，一面破坏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和抗日救亡组织，并用造谣、恐吓、搜查、放毒、绑架、暗杀等卑鄙手段，迫害进步人士，打击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党活动十分艰险。这年 5 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欧阳钦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他就任后首先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反复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在陕西的反共活动将日益加剧，在抗战初期阶段，我地下党组织暴露或半暴露的同志较多，当前紧迫的任务是如何保存党组织，保存干部，尽力避免损失，以等待时机，发挥作用。省委确定了“以巩固为主”的建党方针。省委认为必须吸取我党历史

上“左”倾冒险主义教训，必要时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把已经暴露身份和不宜在国统区继续工作的干部、党员和进步分子调回边区；未暴露和隐蔽较好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应设法打入国民党基层的各种组织中去，如政权、文教卫生、社会组织、地方武装以至国民党、三青团中去，并允许在必要时，可以加入国民党、三青团。隐蔽下来的党员，主要是广交朋友，不发展或极其慎重地发展新党员，以免暴露政治面目。

这一时期，欧阳钦主持起草下发了《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的通知》《党员须知》和《秘密工作规则》等文件，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促进陕西省中共组织的巩固和工作方式的转变。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省委遂决定一般地停止发展党员。10月，欧阳钦又主持起草了《省委关于开展党内教育运动的决定》，经省委讨论后发布。这个决定强调：巩固党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而巩固党最中心一环，是开展党内教育。为把党内教育运动搞得深入透彻，他撰写了《论巩固陕西的党》一文，文章在叙述党内存在的政治、思想、组织不纯的种种表现后，明确地提出了巩固党的措施。即：加强党内教育；改变党的成分；审查选拔培养干部；增强党的纪律性；注意秘密工作；防止奸细；密切同群众联系等。为促进工作方式的转变，做出了《省委关于外地来省委处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1月，他根据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主持省委具体讨论研究了巩固党的工作并召开有省委全体委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各县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部署了巩固党的工作，改变了一些组织形式。根据这次会议的部署，有的同志被调入陕甘宁边区学习工作，较多的人是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打入敌人的地方组织，利用“合法身份”保存自己，并进行可能的抗日活动。当时陕西三原县委由于缺乏周密的考虑，擅自决定从武字区抽调80多个农民党员组成农民连，到胡乔木、冯文彬领导的安

吴青训班学习游击战术，将我们地下党的力量暴露在敌人面前。反动派派了一个民团准备解散县委经常活动的一个据点——武字区的西庙小学。欧阳钦得知这一消息后，指示他们立即全部由公开转入秘密，把已经暴露的同志调回延安，能够留下的同志转移阵地，减少联系，寻找各种关系，取得合法身份，改变不合时局的活动方式。根据这一精神，一些农村女党员，原先剪成短发的又梳起了发髻或接上了长辫子，知识分子党员尽力和社会人士拉上关系，甚至和教会学校的外籍教师也拉上关系，以“灰色”面目出现，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省委要求各地党员减少互相联系，党支部活动一律改为单线联系，但仍允许慎重地、个别地发展地下党员，允许农村保甲组织搞两面政权等等。是年底，省委机关从云阳移至淳（化）耀县安社村。欧阳钦主持召开的这些会议和发出的文件及所采取的措施，使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落到了实处，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方式的转变，使陕西的中共党组织更加巩固。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G高潮。胡宗南部队纠集地方顽固势力，于1939年12月先后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在这种情况下，为正确认识全陕形势，明确党的任务，1940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欧阳钦在会上作了《从陕西与西北事件说到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今天中国时局的特点是：还在继续抗战——但在抗战中，发生了严重的投降危机；还在继续团结——但在团结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现象；还在继续进步——但在进步中发生了严重倒退运动。报告列举了陕西以至全国不断发生的武装反共摩擦事件，暗害进步团体，逮捕、杀害共产党员，以及进行反G教育与反共宣传等破坏国共合作、不利团结抗日的现象。他指出全陕党员的具体任务是：一、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一切抗战与

民主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有利于群众、也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改善生活的斗争；二、坚持武装斗争，做好参战的准备，不仅为了防止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而且也要防止顽固分子投降反 G 的突然事变；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这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他提出巩固党要搞好党内教育，清理认识，审查干部，加强群众工作，了解具体环境，改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警惕性，严密注意秘密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等八项工作。这次会议贯彻后，陕西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9 月，为了检查对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隐蔽精干”方针的落实情况，欧阳钦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告诫大家不能只歌颂成绩，满足现状，而要强调缺点，要追究产生缺点的原因及纠正的办法。他认为陕西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以至造成党“极不巩固”的原因主要是对时局的估计，有些不周到不充分不精密，缺乏远见；环境好时未充分的准备到环境坏时的工作，工作方式虽有改变，但不彻底。所以对贯彻“隐蔽精干”的政策抓的不紧。在一些地方，由于对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群众的核心等建党理论原则，缺乏深刻具体的了解，甚至出现了某些地方党组织大于有组织的群众；党的秘密工作与领导方式很差，甚至在某些地方党竟变成了半公开的。就此，欧阳钦在会上做了检查，并深刻阐述了将党变成“隐蔽精干”的地下党的战略意义。他将这一方针做了通俗的解释。他说：什么是“隐蔽”呢？“隐蔽”即是组织上的隐蔽，不是政治主张隐蔽；要做到在广大群众中隐蔽，在社会中隐蔽，即群众化、社会化。就是表面上与广大群众是一样的，实际上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党的周围有广大群众作掩护。什么是“精干”呢？精干就是少而有为，精干就易于隐蔽，使组织严密、质量提高，使党成为有群众、

有统战工作、有朋友、有适合环境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地下党。使敌人破坏不到，打击不易，真正成为巩固的堡垒。总之就是要“内无奸细”，“外不孤立”。他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工作上爱铺张，有名无实，好大喜功等易使自己暴露的工作作风，强调发扬“有实无名”，埋头苦干，地下生根，做“后台老板”的风格。

会议以后，欧阳钦领导省委各部门抓了22个中心县委、工委的整顿，把各级党组织领导权都掌握在政治上坚定，有工作能力，会适应环境，懂得新的领导方式，能以社会职业、地位做掩护的同志手中，省委直接审查的干部就有80人。省委还抓紧了干部培训，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党的策略教育，并教育干部学会联系本地区实际情况开展工作。经他提议，省委还储备了一批后备干部，以备发生意外时接替工作。除此，还把“红了”（即暴露了）的干部调送延安学习，不能离开的，也设法使之改业；对接受国民党训练的干部，不无故怀疑，而是区别对待，查无问题的恢复了工作，情况不明的继续考察；把已被敌“溶化”的90多人清除出党。将原来县委领导区委、区委领导支部的领导方式，改变为一般每个负责人联系不能超过二个单位，取消了总支部，划成小支部。在党内开展了防奸细工作，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线，清除了暗藏在党内的坏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就“隐蔽精干”问题，对陕西发出指示，完整地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2月，欧阳钦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了《目前时局下的陕西工作》的报告，报告论证了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的意义，就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提出了10项措施。他还提出要“打入要害”（即主要对象），“打入心脏”（即深入内部），对国民党的工作要从外部摩擦转到内部摩擦。会后，他派人到各地采取谈话、写信等多种方式传达贯彻这一精神。各级党

组织都按省委要求，在国民党内部，在国民党中央军、西北军、地方武装、在乡军人、财政经济部门以及青红帮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以合法形式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一批同情者和积极分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1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使陕西省委有所依托，并同中央联系方便，将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划归陕西省委领导，并组成新的省委，欧阳钦仍任省委书记。5月12日，他主持召开了新省委第一次会议，作了《新形势下陕西党的任务》的结论报告，还代表省委对工作做了部署，提出了全省党组织的八大任务，并对国统区提出仍要执行组织上“隐蔽精干”，多交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对关中分区的工作，对军队、以及对文化、教育、出版、干部培养等方面工作，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1941年7月，欧阳钦在将要调往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之前，对自己在陕西省委的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在西北局召开的常委会议上，他以《关于四年来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工作报告》为题，做了长篇书面发言。他详细地介绍了陕西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全面分析了陕西社会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及对中共的态度，系统地汇报了陕西省委四年来的工作，并总结了经验教训。

七

1941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四分局既是中央调研局的一个分局，又是西北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欧阳钦奉调到西北局筹组调查分局。经努力，至12月，办公地址、工作人员等问题都逐一解决落实，西北局任命他为第四分局副局长。是月16日，在成立大会上，欧阳钦作了报告。他明确宣布调查分局要成为西北局的一个助手，要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作好调研工作。

第四分局下设四个研究室，即：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

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欧阳钦兼任友区研究室主任。他主持友区研究室与调查站组长赵伯平一起对陕西国统区的经济（如银行、资源统计资料），政治（如省党部和省府各厅的秘密与公开的出版物），以及地方报纸、思想文化、地图游记等进行了广泛的收集。他深入调查群众的生活状况，逐项对农产品、工艺品、医药品的价格，以及编织、铁路、金矿等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与劳动时间做详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战前作对比分析，为西北局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942年春，延安整风开始，由于四分局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都从国统区来，在学习文件中，民主空气很浓，思想非常活跃，都自觉联系思想实际。可审干开始后，康生主持开展“抢救运动”，把陕、甘、川、豫等地下党统统打成“假党”、“红旗党”（即在国民党红旗政策下建立的假共产党），结果一夜之间，四局原来自陕甘的一些工作人员有的被关进保安处，有的被锁进窑洞里，剩下的寥寥无几，贾拓夫、欧阳钦以及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等也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曾被陕西省委选为“七大”候补代表的彭毓泰同志也未幸免，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逼她承认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这个自小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党的“七大”候补代表，一夜之间成了“敌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她打懵了，怎么也想不通！不少同志都十分困惑，过去在国统区工作时，一贯对党忠诚、勇敢、坚定的同志，怎么都变成“敌人”了呢？对此，欧阳钦忧心如焚，但身陷囹圄，力不从心。一次，李岷阳打饭时，凑巧遇到欧阳钦同志，他见旁边无人只急匆匆对李说了一句话：“你们有问题就说，没问题就不要说，要坚持真理！”当时坦白运动已经开始，有人在大礼堂已“坦白”了，真假难辨，人心惶惶，欧阳钦在这个节骨眼上鼓励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真是一字值千金啊！

不久，西北局召开干部大会，高岗宣布要枪毙延安县委宣传部长

黄流，并且贴出了处决布告。这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外患内乱，人们忧心忡忡。幸好几天后，毛泽东同志作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人们心中的千钧石一下落了地，大家衷心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在紧要关头拨正了航向。

但是，受过伤害的同志心里是无法一下抚平的，他们有很多怨气和委屈。为此，欧阳钦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刘南生从北方局回到延安后，看到几年前在西安一起进行斗争的那么多对党忠贞，为革命赴汤蹈火的好同志，没有被关进敌人的监狱，却被自己的人锁在铁窗里，一颗伤感、愤怒的心怎么也按捺不住，他找到欧阳钦，要求尽快把被“抢救”的同志解放出来，要求欧阳钦证明这些被“抢救”的同志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绝不会与敌人有任何关系。欧阳钦了解他的心情，安慰他说：“希望你不要性急，我和你的看法一样，相信这些被‘抢救’、被审查的都是好同志。凡是各机关、学校来找我们调查的，我们都写了证明材料，今后我们还要努力找有关单位做工作，尽早把这些同志解脱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欧阳钦让刘南生把西安建党的历史情况和这些同志的表现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有助于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欧阳钦还让刘南生劝慰受委屈的同志，不要背包袱，不要有怨气，要以革命前途为重，经过这次运动，进一步得到考验，会锻炼得更坚强。革命任重道远，更艰巨的任务，正等待这些同志去完成！欧阳钦这一席话，充满了温暖关怀和鼓励，刘南生按照欧阳钦的建议，详细写了一个西安建党情况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为被“抢救”的同志得到解脱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1943年元旦，欧阳钦特意让夫人黄葳把彭毓泰和曹冠群请到家中，安慰这两位受到伤害的年轻女同志，欧阳钦热情地端出红枣、花生招待她们。见到老首长，她们犹如见到亲人，一肚子委屈化成泪水，欧阳钦也很难过，他为自己也被审查，无力保护这些年轻同志感到内

疾。待她们心情平静下来之后，他坚定地说：“把陕西省委诬蔑为‘红旗党’是完全错误的，省委的工作成绩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你们都是对党忠诚的好同志、好党员，省委是相信你们、了解你们的！”沉思片刻，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者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不少坎坷，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困难大多数来自外部，有时也可能来自内部。在敌人的监牢、屠刀面前是考验，在革命队伍内部一时被误解、受委屈也是考验，你们都年轻，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和摔打，更不能对党，对党的事业失去信心，否则就不配作一个共产党员了！”欧阳钦这一番亲切关怀，又批评勉励的话，使彭、曹二人心悦诚服，心里的疙瘩化开了。

在欧阳钦的教诲下，许多同志振作革命精神，开始了新的斗争征程。日本投降后，“抢救运动”的甄别工作结束了。很多同志怀着“真党员，假党员，革命斗争中看行动”的壮志豪情走上了新的斗争岗位，不少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埋人坑前凛然不惧，壮烈牺牲。“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这是“文革”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有关陕西问题的文件和谈话中作出的结论，也是几十年斗争实践证明了的。

1943年1月，欧阳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后任秘书长），主持办公厅工作并兼管调查研究工作。他除处理西北局常委、书记处的大量日常政务、电文、会议、上下联系外，还抓大生产运动，保障蔬菜、煤炭、饲料的供给，对磨豆腐、商店经营等具体问题，他都亲自过问，所得盈利改善机关伙食，弥补办公费的不足。由于欧阳钦工作作风深入，西北局机关干部都尊敬他、爱戴他。当时，“杨秘书长”（欧阳钦当时的名字为杨清）在延安广为人知，而他的真实姓名却知者不多。

1945年4月，欧阳钦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大会制定的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使欧阳钦深受鼓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决心为实现党的七大确定的路线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调任欧阳钦为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经过长期国内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以后，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和休养生息。当时正值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美帝国主义又出面进行所谓和平“调处”。所以，许多人对美蒋的反动本质和进行内战的阴谋一时认识不清，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还抱有某些幻想。鉴于这一情况，欧阳钦和分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抗日战争后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即一方面高举争取和平民主的旗帜，发动领导群众争取和平民主的权力。一方面教育党员和干部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清内战的危险。当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抢占平泉等地时，严正指出我们决不能以退让求和平，而要“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冀察热辽地区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把这个刚解放的新区变成巩固的根据地，在军区和分局的领导下，欧阳钦率领部队转战于赤峰、凌源、叶柏寿等地，领导群众进行清匪反霸的斗争，恢复社会治安，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并配合游击队反击国民党的武装进攻。经过努力，冀察热辽边区各县成立了民主政权，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边区的工商业得到了恢复，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党在冀察热辽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

翌年春，欧阳钦任冀热辽中央分局土改工作团南团团长，到热东地区搞土地改革。热东地区管辖建昌、凌源、朝阳、绥中、兴城、锦

西等 16 个县、旗。

热东地区人民是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但长达 13 年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在这一地区搞生化武器试验，制造“无人区”，百余万群众被赶进“人圈”，地方干部和许多农村党员、积极分子被捕、牺牲，损失惨重。“土匪、鼠疫、大烟土”把这一带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生活很苦，村落里到处是残垣断壁，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加之反动分子的造谣惑众，一些群众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欧阳钦带领地委同志和工作团，深入到农民中间，和贫雇农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的愿望，倾听群众的呼声，给他们算地主的剥削账，分析农民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原因，向他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启发、提高穷苦百姓的阶级觉悟，增强群众同国民党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欧阳钦深入群众调查中，发现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中存在搞土改“工作快了就不能好，工作好了就不能快”的思想。他们追求主观认定的“好”，而工作慢慢腾腾。针对这一情况，他反复强调土改的目的就是解决贫雇农饥寒交迫的迫切问题，挨饿的农民迫切需要土地，我们快一点，贫雇农就少挨点饿，少挨点冻。他批评那种只强调主观规定的“好”，而不讲进度的做法是阶级感情问题。他提出了使土改又快又好的途径，即“大胆放手地把政策交给群众而又不放弃领导，群众就会有本领有力量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解决得很好。”“因为有广大群众参加工作，也就易于避免快中的急性病与粗枝大叶的毛病。”

热东地区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但有的地方政策没有掌握好，出现了对地主“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现象；一些地方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提出“打烂平分”、“抽肥补瘦”、“老牛赶山”，加重中农负担，不让中农参加农会；还有一些地方对基层干部实行所谓“搬石头”

等“左”的做法。欧阳钦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指出，土改工作离开党的领导，踢开区、村干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错误的。他指示把犯有一些毛病、群众意见大的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习土改政策，改进工作作风，再派下去参加土改，从而有效地教育、团结、保护了一批干部。他写文章，发表讲话，宣传党的政策，要求严格执行土地法大纲，分给地主、富农土地和房屋。除了极少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地主，必须经法庭宣判执行外，严禁杀人。对地主富农要执行给出路的政策，他说：“‘老牛赶山’尽给地主坏地，地荒了，有人说叫他要饭吃去，向谁要？还不是向贫雇农要，如果我们不给地主富农生产和生活出路，将来社会上将有10%以上的人口无职业，流浪、行乞，甚至为匪、为盗、为娼。没有生活出路时就要为非作恶，破坏社会秩序，贫雇农也不能过好生活。所以给地主、富农生活上和生产上的出路，实际上还是为贫雇农的利益。”

他坚决反对侵犯中农利益，他说：“我们口口声声说贫雇农领导，如果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中农离心离德，你领导谁？我们口口声声强调‘贫雇农优势’，如果中农中立，甚至暗中还是跟着地主走，你有什么优势？”当时宁城一个区发生地主武装暴乱，就有许多中农参加，杀了我们的干部。欧阳钦深入细致地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之认识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要求凡是发现有违反政策的地方，在复查时，政治上赔礼道歉，错划了成份的中农要改定成份，经济上没收的东西坚决赔偿。他提出：必须打开大门，把全体中农吸收到农会里来，并吸收中农参加农会领导，共同商议贫雇农、中农内部团结问题。当然农会的领导权是应掌握在贫雇农手里。所以，巩固团结中农，就是巩固贫雇农的领导权，如果中农不跟贫雇农走，哪里还有贫雇农的领导权呢？

在欧阳钦的精心指导下，热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走上了正确的

轨道，大体上做到了又快又好。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热东地区的扩兵、征粮、战勤、锄奸等工作都获得了很大成绩，有2万多人参军，有20多万人次参加支援前线和破路斗争，提前完成了征粮任务。特别在辽沈战役期间，热东的一些县就是战场，由于土改后正值丰收年，翻身的农民意气风发，在支前中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出了10万民工参战。建昌一个县有140副担架待命随时出动，邻近战场的凌原等5个县一次预交公粮2600万斤，让子弟兵吃饱吃好。叶柏寿县七区硬是用800头毛驴、16辆大车一次送上粮食10多万斤。

八

1948年7月，欧阳钦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翌年2月改任旅大区党委书记。

旅大当时由苏联驻军实行军事管制，我党在那里尚未公开。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有条约，苏军当局不允许我们实行与其它解放区完全一样的政策和做法，如不允许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不允许像其它解放区那样搞轰轰烈烈的土改等等。干部中对此认识很不统一，争论旅大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区，对旅大是做长久打算，还是暂时支援前线的临时阵地等等。意见的分歧影响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欧阳钦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明确提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作为解放区，它和其它解放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大力支援解放战争，这是共性。但作为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又必须照顾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有外交关系这一情况，在一些问题上不能采取与其它解放区完全一样的具体政策和作法，这是它的特性。同时旅大是工业城市，是战略要地。既然是战略要地，就要和苏军合作保卫城市。他组织干部反复学习，终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欧阳钦和其他地委领导同志一起，从旅大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十六字方针，

并把“两个发展”作为旅大党组织的“两大中心任务”。他告诫干部：“在发展生产与文化两个任务中，生产是最基本的”。“而在整个的生产中，又要把工业生产放到第一位，一切工作都应应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了确保两大中心任务的完成，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旅大两年经济发展计划，要求1949年到1950年两年内，工业生产要提高到146.7%，农业要提高到120%，对于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也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由于欧阳钦提出的任务明确，实现计划的措施具体得当，所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旅大经济就走上了恢复与发展的轨道，取得了活跃经济、稳定市场、改善民生、安定民心的重大成就。为东北和华东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炮弹、炸药以及其他军工产品。生产了大量布匹、被服、军鞋、药品、医疗器械等，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毅、粟裕同志曾亲自签发信件，向旅大党组织和工人阶级表示勉励和感谢。

欧阳钦在注重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还注意抓好农业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而发展粮食生产的关键是解决好干部们对旅大开展土改的认识问题。旅大解放初期，接受苏联驻军的建议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分配官地和文化募捐等逐步消灭封建势力的政策。对此有人认为“不彻底”。《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一些干部强烈要求按照我党所控制的解放区模式进行土地改革。欧阳钦针对干部思想，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顾全大局、服从整体教育。他说：“旅大因照顾苏联外交关系，故暂不能实行土改。只能采取切合时宜的逐渐进展的方式来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但只要等到内外条件成熟时，一下子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也是完全可能的。”1949年8月，全国解放前夕，欧阳钦审时度势，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主持召开了区党委会议，从旅大地区特殊情况出发，做出了《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并报请东北局批准，为照顾苏联外交斗争的需要对党外称“土地调剂”，没有搞急风

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在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些补充政策，如不挖浮财，不许打人，不搞流血斗争等，并规定打击面不能超过全旅大农村人口的 8%的政策界限（对全国规定的幅度是不超过 10%），经过一段深入细致的工作比较好地实现了消灭封建势力的目标，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由于广大农村干部狠抓了春耕秋收的工作，发放农贷，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籽的困难，并提倡精耕细作，改良农具，打电井，用肥田粉等等增产措施，更加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旅大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增长。

旅大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是与欧阳钦严格执行政策，正确使用干部分不开的。当时，由于旅大所处特殊条件，汇集了大批党的干部。从延安、晋察冀、华东、中原两广纵队，山东省委、胶东、渤海、鲁中区党委和北海地委等各解放区都先后派来许多干部。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欧阳钦到旅大后，从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关怀、爱护他们。对各地的干部一视同仁，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当有的干部受到冤枉、打击和诬陷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保护同志。1951年冬“三反”运动开始，高岗挟嫌宣称“旅大山高林深，虎多，虎大而肥，有 50%的干部都贪污腐化”，要整垮一批干部。当时，同利公司经理老红军朱华同志被抓了起来。欧阳钦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问当时任区党委组织部长的胡忠海同志，是否知道朱华同志被关之事。当回答不知道时，他焦急万分地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不让他们把朱华同志搞死。只要不死，什么问题都会搞清楚。胡忠海同志根据欧阳钦的指示，竭尽全力去做朱华的工作。原来高岗想从朱华身上打缺口，把旅大区党委的领导成员打成贪污集团。但实际上旅大区党委没有花同利公司一分钱，也根本没有挪用过任何财物。由于欧阳钦出面

保护，高岗的目的没有达到。“三反”运动结束，高岗又对旅大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高岗反党事件暴露后，有的同志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认为自己被带、被拉做了错事不好工作了，欧阳钦同志发现这个问题立即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会上他郑重地说：“在此，我再一次说明，‘带班子’，‘划圈子’责任在高岗等人，一般地说，被带的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某一个人工作，所有被带被拉的同志都不要背包袱，要愉快地安心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简短的一席话，使到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欧阳钦对同志的真诚关怀和帮助，他的宽宏和高度党性原则，在旅大干部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欧阳钦爱知识，爱人才。“出机器，出人才”是他到旅大后的一贯的思想，他在日常工作和各种会议上曾多次谈到：“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没有知识，没有人才不行。”他曾深入大连造船厂，听取厂工会主席关于八级工王智富、徐积宽、程远章等奋不顾身、无私奉献的英雄事迹的汇报，听后非常激动，他说：“工人虽然语言表达不那么好，其行动就是爱国主义，就是拥护共产党的。”又说：“八年抗战能培养一个将军，却培养不出一个八级工；培养一个八级工得二三十年，造船厂只有六七个八级工，要象对待将军一样对待八级大工匠。”针对当时许多同志文化低，不懂经济的实际，他提出要开展学习运动。一方面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组织文化低的干部学文化，另一方面按东北局指示创立大连大学，培养技术干部，大连大学于50年代改为大连工学院。他还选送年轻有前途的干部出国深造，注意发展科学事业，广揽四方人才。他亲自派人去北京、南京、香港等地，通过地下党组织招聘一批各方面专家和教授来大连工作，使旅大地区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

1950年，欧阳钦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访问。在

毛主席为斯大林同志于我驻苏使馆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敬了欧阳钦一杯酒，表示对他在旅大工作时为增进中苏友谊做出贡献的赞许。

九

1954年8月，欧阳钦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是由原黑龙江省、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合并而成，干部来自两省一市，还有一部分人来自旅大、辽西等地区。如何把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干部团结好，统一他们的思想，是搞好全省工作的关键。做为班长，欧阳钦是善于作团结工作的，在旅大是这样，到黑龙江也是这样。他亲自主持起草合省后第一篇《黑龙江日报》社论《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号召全省干部“主动地团结合作，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集中智慧和经验，作好当前及今后紧张而繁重的工作。”

欧阳钦特别重视抓省委“一班人”的团结。他要求大家互相学习，和衷共济。他以身作则，尊重班子成员意见，重大问题总是拿到会议上研究讨论。他主持常委会，同志们可以互相展开坦率的争论和批评。一旦作出决议，就放手让每个成员大胆主持各自分管的工作，使合省后的黑龙江省委工作很快呈现崭新的局面。

当时，中央把黑龙江省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地区，国家很多大型项目如发电设备、飞机、机器制造工业等都在黑龙江“上马”，这使欧阳钦十分受鼓舞。他立下“建设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的宏大志愿，并为实现这一志愿，不懈奋斗了12个春秋。

欧阳钦专门召开省委全会，认真分析研究全省形势和任务，把全省同志的注意力由一向主要抓农业，引向在抓好农业、林业的同时，大力支援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指出“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谁抓住这一条，谁就会得到一切，谁对这一点动摇，谁就会失掉

一切。”

欧阳钦坚决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根据全省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在合省之初，就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发出尽快实现“三个一千万”的号召，即年产一千万吨粮食，一千万吨煤炭，一千万立方米木材为主要指标的全省工、农、林业发展设想。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紧张努力，仅用了4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个设想。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与副业这几个方面的不平衡。欧阳钦及时发现了这一矛盾，明确指出农业、轻工业和副业是黑龙江的三条短腿。为了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他提出了“保证重点、补长短腿”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实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发展繁荣全省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在农业方面，黑龙江省解放较早，土改也较早。广大贫农、下中农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纷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欧阳钦到黑龙江后，进一步狠抓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省委的领导下，到1955年，全省基本实现了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为黑龙江农牧业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

从全国看，当时黑龙江不仅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而且有丰富的森林、煤炭和其他工业资源，在全国工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欧阳钦主持省委工作期间，非常强调顾全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坚定的，即使是在省里有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也从未动摇过。1954年，全国一些地方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国家急需粮食。东北局负责人林枫专程到黑龙江谈粮食调拨问题。省里一些同志担心调出粮食多了会影响本省安排，农民挨饿，存在一种少调为好的思想。在省里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会上会下各地都喊粮食紧张，省里粮食征购指标迟迟落实不了。那时，欧

阳钦刚刚到黑龙江省，他了解到大家的想法后，毫不犹豫地把与会同志召集到一起讲了一次话，他深刻阐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粮食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提出要“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他站在全局的高度，讲得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他讲话后，分组进行了讨论，县委书记们思想通了，都愉快地接受了粮食征购任务。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征购粮问题又成为突出的矛盾。当时，全国经济形势异常恶劣，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黑龙江的情况也极为严重，1961年全省粮食供应先是突破了“危险线”，接着又突破了“警戒线”，很多人以苞米瓢、豆皮、稻壳磨面制造的代食品充饥。有的甚至将木本、草本植物磨碎掺和在糠面中烙煎饼吃。这种情况下，是年的庐山会议，周恩来总理到各组征求意见谈调粮问题时，没有一个人不喊困难的。谈到黑龙江可否多调出1亿斤粮食时，当时黑龙江省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面有难色，认为不好接受，讲了很多情况和不能多上调的理由，有点僵持不下。周总理说，你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以考虑少调一些。就在大家争争讲讲、周总理有点松口的时候，欧阳钦同志从洗手间回来了，他马上说：“不要讲了。当前国家困难很大，我们是产粮省，尽管也有些困难，节约点就有了，总理的想法我接受了。”周总理十分高兴。后来证明，多调给国家1亿斤粮食，尽管加重了省里的困难，但经过大家的努力，日子还是能够过得去。而后，在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时，他一向强调要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并使之成为省委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1957年8月下旬，黑龙江全省各地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降雨，各江河水位普遍上涨，发生了省里有水文记载以来空前未有的特大洪水。在汛情严重的日子里，欧阳钦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挂电话了解汛情，询问肇源怎么样？后汲家店、张家亮子是否被淹？群众撤出来没有？嫩江水位又涨了多少？松花江洪峰什

么时候到达哈尔滨？……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断与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商讨缓解汛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办法。

8月27日，全省11条主要河流水位继续上涨，省会哈尔滨水位上涨到警戒线，预计受来自南方的低气压旋的影响，在全省各地还将有暴风雨，除哈尔滨外，三肇、呼兰、双城一带水情都很紧张。这一天，欧阳钦主持省委召开两次常委会，制定了“城乡兼顾、首先确保哈尔滨，争取保松浦”的方针，决定：在情况恶化时，牺牲局部，保护整体，牺牲庄稼，保护人畜和财产的安全等紧急措施。就在这天，他与省委书记冯纪新及省委、省政府的其他领导同志，冒着滂沱大雨，视察江北险堤，察看刚抢修完的险段。视察结束后还留在现场与有关人员共同研究了运输、物资供应和通讯联络等问题。

在防汛进入决战的时刻，欧阳钦与冯纪新等省委领导同志再次组成慰问小组，慰问为防汛做出贡献的全体防汛人员。9月2日上午，当慰问小组来到顾乡大堤参加防汛抗洪斗争的军队指挥部时，只见战士们满身泥浆，一脸倦容。欧阳钦心疼地请他们坐下来，与他们亲切交谈。他走进工地广播站，拿起话筒对全体防汛人员讲了话，代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对全体官兵同洪水英勇斗争表示慰问和感谢，并鼓舞他们再接再厉争取全胜。

同一天，欧阳钦率慰问小组又先后到太阳岛、太平区等堤段巡查慰问。当他们来到哈尔滨水泥厂，了解到在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这个厂还照常生产，超额完成8月份生产任务后，欧阳钦紧紧握住厂负责人的手，连声说：“谢谢工人同志们，谢谢工人同志们。”省委领导同志的关怀给全体防汛人员增添了战胜洪水的信心和力量。

9月4日，松花江最大洪峰即将到达哈尔滨，哈尔滨进入了和洪峰决战的紧要关头，这天一早，欧阳钦就把常委们召集在一起，仔细分析这次洪峰的特点和应付洪峰的能力和条件，他提醒大家要特别注

意防风浪、防险情、防破坏和防疏忽大意的“四防”工作，并责成哈尔滨市委，务必在当日白天做好一切准备，以便能够随时行动，应付紧张局势。他嘱咐让各堤段把救护船组织好，安排好，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天夜里，哈尔滨沿江百里长堤灯火通明，如同白昼。18万守堤英雄，迎风披雨，时刻警惕着洪峰的到来。时针指向21时，雨点由小变大，人们眼前仿佛张开一片水的帘幕，堤坝上的灯光变得昏暗了，可是守堤英雄们个个精神抖擞，注视着风浪的变化。防洪大军整整与洪水拼搏了一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欧阳钦也紧张地战斗了一宿。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时时刻刻关心着江水的上涨，堤坝的抗冲击力和沿江城市乡村的安全。当他得知若干堤段发生过险情，在守堤英雄们的抢修下，均已化险为夷时，疲倦的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9月6日，松花江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24厘米。然而，哈尔滨和沿江城市乡村安然无恙。经过10多天奋战，9月17日，哈尔滨水位终于降到警戒水位以下，洪水被制服了，全省防汛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欧阳钦也激动异常。在研究如何总结防汛斗争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他激动地说：“这次防汛斗争，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无穷力量；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动员力量 and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人民群众这种英勇斗争的精神，必将在我省防汛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十

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开发北大荒，把黑龙江省建成一个商品粮基地。1958年，王震率10万转业官兵开进了一望无际的荒原。欧阳钦对农垦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他高兴地说：“‘北大荒’要变成‘北大仓’了，唤醒千年沉睡土地的人应该给他立碑。”他要

求各地从各方面对农垦工作大力支援。全省各地向垦区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木材、农药、农机具、日用品等必需物资；输送了许多大专毕业生和农业干部；有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专家，也纷纷参加了对荒原的勘测、规划和设计；建设和交通部门组织力量帮助进行各项工程和道路桥梁建设；商业、邮电部门在垦区建立营业网点，提供生活方便。文教卫生部门协助垦区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和医院、卫生所；公安、政法部门与垦区共同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等等。

1961年，垦区遭受了严重灾害。在最困难的时候，欧阳钦来到垦区看望干部、战士，送去了党的关怀和温暖。他在讲话中引用《左传》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成语，高度评价了农垦战士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献身精神，鼓励垦荒战士去战胜眼前的困难。根据欧阳钦的建议，这一年省里不但没有向垦区征粮，反而拨去了大批粮食，帮助农场度过难关，他还提议让地方干部参与垦区的领导工作。这对协调双方关系，加快开发北大荒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由于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加上产生了骄傲急躁情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开始，欧阳钦也并未意识到这是错误的，跟着执行了，可是，当各地纷纷放“卫星”，每天都有“奇迹”出现，吹牛、浮夸代替了求实和科学精神的时候，这位老共产党员开始了思索。他发现很多提法是脱离实际的空洞口号；有些做法完全是超阶段不顾本国国情的；有的干脆就是吹牛皮。因此，他坚决反对不进行深刻分析研究，不从实际出发赶浪头的反科学的作法。对此，黑龙江上上下下议论很多，一些同志指责省委“太右”。为了“在省委领导同志头上击一猛掌”，他们请徐水、安国的同志来“传经送宝”。秘书接到有关部门请欧阳钦同志出席“经验”报告会的电话，询问他是否出席会议时，他非常恼火，气愤地说：“粮食生产是科学，有其自然规律，

产量不是无限的，怎么能想产多少就产多少，怎么能天天放‘卫星’？告诉他们，我不去听！”事实证明，那种传闻高产水稻密得惊人，水稻穗上都可以托住小孩的典型，完全是弄虚作假。由于黑龙江粮食生产始终没放“卫星”，省里主管粮食的同志在西安一次会议上受到上面的批评，回来后，欧阳钦同志安慰这位同志，并肯定他在原则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当时黑龙江肇源县想抢先进入“共产主义”，县政府给全县每个农民发了一把牙刷、一筒牙膏，实行供给制。欧阳钦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坚决反对。他说：“全国5亿农民，每人都发一套牙具，谁供得起？就是把商店牙刷、牙膏都拿出来，也不够用。”他对大办集体食堂让农民都到食堂吃饭，也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一搞，非造成浪费不可。他说：“中国人一向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怎么能一下子来个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呢？这不是搞浪费吗？”当听到有的县正在搞黑龙江的“徐水”时，他大为恼火，说：“搞黑龙江的‘徐水’我怎么不知道？现在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吗？”对“昼夜连战”，“冷也翻，冻也翻，十冬腊月当春天”等深翻地的口号，他十分反感，批评道：“地冻了怎么翻？”“‘昼夜连战’还能劳逸结合吗？”当张春桥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条件论，为这股风推波助澜的时候，欧阳钦明知这是有来头的，但在省委常委会上他公开批判这篇文章违反辩证唯物主义，鼓吹唯心主义。他说：“一切应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没有条件怎么能行？”当年秋天，全国普遍搞“小土群”大炼钢铁，到处放“卫星”，对黑龙江压力很大。全省已经抽出20万人炼钢，钢产量还是上不去。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有的同志提出再上一二十万人，欧阳钦坚决反对，他说：“矿石一时挖不出来不会烂掉，但粮食收不回来就会烂在地里，大炼钢铁的人一个也不能再加了。”正是由于欧阳钦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才使黑龙江省大大减少了损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欧阳钦担任第六组组长，在讨论形势和任务时，欧阳钦同志说：“共产风虽然刮的时间不长，但很危险。人们误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失收的损失占10-20%，以致有些地方发生浮肿、夏荒。”他尖锐地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增产无限论。”他说：难道没有胆子地就不打粮食了。当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斗争后，欧阳钦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欧阳钦虽然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从全局上讲，他还是执行了当时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包括一些错误的决策，如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等，但他能较早地察觉错误，扬汤止沸，避免错误发展得更严重。

50年代末黑龙江发现油田，中央决定把它建成特大油田。欧阳钦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全力支持”。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各种物资极为缺乏的情况下，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节衣缩食，把油田急需的粮食、蔬菜、副食、帐篷、汽车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动员了大批医务人员、筑路工人、机修工人和电力工人到油区支援会战。在大庆油田建设过程中，发生了“牛”和“油”的矛盾时，欧阳钦和省委领导果断地做出“牛”给“油”让路的决定。萨尔图的红色草原牧场面积136万亩，拥有奶牛6000多头，羊1500多只，马5000多匹，是我国畜牧业和奶制品的重要基地。可恰恰在这块宝地下发现了宝中之宝——石油，是继续养牛，还是打井采油，牧民们舍不得牧场，甚至发生了牧场职工躺在钻井队的拖拉机前不让开进的情景。欧阳钦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召开常委会议，会上他说：

“战争年代，我们不怕打破坛坛罐罐，才有了一个一个战斗的胜利，现在光计较局部的利益怎么换来大油田！”‘牛’一定要给‘油’让路，要做思想工作。”这是一条方针。当具体执行时，根据实际情况，地下，“牛”服从“油”，地上，“油”服从“牛”。也就是说，地下出

油，地上的牧场也不要马上毁掉，根据油田开发的实际需要，“牛”要给“油”让路。随着油田开发的进程，后来又把红色草原划归大庆油田，从而减少了矛盾，保证了大庆油田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建国 1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第一口油井出油了，欧阳钦高兴的难以自制，当油田的同志赶到哈尔滨向省委报捷时，正在进行的常委会议立即停止，欧阳钦亲切地向前来汇报的同志招手，请他坐在自己跟前，欧阳钦指着地毯上的原油瓶子问：“这里面装的是原油吗？”“是真的吗？拿火能点着吗？”当蘸着原油的纸条燃起的时候，欧阳钦激动了，常委们也都激动地鼓起掌来。欧阳钦感慨地说：“日本人统治我们 14 年，疯狂掠夺我们的资源，还没有发现这里有油。如今，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把埋藏在地下这么深的宝藏——石油开采出来了，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好事。”汇报的同志走了很长时间，常委们还是围着这瓶原油看呀，看呀！怎么也看不够。这是一种长期窒闷后的激动，贫油的帽子曾戴在几代人的头上，嗟来之食的滋味难受啊！如今自己有油田了，人们怎能不激动，不兴奋呢？那时油田还没有正式命名，欧阳钦想起歌唱家李高柔唱的一首《大庆子》的东北民歌，意思是国庆节的时候，老百姓家添了一个孩子，思前想后挑选个有意义的名字，时逢国庆节，最后起名叫“大庆”。他风趣地说：“老百姓家添了个孩子都高兴得不得了，叫大庆，我们在庆祝建国 10 周年的时候，开辟了这么个大油田，更是大喜事。就叫‘大庆’吧！”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从此，“大庆”这个名字随着滚滚的油浪，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欧阳钦一贯重视抓经济建设和生产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956 年 4 月，他主持省委适时召开了文教工作会议，强调“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与之相适应地进行文化建设，使两者互为保证，互相促进，”并指出：必须进一步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切实地从上到下地给知识分子以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1959年在省市干部会议上，他又一次号召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大力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文化建设事业，建立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掌握尖端技术，攀登科学高峰”。他提出要把黑龙江建成“文风鼎盛，文艺繁荣”的地方。在他的倡导支持下，黑龙江省曾几次到关内招聘大批人才，争取北京、上海等地支援，并着手黑龙江大学的创办工作，以后他又对理论研究、科研工作、文化艺术、体育卫生方面，提出很多指导性意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黑龙江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幸福、美丽的地方。他还与其他省委领导同志一起，经常会见全省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各界的专家、教授，具体情况，指导工作。他与科学家肖步阳、作家丛深、曲艺表演艺术家李维信和于世德、京剧表演艺术家梁一鸣和云燕铭、歌唱家李高柔等都经常交往，当他们事业取得成就，为黑龙江省、为国家争得荣誉后，他都亲切会见，有时甚至设宴招待。他十分爱惜这些人才，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特意请杨易辰书记特批一些副食、糖、豆、烟及细粮等给文艺战士，设法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他鼓励这些同志说：“我们黑龙江幅员广阔，地大物博，出粮食、出煤炭、出石油、出木材，工业上我们有三大动力、量具刃具厂、亚麻厂、轴承厂等，你们应该写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和思想，应该写黑龙江对全国的支持与贡献，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嘛！”当他得知小麦育种专家肖步阳研究出的小麦新品种在世界也是首创时，高兴地说：“太好了，这是个创造，我支持你们！”他对烧伤工人张太斌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至今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工人中传扬，张太斌逢人便讲：“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是人民的好书记欧阳钦给的。”

十一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非常注意并善于抓大事，对应由政府管的事情一般都不加干预，而放手由政府去做。对省委的一些具体工作放手让别人去做，而对大事则谋自己出，抓得很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画大字的。”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思想领导上，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早在1955年，在一次有县委书记和企业党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曾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列举了城乡忽视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损失的大量具体事例，阐述宣传工作、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不抓思想教育的危害性。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党的思想工作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每个党员都要把党的思想工作看作自己份内的任务。”他批评某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忽视思想工作的失职行为，这对那些埋头做经济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一次深刻的批评和警告。欧阳钦的这次讲话深入浅出，很多人都对他的报告赞不绝口，认为讲得“解渴”，震动很大。会后人们纷纷说：“宣传部长告一状，省委书记打一棒。”意思是欧阳钦的这次讲话是有些宣传部长告的状，他生气了，发火了！但大家都说，这一棒可打清醒了。这些话一直传颂多年，谁一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人提起欧阳钦那次讲话。1956年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欧阳钦就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作大会发言，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欧阳钦重视思想工作，还表现在抓报纸工作上。他说：省报是党的“喉舌”，是“党手中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省报代表省委，省报的声音就是省委的声音。因此，省委常委根据形势出题目，指定专人写社论。省委工作再忙，重要社论也要安排在常委会上讨论，使党报准确地传达省委的指导思想。他自己则每天都认真地阅读当天的报纸，发现问题，及时让秘书给报社打电话。他经常亲自主持撰写一些重要社论，发表学习理论的体会文章，在他精力和身体许可时，对省报一

些重要稿件也细心审阅。他还多次亲临报社视察、指导工作，慰问职工，大大地鼓舞了报社干部职工热爱党、热爱本职工作的热情。

在抓黑龙江省委工作的12年中，欧阳钦始终坚持思想工作领先，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每当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时他就提出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的要求。早在1954年刚合省不久，他在干部会上就提出：“提高思想，改进作风，是保证完成我们各项工作任务不可缺少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是：永远前进，而不停滞；永远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永远保持整体观念，而不是分散主义、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永远谦虚、谨慎，而不骄傲、虚夸、自满；永远保持应有的高度的政治警惕，而绝不麻痹。”群众在想什么，思想动向如何？他很注意。他经常到工厂、农村作调查，倾听群众的反映、了解群众对形势的评价。1958年4月，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一届八次全委会议上，他提出，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并提出省委工作的摆法是“思、农、工、林及其他”。这个摆法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这个工作次序及其指导思想在全省各级党的工作中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欧阳钦认为：“思想战线从来就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线，没有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思想工作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但最根本的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此，他历来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1955年，在他的倡导下省委举办了高级干部学习班，离职两个月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著作。对于在职干部，则组织他们带着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省委常委的学习中，他循循善诱，引导大家畅所欲言，达到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目的。对工农群众的学理论、学哲学活动，他也同样给予了热情支持。1958

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黑龙江的城乡、工矿、企业、商店、学校有成千上万的人投身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中来，学哲学、用哲学蔚然成风。他经常对大家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是让理论从理论家的课堂上和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劳动人民手里的尖锐武器。”他说：“不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多么神秘和高不可攀的事情”，“广大群众不但能够学，能够用，而且可以学得好，用得好。”他十分关心工人学理论积极分子的成长。一次，他找来省委宣传部负责理论工作的部长，特意询问王洪华、魏淑琴、孙锡仲等学哲学积极分子的近况，他让转告这些同志：“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在他的关怀下培养起来的魏淑琴，1960年3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谈学理论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60年代以后，在理论学习上，林彪的所谓学习方针盛极一时，欧阳钦对此很反感，他说：“立竿见影，怎么个见影法？学习是个慢工夫，今天学了，不知道啥时候用得上，怎么能立竿见影？”他说：“学习这个东西就要潜移默化，是急不得的……勉强地机械套用，就是搞形而上学。”他认为学习方法应“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他看到有的工厂交接班时背诵毛主席语录，批评道：“这有多少用处？还不是形式主义！”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什么都联系，随便联系，表面看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了”。他反对那个“顶峰论”，他说：“顶峰了，再往上怎么上？”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十二

1964年“四清”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当时在黑龙江也有人把干部队伍看得漆黑一团，说什么“现在的干部摸一个烂一个”。欧阳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平时说干部啥问

题没有，现在又说都不好，这是形而上学，如果真把干部通通搞掉，反动派会高兴，那就只好请蒋委员长回来了！”

欧阳钦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在关键时刻能头脑清醒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稳妥地掌握工作发展进程。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对错误不姑息迁就，批评人很尖锐，其严厉程度，往往使被批评者接连几天睡不好觉。但是只要你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他从不“记旧帐”。省委有位副部长，对省委有意见，当面不说背地发牢骚，散布什么“省委定的也不要都听。”在一次会议上欧阳钦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这种自由主义的现象，批评得十分尖锐。这位同志承认了错误。过后，有关部门还让这位同志检查，欧阳钦知道了非常不高兴，他说：“谁让你们这样搞？不是已经批评过了吗？批评了就不要这样搞！”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欧阳钦的批评是“其势汹汹，其心融融”。

欧阳钦不仅爱护干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干部，而且还勇于替一起工作的同志担担子，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他有这个胆量，也有这样的肩膀。熟悉他的同志都清楚，他的这种品质是一贯的。早在1955年，黑龙江省委召开省党代表会议，贯彻全国党代会精神，肃清高饶反党联盟影响。会上很多人在发言中点出了一部分同志的名，说这个是高岗的钉子，那个是高岗集团的漏网分子。被点名的同志中，有些就是新省委的领导成员。欧阳钦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这种态度和看法。他指出这些同志的问题不是那种性质，而且都已作过自我批评，问题已经解决，不应揪住不放。有的同志说他：“不民主”，他也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来说服大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坚持了党的干部政策，而且保证了新省委领导集体的稳定和团结。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黑龙江到会的一些同志在学大庆运动中，大讲评功摆好，而且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评功摆好是不搞阶级斗争”的讲话传出后，干部们压力很大。正在这时，

欧阳钦指示哈尔滨市委“要给下边担担子，搞评功摆好的责任不要由他们负！”正是由于他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为主要领导人应有的品质，所以大家乐于在他领导下工作，有他当“班长”人们都觉得有“主心骨”，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欧阳钦生活十分俭朴。他进城到旅大后，仍和战争年代一样，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对自己还是子女都从严要求。1951年，欧阳钦在湖南农村的一个亲属远道而来，想在旅大市安排一个工作。欧阳钦耐心说服了他，给他拿了路费把他送回湖南，让他安心在农村种地。在黑龙江工作12年，人们很少看到他添置新衣服，但对组织上派来照顾他生活的服务人员，他却十分关心。他常对爱人讲“他们（指服务员）有了困难一定帮助”。每年春节，他都要请全体服务人员和他一家人聚餐，用家中最好的烟、酒、饭招待他们。

十三

1960年4月，欧阳钦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仍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0月，离开黑龙江省专任东北局第二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在养病。得知举国上下都在批判《海瑞罢官》时，他深为忧虑，说：“这样批判，以后谁还敢研究历史！”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搞的那一套持有不同看法。当“打倒”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的时候，他异常愤慨地说：“把老革命家都打倒，不是要孤立毛主席吗？”他对这场所谓的“革命”不理解，他要顶，但是又怎么能顶得住呢？造反派轮番到医院与他纠缠，强迫他承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次威逼中，他发现他们手中有一本印着《三反分子欧阳钦的反革命言论》的小册子，立即竖起眉头，狠狠地抢过来摔在床上，气愤地宣布：“这写得不对！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共产党员，你们这样写是错误的！”不久，他病重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转到北京住院治

疗。1969年，林彪下达了那个“一号命令”。欧阳钦被迫离开北京回到黑龙江被软禁起来。各种各样的折磨使他病情加重，经医护人员一再要求，才允许就地住院治疗，以后又转到北京治疗。但是，住院也不得安宁，“专案组”时时缠着他。他虽然身体和精神上受折磨很厉害，可是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来未屈服。让他承认是“走资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一条证明我是走资派？把别的书记打成走资派我也不同意。黑龙江的工作，是黑龙江的干部和人民干的，黑龙江省委是好的，我如果说黑龙江资本主义复辟了，就对不起广大干部和人民！”整整10年，欧阳钦一直坚持进行着斗争。

中共十大就要召开了，有些同志为了欧阳钦不受折磨，早日“解放”，并得到工作，曾劝说：“你就认了吧！”但是坏人的威逼不能使他骨软，好心的劝告也不能使他心动。他说：“我不是为了做官，我是来革命的！”

在那内乱的年代，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陷害欧阳钦，他唯一的儿子欧阳湘出于革命责任感，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果敢的搏斗，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对其施尽了孽威，逮捕、游街、刑讯……在酷刑下，1968年12月22日，欧阳湘被迫害致死。为了欧阳钦的健康，亲近的人对他封锁了消息。可是，一天、二天；一周，二周；一年，二年……年迈的欧阳钦无数次问：“湘湘怎么总不回来？”亲人们忍着悲痛哄他：“到外地搞尖端工程去了。”“怎么连封信也没有？”“那个地方不让写信。”亲人们的搪塞，使他半信半疑。一天，欧阳钦在房中踱步，无意中发现桌子上有一封未及发出的信。这是他的夫人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要求查明欧阳湘之死……当他夫人从外面进来时，老人已瘫坐在沙发上。他异常平静，只是喃喃地说：“湘湘是在延安枣园长大的……湘湘是个好孩子……”他把巨大的悲痛和愤怒压在心中。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殒坠，使心力憔悴的欧阳钦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增加了他对祖国未来无尽的忧虑，他的心象大海一样翻腾，中国向何处去？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就这么轻易地付之东流？他不相信，也不甘心。出于政治家的敏感，他坚信满天乌云总要散去。“四五”天安门广场的群众示威，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使他透过乌云看到了一丝亮光。就在这年的10月，“四人帮”被粉碎。喜讯传来时，他激动地无法自制，双手剧烈地颤抖，露出笑意的脸上，老泪纵横。他终于等到了阳光明媚的这一天。10年，他憋闷得几乎要窒息。在举国欢腾金色的10月，他怎能不激动异常！

1977年，欧阳钦的病情大为好转，他坐着轮椅几乎天天出去兜风。每逢老同志去看他，总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问东问西，并说等身体康复要回黑龙江看看，他对那里的黑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想念那里的人民。他表示如身体可以一定再去看看延安的宝塔、西安的古城、旅大的海滨……。

1978年3月召开的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欧阳钦当选为副主席，他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给予的职务和荣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欧阳钦虽然年高体弱，仍然壮志满怀，表示要为国家 and 民族的振兴，为党为人民竭尽绵薄。但是因为10年动乱使他从身体到精神都遭到严重摧残，未能如愿。1978年5月15日，欧阳钦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5月22日，邓小平、聂荣臻、王震、蔡畅等领导人组成欧阳钦治丧委员会，22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邓颖超、王震等领导同志出席追悼会。乌兰夫同志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半个世纪以来，欧阳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高度赞扬了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团结同志，爱护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